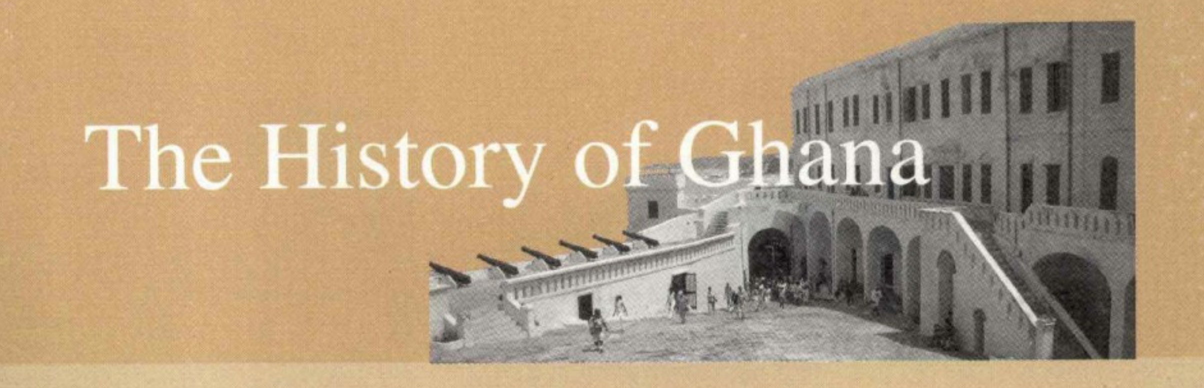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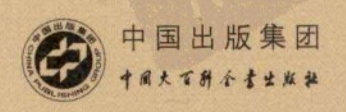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加纳史

罗杰·S. 戈京 著　李晓东 译





The History of Ghana



ISBN 978-7-5000-85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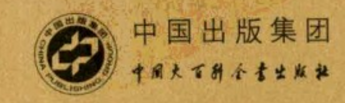
定价：40.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加纳史

罗杰·S. 戈京 著　李晓东 译

The History of Ghana



图字:01 -2011 -05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纳史/(美)戈京著;李晓东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6

ISBN 978 -7 -5000 -8583 -6

(世界历史文库)

I. ①加... II. ①戈...②李... III. ①加纳—历史 IV. ①K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472 号

责任编辑 陆 源 施 楠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言与致谢

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构架一个加纳古今历史的简明框架。该书表述了加纳早期前殖民国家的出现，与欧洲不断增加的接触以及最终于19世纪末来临的殖民统治。该书的后2/3描述的是独立斗争及随之而来的挑战。加纳的殖民历史和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与其他经历过同样历史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挑战交织在一起的非洲国家情形相似。在这个意义上说，加纳的历史完全可以成为许多其他非洲国家历史的前导。当然，加纳历史同时又走过了一个独特的历程，即它是西非第一个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加纳第一位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坚持说加纳的“独立是毫无意义的，除非它与整个非洲的解放联系在一起”。[①] 加纳的历史也在更广泛的泛非主义背景下找到了意义，但同时它又保持了其自身的特点。

应弗兰克·撒克里（Frank Thackeray）教授和“格林伍德现代国家史丛书”主编约翰·E. 芬德灵（John E. Findling）的邀请，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此外还有格林伍德的编辑芭芭拉·雷德（Barbara Rader）、凯文·奥黑（Kevin Ohe）和萨拉·科尔韦尔（Sarah Colwell），他们都对本书篇章节构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① 夸梅·恩克鲁玛:《非洲必须自由》,《夸梅·恩克鲁玛讲话选》第二卷，S. 奥本公司（阿克拉：阿夫拉姆出版社，1997），67页。

此外，我要对许多这些年在帮助我理解加纳过去与现在的历史中起重要作用的人深表谢意。我要特别感谢加纳国家档案馆［现在称为公共档案管理局（PRASD）］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我还深深得益于其主要档案员安东尼·门萨（Anthony Mensah）先生和其他成员的帮助。他们帮助我寻找文件、报纸和传记材料。最值得一提的是肯尼思·索瓦赫（Kenneth Sowah）和弗兰克·阿布罗尔赫（Frank Ablorh）先生。特别是后者，我已经记不清多少年了，成为了我在加纳的私人档案员，为我搜集地方报纸和文件，陪同我到处行走，搜集当代的材料和信息。他对加纳刚过去的历史详尽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也都是无价之宝。在加纳，我还得益于位于莱贡的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图书馆和巴姆图书馆员工的帮助。

回到家乡，我的许多非洲语言学同事也对我完成这部著作贡献良多，对所需强调的内容方面提供建议和线索。我要特别提出我在莫瑟尔学院的同事唐纳德·莫拉莱斯（Donald Morales）博士，他成了我的互联网查询顾问。还有曾在莫瑟尔学院、现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约瑟夫·麦克拉伦（Joseph McLaren）博士，感谢他的帮助和建设性建议，他也曾为格林伍德出版社写过书，以他的经验奉献了许多建议。这两位同事分享了我对非洲的兴趣，补充了很多文学上的看法。我以前在斯坦福大学的顾问们，肯内尔·杰克逊（Kennel Jackson）和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总是鼓励我用新思维来思考非洲历史，也对加纳历史的重点和内容提出过重要建议。纽约新帕尔茨大学纽约非洲研究协会董事会成员和图书管理员科琳娜·尼奎斯特（Corinne Nyquist）亦为我在当地图书馆查询所需资料方面提供了帮助。我还要感谢加纳研究会的同事，特别是伊曼纽尔·阿基亚姆庞（Emmanuel Akyeampong）、戴维·基灵格雷（David Killingray）、塔基瓦阿·曼努（Takyiwaa Manuh）、戴维·奥乌汝—安萨（David Owuru – Ansah）和理查德·塔特伯恩（Richard Tathbone），他们帮助我回答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莫瑟尔学院院系发展委员会和院长办公室在为我 20 多年中多次前

往加纳考察提供资金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没有这持续不断的往返加纳的实地考察，很难了解该国发展的最新情况，寻找新材料，获得当地出版的最新文献。

我的两个妹妹，吉莉恩·戈京—康拉德（Gillian Gocking - Conrad）和罗莎琳德·布赫（Rosalind Bucher）也对这部书的完成起到了间接的作用。许多年来，罗莎琳德生活在伦敦，为研究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大学图书馆馆藏以及大英图书馆那举世无双的材料这一工作提供了最为舒适的基地。这项贡献还不止于此。我们都在英国殖民环境中长大，她们可以分享源自于这个经历的思考，这使我考虑了许多不然就会忽略的问题。她们对我在加纳及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游历的经历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样，我的户外活动爱好者朋友吉登·施瓦兹（Gidon Schwarcz）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对这项计划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兴致，一直用这样的话作为对我的问候：“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要特别感谢加纳人民。在这3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与他们的国家保持联系。他们对结识的对其历史深感兴趣的人一直热情洋溢并充满敬意。他们慷慨地不吝时间来回答关于他们自己、去世的亲属及其社会中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解释对于一个来自非洲之外的人来说由不同结构和习俗构成的超大家族社会的复杂性。正如阿肯谚语所说：单独一个人无法遮蔽神的眼睛（天空）。我清楚需要许多当地人的帮助以画满我这块相对较小的加纳土地的画布。

缩略语

ACDR	国防革命公社协会
AFC	变革联盟
AFRC	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
AGC	阿散蒂金矿公司
A. M. E. Zion Church	非洲卫理公会派教会主教基督教会
ARPB	工人专业团体协会
AYA	阿散蒂人青年协会
BBC	英国广播公司
BNI	国家调查局
CAP	联合呼吁程序
CDR	革命防御委员会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
CNC	中央国家委员会
CPP	人民大会党
CSSV	可可肿枝病毒
CVC	公民数据审核委员会
CYO	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
DPP	民主人民党
DWM31st	12 月 31 日妇女运动
EAC	经济咨询委员会

EC	选举委员会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GLE	加纳全民党
ERP	经济复苏计划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
GAF	加纳武装力量
GBA	加纳律师协会
GCARPS	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
GCP	加纳议会党
GCPP	大联合人民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IHOC	加纳工业控股公司
GNP	国民生产总值
GWCL	加纳水务有限公司
HIPC	重债穷国
IAS	独立非洲国家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CC	国家临时调节委员会
INEC	国家临时选举委员会
ISODEC	综合社会发展中心
JFM	6 月 4 日运动
MAP	穆斯林协会党
MFJ	自由正义运动
MP	国会议员
NAL	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
NAO	新本土管理条例
NCBWA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
NCC	国家文化委员会
NCD	国家民主委员会

NCP	全国大会党
NDC	全国民主大会党
NDM	新民主运动
NEPAD	非洲发展新经济伙伴关系计划
NGO	非政府组织
NIC	全国调查委员会
NIP	国家独立党
NLC	全国解放委员会
NLM	民族解放运动
NPP	新爱国党
NPP	北方人民党
NRC	全国和解委员会
NRC	救国委员会
NRP	全国改革党
NUGS	加纳学生民族联盟
OAU	非洲统一组织
OFY	自给自足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PAC	政治咨询委员会
PAMSCAD	减轻调整社会代价行动规划
PANAFEST	泛非历史戏剧节
PCP	人民大会党
PDC	人民防卫委员会
PFP	人民阵线党
PHP	人民传统党
PMFJ	自由正义人民运动
PNC	人民全国大会党
PNDC	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
PNP	人民国家党

POGR	总统个人警卫团
PP	进步党
PPP	公私伙伴关系
PSP	私营部门参与
PURC	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
RIU	真正塔马利联合
SAP	结构调整规划
SIB	特别调查委员会
SMA	天主教非洲教士会
SMC	最高军事委员会
SRC	学生代表会议
SSNIT	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信托
SSS	高中
TOR	特玛炼油厂
TRC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UC	工会代表大会
UAC	非洲联合公司
UGFC	加纳农民联合会议
UGCC	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
UGM	加纳联合运动
UNC	全国联合大会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A	世界黑人改良协会
UNIGOV	统一政府
UP	统一党
VAT	增值税
VBGC	阳台男孩女孩俱乐部
WAYL	西非青年团
WDC	工人防卫委员会

更　正

地名的拼写以及传统部门和职位随时间变化发生了很多改变。在这部书中我用的都是现代拼写，除非引用时间较早的文献时，不同的拼写方式才会被用到，但仍有一些不一致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 Asante 和 Ashanti。我遵循现在加纳的用法，指地区时拼为 Ashanti，而指人或文化时拼作 Asante。

货　币

直到加纳于1957年独立时，英镑一直是该国的流通货币。然而，英镑在20世纪发生了贬值。在20世纪最初30年中，英镑的官方汇率为1英镑兑换4.86美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镑开始贬值，1931年贬值了25%。当时的官方比价是3.75美元，但其实际价值还在继续浮动。1949年，英镑再次被证实贬值。新的价值是1英镑兑换2.80美元。1957年到1965年，加纳镑与英镑价值相同。1965年起，加纳流通货币是塞地，比价是1：1.16美元。从1967年2月到7月，新塞地比价是1.40美元。1967年7月，新塞地贬值，只值0.55美元，但1972年又上涨到0.65美元。1978年，塞地贬值58%。1980年，官方交换比价到了1塞地兑换0.36美元或2.75塞地兑换1美元。到这个时候，出现巨大的交换塞地的黑市，比价为30塞地兑换1美元。

随着1983年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推行经济复苏计划，塞地贬值到30塞地兑换1美元。从此以后，塞地继续贬值。1988年4月，当政府承认外汇管理局（Forex Bureau）在加纳合法时，塞地的官方价格为185塞地兑换1美元。在外汇管理局，270塞地兑换1美元，但开始逐渐出现两个汇率。2004年末，世界银行的塞地汇率几近9 000多塞地兑换1美元，而在外汇管理局，塞地交易约合9 125塞地兑换1美元。

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50000 年	人类在现代加纳地区定居的最早证据出现。
公元前 10000 年	晚石器时代金坦波（Kingtampo）文化出现。
公元前 2000 年	农业和养牛业在热带稀树大草原地区发展起来。
约公元 1000 年	冶铁技术传入热带稀树大草原并蔓延到雨林地区。
约公元 1000 年	阿肯人和加—阿丹格贝族人出现在热带雨林和赛山。
约 1450 年	热带稀树大草原第一批权力集中的城邦出现：曼普鲁谷、达干邦和纳农巴。
1471 年	葡萄牙人到达海岸。
1482 年	葡萄牙人开始建造圣乔治城堡矿区。
1515—1526 年	葡萄牙人修建圣安东尼要塞和圣塞巴斯蒂安要塞。
1637 年	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圣乔治城堡矿区。

1661 年	丹麦人开始修建克里斯蒂安堡。
1665 年	英国人从瑞典人手中夺取海岸角城堡。城堡成为非洲皇家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总部。
1667 年	阿克瓦穆人的阿肯国侵入并毁坏了大阿克拉。
17 世纪 70 年代	阿散蒂亨奥塞·图图建立阿散蒂国。
1720—1750 年	阿散蒂亨奥波库·韦尔占领邻近的阿肯诸国。
1730—1780 年	阿散蒂占领贡贾和达干邦。
1750 年	非洲皇家公司丢掉了海岸的专营权，被非洲公司取代。
1764—1777 年	阿散蒂亨奥塞·夸多“官僚化”阿散蒂国家。公职资历变得比出身更为重要。
1807—1814 年	阿散蒂人多次入侵海岸地区。
1808 年	英国政府废除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1821 年	英国政府对黄金海岸非洲公司控制的居住区进行行政管理。
1824 年	英国要塞和居住区总督查尔斯·麦卡瑟爵士在与阿散蒂人的冲突中被杀。
1826 年	英国与当地人的联军在多多瓦战役中打败阿散蒂人。
1828 年	英国政府将英国海岸要塞和居住区的控制权归还给与黄金海岸进行贸易的商人。
1828 年	巴塞尔新教会传教士社团成立，克里斯蒂安堡为其总部。

1835 年	第一批卫理公会传教士来到加纳。海岸角堡成为其大本营。
1841 年	R. R. 马登博士调查海岸要塞和居住区管理情况。
1844 年	英国政府恢复对海岸要塞和居住区的控制。副总督与当地酋长签署《1844年条约》。
1850 年	英国购买海岸线上的丹麦城堡和要塞。
1852 年	英国引进人头税以帮助支付当地的管理费用。
1853 年	英国建立其海岸财产最高法院。
1857 年	《阿克拉使者》成为黄金海岸第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
1863 年	第三次阿散蒂战争导致英国屈辱撤退。
1865 年	选举产生的议会委员会建议从海岸撤军。
1868 年	荷兰与英国交换城堡要塞。
1870 年	英国买下海岸的所有荷兰城堡。
1871—1872 年	尝试建立芳蒂人联邦。
1874 年	英国海岸居住区正式成为殖民地。奴隶制被废止。
1876 年	殖民地最高法院成立。
1877 年	黄金海岸殖民地首府从海岸角堡迁往阿克拉。
1878 年	可可由特特赫·夸史（Tetteh Quarshie）从费尔南多波引进加纳。
1880 年	罗马天主教非洲教士会（SMA）神父们到来。他们以埃尔米纳为基地。
1883 年	国家司法权法令通过。

1887 年	奥旁诉阿奇尼案的裁定维护了国王及酋长的司法权。
1896 年	与阿散蒂人的战争爆发。阿散蒂亨普伦佩一世被驱逐到了塞拉利昂。
1897 年	为反对英国政府建立官地并限制特许出售的企图，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GCARPS）在海岸角堡成立。代表团前往英国。
1898 年	阿克拉建立一个高度正义的城市议会。
1900 年	总督霍奇森谋求阿散蒂金凳的之举促使最后一次阿散蒂反抗出现。阿散蒂亨普伦佩一世和其他阿散蒂人被流放到塞舌尔群岛。
1901—1902 年	阿散蒂保护领地和北方地区成为黄金海岸殖民地的一部分。
1902 年	原住民事务秘书处成立。
1903 年	塞康第铁路到达库马西。
1904 年	塞康第城市议会成立。
1906 年	黄金海岸城市议会成立。
1910 年	黄热病爆发，殖民地死 12 人。
1910 年	国家司法权法案通过。
1912 年	西非土地委员会建议国家干预，停止向私人转让殖民地公共土地。
1916 年	总督休·克利福德为了扩大立法委员会而任命 3 位酋长。
1920 年	英属西非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阿克拉召开。
1922—1937 年	阿萨芒克色（Asamangkese）就钻石产区控制权问题发生争论。

1924 年	科尔莱布医院在阿克拉落成。
1924 年	普伦佩一世从塞舌尔群岛被遣返并获准出任库马西的酋长。
1925 年	总督戈登·格吉斯伯格制定新宪法，创立了酋长省议会并增加酋长在立法会中的代表。
1927 年	阿奇莫塔学院正式开学。
1929 年	西非地区法院建立。
1930 年	塔科拉迪深水港竣工。
1930 年	总督兰斯福德·斯莱特试图在殖民地地区征收所得税遇到导致立法的暴乱。
1930—1931 年	非洲可可农组织第一次可可“拒售可可运动”。
1934 年	总督申顿·托马斯制定“讨厌法令”(obnoxious ordinances) 以限制殖民地的不满。中央国家委员会和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派代表到伦敦去抗议该项立法。
1935 年	阿散蒂联盟恢复。普列姆佩二世就任阿散蒂亨。
1935 - 1938 年	I. T. A. 华莱士·约翰逊被判煽动叛乱罪成立，最终判处禁止进入黄金海岸，被送回塞拉利昂。
1937 年	第二次“拒售可可运动”。诺埃尔委员会成立，调查殖民地的可可市场。
1939 年	国家管理法令（Native Administration Ordinance）获得通过，各州创建财政库。
1942 年	总督阿伦·伯恩斯任命两名非洲人做殖民地执行委员。

1943 年	科学家确定了可可肿枝病传染方式。
1944 年	国家法院法令（Native Courts Ordinance）取代政府控制的国家法院。
1946 年	新宪法开始生效，给予非洲人以立法会的多数席位并将阿散蒂与殖民地联系起来。
1947 年	可可销售局成立。
1947 年	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立。夸梅·恩克鲁玛被任命为该组织的书记。
1948 年	反通货膨胀运动迫使欧洲公司降低价格。
1948 年	前军政人员的示威以枪击与骚乱告终，导致 29 人死亡和大量财物被毁。黄金海岸联合大会执行领导人被捕。
1949 年	恩克鲁玛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决裂，组织人民大会党。人民大会党开始“积极行动”。政府囚禁恩克鲁玛及人民大会党领导人。
1951 年	人民大会党赢得新成立的立法会议中的多数席位。恩克鲁玛被释放并成为政府商务部部长。
1951 年	起草 1.2 亿英镑预算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
1954 年	人民大会党赢得扩大立法会 104 席中的 72 席。主要为阿散蒂人党的民族解放运动成立并挑战人民大会党。
1955 年	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反人民大会党集团联合形成统一党。他们主张成立一个联邦政府。

1956年	前德属多哥兰地区举行公民投票，结果倾向于成立一个独立于加纳的联邦。
1957年	人民大会党以有争议的104席中的71席赢得独立之前的最后选举。
1957年	加纳独立。
1958年	人民大会党政府通过《预防性拘留法案》，允许未经审判便可将反对者拘留。
1958年	泛非人民大会在阿克拉成立。
1959年	恩克鲁玛宣布耗资7亿英镑的新的五年发展规划。
1959年	布朗—阿哈福从阿散蒂地区分离出去，单独成为一个地区。
1960年	加纳共和国成立，恩克鲁玛就任第一任总统。
1961年	卡萨布兰卡会议。宣布成立加纳—几内亚—马里联盟。
1962年	恩克鲁玛在库伦古古边境遭遇未遂暗杀。
1963年	非统组织成立，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
1964年	全民公投使加纳成为一党制国家。
1964年	阿科松博大坝工程完工。
1965年	阿克拉成为非统组织的东道主。
1966年	恩克鲁玛的统治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被军队推翻。军队和警察建立全国解放委员会。

1967 年	全国解放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克托卡将军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杀。
1969 年	科菲·布西亚博士的进步党赢得全国选举 140 席中的 105 席，迎来了第二共和国时代。
1969 年	布西亚政府通过外国人遵守秩序法令（Aliens Compliance Order）。约 15 万无居留证的西非人被迫离开加纳。
1972 年	布西亚政府让加纳货币贬值。1 个月后军队上演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1972 年	军事政变领导人伊格内修斯—阿昌庞上校成为新的救国委员会政府领导人。
1972 年	救国委员会政府公布“自给自足”计划。
1972 年	被流放的前总统恩克鲁玛在罗马尼亚寻求治疗时病逝。
1975 年	最高军事委员会取代救国委员会。
1976 年	最高军事委员会寻求建立加纳联合政府。
1978 年	为反对加纳联合政府的思想而成立了自由正义人民运动组织。
1978 年	中级军官迫使阿昌庞辞职；第二届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
1979 年	空军上尉杰里·罗林斯领导了一次反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政变，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国家政权。
1979 年	阿昌庞将军和 7 位其他全国解放委员会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军事领导人被公开执行枪决。

1979 年	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同意全国大选，希拉·利曼博士的人民国家党获胜。利曼博士成为加纳第三共和国总统。
1981 年	罗林斯发动另一次政变。第三共和国解体，以罗林斯为主席的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控制了国家。
1982 年	3 个最高法院法官和 1 位退役少校被绑架、谋杀。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被指控参与了绑架、谋杀。
1982—1983 年	不满的士兵两次尝试政变。
1983 年	100 多万加纳人被迫从尼日利亚返回加纳。
1983 年	全年大旱。加纳雨林地区发生森林大火。
1983 年	阿克拉公共法庭审理了 5 名杀人犯并判其有罪，3 位在押者被执行枪决。
1983 年	加纳货币贬值，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寻求支持，制定经济复苏计划以适应世界银行的准则。
1986 年	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制定第二次经济复苏计划。
1988—1989 年	地方议会选举。
1990 年	自由正义人民运动成立。它呼吁回归多党民主政治。
1991 年	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新的顾问委员会来起草一部新宪法。
1992 年	公民投票赞同一个新的民主宪法和多党政治。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变成全国民主大会党并赢得大选。

目录 *Contents*

前言与致谢 / 1

缩略语 / 1

更 正 / 1

货 币 / 1

历史大事年表 / 1

第一章 导言:透视加纳 / 1

土地 / 1
雨林 / 2
热带稀树大草原 / 5
海岸灌木和草原 / 5
地形 / 6
地理与矿产 / 6
民族 / 8
历史概览 / 12

第二章 前殖民地国家与社会 / 16

史前史 / 16
国家的建立 / 17
欧洲人的到来 / 25
英国势力的扩张 / 31

第三章　殖民统治　/　36

殖民地的建立　/　36

第四章　模范殖民地的政治与抗议　/　50

从市议会到西非全国代表大会　/　50
格吉斯伯格的统治　/　57
萧条岁月　/　63

第五章　战时模范殖民地及其后事　/　73

战时殖民地　/　73
改革的要求　/　75
战后环境:抗议与政治　/　79

第六章　大会人民党与通向独立之路　/　87

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分裂　/　87
积极行动　/　89
1951 年选举　/　91
第一届大会人民党政府　/　94
1954 年大选　/　99
民族解放运动与权力之争　/　101
1956 年大选　/　106

第七章　独立:恩克鲁玛时代　/　110

发展计划与经济表现:1957—1961　/　113
政治王国中对反对派的约束:1957—1960　/　117
对外政策:1957—1965　/　121
向左转:1961—1966　/　128
评价　/　136

第八章　从军事政变到第二共和国　/　152

当权的全国解放委员会　/　152

击退社会主义政策 / 155
回归政党政治 / 158
进步党当政:1969－1972 / 162
政局的失控 / 166

第九章 军人重返政坛 / 169

救国委员会 / 169
恩克鲁玛之死及其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 173
对抗升级 / 176
最高军事委员会取代救国委员会:为联合政府而斗争 / 179
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取代第一任最高军事委员会 / 182
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 / 184

第十章 第三共和国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 / 188

第三共和国 / 188
复临:1981 年 12 月 31 日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 / 192
谋杀法官 / 194
第一个经济复苏计划 / 197
第二个经济复苏计划 / 201
保持控制 / 205
反对派与控制的松动 / 210
1992 年选举 / 213

第十一章 第一届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1993—1997 / 219

议会政府及其挑战 / 219
种族与地域的挑战 / 226
筹备 1996 年大选 / 229
1996 年选举 / 235

第十二章 第二届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1997—2001 / 238

政治路线 / 241
反对派的挑战 / 245

大选 / 248
结果 / 252

第十三章 传统政党当政:2001—2004 / 257

艰巨的任务 / 257
作为在野党的全国民主大会党 / 263
新倡议与新挑战 / 267
2004 年大选前奏 / 273

后记:走向未来,回顾过去 / 278

加纳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 285

索 引 / 299

作 者 / 320

第一章　导言：透视加纳

1957年3月6日午夜，前英属殖民地黄金海岸成为了现代的加纳。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得名于大苏丹加纳帝国，5—13世纪该帝国雄踞西非苏丹区域（热带稀树大草原和西非荒漠草原的结合体）的现代加纳西北几百公里处。现在的加纳位于西非海岸，为该地区16个国家中的第8大国。其土地面积为238 540平方千米，或约92 000平方英里，比大不列颠略大，比美国俄勒冈州略小。该国的主要城市及政府所在地是海滨城市阿克拉，人口2004年推算为近300万，而全国的人口估计为208 000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PPP）］2 200美元（2003年）。[1] 虽然就其土地面积来说相对较小，但加纳在西非为第二人口大国，仅次于尼日利亚。从1993年1月9日起，加纳正式更名为加纳第四共和国。加纳是宪政民主制国家，其国家的首脑亦为政府的首脑。全国被划分为10个行政管理地区。

土地

加纳位于西非海岸线的中段，西经3°和东经1°之间。其最南端，即

①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Ghana" in *The World Factbook* (2004),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gh.html.

三点角，为北纬4.5°，其最北端为北纬11°。其地理位置意味着加纳有一种热带气候，其主要的季节变化只有湿季和干季的不同。这个国家的南半部，大部分由各种热带雨林覆盖，有两个雨季：最强雨季在5、6月之间，之后在9月还有一个短雨季。这个国家的北部，主要为热带稀树大草原林地，只有一个雨季，一般于8、9月份达到其高峰。降雨从半阿西尼（Half Assini）北部热带雨林地区的每年80多英寸到位于海岸热带稀树大草原地带的首都阿克拉（Accra）的每年不足30英寸不等。

从11月到次年4月，被称作干燥热风的东北信风从撒哈拉大沙漠吹入，将干燥和尘土向南一直带到海岸地区。在南方，这些信风从12月持续到次年2月。这是该国的这个地区一年中最冷的时期，而干燥热风季结束、雨季开始之时天气最热。在雨林地区，一年中的白天平均气温只有很小的变化，气温在80F°到90F°之间；但在很远的北面，干燥热风季的日均气温可以升高到110F°，雨季却不超过75F°。

雨林

加纳南部大部分都有两种雨林：常青雨林和半落叶雨林。常青森林中的树木得到更多的雨水因此全年保持葱绿，而半落叶雨林中的树木在旱季落叶，虽然此类森林常常是常青树与半落叶雨林树木杂生。后者因为阳光可以更容易射入，植物越来越稠密，而在常青森林中，超过150英尺的高大树木常常形成华盖，阻隔住了阳光的射入。两种森林都提供了像桃花心木、绿柄桑木、白梧桐、筒状非洲楝和猴子果木等商品树种。那里有超过300种的木材种类，其中许多仅供国内使用。2003年，木材出口达1.74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7.5%。① 木材生产与轮班耕作导致雨林地区大面积空旷。这些地区可以种植非常稠密的比原始雨林小得多的植被和树木使之成为二级雨林，而二级雨林最终可以成为真正的雨林。但不幸的是，农田的压力使之无法实现。

3

① “Budget 2004: A Daily Graphic Special 8 - page pull - out” presented by Mr Yaw Osafo - Maafo, the Minister for Finance and Economic Planning. *Daily Graphic*, February 7,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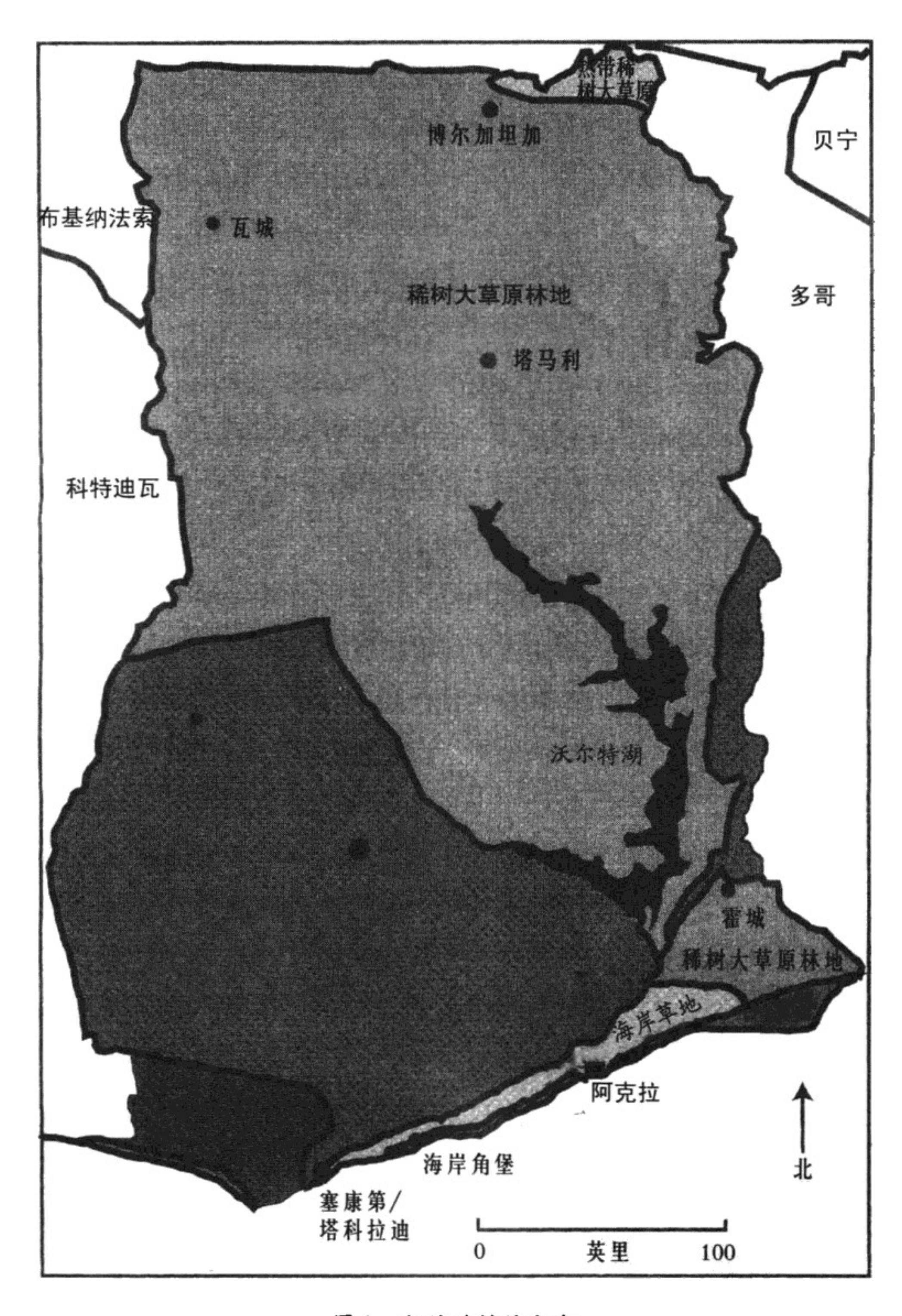


图1　加纳的植被分布

加纳最重要的商品作物可可生长在穿越雨林中心地区的大对角线地带，但最为集中的地带在阿散蒂—阿哈福（Ashanti - Ahafo）地区。

4 可可需要排水很好的土地，丰沛的降水量及高森林树木的树荫，所以许多雨林被用作大量种植可可的土地。可可是继黄金之后的第二大出口物。2003 年，可可出口价值达 8.03 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 35%。[①] 油棕榈为该地区另一重要商品作物，许多油棕榈都是野生的，因为像可可一样，油棕榈在非洲该地区是土生土长的植物。主要种植区是一个离海岸线不远的狭长地带。海岸本身就散布着椰树，像可可一样，相对来讲引进这个地区的时间不长。椰树油，特别是油棕榈果实是重要的食用油资源，大多为国内消费。在油棕榈树干上钻个小洞让它流出液体，流出的液体就是有名的棕榈酒。使之发酵就变成了更烈的酒。棕榈酒也蒸馏制作成一种浓酒饮料，叫作阿克沛特氏（akpeteshie）。可乐树上结的可乐果作为一种柔和的兴奋剂，长久以来一直是一种从雨林地区向苏丹地区出口的重要商品。一些咖啡和柑橘类水果，以及近来越来越多的菠萝构成加纳出产的重要商品作物。

雨林地区的主要食用作物为传统的块根作物和块茎作物。洋芋为该地区的本地作物，还有其他山芋，而亚洲山芋则为新近引进的作物。山芋为加纳人餐桌上的主食。当今更多种类的山芋种植在热带稀树大草原的林地而不是加纳的雨林地区。像木薯这样的块根植物也从国外进口，主要从南美进口。这代表很少的几种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反向收益之一。块根作物在更为广大的地区生长着，为当地人餐桌上最为重要的淀粉来源。玉米是另一种重要的南美进口粮食作物，像木薯一样，它既可以生长在雨林地区也可以生长在热带稀树大草原的林地之中。湿地稻米也在易于浇灌的地区种植，雨林地区与热带稀树大草原丛林中皆可。香蕉及大量热带水果也在这些地区生长。加纳农业一直在轮换耕作以使土地保持肥沃，因为拔去植物之后热带土壤会迅速退化。但是，化肥的不断使用正在改变这种农耕模式。

---

① “Budget 2004：A Daily Graphic Special 8 - page pull - out” presented by Mr Yaw Osafo - Maafo, the Minister for Finance and Economic Planning. *Daily Graphic*, February 7, 2004.

热带稀树大草原

加纳一半以上的土地是热带稀树大草原林地，高高的青草和大量的半落叶树木到处可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酪脂树，为菜油的重要原料。该地区东北的一小部分甚至比苏丹热带稀树大草原还要干燥，那里的草很低，猴面包树和多刺的阿拉伯橡胶树占据主导地位。加纳东部海岸是大面积的热带稀树大草原林地和草地。国家的首都就坐落在该地区，为加纳平均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之一。热带稀树大草原地区最为重要的商品作物是非洲酪脂树果、花生和新引进的棉花。粮食作物主要为谷物，如稻米、小米和高粱（加纳称之为几内亚玉米），高降雨区还有玉米、木薯和山芋。一般说来，该地区的农业由于持续的干旱而十分不稳定。热带稀树大草原大部分过于干燥而舌蝇生存困难，不像雨林地区，没有昏睡病侵扰，因此，养牛成为该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山羊、绵羊和鸡不受造成昏睡病的锥体虫的侵扰，锥体虫造成的疾病在加纳非常普遍。像雨林地区的情况一样，在热带稀树大草原树林中有大量的水果和蔬菜种植，特别是靠近灌溉水源和大量城市人口的地区。

海岸灌木和草原

该地带从一个靠近普拉河（River Pra）的狭窄地带开始，至沃尔特河（Volta River）三角洲地区加宽到 20 英里。该地带的西部有稠密的灌木，几乎直达加纳的首都阿克拉。从这一带开始灌木让位于草地，我们称之为阿克拉平原的地带几乎一直通向沃尔特河三角洲。这是加纳降雨量最低的地区，最大受益来自沃尔特河上阿科松博(Akosombo)大坝的修建及与该工程相关的灌溉规划。木薯是最为广泛的作物，常与玉米、黄秋葵、胡椒、西红柿及茄子等间种。靠近沃尔特河三角洲的地方，青葱种植广泛，而在热带稀树大草原地区，因不受舌蝇侵扰而有大量牛群养殖。沿海岸大部分地区有椰树，构成椰肉干的重要原料，从椰肉干中再提炼出油。海岸开阔，没有海湾，近海海水较浅。这样一来，加纳就没有几处自然港。然而，沿海有大量的鱼，加纳每

年捕获的36万多吨海鱼大多来自这些地区。[1]

地形

6 加纳的地形可以最为准确地描述为长距离地呈现着绵延滚动的墨绿山峦的景象。没有真正的山峦或高地，尽管在有些地区，比如阿散蒂高地、夸胡高原（Kwahu Plateau）和阿夸平—多哥（Akwapim－Togo）山脉，山峰也高达海拔2 300到2 900英尺。这不足以对气候和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仍然是气候变化很小的热带。几个主要河流流淌在加纳的地面之上。最大的河流是沃尔特河。其主要支流为黑沃尔特、白沃尔特与红沃尔特河，发源于邻国象牙海岸或布基纳法索。从1966年起，这些河流与其支脉由阿科松博大坝隔开，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之一。沃尔特湖绵延240英里，其大部分湖体可以通航。湖占据加纳的土地面积约1/6，除了提供运输和国家的大部分电力资源之外，也提供了加纳农业的灌溉用水并支撑其重要的捕鱼业。其他三条重要水系为普拉河、近安科布拉河和塔诺河，流淌在该国的雨林地区。这些河流的流量严重受制于雨季，每条河上都有急流或瀑布限制了航运。

地理与矿产

加纳的地理比较复杂。广大的热带稀树大草原由被称作沃尔特盆地（Voltain Basin）的沉积岩构成。在北方和南方都有由较古的页岩、砂岩和玄武岩构成的高原，有些岩石源于古代火山。特别在南部，有大量的岩石褶皱形成山脉，被称作阿夸平—多哥山脉。再向南，沃尔特盆地西部和北部是较古老的前寒武纪岩石夹杂着花岗岩。两大主要系列清晰可辨，比里姆（Birrimian）和塔库瓦伊安（Tarkwaian）成为该国家最为重要的地理构成。加纳大部分黄金、钻石和锰都产自比里姆和塔库瓦伊安岩石，而矾土的丰厚沉积层也在这些地区被发现。

---

[1] J. Atta－Quayson, ed., *Macmillan Atlas for Ghana* (London and Basingstoke: Unimax Publishers and Macmillan Educational, 1995), 13.

这些矿物中，金矿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矿藏，金子在该地区被挖掘，因此，欧洲人称之为几内亚黄金海岸，后来简称为黄金海岸。过去，黄金大部分来自雨林的小溪和河流的冲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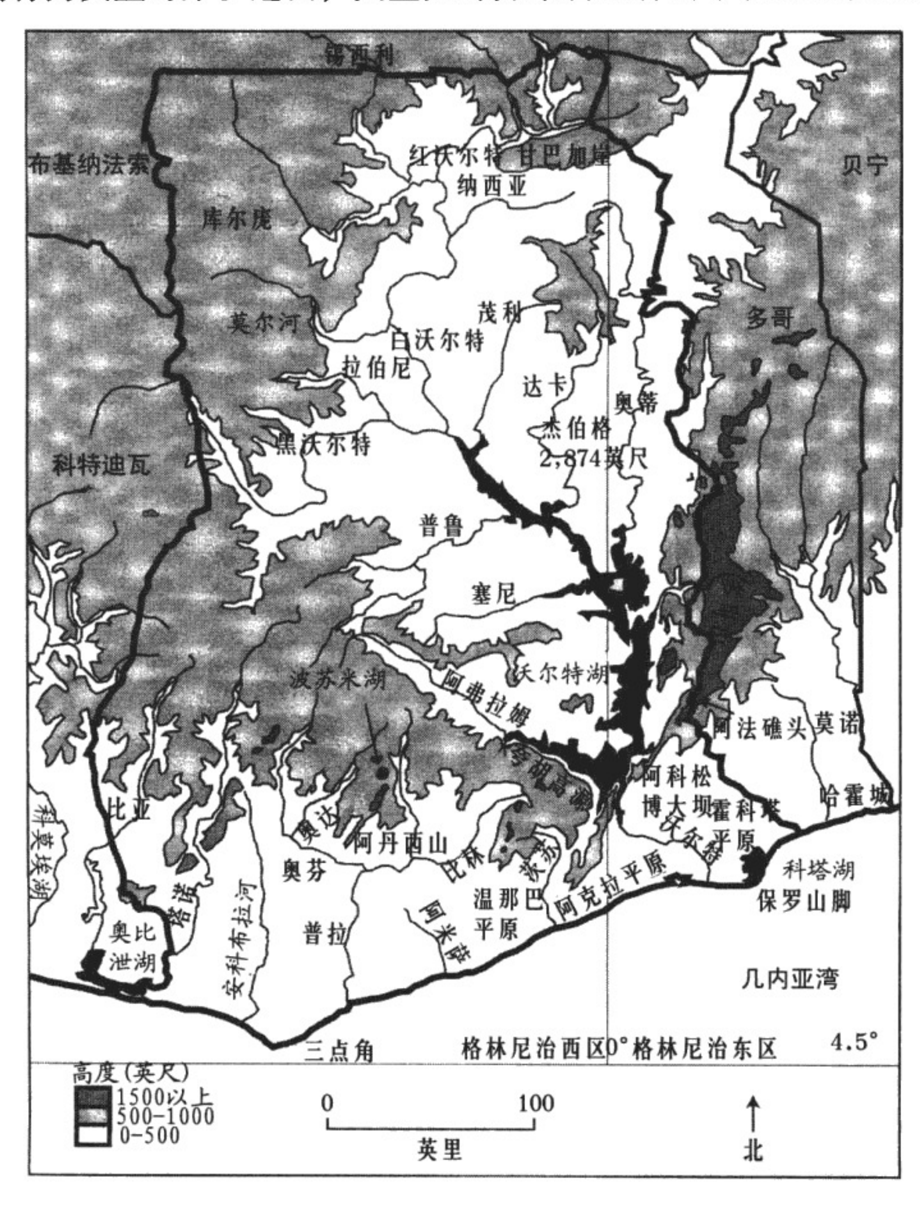


图2　加纳的地理环境

层矿床，以及海岸的沙土中，被河流和雨水冲刷而下。[1] 也有竖井掘金的，仍然使用传统技术，今天在加纳被称作加拉姆西（galamsey）

---

① Raymond Dumett, *El Dorado in West Africa: The Gold-Mining Frontier, African Labor, and Colonial Capitalism in the Gold Coast, 1875-190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

掘金，但现在金矿的开采大多为露天开采或地下开采，需要重型机械和大量的开采资金。这些深井有的深5 000多英尺，集中在狭窄的从南部塔夸（Tarkwa）到北部科农戈（Konongo）雨林地区边缘的塔库瓦伊安地区。2003年，加纳的黄金产量超过2 270 000盎司，价值8.3亿美元，相当于加纳出口总收入的36%。[①]加纳曾是非洲第二大黄金生产国，仅次于南非共和国。

稍次于黄金的是钻石开采，其中大多为工业钻石。加纳有两个主要钻石出产区：位于东部地区的普拉河的一个支流比里姆河周围的较大的比里姆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邦萨阿（Bonsa）峡谷。在前一个地区，开采者主要为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而在后一个地区，开采者主要为成千上万的非洲采矿者。钻石大多为冲积型。2002年的钻石出口价值2 100万美元。加纳还拥有重要的锰矿沉积，大多来自西部地区恩苏塔（Nsuta）非常丰富的矿藏。2002年锰出口价值3 160万美元。这里还有大量的矾土沉积，在塞夫维安维—贝夸伊（Sefwi Bekwai）地区附近有世界最大的矾土沉积区。1941年加纳才开始开采矾土矿，但2002年就开采了663 000多吨，被船运到加纳境外的氧化铝生产工厂。来自该项资源的出口收入高达1 480万美元。[②]

民族

40%的加纳人为阿肯人（Akans），主要居住在加纳的雨林地区。阿肯人可以进一步分成11个子群，其中最大的几个分别为阿散蒂人（Asante）、芳蒂人（Fante）、阿肯人（Akyem）、阿克瓦穆人（Akwamu）和恩济玛斯人（Nzimas）。他们的语言都非常相近，构成较大的西非部分民族所属的克瓦语（Kwa）群。他们为传统的母系社会。阿布苏阿（abusua）成员身份或世系由母系血统确定，这就意味着财

① "Budget 2004"

② 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The State of the Ghanaian Economy in 2002* (Legon, Ghana: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Ghana, 2003),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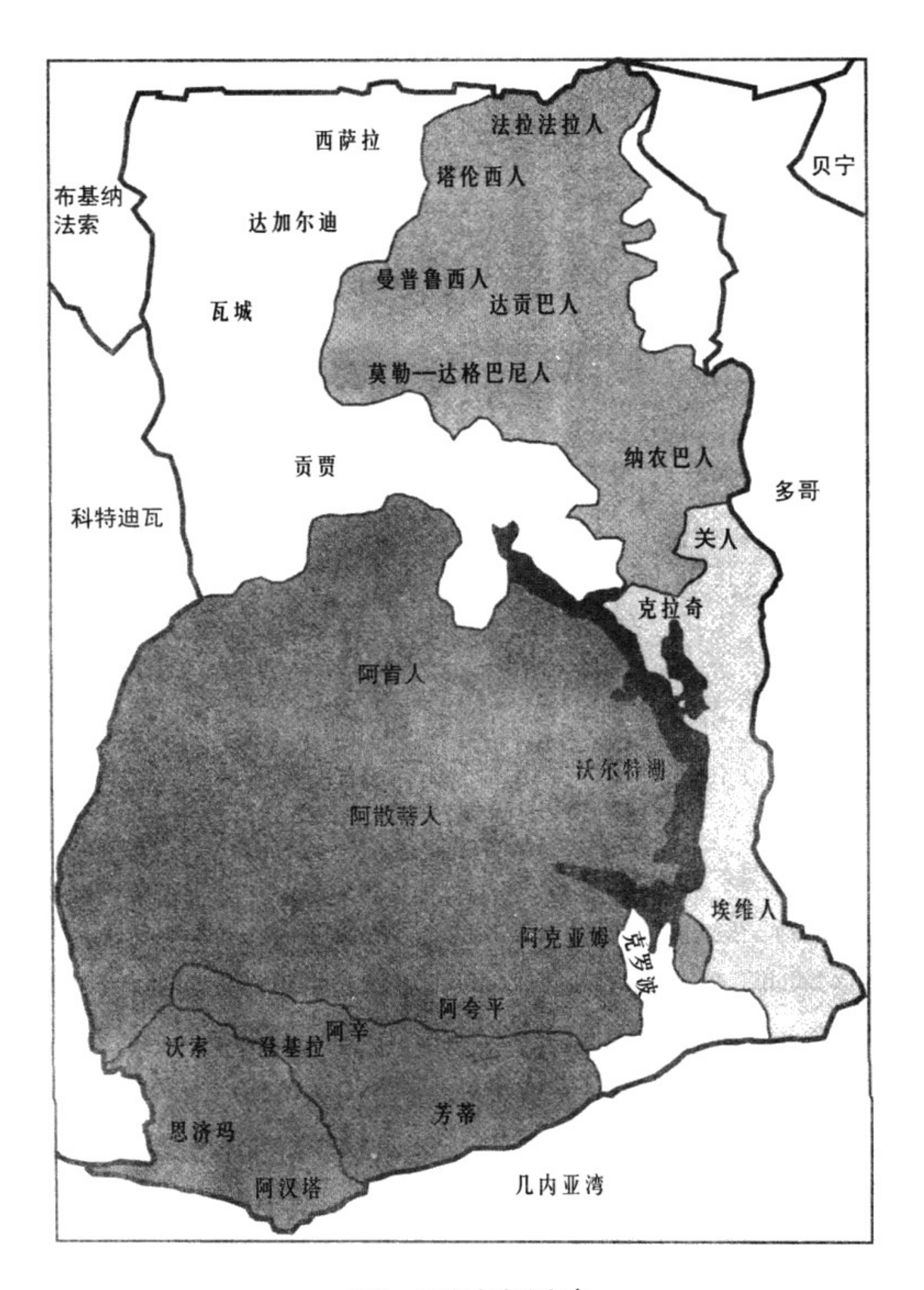


图3　加纳的种族分布

产继承由舅舅传给外甥，就像传统的酋长职位的继承一样。这说明被称作“凳母”（stool mothers）的女性在决定继承权的时候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1] 有些职位，特别是传统的被称作阿萨福体系（asafo）的传统军事组织中的职位，还是作为父系形象（sunsum）依父系传承。这使一些人类学家推测，这些族群，特别是芳蒂人，遵行一种双系体系。[2] 但即使在海岸地区阿萨福体系最为发达的芳蒂人族群中，母系世系仍非常明显地占据统治地位，甚至到了今天，这些公共机构中的重要职位仍常常传给外甥。

9 莫西—达戈姆巴族（Mole – Dagbani）是加纳第二大种族群，包括16%的人口，主要居住在北方。他们可以继续划分为更小的族群，如纳农巴（Nanumba）、曼普鲁西（Mamprusi）、莫西（Mossi）、法拉法拉（Frafra）、塔伦西（Talensi）和达贡巴人（Dagomba）。从语言上讲，他们属于古尔（Gur）语群，为西非热带稀树大草原地区两个主要语群之一。像其他牧牛的热带稀树大草原人一样，他们是父系社会，而经年累月的伊斯兰影响也强化了这一特征。[3]达贡巴人和曼普鲁西这类族群中的人像阿肯人一样聚集生存，而其他像纳农巴和塔伦西这类的族群，却以小氏族部落形式居住，由血缘纽带将其连接在一起。

10 第三大族群是埃维（Ewe）人，占国家人口的13%。他们主要居住在沃尔特湖东边，许多扩散到了邻国多哥。他们操各种不同的方言，尽管其中有一些小的非埃维语族族群，像阿克帕福人（Akpafu）、卢洛比人（Lolobi）和里克匹人（Likpe），居住在该地区的北部，讲着不同的语言，但还是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语言实体。一般推测他们为父系社会，但受阿肯人影响最大的南部埃维人（Ewes），母系影响非常广泛。

---

① 凳子，常由木头雕刻而成，是阿肯人最重要的权力象征。

② James Christensen, *Double Descent among the Fanti* (New Haven, Con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1954).

③ 人类学家认为，牧牛民族必然是父系的，因为他们将值钱的牛作为彩礼，结果孩子都随父亲的世系。

毫无疑问，加人（Ga）和当梅人（Dangme，又称 Adangbe）构成了该国人口的约 8%，居住在围绕其首都阿克拉最为国际化的地区，这些地方的阿肯化走得最远。这里不仅语言受到主要的阿肯语言契维语（Twi）的影响，而且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里有大量的阿肯制度和文化的“Gaisation”①。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母系社会的影响。从传统上看，加人是父系社会，但如果放在更大的与阿肯人通婚的历史背景上看，加人的继承体系有着很长的受阿肯人习俗影响的历史并不令人吃惊。然而，地理和历史的共同作用使中央集权化国家很难在该地区出现，直到殖民统治的到来。该地区的人一直居住在分散的、小的、非常独立的阿库齐（akutsei）或地区的岸边居住区。现代的当梅人，包括像赛人（Shai）、宁戈人（Ningo）和克罗博人（Krobo）等远离阿克拉居住，也受到了阿肯化影响。

在余下的 19% 加纳人口中，有像散居在从北部地区的贡贾（Gonja）向南一直到海岸的温尼巴（Winneba）大弯地区的关人（Guan）和加纳西北部的数量不超过几十万的洛达基人（Lodagaa）这样的较小的族群。加纳还有一个从邻国吸纳其他非洲人的悠久历史。在许多情况下，族群横跨国界，让人很难判定谁是国民谁不是国民。毫无疑问，在沃尔特地区的埃维人中，这个问题最近特别突出。在独立时期，一个小集团意欲与多哥的埃维人联合建立独立国家。

其他非洲人来自较远的地区。西非的其他英属殖民地（甚至加勒比海地区）之间的联系加速了这个进程。塞拉利昂人、冈比亚人和尼日利亚人中的大多数过去一直在利用这些机会，但今天无疑是尼日利亚人占据了优势。他们当中许多人已几代人生活在加纳，融合在了当地人口中。最后，这些非本族人一定也被包括在了像叙利亚人、黎巴嫩人等亚洲人这样的非非洲土著人的行列之中，其中有些民族的祖先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移居加纳。他们与数量不大的主要来自

---

① John Parker, *Ga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Colonial Accra, 1860 – 1920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5), 25.

欧洲的移居者一起为加纳人口增加了国际形象。特别是从独立时候起，一小部分非洲裔美国人口也定居于加纳。他们的数量大约在1 000人，主要居住在首都地区。一般说来，加纳人口比较年轻，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一样，38%的人口在0－14岁之间。①

63%的加纳人表示他们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② 人口的15%到25%为天主教徒。作为一个天主教会重要性不断增加的标志，2003年，大主教彼得·阿皮亚·特克森（Peter Appiah Turkson）被任命为加纳天主教会的第一任红衣主教。主要有卫理公会派教徒和长老会派教徒构成的新教徒成为基督教人口的第二大成分，约占25%。还有其他数量较小的基督教徒，像英国国教徒、七日耶稣再临派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和大量的独立基督教会，名称各异，比如称作超俗世教徒或圣灵降临节集会教徒。这些独立教会是基督教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他们从已建立的教会中拉走成员。最近的估计认为，他们的数量之高已占所有基督教徒的22%。③ 穆斯林约占人口的16%，大部分居住在北方，但在加纳许多南方城市中也有具有规模的团体。约21%的人宣称信仰本土宗教信仰。④ 还有一些其他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和犹太教吸引着小量的追随者。

历史概览

现代加纳的大部分早在早期石器时代或5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到了公元前2 000年开始的时候，农业和养牛业已在热带稀树大草原地区发展起来，紧接着到来的是定居的村庄公社。公元2世纪开始时，冶铁技术进入该地区，使在南方雨林地区种植较稠密的蔬菜变得更加容易。小股带着这些高超技术的移民给早期定居者很大的影

---

①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相比之下，美国的数字是20.8%。

②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③ David B. Barett, George T. Kurian, and Todd M. Johnson,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7. 第三世界的统计数据一般常年开放供咨询。

④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响，最后吸纳了他们。大约在10世纪左右，阿肯人和加—当梅人是该地区首先出现的截然不同的人口。

然而，正是在热带稀树大草原北部最先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中许多都是在伊斯兰教影响下诞生的，这些国家成了伊斯兰文化的重要中心。在17世纪，该地区有了一个南方雨林地区的强大邻邦——阿散蒂人的阿肯国。到了17世纪，北方大多数并入了阿散蒂联邦(Asante Confederacy)。

南方国家的建立受到来到这里的欧洲人的影响，最早是葡萄牙人，他们于15世纪末在海岸地带安顿下来。其他欧洲人接踵而至。他们与当地人结成联盟，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英国人与阿肯人一支的芳蒂人的联盟了。在17世纪早期，该联盟阻止了阿散蒂人向海岸的扩张。

英国势力在海岸的扩张必然造成与阿散蒂人的冲突。英国政府在两种政策间摇摆，正式接管该海岸地区或将该地区交给在海岸地区做生意的商人。最终，1874年，在成功地入侵阿散蒂帝国之后，英国政府宣布该地区为黄金海岸殖民地。1901年阿散蒂人的最后一次反叛之后，英国人将阿散蒂纳入其殖民地。对其他欧洲势力可能吞并北部的顾虑促使英国人于1902年宣布北部地区为其保护国。出于所有现实目的考虑，这三个地区成为由一个统治者管理的政治单位。

殖民警察，特别是他们对陆地的控制，导致了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GCARPS）的创立。1898年，该组织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伦敦抗议殖民地的土地政策，成功地根本改变了殖民地土地政策。在20世纪到来之际，政府采纳的包含传统酋长加入殖民地管理的间接统治政策也引起了抗议。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感觉他们可以更好地代表非洲人民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NCBWA）将此对抗带入前沿，因为许多殖民地最重要的酋长拒绝加入创立一个泛英属西非政治压力的集团。

更为基本的有效改变，是领先世界的可可生产者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殖民地。可可创造的货币经济改变了土地所有权和财产继承的观念。从经济上讲，殖民地被拉进世界经济，像“大萧条”的发生一

样，他们只得服从其难以预测的规律。20 世纪 30 年代有两次大的“物理性停顿”，其间，黄金海岸农民通过拒绝销售其作物而试图强迫提高价格。可可买卖成了一个民族主义情感激愤的中心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改革之风很快加速了民族主义的步伐。在魅力非凡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及其大会人民党（CCP）的领导下，黄金海岸迅速迈向独立，于 1957 年成为第一个获此地位的西非殖民地。

1960 年，加纳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越来越多的前殖民地取得独立，很快成为非洲的泛非洲民族主义的头号倡导者。然而，由于恩克鲁玛不断加强的独裁，导致了 1966 年的军事政变，将其政府推翻。新的领导，全国解放委员会（NLC）提议加纳回归文官统治，为第二共和国制定了一个新宪法。

1969 年，一位大学教师科菲·布西亚（Kofi Busia）博士当选为加纳总理。他的政府执行的紧缩措施很快破坏了自己的声望。1972 年，军队再次夺取政权。

救国委员会（NRC）在伊格内修斯·阿昌庞（Ignatius Acheampong）上校的领导下，改变了许多布西亚政府的紧缩措施，宣布国家许多外债无效。救国委员会拒绝将权力归还文官，但最终还是做出让步。1979 年，在大选举行之前，由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中尉领导青年军官集团发动了又一次政变。

新军人政府，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最终同意举行大选，但在新政府正式就职之前处死了 8 位前救国委员会政府成员。

加纳第三共和国的新总统希拉·利曼（Hilla Limann）博士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新一轮罢工的袭击，其政府的声誉很快遭到破坏。1981 年，罗林斯领导了另一次政变，建立了一个自称为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PNDC）的政府。

这个从恩克鲁玛倒台以来 15 年间的第 8 届政府当政到 1994 年。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府似乎成为了社会主义政府，但到 1983 年，它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

建议，采用了结构调整规划（SAP）。最终，在 1991 年，罗林斯同意还政于民。在次年举行的大选中，罗林斯作为当时称作全国民主大会党（NDC）的领袖参选。他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罗林斯成为加纳第四共和国的第 4 任文官总统。 14

1996 年的大选竞争激烈，全国民主大会党再次获胜。和 1992 年大选不同的是，当时的反对派拒绝参加选出的议会，而 1996 年大选中的反对党却更为合作，赢得了近半数的席位。因为有充满活力的新闻自由，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必须聆听大量的我们现在称之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批评。

2000 年的大选以新爱国党（NPP）获胜结束，其主要反对党在争夺中赢得议会 200 个席位中的 100 个，从全国民主大会党手中夺得了议会的控制权。没有候选者获得绝对多数，这样一来，最后的胜利就十分必要了。最后，挥舞新爱国党旗帜的约翰·阿吉耶库姆·库福尔（John Agyekum Kufuor）赢得了胜利。

2004 年 12 月，加纳面临第 4 次民主大选。约翰—阿吉耶库姆—库福尔再次赢得胜利，新爱国党赢得 230 议席中有争议的 129 席。

第二章　前殖民地国家与社会

史前史

17　对于现代加纳人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猜测。英国人类学家伊夫·梅耶罗维塔（Eve Meyerowita）和加纳民族主义者 J. B. 丹夸（J. B. Danquah）博士提出阿肯人从古代加纳帝国迁居而来。丹夸不倦地鼓吹这一理论，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当黄金海岸于 1957 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改名为加纳。19 世纪的加纳历史学家卡尔·C. 赖因多夫（Carl C. Reindorf）博士提出加纳人是从贝宁湾来到加纳的。其他人则认为多哥、达荷美、约鲁巴兰（Yorubaland）甚至加纳圣经中所述的土地为其诞生地。然而，正如一位考古学家所说："加纳史前史相当长，可能要回溯到大约公元前 5 万年左右。" 而这些石器时代的祖先"留给加纳一份人口遗产，在这个基础上，加纳的未来人口得以发展起来"。[①]

随着对约公元前一万年的金坦波（Kintampo）文化的认定，考古记录变得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具体。许多与该文化相关的考古遗址在现在库马西（Kumasi）以北约 90 英里左右的布朗阿哈福（Brong Ahafo）地区

① James Anquandah, *Rediscovering Ghana' s Past* (Harlow, United Kingdom: Longman Group, 1982), 126 - 127.

的金坦波集镇附近挖掘出来。工具制造明显发生技术改变，特别是小工具的精细制作，跟着出现陶器的制作，最后出现动物饲养、躬耕和村落公社生活。大约在两三千年之间，牛、羊等动物开始驯化。不久，植物性食物如豇豆、朴果、油棕榈和白山芋及黄山芋（Dioscorea sp.）也开始被种植。尤其重要的是，金坦波文化不仅限于可能是其首先出现的热带稀树草原，到目前为止已有16个遗址在热带稀树草原和林地以及更远的雨林地区南部被发掘出来。 18

公元2－4世纪到来的冶铁技术对这些早期社会的“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①] 冶铁技术除了使雨林地区的农耕更加容易之外，还对分工的专业化、城市化、国家的形成以及地区的扩张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大约14世纪，雨林地区发展起来的金矿开采便是这些新专业分工中的一个，受其刺激而建立不同植被区的贸易联系的远程贸易也发展起来，国家的形成首先发生在热带稀树草原，后来在南方的雨林地区出现。不断增长的贸易使地方货币得以出现。来自印度洋的贝壳在沃尔特盆地的齐索托人（Kisoto）居丘中被发现，时间可追溯到14世纪，这表明远程贸易的范围已经相当大。最终随着这些发展而来的是：

旧加纳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面朝中尼日尔和豪萨兰（Hausaland，现在的尼日利亚北部）和跨撒哈拉沙漠商路，该商路将西非与罗马、伊斯兰北部非洲以及东北非连接了起来。另一个面向南方的海岸，展现出与许多欧洲国家的商务代表密切联系的图景。[②]

国家的建立

考古证据显示，铁器时代早期的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加纳北部的沃尔特盆地。低质铁矿石和木材换取燃料的普通活动刺激了该地区的冶铁工业。结果，毫不奇怪，中央集权国家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来

① James Anquandah, *Rediscovering Ghana's Past* (Harlow, United Kingdom: Longman Group, 1982), 127.

② James Anquandah, *Rediscovering Ghana's Past* (Harlow, United Kingdom: Longman Group, 1982),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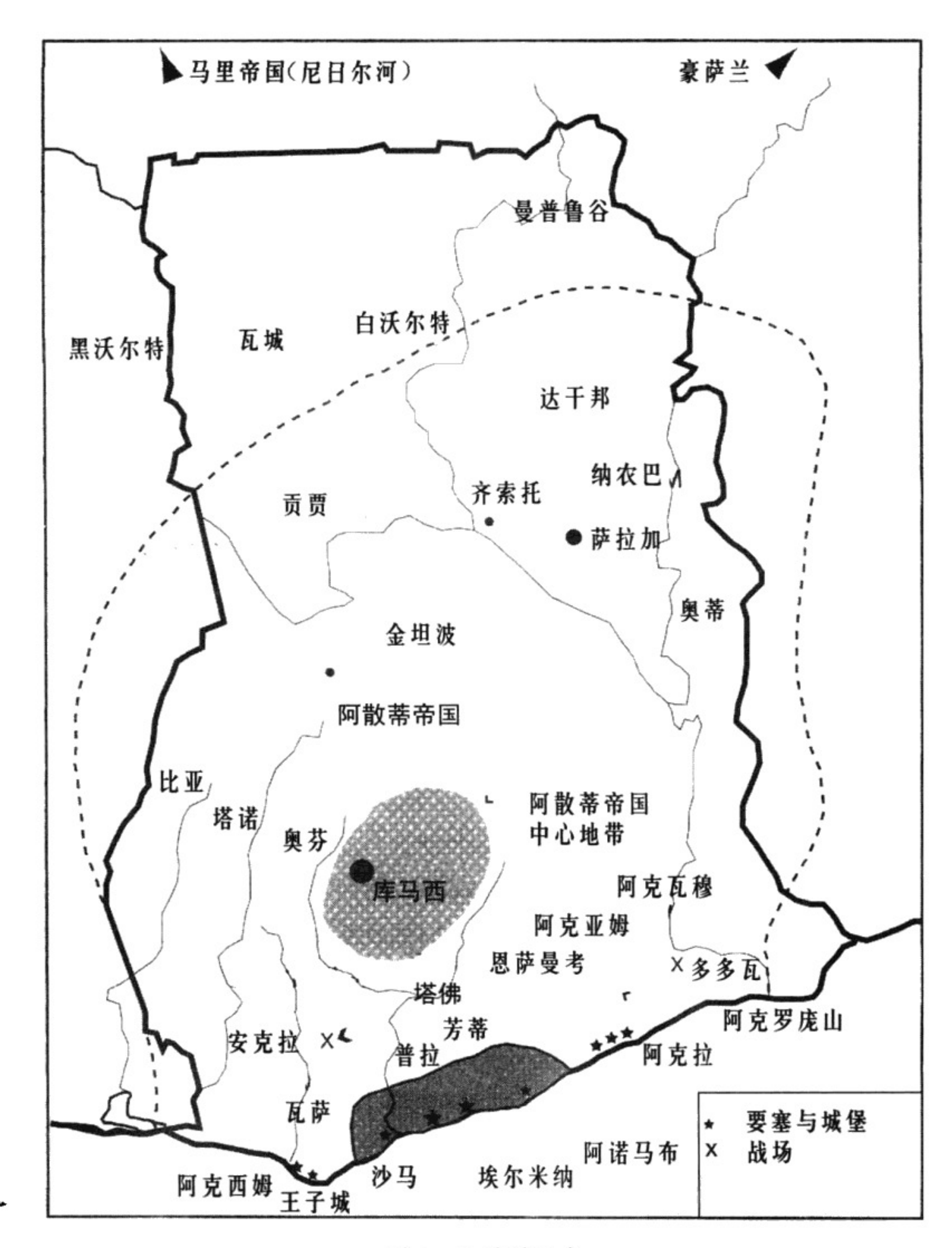


图4 加纳的历史

自北部和东北部的讲曼丁哥语（Mande）的入侵者似乎将自己添加入当地土著民族中，从而构成了曼普鲁谷（Mamprugu，曼普鲁西人的国家）、达干邦（Dagbon，达干巴人的国家）、纳农巴和后来的贡贾这样

19

的国家。[①] 这些国家属于许多历史学家常说的中间地带新苏丹国：介于多民族苏丹王国和公元 1000 年出现在西非（苏丹地区）荒漠草原及西非热带稀树大草原的帝国与南方雨林王朝之间的国家。有人指出，这些入侵者的游荡可能于 13 世纪就已经开始。[②]

然而，直到 15 世纪末中央集权国家才在该地区出现。热带稀树大草原的地位使这些国家可以控制雨林地区和尼日尔河北方或在豪萨兰的贸易中心之间的远程贸易。金子和可乐果用来交换盐、布和谷物。保护商人同时对其交易收取交易税的需要帮助了中央集权的发展。继承权的争论导致了进一步的移民和新国家的建立。口头传说描述了达干邦如何从曼普鲁谷发展而来，布纳（Buna）和瓦（Wa）王朝是怎样从曼普鲁谷发展而来的。

在这些国家的西南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贡贾（Gonjia）王国，其建立者可能是最早的班巴拉（Bambara）人中讲曼丁哥语民族。他们可能来自解体的马里（Mali）帝国。[③] 王表似乎表明贡贾直到 16 世纪下半叶才建立起来。然而，其横跨北方尼日尔湾及东北豪萨兰贸易要道的战略地位使之迅速成为这些热带稀树大草原王国中的最为强大者。到了 17 世纪，其萨拉加（Salaga）镇成为最为重要的来自雨林和北部苏丹的商队和商人的终点站。17 世纪，在最有名的国王拉塔（Lata，1623？—1667？）的领导下，贡贾向南一直扩展到白、黑沃尔特汇合处，向东一直到纳农巴边境。

在所有这些热带稀树大草原国家当中，早期入侵者从充当人民、地神及祖先之间仲裁人的廷达纳斯（Tindanas）或称土地祭司手中夺

① Jack Goody, "The Mande and the Akan Hinterland," in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ed. J. Vansina, R. Mauny, and L. V. Thoma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92－218.

② Nehemia Levtzion,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A Stud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Volata Basin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8), 85.

③ Nehemia Levtzion,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A Stud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Volata Basin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8), 53. 马里帝国是最大的苏丹帝国，从 13 世纪延续至 15 世纪。班巴拉人是该国的民族之一。

得土地。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达干邦中间，廷达纳斯获准留任为乡村首领，受达干邦分首领管辖，这大大减弱了中央集权发展的程度。这些新统治者被称作纳斯。他们坐在象征权力的皮座位之上，相当于阿肯国的凳子，由元老院辅佐。职位的继承遵循父系原则。最初，建立起这些国家的入侵民族不是穆斯林，但他们至少在向南迁徙之前接触过伊斯兰教。随着与北部苏丹联系的扩展，新苏丹国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为在该地区穆斯林随处可见。下一个阶段包含了"伊斯兰成分融入这些国家文化，然后是外国穆斯林进入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体系，最后为社会主要阶层的当地社会成员皈依。"[①] 在达干邦，这个伊斯兰化进程走得更远，建立了中沃尔特盆地国家最为等同的社会、共同的文化和相同的语言。曼普鲁谷卷入邻国人民的事物之中造成了严重破坏国家内聚力的政治紧张，穆斯林试图维护一种将其引入与老百姓和首领都有冲突的半自治状态。在贡贾，尽管穆斯林和首领之间有接触，这两个"阶层仍然截然不同"，三个社会阶层（首领、穆斯林和普通百姓）界限分明。[②]

21

在所有这些中沃尔特盆地国家中，穆斯林主要是商人和城市人口。在该地区，伊斯兰教是一小部分精英们的宗教，并未像北方地区那样加强百姓之间的冲突，百姓都是些农民或养牛人。伊斯兰化进程基本上是和平而温和的。相反，对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挑战来自南方雨林地区阿散蒂人的阿肯国的势力扩张。他们成了阿散蒂人联邦的一部分，到 18 世纪末，覆盖了现代加纳的大部分地区。

在 18 世纪 30 年代，继中部、西部之后，东部贡贾也被占领，到 18 世纪 50 年代，文官政府才建立起来。10 年之后，达干邦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但持续不断的对阿散蒂人统治的反抗使得文官政府直到 18 世纪 70 年代才最终建立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先前的统治者都被认

---

① Nehemia Levtzion,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A Stud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Volata Basin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8), xxv.

② Nehemia Levtzion,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A Stud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Volata Basin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8), 190.

定为每年纳贡的封臣，通常是以奴隶的形式纳贡。开阔的热带稀树大草原地形对阿散蒂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异常有利。阿散蒂人更拥有从海岸处进口欧洲枪炮的便利。来自两个封臣国的军队被编入了阿散蒂人军队，成为达干邦战斗力量重新组织的一部分，一个枪手军团建立起来，阿散蒂人允许他们进口武器。[①] 这些被征服者纳入阿散蒂联邦。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后者成为一支热带稀树大草原势力而不是严格的雨林王国，特别是18世纪在联邦被迫减少了它在南方的利益之后。[②]

实际上，阿肯人一般强调热带稀树大草原的出身，最初的阿肯农民似乎直到15世纪只进入雨林地区来打猎或小规模季节性地淘金。来自马里帝国的迪尤拉（Dyula）商人可能随着他们对雨林地区金矿和可乐果的兴趣而刺激了这个发展。在15世纪，一些阿肯人开始使用奴隶劳力砍伐森林并役使从迪尤拉得到的奴隶淘金。其他阿肯人则被吸引到这些被伐净森林的地带，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一来，最初控制金矿的居民便成了新阿肯人首领制度的建立者。[③] 根据传统，最早出现的阿肯国家是西北部位于雨林和热带稀树大草原边缘的博诺－曼索（Bono－Manso）和位于奥芬河（Ofin）和普拉河汇合处的阿但斯（Adansi），同时也是热带雨林地区的金矿中心。两个国家都从南北远程的金子和可乐果贸易中获利。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发生于15世纪前半叶，也有人认为应该是16世纪中期。[④]

随着阿肯人向北方商路的推进，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塔佛（Tafo）、阿冒空（Amoakom）、阿克罗齐瑞（Akrokyere）、埃得卫索（Edweso）、曼旁（Mampon）和库马武（Kumawu）等国家建立了起

---

① Ivor Wilks,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e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2.

② Ivor Wilks,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e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43.

③ Kevin Shillington, *History of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194.

④ Ad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ccra, Ghana: Sankofa Educational Publishers, 2000), 10; W. E. F. Ward, *A Histroy of Ghana*, 4th e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7), 53.

来。从阿但斯向南和向东的推进导致了诸如夸胡、阿肯人的阿布阿夸（Abuakwa）、阿肯人芃头库（Kotoku）和阿克瓦穆人；阿塞布（Asebu）的埃池国（Etsi）、斐图（Fetu）和隼夸（Sunkwa）；甚至更南边的芳蒂人和阿戈纳（Agona）王国和西南的瓦萨（Wassa）、塞夫维安维及敖文（Aowin）等国家的建立。一张 1629 年的荷兰地图清晰地显示，所有这些阿肯人国家此时都已经出现。[①] 然而，直到 17 世纪后半叶最为强大的阿肯国阿散蒂和登基拉（Denkyira）才出现。起初是登基拉开始垄断普拉河—奥芬河盆地的金矿和可乐贸易，但到了 18 世纪初其地位被阿散蒂人的奥约科（Oyoko）国取代。一个世纪之后，该强大的王国取得了现代加纳大部分地区的支配权。

17 世纪 70 年代，奥塞·图图（Osei Tutu），一位军事首脑和奥约科氏族的首领将其他氏族首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开始控制现在的库马西的贸易中心。许多人想要摆脱登基拉统治的枷锁。奥塞·图图和他的奥约科兄弟们可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为了给其联盟注入精神力量，奥塞·图图和他的祭司顾问奥阔姆佛·阿诺基（Okomfo Anokye）魔法般地创立了阿散蒂人金凳，使该联盟的精神系统化。奥约科氏族首领被公认为联盟国王或称阿散蒂亨（asantehene），而两个非奥约科氏族曼旁和奥曼雅（Aumenya）成了其他非奥约科氏族归入其中的右翼和左翼首领。库马西成为联盟首都。军队重组，配备了枪炮而不是传统武器。1700 年，这支军队在库马西东南 8 英里的菲亚色（Feyiase）战斗中大胜登基拉。1700 年到 1715 年间，图图也占领了临近的阿肯国家特威福（Twifu）、瓦萨和敖文，据说他自己在 1717 年与阿肯人的战争中战死。

奥塞·图图的继任者奥波库·韦尔（Opoku Ware）是一位更伟大的征服者。在其 1720 – 1750 年的漫长统治时期，他将阿肯国塔基曼（Takyiman）、阿肯、夸胡和加—当梅人等靠近海岸的公国及贡贾、达干邦和克瑞亚（Krakye）等热带稀树大草原国家纳入阿散蒂人联盟。

①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11.

如果说奥塞·图图是阿散蒂国的建立者的话，那么奥波库·韦尔就是阿散蒂帝国的创立者。[①] 然而，阿散蒂国家的"行政机构化"却是在奥塞·夸多的统治下完成的，他的统治从1764年持续到1777年。他是第一位"深信并强调公职资格而不是出身"的首脑，这大大地加强了阿散蒂亨的权力。[②] 许多库马西国家的职位或席位以及被占领国的地方官员都是任命的而不再世袭。到19世纪初，阿散蒂人的版图并不比其在奥波库·韦尔统治期间更大，但其行政管理却更为有效，阿散蒂亨在整个联盟都享有无敌的实力。在该广袤地域的行政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一小批穆斯林，他们大多来自北方被占领地区，与苏丹有贸易往来。到19世纪初大约"有超过1 000多穆斯林永久居住在库马西。"[③]

除了登基拉之外，其他可以挑战阿散蒂人的重要阿肯国是阿夸，该王国于17世纪末也开始控制其邻国。该国在阿肯国中历史最为悠久，尽管很少有历史断代"可以完全肯定"，但其历史可能开始于16世纪初。[④] 起初，其居民为阿肯海岸地带移民的一部分，他们最终定居在我们今天称之为东部地区的尼安纳维斯（Nyanawase）、阿巴克兰帕（Abakrampa）和阿萨芒克色（Asamangkese）。然而，所有居址中防御位置最好的尼安纳维斯最终成为其首都。此时，葡萄牙人已经在海岸地区建立起一个要塞，与这些欧洲人做生意的机会刺激了阿夸人向平原地区的扩张。1667年，他们侵入并毁坏了羽翼未丰的加国首都大阿克拉，3年之后，尽管有欧洲要塞的保护，还是占领了加人逃入的海岸居住地。1730年，阿夸人被其他阿肯人打败，但在1742年，阿散蒂人打败了阿肯人，直到海岸的整个地区都纳入了阿散蒂帝国南方省份的版图才停手。

---

①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18.

② I. Wilks, *Asn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446.

③ I. Wilks, "The Position of Muslims in Metropolitan Ashanti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ed. I. M. Lew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319.

④ Ward, *A History of Ghana*, 54-55.

虽然有大量移民进入海岸地区，强大的王国还是没有在该地区发展起来。15世纪，阿肯人大规模迁徙中的一部分讲关语的人开始向沃尔特河盆地到温尼巴平原一带移民。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相反，“浓密的树木植被”和影响其牲畜饲养的疾病迫使该地区的人以小国或首领制形式生存。① 他们曾是17世纪加—当梅人征服的构成大阿克拉的民族。后来传说从布朗—塔基曼越过普拉河和奥芬河来到海岸地区迁徙而来的阿肯移民葆孢（Borbor）芳蒂人也能够取代或征服埃池国，这是从普拉河河道至温尼巴平原沿海岸散布的一支関族。到18世纪初，芳蒂人地区由一个从靠近海岸Mori居住地的铁山向东直到温尼巴平原的海岸狭长地带构成。

此时，与海岸地区欧洲人的贸易异常重要，为了保持其中间人的地位，芳蒂人竭力控制像埃瓜福（Eguafo）、斐图、阿塞布和阿戈纳这样的海岸小国，因为他们已经建立起与海岸地区的欧洲人的贸易联系。阿散蒂人在该地区的扩张也刺激了芳蒂人的扩张和强大。到18世纪中期，芳蒂人控制了从普拉河畔直到东部阿克拉边界的海岸地区。然而，不像阿散蒂人或阿夸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他们因此成为了与阿肯、登基拉和西部恩济玛（Nzima）、特威福和瓦萨这样国家的阿散蒂属国攻守同盟中的一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限制阿散蒂国王的扩张势力，保持其政治经济的独立”。②

加—当梅人在阿克拉海岸地区定居也受到了大量移民的影响。考古证据显示，阿克拉平原早于公元前4000年，在晚石器时期就已有狩猎、采集人口定居。在公元500年到1400年间，冶铁技术在该地区得到发展，促进了城镇和后来王国的诞生。加人传说称，到15世纪，中心阿克拉地区30多个定居点已经并入一个中央集权王国，最终将首都定于内陆的阿雅瓦索（Ayawaso）镇。南部阿肯靠近黄金生产地刺激了这一发展，加人很快成为最为重要的，向16世纪开始频繁出现在西

---

① John Fynn, “Trade and Politics in Akanland,” *Tarikh* 267, no. 2: 23.

② John Fynn, “Trade and Politics in Akanland,” *Tarikh* 267, no. 2: 30.

非海岸该地区的欧洲商人提供日用品的供应者。一般说来，加人在商品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掮客角色。他们用自己生产的盐、鱼和玉米以及欧洲物品如武器、纺织品、金属制品和酒精交换黄金、奴隶、象牙、食品和从内地人那儿得到的牲畜等商品。17 世纪荷兰人（1642）、丹麦人（1661）和英国人（1672）从事该项贸易的公司在海岸地区修建要塞，由此可见该贸易对欧洲人来说何等重要。

东部阿克拉平原上的当梅人也以相同的方式发展起来。可能比加人略晚一点，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定都在内陆的拉（La）。他们也成为海岸欧洲人和内陆非洲人之间的重要中间人。欧洲人最终也于 18 世纪在该地区的海岸线上修建了几个小要塞和看守小屋，见证了这一发展。拉因其棉花纺织品而异常有名，棉花纺织品无疑来自欧洲，内地阿夸人定居区北部为该产品需求的最大部分。17 世纪早期的内战毁坏了拉，其民众迁移到大西洋沿岸的拉巴迪（Labadi）。起初，当梅人的统治者都是宗教人士，称为乌洛梅（wulomei），但与海岸地区的欧洲人的接触加强了世俗领袖的地位，其中最为重要者称为国父或曼策（mantse）。当加人世界的中心于 17 世纪晚期也迁移到海岸地区以躲避侵略扩张的阿夸人的阿肯王国的时候，这是一个将在加人的社会中得到反映的发展。①

欧洲人的到来

欧洲人来到海岸地区立即改变了旧加纳的面貌。1471 年，葡萄牙人来到海岸地区，使权力和影响从内地向海岸地区逐渐地重新聚拢。他们与西非初次接触之后 11 年开始在海岸地区建造现在仍然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欧洲要塞矿区圣乔治城堡（São Jorge da Mina）。他们精挑细选了一处靠近雨林深处的黄金产地。该地坐落于本雅河（Benya）口，提供了这一开阔海岸线上舍此无他的天然良港。最初，该地点称作矿（葡萄牙语为 A Mina），但这个名词最后演变成埃尔米纳（Elmi-

① Anquandah, *Rediscovering Ghana's Past*, 124.

na)。正是从该城堡以及他们在海岸上修建的其他要塞圣安东尼（São Antonio，1515，靠近安科布拉〈Ankobra〉河口并挨着阿克西姆〈Axim〉镇）和圣塞巴斯蒂安（São Sebastian，1520—1526，在普拉河河口的沙马镇）——葡萄牙人垄断了该地区的贸易，直至17世纪初期。最初，是几内亚的黄金将他们带到西非。青椒和象牙也成为重要的贸易产品。作为交换，他们提供了纺织品、铜制器皿、铁条和铁制品。

葡萄牙人与其对手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s）从最初与西非接触时，就开始购买奴隶贩至欧洲。[1] 为帮助将他们的贸易产品带入黄金海岸内陆，葡萄牙人于16世纪早期开始从贝宁王国进口奴隶。有些奴隶被他们在黄金海岸自己使用或带回葡萄牙，而其他奴隶则卖往内地金矿以换取黄金和象牙。16世纪，葡萄牙人还向过去无人居住的赤道岛屿太子（Príncipe）和圣托姆（São Tomé）引进了甘蔗种植，役使来自贝宁的奴隶工作。这些跨地区的奴隶买卖活动为界定欧非关系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作了铺垫。

其他欧洲商人，比如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试图打破葡萄牙人在海岸地区的垄断，但直到1637年荷兰人才成功地从埃尔米纳城堡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去。1642年，荷兰人设法完全将葡萄牙人从黄金海岸驱逐出去。荷兰人之后，英国人、瑞典人、丹麦人、法国人和勃兰登堡人接踵而至，他们都修建了要塞。最重要的要塞是丹麦人于1661年在阿克拉附近修建的克里斯蒂安堡（Christiansborg）和英国人于1665年从瑞典人手中夺取的海岸角堡（Cape Coast Castle）。作为该地区贸易争夺如何重要、如何激烈的证明，我们看到欧洲人在西非海岸修建的大约110个要塞中，大约有100个位于黄金海岸。[2] 这些要塞包括大的城堡，像埃尔米纳、海岸角堡和克里斯蒂安堡，小的要塞，像克雷弗克要塞（Fort Crevecoeur，荷兰人建于1649年）和詹姆斯要塞

① 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于1496年通过联姻合并，西班牙国家由此日渐发展而来。

② A. W. Fawrence, *Trade Castles and Forts of West Africa* (Stanford, Calif.: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42.

（James Fort，英国人建于1673年）——两者均在阿克拉，还有靠近王子城（Princes Town）的大腓特烈堡（Gross - Friedrichsburg，勃兰登堡人建于1683年）和大量的武装据点，包括各种不同的小型要塞和用当地土泥swish（自然风干的泥土）修建的仅为加强防御的贸易货栈。

建立这些要塞需要得到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非洲人的同意。一般说来，海岸地区人口稀少并缺少强大的帝国，这使得谈判变得非常容易。口头传说告诉我们，非洲的许多海岸定居点仅仅早于欧洲人到来之前几代人的时间。这些海岸居民往往为其先辈的内陆国的捕鱼或制盐的边区村落，渴望交易内地产品，比如黄金、象牙、皮革、染料、木材、胡椒、蜂蜡和少量的出口欧洲的奴隶，但到了17世纪，奴隶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活动。

27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欧洲人贸易的继续，在这些欧洲人修建的要塞的围墙之外出现了荷兰奴隶贩子威廉·博斯曼（William Bosman）描述的“人口非常稠密的黑人城镇”[①]。结果是他们开始挑战其最初从属的内陆国家。大约1515年左右，埃尔米纳从埃瓜福和斐图王国独立出来。正如一位无名的荷兰绘图师1629年说的那样，埃尔米纳人（Elminians）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且大多数由一个葡萄牙统治者统治”的状态之下生活。[②] 这个欧洲官员享有多大的权力还值得讨论，因为当荷兰人于1637年发动进攻的时候，埃尔米纳人基本上保持了中立。就海岸角堡事件来看，是七年战争（1756—1763）打破了内陆国家斐图对该镇的控制。在这场战争中，欧洲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事扩展到了西非，斐图丢掉了其支脉海岸角堡。阿散蒂人于18世纪向海岸地区的扩张通过迫使斐图统治阶层逃往海岸角堡寻求庇护而完成了这一进程。

让我们的目光转向加人。当1677年阿夸人入侵并毁坏了阿雅瓦索

① William Bosman, *A New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 of Guinea* (1704;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1967), 43.

② Kwame Daaku and Albert van Dantzig, "An Annotated Dutch Map of 1629," *Ghana Notes and Queries* 9 (November 1966): 15.

的大阿克拉首都的时候，许多幸存者到岸边阿克拉的欧洲要塞区寻求庇护。1680—1681 年，阿克瓦穆人占领了这些避难所。很快，当阿肯人于 1730 年打败阿克瓦穆人的时候，加人又重新得到一些有限的独立，但阿散蒂人于 1742 年打败阿肯人并将阿克拉平原的大部纳入阿散蒂帝国的南部省份。结果与埃尔米纳、海岸角堡和许多其他 17 世纪开始明确地成为独立国家的海岸地区相反，国家形成的进程在阿克拉的发展并不充分。3 个拥有城堡和靠得很近的要塞、正处于竞争中的欧洲贸易公司的存在也破坏了国家的形成。围绕它们发展起来的城镇进入 19 世纪之后还保留着分散的特征。

与欧洲人长久的相互作用的历史对这些沿海定居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这些沿海定居点又进一步向内地扩散其影响。大面积从地中海地区、亚洲和美洲引进的水果和粮食作物变得无处不在，其中有柠檬、甘蔗、橘子、香蕉、椰子、菠萝、山药、大米、地瓜、花生、玉米和木薯。起初，这些作物被种植在欧洲人要塞周围的园子里，用来补充食物供给，同时也为奴隶船提供给养，因为奴隶船要横越大西洋驶往美洲，这条海路被称作中央航路，但后来这些作物逐渐扩展到了内地。欧洲人的贸易物资，比如说武器、酒精、金属器皿和纺织品也成为沿岸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就像苏丹建筑风格的影响波及加纳北部一样，欧洲人的建筑风格也影响到了当地的建筑。富有的非洲商人用石头建造和欧洲人一样的房屋。该影响最终扩展到了内地。例如，阿散蒂人早在 17 世纪修建的祭祀神殿就已经按照海岸要塞和城堡中的样式建成了椭圆拱形。[①]

非洲的公共机构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欧洲影响。最为突出的是海岸城镇的阿萨福，或称军事联队。关于这些公共机构的起源一直有许多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起了主要作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是土生土长的。[②] 显然，海岸角堡、埃尔米纳和阿诺马布（Anom-

① Anquandah, *Rediscovering Ghana's Past*, 133.

② Ansu Datta and R. Porter, "The Asafo Syste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2, no. 2 (1971): 282-83.

abu）的阿萨福体系，的确与这些城镇欧洲人的存在有关。在保卫他们各自城镇的关键时期，欧洲统治者似乎在为这些组织编号并在将其纳入军事编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都采用了欧洲人的物品和符号作为其装备和礼仪，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丹麦枪（步枪）和欧洲人的军旗，但远没有欧洲人那么结构严谨。阿萨福体系最终传遍了整个海岸地区。芳蒂人或阿夸人是将其引入阿克拉平原的加人和当梅人中的关键。在这里，其发展更像一个军事组织，其成员主要根据年龄而不是像阿肯人那样根据其特殊城镇地域来组织。

欧洲语言也成了贸易的混用语言。最初是葡萄牙语，其在海岸地区的存在比葡萄牙对该地区的占领还长久，但最终，后起国家的语言取而代之。1679 年，法国旅行家吉恩·巴博特（Jean Barbot）发现，他所见到的埃尔米纳海域内的艄公都能讲“很好的英语”，但在阿克西姆（Axim）周围地区却普遍使用葡萄牙语，尽管荷兰人已于 37 年前驱逐了葡萄牙人。[①] 然而，最终还是英语和洋泾邦英语成为了海岸地区的商务混合语。

基督教影响具有重大的长久意义。最初，葡萄牙人下了很大力气传播天主教，在他们定居埃尔米纳之后不久，在这个小镇就有了超过 1 300 人的受洗天主教徒。[②] 1573 年，6 位奥古斯丁教团教士从葡萄牙被派去传教，但初见成效之后，他们就被科门达（Komenda）和埃瓜福人攻击并杀死了。可能是奴隶贸易和劝说改宗两者的势不两立注定了这一努力的失败。对欧洲人而言，沿海地区不健康的环境不利于向内陆的传教，也不利于大多数时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仅限于要塞和城堡的民众当中。葡萄牙人和后来居上的荷兰人继续让牧师做其雇员，他们也负责其军人和非洲妻子所生的孩子的教育。牧师也附属于其他欧洲城堡和要塞，但经常发生的疾病和死亡中断了这一努力。18 世纪，非洲人受训接受这些职位，3 位最为成功者

29

① Anquandah, *Rediscovering Ghana's Past*, 131.

② Helene Pfan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Ghana* (Cape Coast, Ghana: Catholic Mission Press, 1965), 4.

是任职几十年的埃尔米纳的埃利萨·约翰尼斯·凯匹腾（Elisa Johannes Capitein）、克里斯蒂安堡的克里斯汀·普劳腾（Christian Protten）和海岸角堡的菲里奥·奎克尤（Philio Quaque）。

然而，直到19世纪，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基督教传教工作在西非才真正得以认真的开始。丹麦人是最早废除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正是在他们的居住地克里斯蒂安堡（Christianborg），巴塞尔福音派传教团（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于1828年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工作。1835年，卫理公会教派紧随其后，再往后，1880年，是新建立的天主教非洲教士会（Catholic Societas Missionum ad Afros，SMA）的教父们。对于这些早期传教士来说，西非有着白人坟墓之称。4位巴塞尔传教士中有3位在他们到达黄金海岸的3周内死掉了。第一位卫理公会派传教士约瑟夫·顿维尔（Joseph Dunwell）到达海岸角堡之后5个月也死去了。巴塞尔传教团通过转移到更好的环境阿克罗庞（Akropong）高地而得以生存下来。海岸角堡卫理公会派教徒在斯坦法斯特山（Stanfast Hill）建立了居住点，这里的海风对减少与蚊子相关的健康风险作出了贡献。但一般说来，欧洲传教士的死亡率仍然非常之高，影响了这些初出茅庐的教会，使之严重依靠当地政府。毫无疑问，这些非洲传教士中最为成功者是托马斯·伯奇·弗里曼（Thomas Birch Freeman）。他生于英格兰，父亲是加纳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从1838年至1890年一直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工作。

在基督教传教与西方教育推广之间一直存在着联系，19世纪的传教士迅速扩展了这一联系。特别是卫理公会派传教士的情况，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其成功地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与提供西方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1858年，教会的7个联合组织成员为2 000名，6 000人参加公共祈祷活动，大约有1 250名男女学童在约30个学校接受教育。[1] 19世纪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希望“圣经与开垦”能使非洲走向

[1] F. L. Bartels, *The Roots of Ghana Method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78.

文明。但西非海岸地区却不同，教科书和商店之间的联系是其发展起来的更为重要的关联。19 世纪不断扩展的贸易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西方教育知识，这确保了基督教、西方文明和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英国势力的扩张

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也与英国势力在海岸地区的扩张相一致。英国影响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散蒂人向海岸的扩张。对于阿散蒂人，这是保证欧洲军火稳定供应以使其能够控制其周边省份的迫切需要。但是，特别是对海岸地区的英国商人而言，此扩张引起了对阿散蒂人垄断海岸地区贸易的担心。这意味着，主要贸易商品，像奴隶、金粉和象牙，都将来自阿散蒂（Ashante）控制地区，阿散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价格。1811 年、1814 年和 1816 年，阿散蒂人再次侵入芳蒂人地区，最终完成了对海岸地区的统治。由于害怕他们将失去与荷兰人分享的贸易份额，而荷兰人与阿散蒂人的关系更好，1817 年，英国商人公司（British Company of Merchants）派遣一个由公司雇员 T. E. 鲍迪奇（T. E. Bowditch）率领的使团到达阿散蒂首都库马西谈判。然而，他们却没有对阿散蒂人作出什么妥协，条约反映了海岸地区人民对阿散蒂人统治的敌意。

一年以后，英国政府委派了自己的代表和领事约瑟夫·迪普伊(Joseph Dupuis)。1820 年，他也来到了库马西，进行了新一轮谈判，废除了早期协议，承认阿散蒂亨对芳蒂人的统治。但英国政府和当地英国商人都不接受这项协议，对于如何与阿散蒂人打交道仍然令人非常茫然。1808 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也加剧了与阿散蒂人的紧张关系。并不服从英国法律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来填补了这个由于曾在西非该地区控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英国商人的离去所带来的真空。[①]在英国，海岸地区的英国商人因没有有效地制止奴隶贸易而受到

31

---

① Mary McCarthy, *Social Change and the Growth of British Power in the Gold Coast: The Fante States 1807 - 1874*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76.

批评，而他们的政策也因损害了英国总体贸易而受到指责。

结果是，1821 年，英国议会解除了商人公司对海岸地区英国要塞和定居地的管理，将其置于皇家官员的统辖之下。塞拉利昂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Sir Charles Macarthy）接管了对海岸地区英国要塞和定居地的管理，他很快形成一个对阿散蒂人不利的判断。他认为他们都是些无法与之进行贸易的野蛮人。一场司法权的争论最终导致了一场战争，但麦卡锡的军队完全不是阿散蒂人的对手。1824 年，在恩萨曼考（Nsamankow）战役中，麦卡瑟的军队遭到伏击，其官员中有 7 人被杀。此时正是阿散蒂帝国势力的鼎盛时期。

但是，1826 年，在阿克拉平原上的多多瓦（Dodowa，又称卡塔曼索）战役中，英国人在芳蒂人、加人、登基拉人、阿肯人和阿夸军队的协助下，成功复仇，有效地结束了阿散蒂人对海岸地区的统治。经过一系列漫长的谈判，阿散蒂人于 1831 年在和约上签字。除了抵押 600 盎司黄金并将两位王子送往英国作人质外，他们还同意贸易自由并承认登基拉、阿辛（Assin）和芳蒂国家的独立。

与阿散蒂人的冲突刺激起关于“保护”贸易与“非保护”贸易利弊的激烈争论。那些觉得后者不可避免地将英国带入海外世界最不健康地区的混乱冲突的人成功说服议会将管理权交还给海岸地区的英国商人。1828 年，他们任命乔治·麦克莱恩（George Maclean）上校为其总督。他曾在塞拉利昂皇家非洲军团（Royal African Corps）做中尉，对该地区有一些了解，因为从 1827 年起他一直是统帅黄金海岸英军司令的私人秘书。

他迅速着手维持和平并促进贸易。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非凡的外交官，得到了芳蒂人和阿散蒂人的信任。他最重大的贡献无疑是裁决了争论。他也并不完全不屑于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维持和平。1835 年，他甚至组织了一次军事远征以对抗靠近阿克西姆的阿波洛尼娅（Appollonia）国王，因为这位国王被控在他的治下杀害商人。1840 年，海岸角堡出口额已从 1831 年的 131 000 英镑升高到 325 000 英镑便是其成功的一个标志。麦克莱恩也做了些沽名钓誉之事，娶了著名

32

的伦敦女演员莉蒂希娅·伊莉莎白·兰德勒（Letitia Elizabeth Landon）。她于1838年陪同他一起来到海岸角堡，但到达后很快就死了。关于她的死，特别是关于他并未停止奴隶贸易和制止国内的奴隶制度的谣传毁坏了麦克莱恩的名声。1841年，英国政府派遣一位专员R. R. 马登（R. R. Madden）博士前往海岸角堡调查这些对他的指控。指派调查非洲西海岸英国财产状况的议会特别委员会没有接受马登博士的充满敌意的发现，再次将黄金海岸置于塞拉利昂总督的统治之下。

1844年，H. W. 希尔（H. W. Hill）上尉以副总督的身份接管黄金海岸要塞和定居地，而麦克莱恩则成为陪审法官和地方长官。他们一起与当地芳蒂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史称《1844年条约》（Bond of 1844）。除了承认英国官员的“司法权”之外，酋长们也就重罪的裁决向英国官员妥协，以便将“国家习俗纳入英国法律总原则”之中。[①] 1852年，在要塞和定居地从塞拉利昂分离出来成为殖民地3年之后，建立了最高法院，继续在殖民地建立英国习惯法的进程。首席法官继续担任陪审法官，他在后一个职位上致力于习惯法的应用，但1847年麦克莱恩死后，其继任者喜欢短期任职，对习惯法了解较少而喜欢当地习俗。

如何支付殖民地管理费用也是一个矛盾的事情。英国国会提供每年4 000镑的资金，但想让殖民地最终自给自足。这就是1850年购买海岸地区丹麦城堡和要塞的目的，因其减少了走私的机会，此举严重破坏了通过对进出口征税而增加收入的企图。于1852年引进人头税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增加地方税收的企图，但征收该项税款却非常困难，特别是在阿克拉地区。在那里，1854年，一艘英国战舰炮轰拉巴迪、泰希（Teshi）和克里斯蒂安堡定居地，来镇压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武装叛乱。这项不受欢迎的直接税形式苟延残喘到1862年，为海岸地区人民留下了一笔对任何此类征税形式进行抗争的遗产。 33

① J. J. Crooks,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Gold Coast Settlements from 1750 to 1874* (1923;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1973), 296.

伴随征收地方税的无能而来的是，1862 年与阿散蒂人战争的爆发及接踵而至的英国人耻辱的退却，这再次引出了英国政府是否应该管理该地区的问题。1865 年，国会特别委员会建议撤出西非，将除塞拉利昂之外的全部西非殖民地交给当地人管理。对于黄金海岸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提议。他们受到此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鼓舞，其中两人远赴伦敦向委员会当面作证。对黄金海岸的英国统治者而言，委员会看似要求更有效的行政管理，在他们与非洲精英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激烈冲突。海岸角堡的冲突尤其激烈，1866 年，刚登基并受城镇中许多有文化的精英支持的国王阿格雷，挑战总督康兰（Governor Conran）的政权，从而被驱逐到塞拉利昂。

英国人的控制非但没有解除，反而有所加强。1868 年，城堡和要塞都换给了海岸地区保留下来的欧洲势力荷兰人。埃尔米纳以西所有的城堡和要塞都转到了荷兰人手中，而所有以东的城堡和要塞则归英国人，欧洲人在海岸地区混合居住的状况结束。以前，财产的分散使征收税款无法实现。这次交换没征询任何一个当地非洲人的意见。芳蒂人尤其担忧阿散蒂人会入侵海岸地区以保护他们的贸易利益。结果，芳蒂人酋长们在其古代的 Mankessim 总部开会成立了一个“芳蒂人委员会”。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反对荷兰人，被称作阿散蒂人联盟。驻扎黄金海岸的英国军医塞拉利昂人詹姆斯·阿弗里卡纳斯·霍顿（James Africanus Horton）博士的想法也在将该委员会变作芳蒂人联邦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联邦有能力实现国会特别委员会建议的自治政府。

然而，建立该军事联盟的理于 1870 年被暂时排除，因为英国同意购买海岸地区的荷兰人财产，但对于许多联邦运动的支持者这似乎仅为“将黄金海岸交给联合民族政府的初级阶段”。[1] 1871 年，大家一致努力通过起草宪法选举联邦官员。总督把起草宪法看做是对海岸地区英国政权的挑战，于是逮捕了许多推动联邦的成员。一位更富同情心

① David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1850 - 192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43.

的驻塞拉利昂总督将军的任命给了先前联邦策划者们又一次机会，1872年，他们整理出一个更多限制的自治方案，对英国人政权的挑战较小。但这同样使英国人和海岸人民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和酋长在地区管理及司法权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更加突出。

1873年阿散蒂人再次侵入海岸地区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搁置在了一边。将荷兰人的财产卖给英国人在埃尔米纳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一次骚乱中，一位荷兰官员被杀。1872年，英国人因该邦的国王科比纳·吉安（Kobina Gyan）反抗这一买卖的实施而将其放逐到塞拉利昂。对于阿散蒂人来说，这一买卖的完成意味着他们将丢掉荷兰人付给他们的租金，更严重的是这将威胁到他们与海岸地区的贸易及其军火来源，这一切都是他们通过与荷兰人进行奴隶贸易获得的。另一方面，英国人决心不能再被阿散蒂人从海岸地区驱逐出去，授予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以全权将黄金海岸从阿散蒂人的“威胁”中解救出来。[①]

英国人学会了一些西非的作战方法，设法在雨季到来之前行动。1874年初，沃尔斯利与他的下属、从东路进军的J. H. 格洛弗上尉一起进入阿散蒂人的首都库马西，火烧该城并迫使阿散蒂人赔款，并迫使后者放弃对埃尔米纳的索赔，保证内陆的商路自由，同意“制止活人陪葬”。[②] 尽管没有逼迫阿桑特（Asangte）的投降又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但这场当地人称之为Sargrenti的战争（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名字的讹传）还是被英国人看作是对1863年蒙羞的恰到好处的胜利。然而，这场战争表明英国人对该地区是多么重视。国会中仍然有少数人支持1865年保证过的从海岸地区撤出，但大英政府却决定将定居地变成黄金海岸殖民地，在管理上就同拉各斯而不是塞拉利昂相关联了。一个临近内陆的尚不明确的地区成为了受保护地，殖民地一院制议会也得到授权为之制定法律。

---

① Crooks,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Gold Coast*, 460.

② Crooks,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Gold Coast*, 522 – 523.

第三章　殖民统治

殖民地的建立

37　在界定英国势力范围的时候，副总督 G. C. 斯特拉姆（G. C. Straham）上尉采用了文告的方式而不是和当地酋长签订和约，这和 1844 年的做法如出一辙。皇家的权力包含了维持和平、民法和刑法审判、法律的制定、鼓励贸易和最富争议的单方面废止奴隶交易和释放奴隶。非洲奴隶主无论是酋长还是一般人都抗议后来的条款，因为该政策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补偿。斯特拉姆坚持认为，通过提供保护，英国政府早已尽到了义务。1873 – 1874 年的阿散蒂人战争已使英国人对黄金海岸当地奴隶制的扩张本性谙熟于心，斯特拉姆的急切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英国殖民地舍此便无法解决的尴尬窘境。他还消除了奴隶主要求赔偿的争论。

然而，英国政府并不想继续这一有力的废除政策，一小部分涉及38　非法奴隶买卖的案件在殖民地法庭于 1874 年成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似乎说明废除奴隶制度并不那么具有破坏性。行政管理与司法的改变更为重要。殖民地的一院制议会得到为殖民地及被称作保护区的内陆模糊划界地区立法的授权。要塞的文职指挥官成为准备行使更多司法权的专员。1876 年，最高法院法令和相关的刑法程序法颁布，此举

废止了陪审法庭并建立起一个由首席法官领导的独立的最高法院。[1]地方专员和首席法官的判决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1877 年条款规定，最终可以上诉到伦敦的枢密院。

该改变强化了英国习惯法在殖民地的重要性，接下来的是强化证据和程序的英国规则，首席法官有权认可律师在法庭上辩护。缺少正规法律训练的“乡村律师”，即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们在法庭上充当委托人，他们在 1876 年前已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然而，他们很快被在英国接受过训练的律师所取代。理论上讲，除非习惯法受到合约的明确排斥，不然最高法院的法令会倾向于习惯法。然而，最初似乎这些改变给予英国习惯法以特权，因为英国法官大多对当地习惯法所知甚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出现了“基于本土法的判例法”。[2]

这些行政管理和司法的改变引起的一个直接问题是酋长在该新秩序中的地位和司法权。1878 年国家司法权法令（Native Jurisdiction Ordinance）试图规定“大酋长”和“小酋长”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但是没有颁布，部分原因是非洲人的反对。英国行政官员也不同意酋长们在殖民地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1879 年成为副总督的赫伯特·厄舍（Herbert Ussher）感到酋长们“无用，残暴且不受行政司法长官的信任”。[3] 他更喜欢欧洲官员实行的直接统治。其继任者塞缪尔·罗爵士（Sir Samuel Rowe）却持直接反对意见，他认为“管理黄金海岸的正确道路是通过酋长来实现的”。[4] 1883 年，他废除了 1878 年法令，重新制定了一个修正案：主法庭做出的判决可以上诉到英国法庭。

最初，该法令只适用于 6 位摄政大酋长，他们并不想将其应用于整个海岸地区。对此，人们感到这些统治者最终将失去他们的权力，

---

① 司法中的陪审法庭被废除，在实施中只保留英国法院系统。

②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Revised 1956: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599.

③ David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1850 – 192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461.

④ David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1850 – 192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462.

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敌对。1880 年，总督厄舍（Ussher）将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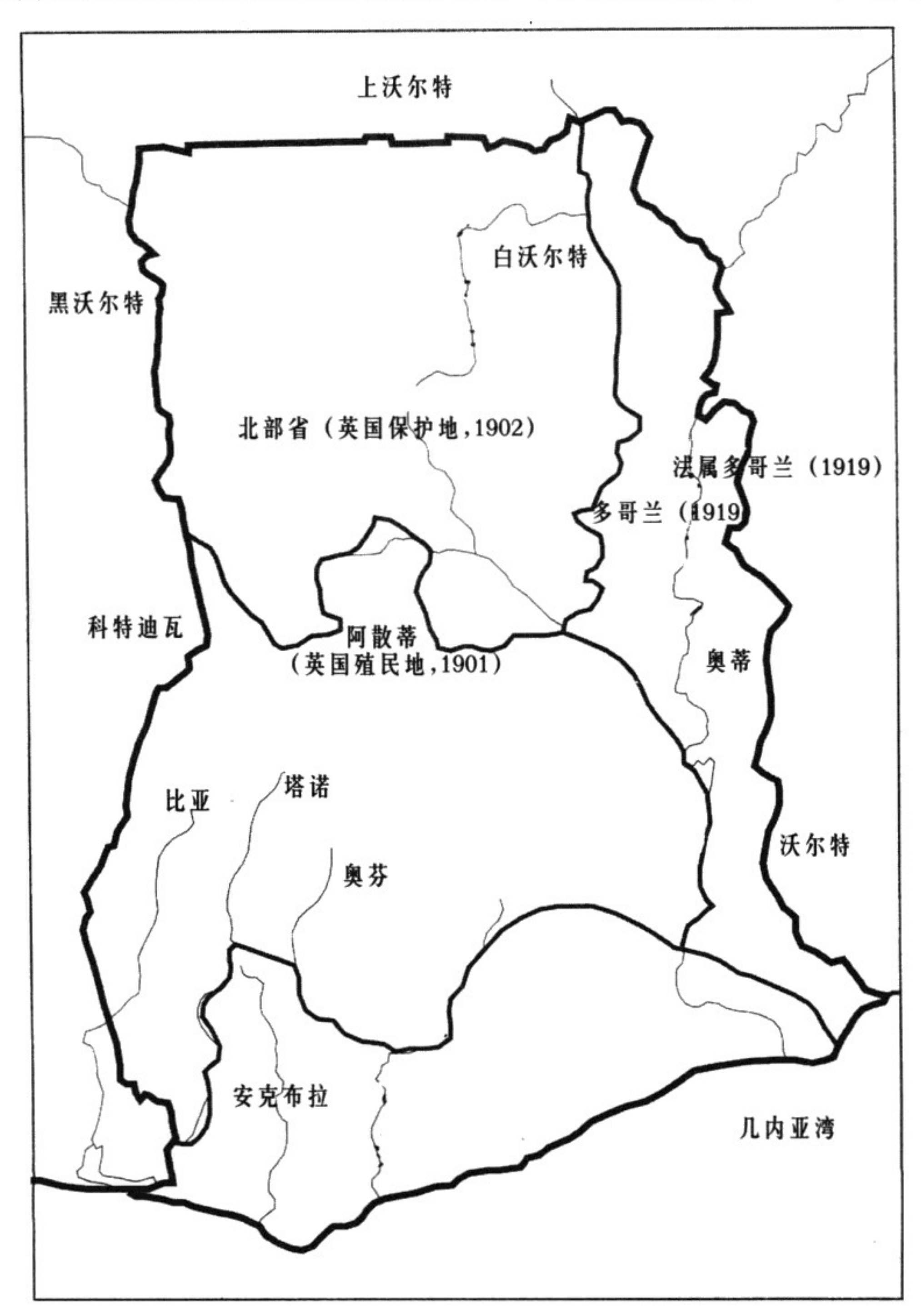


图 5 英国统治的扩张

奇·塔维亚（Taki Tawia）国王，阿克拉的加人曼策，流放到埃尔米纳，因为他试图行使挑战英国法庭的司法权。7 年之后，当科乔·马

布拉就职海岸角堡的阿曼亨的时候，政府强烈反对并拒绝承认。然而，1887 年最高法院对 1876 年最高法院“绝不削弱当地国王和酋长司法权”的奥旁诉阿奇尼案（Oppon v. Ackinnie）的裁决再一次引起当地秩序之作用的争论。[①]另外，许多官员承认，要改善亟待改善的海岸城镇的卫生条件，他们需要这些酋长的合作。要这样做，酋长就需要有司法权，1888 年本土监狱法令给予他们以处罚和监禁的权力。1894 年爆发的与阿散蒂人的对立也表明，政府依靠这些酋长提供搬运工将供给运到内地是多么重要。那些丢掉最大权力的酋长不肯合作也在情理之中，这项新的政策有赖于调整整个殖民地的秩序。

1895 年，总督威廉·马克斯韦尔爵士想要对黄金海岸实行统一的政策。他来自海峡殖民地马来亚（Malaya），那里的政府间接统治形式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想给予酋长们更大的司法权并在发展殖民地道路网上起作用，他甚至希望承认海岸地区的酋长，只要他们不“与当地律师走得太近”。[②] 他的早逝及其与阿散蒂人的冲突使得这些计划短命。直到 1902 年吞并阿散蒂，枢密令才规定了北部地区和黄金海岸殖民地的界限，以结束从《1844 年条约》时起就已存在的与酋长们纠缠不清的关系。1900 年成为殖民地总督的马修·内森（Mathew Nathan）认为，酋长的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来自王权，因此政府可以决定如何构建与酋长的关系。1902 年，他建立了原住民事务秘书处（Secretariat of Native Affairs）从而开启了这一进程。

对于殖民地首席法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威廉·布兰德福德·格里菲思（Sir William Brandford Griffith）爵士就特别关注地方法庭的司法规范。如果要有此类法庭，就应该置于最高法院的控制之下而不是接受行政长官的管理。假设司法规模极小而地方法庭几乎在所有殖民地时期都要置于行政官员的监管之下很不现实。此项政策有多

① John Mensah Sarbah, *Fanti Customary Laws* (1897;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1968), 237.

② Governor Maxwell' s di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6, 1897, CO/96/294,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London.

大争议，看一例便可知晓，当总督罗杰（Governor Rodger）于1910年最终提出一个新的本土司法条例的时候，采用了修正1883年本土司法条例的手段，这样新法案的每一条款都用不着公开讨论了。这些修正案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将地方法庭扩展到了整个殖民地。请求这些地方法庭复议是地区特派法庭的责任而不是非洲律师喜欢的区域法庭的事。最为矛盾的是该法案给予总督的"按规定时间延缓执行或放逐显然已经滥用权力或不称职或不能公正执行权力的酋长"的权力。[①] 该法案对于酋长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地位是一个根本挑战。

41

在那个时代，被称作"土著知识分子"的角色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官员都已见到的芳蒂人联邦对英国人统治构成的挑战恶化了官员同这些知识土著之间的关系，一位官员将其描述为"西部海岸的诅咒"。[②] 然而，庞大的殖民地的建立实实在在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殖民地行政管理机构为有知识的非洲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1867年，民事机构的职员仅有85人，但30年之后增加了10倍，达到863人。[③] 其中，许多职位为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非洲人出任的低级职位，但有些为来自黄金海岸或来自西非其他地区如塞拉利昂的非洲人甚至西印度群岛人出任的高级职位。19世纪80年代时，在9位殖民地地方长官中，甚至有7位是非洲人。19世纪90年代，殖民地的最低级法官弗朗西斯·史密斯（Francis Smith）就是一位塞拉利昂人。从1894－1897年，殖民地卫生次长詹姆斯·法雷尔·伊斯曼（James Farrell Easmon）医生也是塞拉利昂人。这一时期，黄金海岸的22位卫生官员中有4位是非洲人，他们同欧洲同事享有相同的工资。

教堂也是土著知识分子重要的就职岗位。许多人就是简单的问答

---

① *An Ordinance to Facilitate and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Certain Powers and Jurisdiction* by Native Authorities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10), chapter 29.

② Minute by A. W. L. Hemming (an official in the Colonial Office, London), July 24, 1886, CO/96/174, PRO.

③ Government of the Gold Coast, *Gold Coast Colony Blue Book*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867), and Government of the Gold Coast, *Gold Coast Colony Blue Book*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897).

传教者，但随着传教组织转向非洲人而不再是很难适应当地气候的欧洲人，甚至教士团也成为非洲人的了。卫理公会派教徒尤其如此。在其1885年50周年大庆的时候，牧师中有15位非洲人而只有3位欧洲人。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最为知名的是老教士托马斯·伯奇·弗里曼。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任该教士团的团长。在漫长的任期内，他3次试图将基督教传播给阿散蒂人。[①] 1859年，他在海岸角堡创办了《基督教信使与考察者》（*Christian Messenger and Examiner*），和1857年创刊的《阿克拉使者》一起最早为当地提供新闻来源。

皇家殖民地统治的建立与迅速工业化的欧洲同黄金海岸之间贸易的大扩张是同步的。到19世纪末，该项贸易额是1874年的3倍。19世纪70年代，汽船的到来使非洲商人染指此项贸易更加容易，一些商业之王应运而生。海岸角堡商人如弗朗西斯·格兰特（Fanncis Grant）和约翰·萨尔巴赫（John Sarbah）在19世纪80年代的橡胶贸易中扮演着生机勃勃的角色。海岸角堡人查尔斯·巴恩斯（Charles Barnes）是木材工业的先锋，而温尼巴国王哈提（Ghartey）在其商人时代第一个将棕榈果破碎机引进黄金海岸。[②] 有些人非常成功，建立了自己的生意；而有些人则为欧洲贸易做代理。更多的人是从欧洲和美洲进口商品的店主和在集市以及殖民地商业城镇的路上兜售物品的小本生意人。到了19世纪末，贸易已经支配了殖民地的经济。据估计，1891年海岸角堡超过30%的工作人口、阿克拉20%的人口从事贸易活动。[③] 贸易活动也将殖民地的渔民吸引进来，他们驾着冲浪小船将货物运到停泊在离海岸1公里远的海船上。当黄金海岸于1928年在塔科拉迪（Takoradi）建成一个深水港口之后，大量殖民地的贸易商品仍然从像海岸角堡、索尔特庞德（Saltpond）、温尼巴、阿克拉和凯塔（Keta）

---

① T. B. Freeman, *Journal of Various Visits to the Kingdom of Ashante Aku, and Dahomi* (1842;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1968), 1.

② 大部分油料来自棕榈果的外表，即果皮，这是传统的油料来源，但果实的内里，即果核也含油料，必须用机器才能将这些油料榨出。

③ J. F. Easmon, *Report to Governor William Brandford Griffith*, 1891, enclosed in Sir William Brandford Griffith's di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1, 1892, CO 96/226, PRO.

这样的浮码头运出。

贸易还刺激了相关活动的增加，加强了殖民地本地文化人的重要性。出现了对拍卖师、摄影师、农艺师、医生和工程师的需求，但最明显的是对律师的需求。过去未经训练的乡村调解员被受训于英国的律师取代。最初他们或来自英国或来自塞拉利昂，但 1887 年，阿诺马布和海岸角堡的约翰·门萨·萨尔巴赫成为第一个加入其行列的来自黄金海岸的非洲人。到 19 世纪末，又有 10 位其他伦敦的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培训的黄金海岸律师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①] 第一位被任命为立法会议员的非洲人是商人，但到 19 世纪末，非洲人上院议员便都是律师了，在余下的殖民地时期中律师一直占据着这些位置。

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新闻编辑和出版人。1874 年，同样身为乡村调解员并曾对芳蒂人联邦计划涉人很深的詹姆斯·赫顿·布鲁（James Hutton Brew）开始在海岸角堡殖民地出版第一份印刷的报纸《黄金海岸时代》（*Gold Coast Times*）。布鲁的报纸与《西方回声》（*Western Echo*）一同努力，持续到 19 世纪 80 年代，对政府的政策给予勇敢的批评，直到 1887 年布鲁前往英国开辟新的业务。卫理公会教徒布道团（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也于 1886 年在海岸角堡出版了报纸《黄金海岸卫理时报》（*Gold Coast Methodist Times*），阿托赫·阿胡玛（Attoh Ahuma）牧师为其主编，也成为批评政府的发泄途径。直到 1890 年，阿克拉有了自己的报纸《黄金海岸纪事》（*Gold Coast Chronicle*）。1895 年，该报有了一个竞争对手《黄金海岸独立报》（*Gold Coast Independent*），预示着 20 世纪殖民地的主要城镇开始了新闻竞争。这些报纸一律短命。殖民地的政治冲突刺激了报纸的诞生，但随着政治冲突的淡化，报纸也随之消失。1897 年，海岸角堡报纸《黄金海岸原住民》（*Gold Coast Aborigines*）为反对政府《马克斯韦尔地政条例草案》（*Maxwell' s Lands Bill*）而作为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的机关

43

① Ray Jenkins, "Gold Coasters Overseas, 1890 – 1919: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ir Activities in Britain,"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4, no. 3 (1985): 45 – 46. 英国律师队伍分为专门律师与初级律师。前者代表委托人出庭，而后者则提供法律咨询。

报诞生，但到1898年它就撤摊了。1912年，它又以新名《黄金海岸国家》（*Gold Coast Nation*）复活。到了20世纪，殖民地有了一份自己的正式报纸。维持这些出版的经常是殖民地的职员阶层、律师和医生。

政府关于关税、向内地扩张、议会上院的非洲代表问题及试图将疑似无主土地收归国有等政策成为报纸刊载的有争议的问题。1882年，詹姆斯·赫顿·布鲁在《黄金海岸时报》上提出建议，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去要求“民众代表通过议会真正统治国家”。[①] 代表团的花费导致计划流产，但1886年总督布兰德福德·格里菲思任命了两位非政府官员进入立法会，这也有助于缓和代表团运动所造成的紧张。然而，1894年，当总督提出意在控制被称为无主土地的国有的《官地条例草案》（*Crown Lands Bill*）时，抗议再度爆发，最终导致1898年派代表团到伦敦。

1874年，金矿开采和木材贸易的升温将土地归属权问题推向前沿，因为政府感到土地归属权的认定急需监管。《官地条例草案》意在“使西部土地、林地和矿区归属于女王”。[②] 此举立即引起了酋长和本土知识分子两方面的抗议，酋长们感到其控制的世袭土地受到威胁，而本土知识分子则经常深陷其本身的特许权事务。对该法案的反对最终使其不得不被撤回，但1897年新总督威廉·马克斯韦尔爵士提出一个更有限的法案，只寻求给予王国政府对“废置土地”的“管理权而不是占有权”。[③] 然而，这仍然被看作是对非洲人所拥有权力的威胁从而导致了殖民地的第一个政治组织的成立。1897年，黄金海岸权力保护协会在海岸角堡成立，很快该组织的分支就遍布整个殖民地。

黄金海岸权力保护协会以高度一致的面貌将殖民地酋长和文化精英集合起来。他们也得到英国商业集团的支持。这表明该法案阻碍了

---

① *Gold Coast Times*, August 26, 1882.

② Letter of July 26, 1894, from Hutchinson to Governor Brandford Griffith, CO 96/247. Quoted in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334.

③ Letter of July 26, 1894, from Hutchinson to Governor Brandford Griffith, CO 96/247. Quoted in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340.

英国人在殖民地的投资。总督马克斯韦尔在回家休假的路上突然死亡，这也没能增加法案被国务大臣批准的机会。之后不久，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的三人代表团抵达伦敦，使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爵士同意成立遵守“本土法”的“审判法庭”，这是用来处理特许权而非任命“闲置土地”皇室管理人的。[①] 这一巨大胜利保证了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的继续存在，殖民地酋长们得到授权，代表他们行事。三人代表团从英国返回之后，新总督弗雷德里克·霍奇森（Frederic Hodgson）爵士甚至会见了海岸角堡的协会官员，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很“友好”。[②] 1900年，一个新的特许权法案（Concessions Bill）得到认可，据此建立了一个特别特许权法庭，受殖民地司法部控制，主要负责确保特许权持有者头衔的安全及保护土地所有者不受欺骗。[③]

土地法案的争论只是间接地涉及殖民政府卷入殖民地边界和保护地性质的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同阿散蒂人联邦的关系，正如双方所期待的那样，1874 年后，政府与阿散蒂联邦的关系还没有彻底决裂。但是许多像贡贾、达干邦和曼普鲁谷这样的从属地区都开始彻底脱离。内部仍有争执，特别是关于“金凳”（Golden Stool）的继承问题，此外还有临近阿散蒂人保护区的极度不稳定的问题。英国人对于阿散蒂人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影响到贸易，还会涉及到广泛的利益集团。一般说来，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加入使英国政府与阿散蒂人及北部的关系大为复杂化了。随着 19 世纪 80 年代对非洲的争夺愈演愈烈，英国政府有点不大愿意与内陆地区签订友好和保护条约。1892 年，殖民地总督

①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Deputation（1898）., Letter of July 26, 1894, from Hutchinson to Governor Brandford Griffith, CO 96/247. Quoted in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354.

②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Deputation（1898）., Letter of July 26, 1894, from Hutchinson to Governor Brandford Griffith, CO 96/247. Quoted in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355.

③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Deputation（1898）., Letter of July 26, 1894, from Hutchinson to Governor Brandford Griffith, CO 96/247. Quoted in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356.

威廉·布兰德福德·格里菲思爵士派遣芳蒂人代表乔治·艾克木·弗格森（Ekem Ferguson）去和达干邦、贡贾、曼普鲁谷和莫西人的酋长们缔结协议。1893 年和 1894 年，他继续这一努力，甚至签署了被称作《中间地带》（Neutral Zone）的条约，该地区位于黄金海岸和德国人的领地之间，后来成为多哥兰（Togoland）。

1894 年，另一个非洲人，旅游委员亨德里克·沃卢姆（Hendrick Vroom）被派到库马西劝说阿散蒂人接受一位英国官员作为他们的“朋友和顾问”。[①] 新阿散蒂亨，阿杰曼·普列姆佩一世（Agyeman Prempeh I）拒绝了该项请求及其他要求，但要求将他的王国置于英国的控制下以阻止法国人的呼声与压力与日俱增。殖民地内部有支持这一动议的强烈情绪。1894 年，来自海岸角堡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的代表团向总督施压，让他任命一个永久的殖民官。最后，阿散蒂人想要绕过英国总督的权力，派了一个八人代表团到伦敦，请求同意其国家独立，但既未得到承认也未被接受，他们被告知去和黄金海岸总督直接联系。英国政府决定正式解决这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派遣远征队越过普拉河去执行被忽略了 20 年的 1874 年和平条约的所有条款。

早在 1896 年，为了确保行动在雨季之前结束，弗朗西斯·司各特爵士（Sr Francis Scott）和 R. S. 巴登·鲍威尔（R. S. Baden Powell）率领的一支远征队就进入了库马西，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当场逮捕了阿散蒂亨与其大多数下属和各派的酋长，他们没能立即缴纳 1874 年条约条款规定向他们征收的 50 000 盎司黄金的赔款。他们先被送到埃尔米纳城堡，然后又被送到塞拉利昂。然而，仍有许多人支持被放逐的阿散蒂亨，并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非常愤怒。1900 年，黄金海岸新总督弗雷德里克·霍奇森爵士来到库马西。其间，有人要求将阿散蒂人的“金凳”交给他，以避免任何新的阿散蒂亨再得此位。对于阿

① Confidential Dispatch of February 26, 1894, from Governor Hodg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O 96/243. Quoted in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Deputation (1898)., Letter of July 26, 1894, from Hutchinson to Governor Brandford Griffith, CO 96/247. Quoted in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283.

散蒂人而言，“金凳”比王位更重要。它被看作是阿散蒂民族的象征，包含他们所有的 sunsum 或称灵魂。最终，该要求被视为一大侮辱。在太后雅·阿散蒂娃（Yaa Asantewaa）的领导下，阿散蒂人在库马西包围了城堡中的英国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这次反叛被镇压下去。46 个阿散蒂人被捕并被送到海岸角堡。其中 14 人，包括雅·阿散娃被送到塞舌尔群鸟（Seychelles）加入普列姆佩及其于 1900 年库马西解围不久就被送到那里去的随从行列。他们呆在这个英帝国在印度洋的偏远村落直到 1924 年。

46

阿散蒂人事件有助于解决保护区问题，使其于 1901 年成为黄金海岸的一部分，服从立法会通过的法律。然而，阿散蒂人也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保护区并入，总督得到授权在该地区立法，法院体系保持独立。阿散蒂北部地区也于 1902 年作为保护区并入，称作北部地区，其司法权和立法权也从殖民地独立出来。在这两个保护区中，总督的权力都由一个酋长委员行使。这项对英国人权力的最终解释没有引起非洲人的抗议，因为他们得到了政府不对他们提出土地要求的保证。然而，这样做等于强调了地区差异。当阿散蒂人和北方人稍后有了殖民地时代的政治觉醒，他们将自己看作不同于黄金海岸殖民地的殖民地，打破这些感觉上的不同需要一定的时间。

议会制定殖民地法令，同时赋予总督收税的权力。在阿散蒂，有人试图收取战争赔款，但害怕在库马西西非管辖地引起更大的不满和叛乱，又放弃了这项计划。在北部地区，有人试图收取维护税，但因其强迫劳动的性质也很快被放弃，因为人们更偏爱被视为传统奉献形式的自由劳动。一般说来，黄金海岸的官员是反对收直接税的。结果，殖民地的税收只得通过进口税大幅度增加，以至于到 1901 年，一半以上的支出可以从该项收入中获得。

从经济上讲，殖民地正享受着市场繁荣。棕榈油出口在世纪之交已经达到顶峰，橡胶出口也几乎达到顶峰，但人们怀着巨大希望，希望黄金海岸成为另一个南非。1911 年黄金出口总值超过 100 万镑，占殖民地出口额的 30%。铁路建设受到黄金开采工业需求的巨大影响。

1901 年窄轨距线路从塞康第（Sekondi）铺设到殖民地西部矿区的中心塔夸。1902 年，铁路修到阿散蒂地区储量最丰富的殖民地金矿奥布阿西（Obuasi），1903 年，又修到库马西。但最重要的是可可工业的迅速扩大。1891 年可可出口量仅 4 磅，到 1901 年上升到 43 000 磅，列殖民地出口商品的第 3 位。到 1911 年，可可出口总值几乎接近殖民地出口总值的一半，黄金海岸成为这一热带作物的世界龙头产地，当时总值超过 600 万英镑。①

47

然而，生意兴隆并不一定对非洲企业家有利。欧洲公司开始在殖民地建立他们自己的代理人运转机制。这些生意转化成资本远远超过其非洲同行，得以获得甚至非洲商业王子都无法得到的信用。这些零售商店获得了垄断西非贸易的埃尔德·邓普斯特（Elder Dempster）和沃尔曼航运（Woerman Line）这样的船运公司的特别价格，1895 年成立了西非船运联盟（West African Shipping Conference），提高了船运价格，但给予大公司以折扣。② 意味深长的是，1894 年向国务秘书联名请求吞并阿散蒂的 19 个商人中只有 5 位是非洲人。

为这些变化做铺垫的不仅仅是船运经济。在 19、20 世纪之交，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大大损害了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关系。更年轻的一代商人、官员甚至传教士开始相信，欧洲人生来就比接受最好教育的非洲人还要优越，因此后者充其量只能充任从属职位。热带药物的开发使人亦做此想，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说，西非不健康的地区都曾被称作白人的坟墓。文职上层职位和宣道教会的欧化是这一不断恶化关系的几个最常见方面。

这些更激发了对黄金海岸非洲人的种族态度，在 19 世纪末，像约翰·法雷尔·伊斯曼博士和亨德里克·沃卢姆这样闪亮的文职岗位上的非洲人的位置不光彩地结束了。1897 年，对黄金海岸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统治者们满怀敌意的马克斯韦尔总督将伊斯曼从殖民地卫生总长

---

① Government of the Gold Coast, *Gold Coast Blue Book*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11).

② 埃尔德登普斯特公司是英国的，而沃尔曼航运则是德国的。

的位置上解职，进而迫使他完全辞去在殖民地卫生部的职务。[①] 1901年，马克斯韦尔总督将地区专员沃卢姆的工资减少到一半，并将其派往内地，离开了家乡，依据是他是黄金海岸的土著。在为政府工作了29年之后退休的时候，他只得到一点很微薄的养老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人都曾因工作突出而得到过提升。粗暴、年轻的传教士丹尼斯·肯普（Dennis Kemp）教士严惩他的非洲籍卫理公会派教会牧师同伴，因为他没有“像基督徒一样在非洲生活”。[②] 这类冲突因欧洲传教士会议和修道院长会议的存在而格外惹眼，尽管许多会议的非洲牧师远比欧洲同伴资格老。

48

对这种歧视的一个反应是在所有西非都建立起独立的非洲基督教会。该运动于1898年在黄金海岸开始，以主教B.J. 斯莫尔（B. J. Small）建立非洲卫理公会派教会主教基督教会（AME Zion Church）为标志。最初，他于19世纪70年代从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岛（Barbados）作为西印度群岛军团的外科医生来到殖民地，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他被任命为非洲卫理公会派教会主教基督教会的一名牧师，前往美国。经过努力，他选择了弗兰克·阿塔·阿萨姆·匹南柯（Frank Ata Asam Pinanko）到美国的利文斯通学院（Livingstone College）接受培训，这位年轻人来自海岸角堡附近的小村庄。1903年，他返回黄金海岸，先在海岸角堡，然后在海岸的另一些城镇进行艰苦工作，建立非洲卫理公会派教会主教基督教会。[③] 开始时，海岸角堡基督教社团主要成员中有着巨大的建立独立非洲教会的热情，但几乎没人愿意在建立基督教会的过程中采取激进行动，放弃其成员身份。一般说来，关于海岸角堡律师和早期民族主义者科比纳·塞齐

---

① Adell Patton, “Dr. John Farell Easmon: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and Colonial Racism in the Gold Coast, 1856 - 19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2, no. 4 (1989): 623.

② Cited in F. L. Bartels, *The Roots of Ghana Method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39.

③ I. S. Ephson, *Gallery of Gold Coast Celebrities* (Accra, Ghana: Illen Publications, 1969), 111.

（Kobina Sekyi）在20世纪早期描述的“盎格鲁－芳蒂”（Anglo－Fanti）社会，存在许多文化上的含混不清之处。[1]

在19世纪90年代，报纸上关于非洲行政事务效率提高的报道都被千篇一律地淡化为宿命，就其种族而言，反而被认为不值得获得这些荣誉。对此人们并不吃惊。早期泛非洲主义者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认为，太多的欧化应该为这一“退化”负责，是欧化引起了人们对塞拉利昂的非洲习俗的兴趣。[2] 在黄金海岸也有文化主张的相同声音。1889年，约翰·门萨·萨尔巴赫同另一些海岸角堡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成员一起建立了芳蒂全国政治协会（Mfantsi Amanbuhu Fékuw）。对于该组织的创立者来说，其目的是消除“一些欧洲影响的腐化作用”，“遏制其进一步侵蚀其民族”。[3] 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猜疑远早于19世纪晚期便露端倪，但却在19世纪晚期那伪科学的种族主义氛围中找到了表达方式，而这对后来的殖民地统治意义重大。

---

① K. Sekyi, “The Anglo－Fanti,” *West Africa*, May 25－September 18, 1918. 这是一种虚构的描述：面对其社会的盎格鲁化，一个年轻的芳蒂人努力保留自己的文化。在很多方面，它是自传性质的。

② E. W. Blyden, *Christianity, Islam and the Negro Race* (London: W. B. Whittingham, 1889), 234－35. Quoted in L. Spitzer, *Creoles of Sierra Leone: Responses to Colonialism, 1870－194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115.

③ John Mensah Sarbah, *Fanti National Constitution* (1906;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1968), xvii.

第四章　模范殖民地的政治与抗议

从市议会到西非全国代表大会

51　尽管在沿海城镇对酋长们做出让步，但殖民政府感到，殖民地这些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官员们感到主要集中在沿海城镇的受过教育的精英通过接触西方社会已经“去部落化甚至去民族化”，他们需要一些形式的选举产生的市政府。① 1858 年，总督潘恩（Governor Pine）曾试图将其纳入他的市政条例，“受过教育的精英”方面也有更多非正式的尝试，特别是在海岸角堡“训练他们人民自治的艺术”。② 1874 年之后海岸城镇的发展使之更为急迫地需要市政府的管理。1888 年，殖民地政府为阿克拉、海岸角堡和塞康第这三个主要海岸城镇的非洲人提供了最初选出非洲多数派的市议会。然而，有争议的是，这些直辖市要用当地税收支付其行政费用。对于殖民地统治者来说，此乃需要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这一规定足以注定毁坏任何自愿接受

① W. A. G. Ormsby - Gore, Report by the Hon. W. A. G. Ormsby - Gore, M. P. (Parliamentary Under -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on his Visit to West Africa during the Year 1926 (London: HMSO, 1926), 135.

② F. C. Grant et al., letter of May 18, 1887, to Admisintrator White, enclosed in his di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5, 1887, CO 96/182, PRO.

本条例的愿望。

1894 年，政府再次试图通过市议会的法案，但也更理性地认识到，当地资产税不够用来支撑这些机构的运行，必须从政府的一般税收中支取一些补助金。然而，更大的财政依赖意味着给予非洲人更小的政治权力，恰与政府中占有较高地位的非洲人越来越不受信任相符合。结果，拟建市政新议案甚至比前一个议案更不受民众欢迎。政府最终于 1898 年为阿克拉建立一个市议会的时候，陷入非常大的困境。 52

除了破坏非洲人的私有财产观念外，市议会法案还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与酋长之间制造了紧张。对于后者来说，市议会再次对他们仍拥有的一点权力进行压制。首先在阿克拉，为了压制批评，政府任命曼策到当地任职。1904 年，当该条例在塞康第实施的时候，权力争夺问题还较少争议，因为这个城镇的主要分歧是由谁来担任酋长。塞康第可以说是一个在世纪之交随着金矿和木材工业在西部省份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殖民地创造物。值得注意的是，4 个欧洲人回到市议会的非正式职位上而没有遭到反对。

然而，1906 年，当条例用于海岸角堡的时候，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因为海岸角堡拥有长期反对殖民政策的历史。此事正发生在该城命运开始衰落之时。阿克拉已经成为殖民地的首都，金矿和特许权生意转移到了塞康第。对海岸角堡广大清醒的市民来说，似乎他们的城市正因为过去反对殖民政策的历史而受到惩罚，最初，以海岸角堡为基地的黄金海岸权力保护协会与城市的阿曼亨（Omanhen），科乔·马布拉（Kojo Mbra）紧密合作反对该议案。对于是否立即派代表团赶往英国和由谁在政府发言等问题的争议很快造成此次联合行动的分裂，伴随而来的是更年轻一代的受教育精英站在阿曼亨一边，引起更为激烈的内讧。殖民地政策依据的是殖民地社会西化和传统之间存在着基本分歧的设想。海岸角堡的情况表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界限远比官僚们认定的模糊得多。城市中的两极化造成没有非洲人赞成市议会选举，总督提名的人也无一当选。

1908 年爆发的瘟疫和 1910 年黄热病的泛滥进一步将这些机构毫 53

无例外地变成了殖民政府的武器。1910 年的黄热病造成 10 个欧洲人和两个非洲人死亡，由此引起的恐惧气氛足以推翻任何市议会。为了使这些机构更有效地根除啮齿动物和蚊子，省级专员成为他们的首脑，议会失去了任命卫生官员的权力。非洲人中的非官方委员无权制止在他们看来是受命的卫生官员和欧洲官员的无节制行为。从西非医务部门与非洲医生密切合作的 1902 年起，医务官员很快都为欧洲人所担任。相应地，他们也没有多少非洲病人，结果对那些违反城市议会通过的控制蓄水的规定者几乎没有同情。清除孳生黄热病蚊子的积水在那个时代优先于其他所有事物。

黄热疫情也促使政府为欧洲官员建设单独的房屋。根据当时的医学思想，非洲人是疟原虫和黄热病毒的储存库。特别在夜间，当传播这些疾病的蚊子最为活跃的时候，欧洲人需要同非洲人隔离开来。这些匆忙建立的隔离居住区要达到完全隔离显然是不可能的。1913 年，总督休·克利福德（Hugh Clifford）批评此举是将殖民地公共工程部“降低”到部分瘫痪的程度。[①] 市议会也被指责为漠视拥挤的非洲人区域，而仅仅把那看作是蚊子繁殖的主要基地。结果是通过法规限制建筑材料并拆除不安全、不卫生的建筑，这又不可避免地使欧洲官员反对非洲非官方委员。颁布建筑许可的欧洲官员中的省级工程师变得和市议会的医务官同样重要。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19 世纪的伪科学民族主义当时被当作是医学科学而得到加强。非洲人没有愿意接受被裁决的结局的，这说明，在发展殖民地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他们当中甚至接受最好教育者也无法获得殖民者的信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殖民地的财政在此时已大为改善，20 世纪最初 10 年间内政部门几乎翻了一番，非洲人还是

① Governor Cliffor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8, 1913, CO Afr. 999, no. 83, 113. Cited in Raymond Dumett, "The Campaign against Maliaria and the Expansion of Scientific Medical and Sanitary Services in British West Africa, 1898 – 1910,"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1, no. 2 (1968): 172.

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管理职位上去。[①] 健康条件的改善使欧洲官员把他们的夫人从英国带来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总督罗杰（Governor Rodger）认识到这一情况，于 1908 年在阿克拉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俱乐部以迎合被阿克拉俱乐部（Accra Club）排斥在外的非洲人，后者仅接待欧洲人。

市议会的建立与重新挑战非洲人的土地所有权正相适应。1910 年，政府提出一项建立森林保护区的森林法案。所有权头衔不再有影响，“而如果不在规定的有限时间里认领就可以失效”。[②] 这个对所有权的潜在威胁足以将酋长和受教育精英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种对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1898 年所作保证的践踏。这足以迫使政府修改法案以减少非洲人的猜疑，但 1912 年，国务大臣秘书任命一位特使 H. C. 贝尔菲尔德（H. C. Belfield）调查黄金海岸的土地转让。之后不久，西非土地委员会受命调查那些英国批评者感到的土地过度商业化在整个西非带给公社所有权的威胁。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派遣四人代表团到伦敦挑战“以广泛的国家干预阻止转让个人使用权”的建议。”[③]

取而代之的社会问题，是建立在农民耕种基础上的可可工业的发展；在殖民地内政管理中起很大作用的酋长们的烦恼；以及最为直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扰。这些问题破坏了任何改革黄金海岸原住民土地政策的企图。然而，对于像土地这样的根本事物的斗争似乎再次强调了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打击被视为敌对的殖民政策的无能。1911 年，总督詹姆斯·索伯恩（James Thorburn）不顾来自社会的反对，任命一位当地受过最好教育的酋长曼雅（Manya），克罗博

---

① 1900 年，内政部由 829 人组成。1910 年，1505 人。*Gold Coast Colony Blue Book*（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00）; *Gold Coast Colony Blue Book*（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10）.

② David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1850 - 1928*（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7.

③ Anne Philips,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British Policy in West Africa*（London: James Currey, 1989）, 77.

人的科诺（konor）、梅特·科勒（Mate Kole）为立法委员。对于社会来说，这破坏了他们代表殖民地酋长并为之说话的主张。索伯恩的继任者，克利福德总督甚至更喜欢让酋长们参加殖民地的行政管理，1916年，他和3位受教育的非洲人一同任命3位地位最高的酋长到扩大的立法会中去工作。他们要代表殖民地讲契维语、芳蒂语和埃维语的人民。[①] 以海岸角堡为基地的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似乎无力影响这些发展，由海岸角堡律师J. E. 凯斯利·海福德（J. E. Casely Hayford）领导的更年轻的一代受过教育的精英开始赞同一个全新的、地方色彩更少的组织。

55 需要广泛关注的例证已经存在。1900年由特立尼达律师亨利·西尔维斯特·威廉姆斯（Henry Sylvester Williams）在伦敦组织的第一个泛非会议已有来自黄金海岸的律师A. F. 里贝里奥（A. F. Riberio）加入，还有其他来自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利比亚的代表。黄金海岸报纸刊载了对此次会议的报道，鼓吹对“尼格罗人”的需要应通过更多地依靠他自己来“远离”白人的阴谋。[②] 这样史无前例的种族团结景象给凯斯利·海福德以灵感，他从中学时就开始接受泛非思想家威尔莫特·爱德华·布莱登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布莱登已经是“非洲人格”的主要倡导者，经常访问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凯斯利·海福德就在当地的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上学。[③]

在凯斯利·海福德贴切地题为《无约束的埃塞俄比亚》的书中，赞美布莱登为“种族最重要的思想家”。[④] 他呼吁成立西非共同体并对创建一个西非大学及有关西非教会兴趣盎然，这在伪科学种族主义信念破坏了其自尊的时候特别投合西非精英们的心意。

---

① 契维语是阿散蒂人的语言，和芳蒂语很接近。

② *Gold Coast Aborigines*, August 31, 1900.

③ 布莱登直至1893年才公开使用“黑人”一词，当时他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发表演讲。Hollis Lynch, Edward Wilmot Blyden: *Pan – Negro Patri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54 – 55.

④ J. E. Casely Hayford, *Ethiopia Unbound: 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 (1911;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1969), 164.

1912 年，凯斯利·海福德的兄弟，马克·海福德（Mark Hayford）牧师参加了在阿拉巴马的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召开的布克·T. 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黑人问题国际大会，他在会议上发言并宣读了他哥哥的一封信。[①] 布莱登于同年去世，这进一步引发了西非对他的纪念。凯斯利·海福德同 1900 年伦敦泛非大会的尼日利亚代表 R. A. 萨维奇（R. A. Savage）博士一起开始接触在英国的非洲殖民地有影响的人物，征询他们对西非大会的意见。1912 到 1913 年，他利用报纸《黄金海岸领导者》广泛宣传这一思想。英国政府对土地问题采取的地区间的方法进一步证明需要一个包含所有英属西非殖民地的英属西非组织，包括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冈比亚。他们将携手组成一个凯斯利·海福德所希望的“联合的西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 1919 年，他才和其他黄金海岸的行家们一起组织起计划中的西非大会的黄金海岸分会。

协约国的战争目标和当时正在进行的凡尔赛和会（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普及了民族自决的思想。在黄金海岸，这进一步转化成立法会议对非洲人更广泛的代表，但谁应该做这些代表的问题却使受教育的本土人和酋长们发生公开分裂。凯斯利·海福德认为已到了“受教育的本土人”推选他们国家自己“天然领导者”的时候了，他使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领导阶层及殖民地最重要的酋长纳纳·奥福里·阿塔（Nana Ofori Atta）、阿肯人阿布阿夸的欧科恩痕尼（okyenhene）非常不满。[②]奥福里·阿塔于 1916 年代表黄金海岸讲契维语的人被接纳进入立法会议，成为议会中一个说话有力的重要声音。实际上，他一直和凯斯利·海福德在思想上一致，但极其愤怒地发现他已被排除在后者的考虑之外。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也拒绝执行这一新举措，担心旧的社团会在凯斯利·海福德提出的更广泛的协会

56

---

① J. Ayodele Langley, *Pan – Afric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West Africa 1900 – 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32.

② Nana Ofori Atta,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April 27, 1921, Quoted in Kimble, *Political Histroy of Ghana*, 379.

中丧失其身份。

然而，1920 年，人们称之为英属西非全国代表大会（NCBWA）的第一次会议在阿克拉举行，4 个英属西非殖民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支持会议的资格最老的黄金海岸律师 I. 赫顿·米尔斯当选为主席，凯斯利·海福德当选为副主席。大多数官员来自黄金海岸，但另外 5 个副主席被推举到其他西非殖民地去做宣讲。会议通过 83 项决议，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选举代表政府、政府与土地问题的关系、英属西非大学的创立、非洲人进入公务员里上层的机会、向合格的非洲人开放司法部门和西非医务部门以及请求遣返叙利亚人，因为人们认为叙利亚人与非洲企业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公平。这些叙利亚人实际上大多来自黎巴嫩。他们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来到西非，通过囤积资源和降低价格将非洲商人从整个地区的零售贸易中排挤出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非洲人和黎巴嫩人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已非常紧张，导致了 1919 年塞拉利昂的严重骚乱。毫不意外，大会代表们要政府对他们所称的“叙利亚危险”做些事情。①

然而，这些决议一般说来是渐进的而非激进的，尽管他们的措辞用的是自决。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将人民的自决条款概括为其“十四点计划”中的一点，即致力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持久而公正的和平，这激励了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起初，情感上倾向于改革派的新总督戈登·格吉斯伯格（Gordon Guggisberg）对改革至少是同情的。但当 4 个西非殖民地组成的九人代表团前往伦敦为改革宣传的时候，他对改革的同情烟消云散了。纳纳·奥福里·阿塔领导下的酋长们也攻击受过教育的精英为天然领导者。他们的观点，破坏了凯斯利·海福德及其同道的代表团成员拥有的影响伦敦殖民部的机会。

酋长与受过教育的精英之间的冲突让黄金海岸政府以其不具代表性为由解散了该会议。作为应对措施，会议控制了黄金海岸原住民权

① Leo Spitzer, *The Creoles of Sierra Leone: Responses to Colonialism, 1870 – 194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158.

力保护协会。凯斯利·海福德成为其副主席。他从1916年起一直是立法会成员，他"指控"纳纳·奥福里·阿塔及其支持者为"英属西非事业的叛徒"。[①] 然而，对西非联盟目标的损害已经造成，尽管其他英属西非殖民地首府有许多联合会议［弗里敦，1923；巴塞斯特（Bathurst），1925－1926；拉各斯，1929］，但只有到了这些时候该运动才真正活跃起来。作为一只政治力量，西非全国代表大会对英属西非殖民地只有间接的影响力。其许多建议中只有一项建议，即建立西非地区法院（1929）实际上在该组织存在时期实现了。更为重要的是，该组织让人看到，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其殖民地社会的行政管理中要求更多的发言权。

格吉斯伯格的统治

议会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殖民地第12届总督戈登·格吉斯伯格的精力充沛的统治。他于1919—1927年在位。除了祖籍加拿大外，格吉斯伯格还有其它不同于其前任之处，他有工程学背景。他于1889年从位于伍里奇的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在英国殖民地的许多技术岗位上工作过。1901—1908年，他任黄金海岸勘察署署长助理，勘察了几乎全部殖民地以及1/4的阿散蒂地区。在野外工作的经验使他对改善殖民地交通和通讯的需要特别敏感。

格吉斯伯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繁荣时期来到黄金海岸。可可出口从1918年的1 800万磅左右增加到1919年的超过8 000万镑，尽管有很大的上下波动，但殖民地的主要出口价值在20世纪20年代持续增长。他意识到，殖民地未来的繁荣依赖于其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吸引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海外资本"。[②]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起草一个10年发展规划。其中，他打算前所未有地投

58

① Casely Hayford,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April 25, 1921. Quoted in Kimble,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394.

② Casely Hayford,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April 25, 1921. Quoted in Kimble,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56.

入2 500万镑。此项经费的一半以上将花在铁路建设上，格吉斯伯格认为，没有铁路，殖民地的经济注定完蛋。许多钱最后花在了扩展殖民地已有铁路网的建设上，但雄心勃勃发展北方的北方省际铁路却从未开工。此外，他还花了120余万镑在公路建设上，大部分都在北方。1924年建成的科尔莱布（Korle Bu）医院成为“非洲最好的医院”。按照格吉斯伯格的设想，这个医院也成为很好的临床医院。[①] 1927年，阿奇莫塔（Achimota）学院正式成立，很快成为殖民地最重要的教育机构。让非洲人特别骄傲的是该学校副校长的位置由英国的非洲教育工作者詹姆斯·E. K. 阿格雷（James E. K. Aggrey）担任一小段时间，他曾在美国接受培训。[②] 格吉斯伯格设想，这个精英中学最终将成为殖民地第一所大学的基础。毫无疑问，格吉斯伯格规划的核心是在塔科拉迪修建一个深水港口，大约需要花费300万英镑，但直到1930年仍未完工。

这种性质的计划并非无人反对。投资塔科拉迪港口建设及其他基础工程的改善意味着向伦敦金融市场借贷450万英镑。有一些殖民公署的官员认为，以该项贷款为代表的长期债务表明，总督“已染上不计后果的铺张浪费的疾病”。[③] 还有大量的针对殖民地修建港口，特别是作为支线体系重要部分的中部省铁路的反对意见，这些工程被认定是要从温尼巴、索尔特庞德和海岸角堡这样的风浪港榨干内陆产品。实际上，这一威胁看似对海岸角是如此之大，因为从内陆出口的产品更容易通过铁路运往塔科拉迪，这足以集结起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以反对中部省铁路以及任何将城镇关闭使之变作风浪港的政府

① Casely Hayford,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April 25, 1921. Quoted in Kimble,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58.

② 琼斯博士（D. T. J. Jones）以非洲的阿格雷作为他的名号。他于1920到1921年受纽约的Phelps - Stokes基金会委派指导对非洲教育的调查，阿格雷于1927年离开阿奇莫塔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但在抵达纽约不久后猝死。W. E. Smith, *Aggrey of Africa: A Study in Black and White*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9).

③ David Mered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akoradi Harbour in the Gold Coast 1919 to 1930: A Case Study in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5, no. 1 (1976): 133.

计划。此举严重分裂了议会运动。

格吉斯伯格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如1924年的遣返前阿散蒂土王普列姆佩一世（Premphe I）以及1926年他就职为库马西土王，都受到了毫无保留的欢迎。同样受到感激的，还有增加非洲人就任公务员高级职位的决定。克利福德总督于1919年任命了两位警局官员，这是殖民地法院系统中的新司法职位，以及一个临时的医务官，开启了这一进程。到格吉斯伯格1927年离任时，这样的任命已有31个。这些任命中大多是留给非洲人的“特殊阶层”的。[①] 格吉斯伯格相信，以阿奇莫塔学院为中心的中学体系可以为这样的岗位提供许多合格的非洲人。一般说来，在行政事务岗位为非洲人找些职位并不困难。在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耗之后，内政需要重建。在格吉斯伯格在位的8年间，文职官员扩大了63%。[②] 格吉斯伯格相信，这样的人事任用，尽管可能暂时导致“效率有点儿降低”，但从长远看会节省殖民地开支，因为就职欧洲人位置的非洲人的报酬比同样位置上的欧洲人少20%，而且不享有同样慷慨的假期规定。[③] 这也是总督和立法会议的非洲成员之间存在摩擦的一个根源。

总督的宪政改革更富争议。1924年，由于响应非洲人在政府中要有更多代表和改善城市议会工作的要求，格吉斯伯格提出了市政机关法案。法案规定，大部分选举产生的非洲议员有权征税，特许经营仅限于业主的每座房子价值5镑的税款。开始时，凯斯利·海福德欢迎这一立法，但其他受教育精英认为，该法案没有扩大非洲人在立法会的参与。还有些人强烈反对直接税的规定，格吉斯伯格最终收回法案，取而代之的是，仅仅修改了1894年市议会条例以增加任命委员的数量。

---

① R. E. Wraith, *Guggisber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25.

② 1920年，文官队伍为2700余人，1927年，则突破4300人。Gold Coast Colony Blue Book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20); Gold Coast Colony Blue Book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27).

③ Wraith, *Guggisberg*, 231.

格吉斯伯格的1925年新宪法甚至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他将立法机关成员从21个扩大到30个，其中16个为正式成员，其余为非正式成员。非正式成员中有5位为欧洲人，代表殖民地的商业利益，其余为选举产生的非洲人。殖民地3个直辖市每个选一位代表，特许向所有21岁以上的人和拥有房产者至少征收每年8镑的税金。其余6位非洲委员由新成立的省级酋长委员会选举产生。西部省份人口最少，只有一个代表名额；中部省份有两个代表名额；东部省份人口最多，有3个代表名额。政府力求保持该体系既民主又有代表性，试图将其根基追溯到19世纪。然而，对于受过教育的精英来说，保留本地机构的用意被看作是对渴望成为凯斯利·海福德说的“天然领导者”的一个打击。殖民地的政策是分而治之，更倾向于依赖“半文盲”的酋长而不是受过教育的精英，这一点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们那里引起很大质疑。[①]

60

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的直接反应是“绝对拒绝合作”。[②]凯斯利·海福德及其支持者控制的社会阶层规定，任何酋长都不该参与省级议会。政府克服很大困难设法召集三个省议会开会，但只有中部和东部省议会选派了代表。没能当选东部省份代表的纳纳·奥福里·阿塔后来被提名填补西部省份议会的空缺。该议会在组织以市政议员身份竞选公职方面更为成功。格吉斯伯格想使海岸城镇市政自治政府成为立法会选举产生代表的一个垫脚石。然而，他被迫提名非洲人到这些岗位上去，以区分受教育精英的等级。凯斯利·海福德在海岸角堡的主要政敌E. J. P. 布朗（E. J. P. Brown）在立法会恢复了席位。一位来自阿克拉的年轻律师A. W. 科乔·汤普森（A. W. Kojo Thompson）利用该镇区域间的激烈竞争使其中一派提名他，而一位来自阿克西姆的木材商人乔治·格兰特则接受了塞康第的提名。

不知疲倦的凯斯利·海福德急匆匆派往伦敦的一人代表团也没能阻止立法会于1926年召开。1927年，立法会的市政委员选举在即，

① “An Open Letter to His Excellency Sir Gordon Guggisberg,” *Gold Coast Leader*, October 23, 1926.

② Kimble,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445.

他知道进一步反对已经无用。他联合英属西非委员会的支持者一起成立了阿克拉纳税人（Retepayers）委员会，成功推选出阿克拉律师格洛弗-阿多（Glover-Addo）。在塞康第，凯斯利·海福德自己成功地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但是，在海岸角堡，由于长久的反对殖民政策的历史传统，他还是遭到了大量的抗议。一个由海岸角堡律师 W. E. G. 塞齐领导的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精英委员会攻击他说他有"大脑的奴性习惯",[1] 因为他曾对凯斯利·海福德的市政议会法案持不同意见，现在人们仍然这么说他。害怕政治上落后最终使一个重要的城市会议共同形成海岸角堡地方纳税人联盟，年轻律师 K. A. 科萨赫被推选出来。塞齐领导的海岸角堡知名的不合作者（Noncooperators）组织也质疑该选举的合法性。他们在这一点上并不成功，但作为一个市政政治上与当地秩序交织在一起的标志，他们成功地废除了该城的地方纳税人联盟的军人首领（Tufuhen）W. Z. 科克尔（W. Z. Coker）。

61

像以前的凯斯利·海福德一样，塞齐控制了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并利用这一组织破坏省议会的功能。他在中部和西部省份得手，在这些省份他能够利用继承权的争论和最高酋长与其下属间的冲突。在海岸角堡，他可以控制该城的阿曼亨——马布拉三世。在东部省，在一系列想要脱离阿肯人阿布阿夸控制的法庭诉讼案中，塞齐可以通过他们的副酋长来攻击纳纳·奥福里·阿塔。钻石矿税收的控制是危险的。在殖民地被称作阿萨芒克色的争论开始于 1922 年并一直持续到 1937 年，阿萨芒克色城最桀骜不驯的纳纳·奥福里·阿塔的副酋长奥海内（Ohene），最终撤回了他向英国枢密院提交的悬而未决的上诉。双方各自付出了超过 16 万英镑诉讼费的代价。

对黄金海岸权力保护协会和受教育精英其他成员的反抗更加火上浇油的是，格吉斯伯格当局批准了酋长们于 1927 年提出的新本土管理条例（NAO）。条例除了给予酋长们构建法律框架的经验外，还加强了他们的行政和司法权。对政府的间接统治政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① *Gold Coast Times*, 30 April 1927.

随着条例的更加形式化，其所创立的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秩序。殖民地最高酋长遭废黜的数量惊人地增长着，从 1904—1908 年的 7 位，到 1919—1924 年的 41 位。阿萨芒克色争论并非绝无仅有，[①] 副酋长挣脱其对最高酋长的臣服也有增长的趋势。新本土管理条例欲抵制这一趋势，但对其对手来说，这被再次视为将权力给予反传统的酋长，这将会激起更大的反对。

格吉斯伯格改革，特别是新本土管理条例，代表了从不干涉主义向干涉主义统治政策的转变。[②] 间接统治并不表明对传统的国家司法机器的顺利运行和争论的解决感兴趣，而是要将酋长秩序纳入殖民地的政府机制中。显然，这需要对传统社会及其机制有更好的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格吉斯伯格于 1921 年成立了人类学部。该部由 R. S. 拉特雷（R. S. Rattray）领导，他于 1916 年出版了一个阿散蒂谚语集，将之看作是“该民族心灵的真实写照”。[③] 拉特雷总共出版了 7 部关于北部内陆阿肯人及其“部落”的著作。他主要关注的是阿散蒂人，并很快得出结论，在阿散蒂人和所有阿肯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相同之处。早期非洲评论家约翰·门萨·萨尔巴赫和凯斯利·海福德已经观察到这一点，但现在得到了官方的承认。结果是，干涉主义的间接统治比过去更有意地以阿肯人模式的治国方略为基础。

理解本地社会的兴趣也扩大到了北方，而这一区域在集权化国家方面落后于南方。大小相当的王国，如贡贾和曼普鲁谷，已被 19 世纪的奴隶搜捕及内战搞乱。特别是在西北和东北部，许多民族根本没有了酋长，只得通过在这些特殊地区建立最高酋长制来进行修正，寻求实现行政管理。一般说来，人们对当地传统和习俗所知甚少。北方发展成为矿山、可可园、阿散蒂及南方公共工程部和殖民地军警力量的

---

① Kimble,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490.

② Robert Ston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Rural Politics in South Central Ghana, 1919 - 1951* (Ph. D. D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5), 1 - 2.

③ Robert S. Rattray, *Ashante Proverbs: The Primitive Ethics of a Savage People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with Grammat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Notes* (1916; repri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12.

劳力储备地。对殖民地官员来说，北方被描绘为该国的灰姑娘。

20 世纪 20 年代，格吉斯伯格的统治将希望的目光转向更系统的发展。计划中的北方地区铁路将是该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北方社会加深理解似乎也非常必要，因而要鼓励官员们提交其治下人民生活的报告。拉特雷将其目光转向北方内陆的人民。他提供了关于源自 ten'dana 的双轨政府的大量信息，ten'dana 是土著居民执行所有“宗教或宗教魔力”的祭司国王和从更北方入侵者的后裔充任的世俗统治者。[①] 然而，拉特雷发现，这些北方民族机构和南部阿肯民族机构间仍存在着巨大的相像之处。北方的间接统治政策也受到阿肯人治国艺术思想的影响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像许多当时的人类学著作一样，拉特雷的研究建立在什么应该发生和什么已经发生的假设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拉特雷避开了和欧洲人“经常接触”的地区。他故意避开了阿散蒂首都库马西，只在阿散蒂人社会进行实地考察。那里的“老年男女和外国人很少接触。他们在偏远村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②] 一般地说，他的著作描绘了秩序井然甚至是时间静止的社会，与当时行政管理记录中描述的与传统秩序的高度竞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幅迎合了殖民地管理者的景象，因为它强化了他们关于传统秩序与海岸地区的西化社会截然不同的假设。他们还假设，殖民统治本身就具有静止的性质，改变只是渐进的发生。一个植根于经久不变的过去的政府体系似乎更适合保存他们所依靠的酋长的权力。

63

萧条岁月

在兰斯福德·斯莱特（Ransford Slater）爵士接任戈登·格吉斯伯格爵士的殖民地总督职位后不久，可可价格继续上涨。但是，到 1929 年，在“大萧条”的打击下，价格开始狂跌，到 1930 年，价格跌到

① R. S. Rattray, *The Tribes of the Ashante Hinterland*,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2), xv.

② R. S. Rattray, *Ashan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7.

只相当于1727年价格的1/3强一点。大约60%的殖民地税收来自可可出口，因此当地经济陷入了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过的。格吉斯伯格的野心勃勃的殖民地计划被束之高阁，削减费用、提高税收的政策更引起了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可可价格的崩溃也引起非洲人的反应，最激烈的反应是抢劫。一般说来，世界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对其体制的彻底批评。保护殖民地不受反帝意识形态的攻击成为殖民地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通过立法以实现这一目标。在黄金海岸，挑战如此讨厌的法案及增税措施是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政治生活的主要特色。

甚至在大萧条发生之前，总督斯莱特就通过对公务人员的非洲化来展示他与其前任的不同。1930年，他规定减少非洲试用雇员起薪就更加不受欢迎。一年以后，他实行的征收所得税真的引起了抗议。抗议规模不大且仅限于其所得超过每年40镑者。当许多非洲人和欧洲人紧缩了开支或收入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该法案遇到了强劲的反对。在塞康第、沙马（Shama）和海岸角堡，发生零星的暴乱扰乱了生意和法庭程序，暴乱的攻击目标是警察和欧洲人。让政府最为头痛的是知识分子利用这一形势，接受来自欧洲商会成员的支持。

64

总督被迫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以保护他认为是更重要的初衷，即实行一项更普遍的直接税，甚至本地权势人物也不例外。他认为最为重要的目标是全面执行间接统治政策，按照尼日利亚的模式，这将“使本地权势人物……成为政府机器中的一个有活力的成分”。[①] 实际上，在他统治期间，间接统治这一术语被正式纳入政府用词。为了实现其目标，他感到有必要提高赋税，让酋长“支付公职人员的工资，启动发展规划”。[②] 1932年，他试图从本地管理税务条例开始其计划，但遭

① Sir A. R. Slater,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the Gold Coast and its Dependencies*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30). Quoted in Ston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Rural Politics in South Central Ghana," 99.

② Government Sla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18, 1930. CO 96/693/6599/1930, PRO. Cited in Stanley Shallof, "The Income Tax, Indirect Rule, and the Depression: The Gold Coast Riots of 1931," *Cahiers d' Etudes Africaines* 54, no. XIV-2: 360.

到大规模抗议。除了一些像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1927 年被授以爵士头衔）和纳纳·阿伊雷比·阿夸赫（Nana Ayirebi Acquah），温尼巴的阿曼亨那样的酋长外，在乡村没有得到比城市更多的对直接税的支持。

发生此种情况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在现存的殖民地地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由于可可价格的崩溃，欧洲公司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由非洲联合公司（UAC）领导的联营，非洲联合公司本身就是 1929 年 3 个主要大都会公司联合而成的联合体。殖民地种植可可的农民的对策是成立了一个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可可联盟，1930 到 1931 年间组织了一次价格的联合行动，取得有了限成功。黄金海岸可可农诸如此类的讨价还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溯到 1921 年，阿夸平可可农就结成过一次联盟。过去，这些提价都是地方性的。然而，1930 ~ 1931 年这次联合侃价遍及整个殖民地，也延伸到了阿散蒂地区。几个月后，殖民地可可农的行动获得极大成功，但在阿散蒂地区情形却并非如此，当地的政府官员给酋长们施压，让他们不要参与。不幸的是，当这次价格行动最终于 1931 年初失败的时候，可可的价格大幅度下跌，各种让可可独立上市摆脱合营公司的竞争计划，也都不太成功。可可的价格继续下跌，引起殖民地农村地区的极度不满。这并不是一个开始任何形式的直接税收的好时机。

65

但是，1932 年接替斯莱特的申顿·托马斯爵士（Sir Shenton Thomas）被迫继续削减成本的措施并试图从其他来源增加税收。他的水务设施条例便是一项这样的动议，法案让享有供水系统的城市居民付水费，而以前水是免费提供的。与这项“令人讨厌的”条例并行而来的是刑法修正案，旨在防止“颠覆性文字进入殖民地”。[1] 后一个法案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控制政府认为是变得“种族意识强烈和反殖民

① Stanley Shallot, "Press Controls and Sedition Proceedings in the Gold Coast, 1933 – 39," *African Affairs* LXXI, no. 284 (July, 1972): 242.

主义”的当地报纸。[①]“大萧条”时期的一个增长源泉便是殖民地的报纸。阿克拉地区尤其如此，1934 年那里有 4 家报纸，其中一家报纸（《西非时代》）是日报。经常让殖民地官员恼火的是，该报纸强烈批评政府的行为。一些更为激进的出版商和编辑也与共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组织有接触，如国际反帝联盟和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世界黑人改良协会（UNIA）。[②] 这些组织传播的文献是刑法修订案，俗称煽动法案的主要目标。

可可种植区的不满和城镇的抗议将酋长和知识分子带到一起，结成名为中央国家委员会（CNC）的组织。实际上，该联盟早在 1929 年就已随着青年会议运动的成立而开始构建了。刚从其英国书斋中返回的专业人士是该运动后面的推动力量，他们力图让“酋长与知识分子相互利用”。[③] 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的侄子，J. B. 丹夸博士于 1927 年完成法律学和伦理学博士学业后从英国返回，成为该运动主要的幕后力量。这并不奇怪，他从在英国做学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卷入政治，是西非学生会主席。1934 年，当中央国家委员会决定再派代表到伦敦时，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八人代表团就包含了许多来自殖民地和阿散蒂的青年运动的重要人物。为了给代表团尽可能多的合法性，组织者说服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做其领导人。此外，他们通过要求改变殖民地宪法扩展了他们关注的范围。他们要求立法会由非洲人占多数并代表执行委员会。

66

对于殖民地建立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存在着太多的意见分歧，经过与中央国家委员会的争吵，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最终派遣

---

① H. S. Newlands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January 15, 1931, CO 96/707/21613/1933, PRO. Quoted in Shallof, “Press Controls and Sedtion Proceedings in the Gold Coast.”

② 列宁于 1919 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将其作为向世界传播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全球性组织。它由许多附属机构、先锋队、组织构成，执行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国际的政策。加维于 1914 年在牙买加建立了黑人改良协会，但两年后他移居纽约，那里遂成为协会的实际中心。他呼吁“非洲是海内外非洲人的非洲”。

③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accra*, (Accra, Ghana: Sankofa Educational Publishers, 2000), 245.

其两人代表团前往伦敦。二者都没有取得多少成功，因为英国政府也正面临红色恐慌，陷入不得不通过自己的煽动法案的困境。这让殖民地官员相对容易对其黄金海岸的下属产生同情，他们认为这些下属正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可能丹夸是个例外，黄金海岸和阿散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是温和派，谨慎地避免在英国期间做任何违宪的事情。甚至在他们已经无法保证国务大臣做出任何让步之后，仍拒绝同工党左翼进行接触。然而，在黄金海岸有更为极端的元素似乎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给殖民地带来的威胁。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当属塞拉利昂人 I. T. A. 华莱士 - 约翰逊（I. T. A. Wallace - Johnson）。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就来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并毕业，还保留了殖民官员的职位，处于“颠覆性宣传艺术之中”。[①] 他于 1933 年在因组织工会而被殖民政府驱除出尼日利亚之后来到黄金海岸。华莱士 - 约翰逊将其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与国际左派目标联系起来，远远超出了黄金海岸已建立起来的不合作激进主义范畴，这使他对殖民地官员威胁极大。他很快卷入工人骚动。20 世纪 20 年代，殖民地开始出现工会组织，塞康第铁路协会（1923）是殖民地出现的第一个组织。然而，工人骚动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急剧发展起来的，华莱士—约翰逊全身心投入了这些冲突。争取工人的赔偿是其关心的主要目标之一。1934 年，普雷斯特阿（Prestea）矿难发生，40 个矿工殒命，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攻击殖民地金矿恶劣环境的典型事例。为此目的，他利用了殖民地更激进的报纸，还为《黑人工人》（Negro Worker）撰写文章，确保黑人工人国际贸易工会委员会的这个喉舌刊物散发到黄金海岸各地。他甚至更直接地将黄金海岸的斗争与争取种族正义的国际运动结合起来，比如美国的“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抗辩。[②]

刑法修正案的通过也没有阻止住华莱士 - 约翰逊。1935 年，他站

① Shallof, “Press Controls and Sedition Proceedings in the Gold Coast,” 245.

② 斯科茨伯勒案涉及 9 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们被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妇女。美国共产党奋起抵挡各种指责并揭露南方的种族主义。

67 在阿散蒂自由之友（Friends of Ashanti Freedom）协会一边，反对恢复阿散蒂联盟，这样做便可以攻击间接统治。他和尼日利亚人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共同组织了西非青年团（WAYL）。后者于1935年来到黄金海岸做阿克拉一份最激进报纸《非洲清晨邮报》的主编。西非青年团比凯斯利·海福德寻求在讲法语和讲葡萄牙语的非洲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构想走得更远。尽管其名字是青年团，但并不仅限于青年，成员可以是“年龄上的青年和思想上的青年”，该青年团力求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反帝思想。[①] 在1935年竞争激烈的阿克拉市政选举中，青年团支持A. W. 科乔·汤普森，反对保守的南卡·布鲁斯（Nanka - Bruce）博士。他们与许多后者的支持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在第一次选举中颗粒无收，但在第二次选举中却仍能有候选人当选。

西非青年团还建立了埃塞俄比亚国防委员会（Ethiopia Defense Committee）支部，该组织于1935年当意大利人侵入埃塞俄比亚时在巴黎成立。之后的泛非抗议将反帝与种族意识联系起来，在殖民地的工人和受到大萧条负面影响的其他人中找到了现成的回应。1936年，阿诺德·霍德森（Arnold Hodson）总督利用了华莱士—约翰逊以“非洲人有神吗?”为题在《非洲清晨邮报》[②] 上发表的对欧洲文明、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充满强烈敌意的攻击。政府利用刑法修正案逮捕并起诉了他和报纸的主编纳姆迪·阿齐克韦。他们双双被判有罪并处以罚金。阿齐克韦向西非上诉法院申诉成功，但不久便返回尼日利亚。1937年，华莱士·约翰逊前往英国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他上诉失败，于1938年返回其祖国塞拉利昂，因为黄金海岸政府已禁止他返回殖民地。失去了他的组织才能，黄金海岸的西非青年团很快崩溃，以后的华莱士—约翰逊只得专心致志于在塞拉利昂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华莱士—约翰逊出局了，但霍德森总督几乎立刻面对一个更为严

---

① Leo Spitzer and LaRay Denzer, “I. T. A. Wallace - Johnson and the West African Youth Lea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6, no. 3 (1973): 413.

② *African Morning Post*, May 15, 1936.

峻的挑战。可可价格于 1936 年回升，黄金海岸的萧条似乎已经过去，但 1937 年又突然下降。非洲联合公司领导的大公司签订了购买协议，很快成为新一轮价格战的靶子。1937 年的远比 1930 ~ 1931 年以及其他不很成功的早期尝试更为成功。此次的领导来自农民，酋长们也起到了谨慎的作用，这使政府官员很难让他们对非法的胁迫性行动负责。购买协议也通过寻求消除他们过去曾被指责犯过的陋习，从而将矛头指向经纪人。这次持续了 7 个月，从 1937 年 10 月直到 1938 年 4 月，在其顶峰时期，80% 获得了成功。最后，殖民地政府被迫于 1938 年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可可市场的情况。

68

为了实现和解，诺埃尔（Nowell）委员会（以其主席威廉·诺埃尔的名字命名，他一直任东非农业研究所所长）呼吁停止购买协议。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通过的规定出口配额的条例。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更大的灾难，因为他们不得不以抵制之前接受的一少半的价格出售可可。为了寻求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诺埃尔委员会建议集团合作营销以摆脱那些应对混乱局面负责的经纪人。政府的两个委员会对该计划的成功都非常悲观。代价非常之大，农民也不特别热心。殖民地这样的营销活动不怎么成功由来已久。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 1924 年斯特里克勒（Strickler）欺诈案让黄金海岸可可农民损失 250 000 英镑。1937 年，该案仍在纽约最高法院审理着，因为 F. D. 斯特里克勒是美国人，用了本国的公司进行运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本改变了整个西非可可市场营销的性质。为了避免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降临在可可工业头上的浩劫，宗主国政府决定全部购买殖民地的可可作物。由于收购价格非常低，在战争期间煽动殖民地农民提高价格的情况不断发生。然而，正是该管制计划使战后可可销售委员会得以诞生。

除了改变可可在黄金海岸的营销方式外，1937 年的抵制正好表明了酋长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多么重要。他们最初反对抵制，但当决定加入的时候，其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细想一下 20 世纪 30 年代间的

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使省议会成为非洲殖民地活动的一个主要聚焦

69

点。[①] 然而，该重要因素意味着酋长要为其失败受责。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因1934年代表团的失败而受到激烈的批评。1938年可可价格的灾难性下跌让诺埃尔委员会的任命所带来的得意洋洋一扫而光，酋长们再次成为输家。此外，这些倒退构成了殖民地政府加强间接统治的有争议立法企图的背景。这使酋长们再次在批评面前变得脆弱不堪。

这些措施中最受争议的是建立国库以控制本地各州上缴税收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932年北部地区所有尝试中的第一个尝试。简单地说，就是步在北部尼日利亚和坦噶尼喀（Tanganyika）做法的后尘。1935年，政府还颁布了阿散蒂本土政局条例，赋予总督要求获得认可的地方当局建立国库的权力。[②] 此事恰与阿散蒂联盟的恢复相一致，这意味着新任阿散蒂亨普列姆佩二世不可能抗议。科托科（Kotoko）协会的知识分子们不像其殖民地同伴一样进入了省酋长议会，而是被增选入联邦议会。直到1939年，同样的立法才随着本土行政国库条例的通过为殖民地颁布。可以预见，一定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该立法使本土州政府向其人民收税成为可能。

表面上看，这样的反对似乎突出了酋长和知识分子之间不断的分离。青年运动的再次出现是缓和该紧张关系的一次重要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该运动于1938年召开第二次大会的时候，地点选在海岸角堡，即为了拉入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使运动尽可能民族化。出于同样的原因，1939年第二次会议在库马西召开，这是一次在殖民地和阿散蒂分离间架起桥梁的重要尝试。首先，该运动背后的推动力J. B. 丹夸博士想使其尽可能非政治化，以使之不至于像西非全国代表大会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与殖民地政府相对抗。该运动是想将“思

---

① Baron A. Holm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old Coast, 1920 - 1945”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2), 463.

②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Revised* 1956: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523.

想者”集中在一起而不是将“做事者”集中在一起。① 通过将广泛的参与者集合在一起，温和者将淹没激进者，作为该运动兼容并蓄而又温和的标志，被称作黄金海岸阳光总督的霍德森在 1939 年库马西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历史学家通过观察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组织强调了殖民地政治生活的精英性质。可可价格抵制运动很明显有广泛的农民参与，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年运动几乎没有注意到发展中的殖民地工人运动。对铁路工人工会的罢工，库马西议会成员像政府一样吃惊，此次罢工正好和大会的召开同步。然而，把目光聚焦在殖民地主要政治组织的精英性质或酋长和知识分子间的分裂上会忽视间接统治对正在走向政治化的黄金海岸具有多大的贡献。这一点在殖民地档案记录的内部事物中最为详细地表现出来。但过于细小不易聚焦，所以被历史学家忽略。历史学家一直主要关注殖民地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

废除和继承之争是殖民地两战之间政治生活的主线。各界人士卷入争辩，包括知识分子成员及没有文化的渔民或农民。在精英政治运动中角色微小的妇女作为权位母亲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她们负责为传统职位选出候选人。酋长们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割也不特别死板。扩大的家族体系确保必须有更广泛代表的候选人出现，甚至到了将具有奴隶背景的人也囊括其中的程度。源于这些选举进程的争吵异常激烈，甚至到了流血的程度。1932 年，在海岸角堡有 6 位阿萨福成员为争论谁是该城合法的军人首领而被射杀。② 这些争论特别持久且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埃尔米纳城没有官方认可的阿曼亨。两大对立势力表面上由“无文化的渔民”和同其对立的“有文化的学者”构成，两者都向知识分子寻求法律支持，这些知

---

① Holm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old Coast,” 784 – 785.

② Stanley Shallof, “The Cape Coast Asafo Company Riot of 193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7, no. 4 (1974): 602.

识分子既反对省议会又支持他们。[①] 一般来说，间接统治刺激起对传统职位的竞争，这需要新的策略来夺得其实是获胜党获取的官职。

这种政治环境令人不解的陌生性质会将间接统治的构想者引入绝望。恰如一位殖民地官员在1939年描述的一样："无休止的政权交涉，冷漠，缺乏真正的热情、政策、合作及远见成为整个黄金海岸行政管理的主要特色，一次真正的重击出现得越快，对于一切相关事物就越好。"[②] 可以理解为什么聪明的局外人很难将这个派系林立的世界看作民族主义的生机。当英国在非洲的权威人士黑利勋爵（Lord Hailey）于1938年出版其《非洲纵览》（*An African Survey*）一书的时候，他设想，"当非洲被认为有能力履行责任的时候，充其量不过是勉强承认负责任的西非自治政府的意愿而已。"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被认为是"时代的圆满成果"。[③] 然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黄金海岸成为独立的加纳。20世纪30年代，尽管有抗议和争论，殖民地政府还是有效地维系了西非殖民地样板的最初设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新的挑战，呼唤重大改革。在接下来的世界新秩序中，该初衷很快转向民主主义。他们显然依赖过去的抗议，而黄金海岸社会的高度政治化使其非常容易"产生集体不满"，出现一个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④]

71

① The provincial commissioner to the secretary of native affairs, May 3, 1934, Edina Native Affairs, ADM 23/1/749, National Archives of Ghana (NAG), Accra.

② Minute by unnamed Colonial Office Official, February 16, 1939, CO 96/757/31165D, PRO.

③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252.

④ B. A. Holmes, "What Was the 'Nationalism' of the 1930s in Ghana?" in *Akyem Abuakwa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nter - war Period in Ghana*, *Mitteilungen der Basler Afrika Bibliographien* 12 (1975): 18.

第五章　战时模范殖民地及其后事

战时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黄金海岸有 11 000 多非洲人应征入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有超过 65 000 人参与战事。尽管殖民地人口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大约 160 万增至 400 万，但“二战”对它的影响还是过于巨大了。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一样，来自黄金海岸的战士在非洲大陆不同地区负起积极的责任。在西非，没有像 1914 年和 1916 年的多哥兰和喀麦隆一样的情形，那里没有德国殖民地要去争夺。然而，黄金海岸的战士却于 1940 - 1941 年在东非亲眼目睹了战斗。在那里，他们要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战斗。1940 年后，法国陷落，西非的法国殖民地也变成了潜在的敌对地区。但是，该地区几乎没有发生真正的战斗。到了 1943 年，这些殖民地成为自由法国的一部分，不再是敌对地区。毫无疑问，黄金海岸军团对盟军最重要的军事贡献是 1943 年以后一直参与的在缅甸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作战。大多数战役发生在缅甸西南，他们特别适应那里的热带环境。总共有 41 000 多名来自黄金海岸的士兵投入战斗。

另外，黄金海岸从战略上讲对盟军极为重要。当意大利加入纳粹阵营的时候，英国通往远东帝国的地中海要道遭到封锁，西非的港口和机场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法国于 1940 年投降纳粹使得情况更加糟

糕，因为这意味着丢掉了北非的基地。为了应付军用海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口的增加，塔科腊迪港经历了一次大扩张。黄金海岸成为盟军空运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塔科腊迪和阿克拉机场必须极大地扩展，以应付之后增加的空中运输。1941 年，美国空军在阿克拉安营扎寨，1942 - 1943 年高峰期间，每天都有 200 - 300 架飞机降落在阿克拉检修加油然后东飞北上。[①]

由于日本占领了远东，西非便成为战争原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棕榈油和可可油等食用油需要增加产量以取代被日本占领控制的远东殖民地的资源。木材和橡胶业也受到影响。航空工业需要铝、锡和矾土（铁铝氧石）等矿产，但其来源以前一直是远东。早在 1914 年就已发现的殖民地矾土的巨大储量正是在战争期间最终被开发出来的。一条从丹夸（Dunkwa）到阿瓦索（Awaso）的铁路延伸工程在战争结束前建造完成以便挖掘和运输这些矿藏。

为了节省船运空间并减少对英国的依赖，在黄金海岸和其他西非殖民地广泛设立了第二产业。[②] 同时尝试使殖民地农业生产多样化以取代一直进口的产品。为了与其他英属西非殖民地协调一致，英国政府于 1942 年指派了一位内阁大臣、前国务秘书菲利普·坎利夫 - 利斯特（Philip Cunliffe - Lister）爵士常驻海岸，他当时是斯温顿（Swinton）勋爵。其总部就设在西非殖民地的核心黄金海岸西非殖民地。

战争时期的经济刺激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在主要城镇中，欧洲人和非洲人不断聚集中伴随进口货物的短缺，造成价格飞涨。因当地无法执行像英国那样严格的配给计划，于是黑市发展起来。生活费用在一些沿海城镇提高了 50%—75%，政府被迫进行物价调控以及定期为工人提高工资。然而，因为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稳定价格以

77

① F. M. Bourret, *Ghana: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1919 - 195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48.

② Ab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ccra, Ghana: Sankofa Eductional Publishers, 2000), 151.

赚取外汇支持战争，所以长远一点看，黄金海岸工人的工资在战争年代实际上是降低了。

市场秩序也没有给非洲人带来利益，因为政府分配进口许可证的方法只让大型海外公司受益，而使未来的非洲商人无论是涉足出口还是进口贸易领域都变得不可能。然而，黄金海岸的人民在战争期间仍然是英帝国的忠实成员。他们通过礼物、公债和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了近150万镑支持这场战争，这个数字相当于为英国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提供的喷火基金。然而，该表面现象之下却掩藏着巨大的不满，并在1948年爆发出严重的暴乱事件。

改革的要求

战争提出的要求也暴露了酋长们在帮助增加生产方面是多么的无能。实际上，在这一点上，“酋长统治所带来的更多的是阻碍而不是帮助。很难设想出更不胜任目前称之为‘发展’工作的机构了”。[①] 一般说来，战争总能激起人们对改革的兴趣。1942年，新总督阿伦·伯恩斯（Alan Burns）爵士任命两位非洲人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和K. A. 科萨赫（K. A. Korsah）进入执行委员会，他们都有长期担任立法会委员的经历。[②] 此外，对1925年宪法进行了修改，使联合省议会选举非酋长进入立法会变得可能。1943年，总督成立了一个由殖民地总检察长H. W. B. 布莱科尔（H. W. B. Blackall）主持的仲裁委员会调查当地法庭的工作。布莱科尔报告“提供给公众一个可信的现存体系缺陷的图景”，其许多建议都被纳入1944年《本土法院条例》。[③] 当时自称为“本土法院”的法庭“被特别宣布为由议会中一项政府命令所构成”。[④] 所立四级法庭的法庭成员可以由政府任命，享有固定收

① Richard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6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

② 科萨赫于1955年被封为骑士。

③ Lord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African Territories* (London: HMSO, 1951), 211.

④ Lord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African Territories* (London: HMSO, 1951), 211.

人。到1951年，这些法庭的数量从300个降到了135个。

1944年的《本土法院条例》甚至引入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改革。该立法最重要的方面是政府最终拒绝了“酋长或其他掌权者拥有与生俱来的司法管辖权的主张”。① 在争议悬而未决时，总督可以任命一个政务会负责国家的管理直到酋长上任。总督还可以将小国组合起来推动建立有效的国库。该立法加强了酋长的地位，表明政府一贯的希望——间接统治可以有效地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酋长省联合议会接受了该立法，但却遭到来自市政委员对立法会的强烈反对。酋长力量的加强点燃了知识分子旧日的恐惧：酋长会变得更加独裁并逢迎政府官员。

市议会也经历了变化。1943年，库马西公共卫生局以非正式多数变成一个市议会。1944－1945年，在塞康第、海岸角堡和阿克拉也有类似的事态发展。他们的市议会从10位成员扩大到14位，7位为选出的非洲人，两位为本土当局提名的代表。然而，1943年政府利用战时的非常时期最终通过了一项所得税法案。市政委员进行了最后一次反对该措施的战斗，但值得注意的是，酋长们接受了“直接税收与代表相伴”的想法，只有很小的调整。该税收几乎完全落在了非非洲人的收入来源上，位列英帝国的第二低。②

任命非洲人担任公务员中的高级职位没有产生什么争议。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刚从英国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K. A. 布西亚和A. L. 阿杜（A. L. Adu）被任命政治部地区专员助理的职位，过去该职位一直是留给欧洲人的。文官队伍因战争所产生的消耗使得这一点比在和平年代更容易些，但对于格吉斯伯格总督承诺使政府中的高级职位非洲化而言，这确是一个重大转折。在英国的西非殖民地建立高等教育与非洲人在内政部门的提升相关。以其主席，议会的英国议员沃尔特·埃利奥特（Walter Elliot）名字命名的埃利奥特委员会没能达成

① Lord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African Territories* (London: HMSO, 1951), 211.

②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Revised* 1956: *A Sd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666.

共识，1945 年提交了一份多数人意见和一份少数人意见。黄金海岸委员 K. A. 科萨赫站在多数派一边，要让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现存的学院发展成为大学。少数派意见主张集中资源于一个西非大学，就像当时正在计划中的西印度群岛大学一样，西非大学将坐落于尼日利亚。起初英国政府倾向于少数派意见，但后来他们意识到，大学将主要从地方财政获取支持，于是转而赞同在黄金海岸分设一所大学。

英国殖民地这一崭新的社会秩序究竟有多么与众不同，其最大标志是《殖民地福利与发展法案》（Colon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Act）的通过。与 1932 年殖民地发展基金截然相反，这个法案是用来从英国为殖民地发展提供资金的，而 1932 年殖民地发展基金却主要是用来帮助英属西非殖民地对付萧条期间的财政危机的。该法案在战争刚刚开始之前获得通过，是针对 1938 年西印度群岛暴乱的，每年预留 500 万英镑用于发展计划，50 万英镑用于英国殖民地研究。从本质上讲，该法案标志着放弃了过去作为殖民政策特点的经济自给自足原则。1942 年，阿伦·伯恩斯爵士就任黄金海岸总督。他设立的第一批目标之一便是制定一项 5 年发展规划。战争之不可预见的费用与工作人员的匮乏阻碍了许多事情的完成。但到 1964 年，伯恩斯总督制定了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 10 年发展计划。

变革的压力也来自非洲人，省联合议会首当其冲。1941 年，最高酋长们在索尔特庞德（Saltpond）召开会议，“鼓励一般公众就社会、教育、经济和其他改变发表符合世界新秩序趋势的意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敌对行动的停止”。[①] 同年晚些时候召开的青年会议以一份 400 页的备忘录响应，备忘录题为《黄金海岸改革纪要》。由 J. B. 丹夸博士领导的一个知识分子小集团制定了一个新宪法草案。伯恩斯总督与殖民部商议之后否决了该宪法，但他召集了一轮会议制定了一个在

① Baron Holm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old Coast, 1919 - 1945"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2), 816.

1944年几乎完全被国务大臣接受的宪法。除了将官员和知识分子聚在一起之外，这些会议还纳入了阿散蒂联邦议会的代表。

对阿散蒂构成更大政治威胁的是，这两个地区历史上就存在着长期的敌视的传统，但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分裂趋势已经被1934年代表团和可可抵制这样的民族运动所抵消。1933年，阿散蒂司法体系已经与殖民地司法体系相一致。律师获准在地区法庭上辩护并可上诉到西非上诉法院。许多知识分子领导成员，无论是阿散蒂的还是殖民地的，都成为一个小型的组织严密的互助会的成员。

这些谈判的结果是，1944年，即碰巧在1844年债券100周年的时候，伯恩斯总督宣布了新宪法。新立法会包括31名委员，总督成为主席并有6位按职务选出的委员。此外，总督可以提名6位委员。余下的18位委员将选举产生，这意味着非洲人将成为委员的多数。然而，主要优势依然存在，这些成员中9名由联合省议会选举产生，4名由阿散蒂联盟选举产生，只有5个位置留给市政委员，其中阿克拉占据两个，塞康第/塔科拉迪、海岸角堡和库马西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仅将殖民地和阿散蒂连接起来，其他属地被认为没有得到足够发展，不值得分配代表。1946年，北部地区接受了一个酋长议会，最终形成立法委员会的道路就此铺就。1949年，南多哥兰成立议会，并在1950年得到许可派一位成员到黄金海岸立法委员会。新宪法在一些行政管理上实行改革。殖民地3个省合并成两个，老的地方事务秘书办公室被一位首席专员所取代，其总部设在海岸角堡。[①]

该宪法直到1946年才实际生效，但对许多人来说，宪法似乎使“黄金海岸人民……成为非洲政治进步的先锋及政治能力的试金石”。[②]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比人们预想得要快，这一点点政治进步变得毫无作用。盟军的战争宣传，特别是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许诺“建

① Bourret, *Ghana*, 164.

② Martin Wight, *The Gold Coast Legislative Council*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7), 207.

立一个人民可以选择其政府的世界”。[1] 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s）于1941年告知西非学生，这些原则将用于非洲殖民地。1945年，他的政党在英国选举中获胜并致力于印度、缅甸和锡兰的独立。同年，联合国成立并制定了一个在其他众多条款中强调全民自决的宪章。冷战的迅速发展给战后世界政治加上了意识形态的成分，这给予殖民地人民一个攻击殖民权力的理想阵地。

战后环境：抗议与政治

当地的环境也增加了人们的不满。最严重的是可可肿枝病毒（CSSV）的传播，先是在东部可可种植区，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该病毒不同程度地传播到了殖民地所有其他可可种植地域。这种疾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殖民地的老可可种植区了，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东部省以流行病的速度传播。受此趋势的严重影响，1938年，政府在东部省的塔佛建立了可可中央研究所以调查可可疾病的总体情况。[2] 到1943年，科学家已经确定，从感染树逐渐向健康树传播并造成所有受到感染的树死亡的病毒是由粉状虫传播的，而它是可以根除的。但为了制止其爆发，农田里不论是病树还是健康树都必须被伐倒并焚烧，即使这些树仍然在结果实。

战时环境和可可种植业的低迷无疑有助于疾病的传播，因为农民无心对农田精心侍弄。此外，政府对增加食物和菜油的产量更感兴趣，所以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对该病虫的防治做任何事情。可可肿枝病毒根除计划是非官方的，但1946年，随着可可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殖民政府通过一项法令，所有农田主必须清除其受感染的可可树。来自农业部的除树人员在政府指派的农业巡视员的指导下进入农田消灭受感染的树。然而，这正值可可价格终于上

---

① Robert Paxto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469.

② Francis Danquah, *Cocoa Diseases and Politics in Ghana, 1909 - 1966* (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61.

升的时候，完全可以理解，砍除受到感染树的行动遇到了来自殖民地可可农民的巨大反抗。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防治似乎比病毒更加可怕，因为即使可可树受到病毒感染也至少能结果两个季节。1947年，82政府通过提供补偿让人接受砍除计划，但是随着可可价格不断戏剧性的提高，政府提供的补偿无法弥补可可收成的损失。

到了1947年底，250万棵树被砍掉，但仍有4 000多万棵受到感染，砍掉这些树，虽然对于殖民地4亿棵的总数不过是一个相对小的比例，但就某一特定树场来说却往往包含有大量的成年树。该计划无法保证可以奏效，到1947年末，可可种植区当地的农民举行抗议集会，农民与农业部征召来的砍伐工人之间也发生冲突。[①] 在1937年可可抵制时期就曾非常活跃的农民协会再次活跃起来，像在20世纪30年代可可抵制事件一样，许多本身也是可可农的酋长在反对政府根除可可树计划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农民“早已准备好应付任何知识分子领导人对管理的批评了”。[②]

如果许多可可种植地区处于反叛的边缘，主要贸易城市和自治市的情形将会同样是爆炸性的。战时开始的消费品短缺状况还在继续，但可用资金数量的增长却使价格剧增。尽管由于肿枝病，出口可可总量从1937－1938年下降了1/3，1947－1948年收成的价值已几乎增长了8倍，流通货币总量4次达到战前的水平。航运短缺使进口仅有的一些消费品也非常困难，结果不仅价格剧涨，还出现大量的黑市交易。日薪和月薪工人的实际指数从1939年的100下降到1948年8月的74。曾是1930年抵制目标的非洲联合公司主导的西非商人协会（AWAM）再次被看作主要祸根。消费者和找不到货源的小商贩确信，这些公司故意抬高物价以使其利润膨胀。非洲商人也非常恼怒，因为受益于政府对进口执照的配给，大公司业已有能力渡过萧条岁月的难关，而这

① Dennis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946－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66.

② Dennis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946－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5.

种配给是以既往的业绩为基础的。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利用战后的价格飞涨。

1947 年，这些商人中的一位，也曾是阿克拉传统酋长的商人旖旎·夸贝纳·博讷二世（Nii Kwabena Bonne II）开始一次旨在反对大公司和黎巴嫩商人的抵制运动，他认为，他们在经济上“实际上在进 83 行垄断”。[①] 他首先试图使阿克拉商会（Accra Chamber of Commerce）同意一套接受价格，但他们拒绝了，旖旎·夸贝纳·博讷很快取得全殖民地对其反通胀运动的支持。高价进口货物是欧洲公司较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也购买殖民地的可可作物，以此作为高价购买可可的一项补偿。政府不愿意卷入，对非洲人来说恰恰清楚证明，政府在行动上与这些欧洲公司是同谋。[②] 1948 年 1 月份，抵制持续了近 1 个月。针对的主要是进口商品，如棉纺织品、肉罐头、面粉和酒。抵制很有效，大公司同意将这些商品的利润空间从 75% 减少到 50%。抵制委员会和缺少货源的小商贩之间的争吵也对组织者施加了压力。

抵制于 2 月份刚刚结束，另一个不满集团又准备走上街头了。这些人都是退伍军人。他们从战争中返回却发现，复员意味着没有工作，养老金同生活费用不相匹配。同时，他们的战争经历又粉碎了白人的威望和与生俱来优越感的神话。他们不愿意被动地等待情况的改善。1946 年，一些更为政治化的老兵成立了黄金海岸的老兵联盟。联盟在抵制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抵制一结束，其书记 B. E. A. 塔马克洛（B. E. A. Tamakloe）便宣布老兵要列队向政府所在地克里斯蒂安堡游行前进，向总督请愿。游行队伍很快就偏离了授权路线，碰到了一只警察小分队，试图阻止他们向城堡前进。石块纷飞，接着一片混乱，指挥警察的欧洲警司从他的一个手下手中夺过来复枪向示威群众开火。两名老兵毙命，许多示威者受伤。

游行者溃散到阿克拉的商业中心，一些失业青年加入进来，他们

---

① Quoted in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71.

② W. E. F. Ward, *A History of Ghana*, 4th ed.（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7), 328.

声称大公司没有履行协议价格的责任。甚至这之前，已经开始开枪、抢掠和焚烧欧洲人、叙利亚人和利比亚人的商店。混乱一直持续到夜间。开枪加速了这些活动的节奏。政府设在附近的一个监狱也遭到攻84击，一些囚徒被释放。暴乱的消息迅速传播，接下来的几天中，科福里杜亚（Koforidua）、恩萨瓦姆（Nsawam）、阿库塞（Akuse）和库马西也发生了同样的暴乱。起初，政府放任阿克拉的暴乱持续了一段时间，因为财产的损失还是比镇压暴乱所要造成的生命损失小一些。然而，政府最终还是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并从尼日利亚调来军队。为恢复秩序，29 人死亡，266 人受伤。暴乱造成损失 200 万镑。黄金海岸作为模范殖民地的荣誉遭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为这次暴乱寻找合理解释而不知所措的政府应该承担巧妙阴谋的责任，因为这么多的事件似乎都在恰好的时间凑在了一起。最明显的目标就是在 1947 年前成立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UGCC）的领导人。总督杰拉尔德·克里西（Gerald Creasy）爵士下令逮捕了丹夸博士及 5 位同伙——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领导人，将他们拘留在北部地区较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被拘 6 周以“使其不致危害社会”。[①] 一个调查委员会成立“调查并报告近来的骚乱……及其原因；对其调查中浮现的所有问题提出建议”。[②] 其大多数成员由殖民地非管理层人员构成，这与过去的此类委员会大相径庭。主席艾肯·沃森（Aiken Watso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律师。另一位成员安德鲁·达格利什（Andrew Dalgleish）则是工会主义的权威人士，而第 3 位成员基思·默里（Keith Murray）是牛津大学的一位讲师。

毫无疑问，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利用了这次公共秩序的崩溃。丹夸博士和大会书记夸梅·恩克鲁玛给国务大臣、联合国和各大新闻机构发了电报，声称黄金海岸的文官政府已经瘫痪，呼吁派遣一个特别

---

① W. E. F. Ward, *A History of Ghana*, 4th e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7) 332.

② Aiken Watson, A. Dalgleish, and Keith A. Murray,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Disturbances in the Gold Coast*: 1948 (London: HMSO. 1948), 5.

专员，取消总督，召开酋长和人民的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实际上，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比这些要求所显示的要保守得多。进一步推动宪法的期望使伯恩斯宪法引起塞康第木材商人 G. A. 格兰特（Pa Grant）联合一些包括 G. B. 丹夸在内的朋友发动一场全国的政治运动。有"40 个代表领袖"参与的大会在索尔特庞德召开。1947 年 8 月，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在一个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始活动。[①] 其主要目标就是对"政府的控制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移交到人民及其酋长的手中"。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拭目以待，[②] 想用"受教育平民"取代酋长进入立法委员会，但为了解决一个现实中特殊的宪法问题，他们暂时决定任命一位全职组织秘书来代表他们主持大会。[③]

他们的人选是夸梅·恩克鲁玛。他从阿奇莫塔学院的毕业后，在几个罗马天主教学校及神学院任教。1937 年他前往美国，在那里度过 10 年，并获得宾夕法尼亚州林肯大学文科学士学位，林肯神学院神学学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45 年，他前往英国继续其学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和他接触时，他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恩克鲁玛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参与政治活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就成立了美国和加拿大非洲留学生协会。他在伦敦很快加入政治组织，投入全部精力，以至他只是一名名义上的学生。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西非。他成为西非学生会成员并最终成为其副主席。他作为第 5 届泛非大会的联络秘书参与 1945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同西印度泛非主义者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的工作，曾再次当选为该会议一个分支——西非国家秘书处的秘书。为了提升该组织的理想，他出版了一个短期月报《新非洲人》，作为秘书处工作的一部分，他还组织了一个大不列颠有色工人协会。

恩克鲁玛在英国的两年半时间里成为了英国的非洲殖民地主要批

①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52.

②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52.

③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52.

评家之一。丰富的组织经验使他成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极其需要的理想领导人选。然而，他开始时对接受秘书长一职还犹豫不决，因为他感到“将自己与几乎完全由反动分子、中产阶级律师和商人支持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毫无意义”。[①] 他感到，其“革命背景和理想使他不可能与他们一起工作”。[②] 然而，在咨询了西非国家秘书处之后，他决定接受这个职位，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而紧张的训练结束后的行动的黎明……但他准备好了，如果他发现他们在追随一个反动路线的话便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斗争”。[③] 执委会对自己的选择也不完全满意。丹夸博士特别怀疑恩克鲁玛怎样使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非的兴趣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非常有限的目标相一致”。[④] 执委也不喜欢恩克鲁玛使用“同志”这一术语，他们觉得这“会引起公众及官方的怀疑”。[⑤]

恩克鲁玛头脑中显然有比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执委更远大的目标，他立即拟定了分几个步骤走向自治政府的行动方案。此外，他决定使该运动超越殖民地的范围，将阿散蒂地区、北部地区和跨沃尔特多哥兰（Togoland）也包含进来。在 6 个月的时间中，他最多时将分支机构从 13 个扩展到 500 个。他是通过在整个殖民地游说做到这一点的，呼吁包括农民、小商人、司机、工匠、学校教师、职员、代写信件人和不断增加的大批小学辍学者在内的听众，他们许多人都无法找到工作，在黄金海岸被戏称作“走廊男孩”。因为他们无家可归，夜里不得不睡在路边商户的走廊上。他比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更敏锐地意识到不仅知识分子对其在殖民政体下毫无权利极其不满，在一般人

① Kwame Nkrumah,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62.

② Kwame Nkrumah,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62.

③ Kwame Nkrumah,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62.

④ UGCC, *Minute Book*, December 28, 1947.

⑤ UGCC, *Minute Book*, December 28, 1947.

群中也有"民族主义激愤的肥沃土壤"。[①]

恩克鲁玛也意识到，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小学辍学者涌进南方城镇和农村的潮流，激进青年团体的新领导阶层正在出现。学者联盟、文学和辩论社团、青年运动和很容易被政治化的改良社团的数量激增。例如，在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在索尔特庞德成立的时候，一个更激进的组织在库马西同时诞生。该组织名为阿散蒂人青年协会（AYA），选举了一位当地店主——阿塔·门萨作总书记。主要主张是实现"自治政府，不要官员指手画脚下的酋长，而是由普通人掌权的政府"。[②]该协会的一位领导成员，当时身为库马西报纸《阿散蒂先锋》的通讯员和清债人的克罗博·艾度斯，成为反通货膨胀运动阿散蒂抵制委员会的主席。阿肯人阿布阿夸州立学院教师科乔·博齐奥在恩克鲁玛从监狱被释放之后帮助他建立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CYO），从阿奇莫塔毕业的克姆拉·格贝德纳（Komla Gbedemah）成为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恩克鲁玛于 1948 年创刊的报纸《阿克拉晚间新闻》的编辑。

对酋长不可改变的敌意和对主导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专业人士的怀疑，使得这个新领导阶层促使恩克鲁玛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决裂并建立自己的政党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六人团（Big Six）的被捕加速了该趋势的发展，因为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摩擦和反控，有人责备恩克鲁玛要对所发生的事件负责。当他们单独出现在艾肯委员会的时候，这些分裂更为明显，几乎所有工作委员会执行委员都与恩克鲁玛组织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计划决裂。然而，艾肯委员会代表了殖民地历史上一个分水岭。可以预言，警察和政府处理暴乱的方式会被免除责任，但黄金海岸政府的政策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暴乱的原因被列出 16 条，其中 8 条非常详细，涉及如砍除病树计划是如何执行的、老兵对退休金的不满、房屋短缺、经济权利掌握在欧洲人和黎巴嫩人

① Nkrumah, *Ghana*, 74.

② Austin , *Politics in Ghana*, 56.

手中和生活费用过高等问题。其他问题为长期的问题，其中最重要并充满矛盾的是政府“通过酋长来进行统治”的失败有目共睹。[①]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们毫无悬念地认为1946年伯恩斯宪法“一诞生就已过时”。[②]

伦敦殖民办公室已经开始反省关于酋长在殖民地未来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仍希望他们可以“保留但民主化”。[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艾肯委员会最重要的建议，即全非委员会制定一个新宪法开始实施之时，36名委员中只有9名是酋长。委员会也没像以前的此类组织一样由一位资深英国官员主持。相反，其主席是殖民地最资深的非洲司法委员J. H. 库西（J. H. Coussey）法官先生。立法提案权毫无疑问转到了非洲人手中，就像从酋长手中转到知识分子手中一样重要。殖民办公室和总督伯恩斯希望1946年宪法将“满足黄金海岸政治阶层的合法渴望达数十年，这样，同时为当地政府健康发展提供一段时间”。[④] 1948年的事件很快破坏了这些希望，同样重要的是，它将新一代更加激进的领导推到前台，他们比老一代精英更缺乏耐心。正如克里西总督于暴乱之后在立法会讲话时所表达的那样，他已被“事件压倒”。[⑤] 1948年之后，事件发生的速度甚至以比1948年以前任何参与者的想象都更令人困惑的步伐加速前进。

88

① Watso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Disturbances in the Gold Coast*, 7.

② Watso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Disturbances in the Gold Coast*, 24.

③ R. D. Pearce, *Turning Point in Africa: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938 - 48*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82), 153.

④ Wight, *The Gold Coast Legislative Council*, 208.

⑤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1.

第六章　大会人民党与通向独立之路

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分裂

91

当1948年暴乱后黄金海岸警察逮捕恩克鲁玛的时候，他们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个未签字的英国共产党员登记卡及一份名为“圈子”的“先锋组织”文件。在伦敦支持西非国家秘书处的非洲学生发起了这个组织，恩克鲁玛一直是该组织的主席。其主要目标是“西非的民族独立和创立并维护非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①] 对于艾肯委员会来说，这足以显示恩克鲁玛已经“满脑子都是只有政治私利才可能将其模糊的共产主义思想。”[②] 他对殖民地解放的呼吁，对帝国主义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抨击，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使用都是用来强化这一思想的。

起初，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利用关押带给他们的声望，但他们很快转向了捍卫法律和秩序，而官方将其与“共产主义征服”联系在一起的恩克鲁玛则成为了他们的障碍。工作委员会的优秀成员

---

① Quoted in Aiken Watson, A. Dalgleish, and Keith A. Murray,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Disturbances in the Gold Coast*: 1948 (London: HMSO, 1948), 92.

② Quoted in Aiken Watson, A. Dalgleish, and Keith A. Murray,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Disturbances in the Gold Coast*: 1948 (London: HMSO, 1948), 17.

92 受邀成为库西委员会成员，但恩克鲁玛显然不在其列。他对艾肯委员会说自己是大会的“谦恭而顺从的仆人”。很快，他的雇主转而开除了他，但同时“他们又惧怕没有他们他会做出什么”。[①]

在他出狱之后，他的许多倡议也增加着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为因参加抗议1948年逮捕六人团而进行的罢工被逐出学校的学生创立了加纳国家学院（Ghana National College）。也有些因罢工而被驱除出学校的老师成为他们的第一任导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学生人数增加到230人。然而，工作委员会激烈抨击这一倡议。恩克鲁玛还为运动创办了一份报纸，工作委员会害怕报纸会将他们卷入煽动和诽谤案。这份《阿克拉晚间新闻》立刻获得了成功，还促使工作委员会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注定短命的报纸。

然而，最激怒他们的是恩克鲁玛建立了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吸收了许多来自殖民地和阿散蒂的青年组织的成员。在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世界中，青年被称赞为革命的先锋。黄金海岸的青年组织寻求与这一传统建立联系，但年龄不是成为此类组织成员的唯一必要的标准。此外，青年可能都是普通百姓而不是权贵，但首先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政治上的进步者并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工作委员会害怕这一发展，因为他们意识到该组织代表的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一系列潜在的政治敌人。

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接受了“立即完全自治的政府”这一口号，而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口号正相反，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的自治政府”。这不仅是一个语义意义上的不同。工作委员会希望在宪法程序的框架内进行工作。他们是库西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正为制定一个殖民地半责任政府的宪法而努力。另一方面，并未派代表参加库西委员会的青年要的是立即自治的政府，并努力采用非宪法行为实现这一目标。在《阿克拉晚间新闻》的字里行间对黄金海岸统一大会

① Dennis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946 – 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83.

党挥洒着巨大的敌意，大会最终使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和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员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尽管恩克鲁玛仍然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书记，却不断在《阿克拉晚间新闻》上发表批评统一大会党工作委员会的文章，最后，他们决定将他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中驱除出去。然而，恩克鲁玛抢先一步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决裂。1949年6月12日，在阿克拉的会场，当着60 000名观众，他宣布了大会人民党（CPP）成立。恩克鲁玛为主席，K. A. 格贝德纳为副主席，科乔·博齐奥为书记。

93

积极行动

该党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是对库西会员会的建议如何应对，他们建议建构一个半责任政府，设立由3个殖民地政府选出委员的执行委员会，8个指定的部长和一个全民选出的大会。起初，恩克鲁玛驳回了这个“虚假而欺骗”的“特洛伊木马礼物”的新宪法，开始谈论“积极行动”（Positive Action）的必要性。这包括煽动、宣传和“罢工、联合抵制及基于像印度的甘地使用的绝对非暴力原则基础上的不合作的宪法应用”[①] 等民众抗议的最后手段。目标是迫使政府召开一个制宪会议。因为人们对1948年的暴乱仍记忆犹新，积极行动的思想在殖民地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在大会人民党成立之后一个月召开的加纳人民代表大会（Ghana People'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的一次会议上，代表的反应是从强调对峙转向修正来自库西报告的建议。让国务大臣和总督接受这些修正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是年底，恩克鲁玛再次用积极行动相威胁。

政府以起诉、监禁许多呼吁积极行动的报纸编辑相回应。恩克鲁玛本人被罚款400镑。然而，僵持于与政府激烈的争执之中，工会代表大会（TUC）通过呼吁一次支持气象雇员工会（Meteorological Em-

① Kwame Nkrumah,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112.

ployees Union）的总罢工最终使积极行动尘埃落定。作为避免积极行动的最后努力，殖民地大臣 H. R. 萨洛韦（H. R. Saloway）与恩克鲁玛会面，但最终工会代表大会于 1950 年 1 月宣布总罢工，迫使该党行
94 动。一天之后，恩克鲁玛在一次公共集会上宣布，积极行动于午夜开始。然而，在此次事件中，政府对骚乱的准备比 1948 年事件要充分得多。官方迅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实施宵禁，动用一支新的机动警察部队在大城市维持秩序。政府还决定采取强硬立场，无需通过调查委员会，迅速开始逮捕工会代表大会和大会人民党成员，以煽动非法罢工、试图胁迫政府并制造暴乱罪起诉、宣判他们。恩克鲁玛最终被捕，以 3 项指控宣判他有罪，每项指控均判处他在阿克拉和海岸角堡各服刑一年，连续服刑。

呼吁积极行动也引发了许多来自恩克鲁玛政敌的反对。在其运动的高潮时期，酋长联合省议会邀请他将加纳人民代表大会事务提交给他们考虑，但结果是“咒骂”式的演讲。负责人丹夸博士谴责恩克鲁玛及其追随者“反对宪法权力”，他们要“为此付出掉脑袋的代价”。[①] 接着政府主办的报纸《黄金海岸周刊》（*Gold Coast Weekly Review*）上出现许多攻击大会人民党和恩克鲁玛的文章。这些攻击的一个结果是恩克鲁玛很快在阿瑞娜会场的一次讲演中预测那些“加入帝国主义者势力”的酋长“……他们丢盔卸甲地逃跑的时刻就会到来”。[②] 本质上讲，他是在鼓励传统领袖势力下极其愤怒的青年将他们赶下台。酋长和该党之间的仇恨将留下一份重要遗产。

随着大多数激进的领导人被关进监狱，政府似乎控制了局势，酋长和保守的知识分子再次控制自治政府运动的时刻已经成熟。但是，他们自己内部很快发生冲突，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攻击“反动势力”，“甚至质疑一些进步而理智集团的计划”。[③] 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内讧

① Kwame Nkrumah,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120.

② Quoted in an editorial in the *Accra Evening News*, January 5, 1950.

③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13.

显示，两个集团仍然只是小而无力的少数。反对大会人民党极端主义者的“温和、有力而负责任的人构成的实体”并没有真正存在过。[①]然而，政府的主要战略是确保改良的库西宪法得以实现，希望接下来是一个稳定的时期。

然而，很明显，如果没有大会人民党及其领导人的参与，稳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党魁的被囚增加了大会人民党的魅力。结果该党在1950年阿克拉市议会选举中赢得了7个席位，在11月库马西市议会选举中也几乎获胜。格贝德纳在宣布积极行动时已在狱中，但很快被释放的了。他极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南半部的党支部网络。该党的战略是在1951年新的立法会选举中竞争所有的38个普选席位。

1951年选举

尽管恩克鲁玛斥责新宪法“虚伪欺诈”，选举仍是殖民地政治生活中的分水岭，因为这是在成人公民权下的第一次选举。当奎西·普兰格（Kwesi Plange）使立法会同意将投票年龄从25岁降至21岁时，大会人民党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他作为大会人民党候选人代表海岸角堡参加立法会选举的时候，自己也不到25岁。这是个对大会人民党有利的决定，因为青年支持“立即自治的政府”要远胜过对“尽可能短时间内的自治政府”[②]的支持。此外，大会人民党与肩负组织选举任务的官员建立起非常重要的工作关系。以平等的方式界定选民是可能的，因为负责此项工作的委员会并不想凌驾于地方利益之上而任意划分选区。其结果是，选民的数量发生很大变化。此外，尽管北方的人口数量巨大，但其代表数却同阿散蒂相同。

然而，该党违背了一人一票原则。实际上，该党在选民登记中的作用更为重要。许多地区的殖民地民众只在受到大会人民党代表鼓励

①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90.

② Nkrumah, *Ghana*, 113.

的时候才前往登记。这样做也意味着支付本地税赋以至于该党在鼓励人民支付其费用以使他们得以登记选举方面走在了前列，而政府官员已将其描述为颠覆组织。这是为本地国库提供定期收入来源的钱，结果却支持了该党反对的酋长和间接统治。如果考虑到所涉及的所有挑战，最后登记数字仅占总选民的40%就不会令人吃惊了。[①]

96

除了与政府有紧密合作之外，大会人民党还有许多其他的有利条件。从被囚党魁赴义的崇拜中受益，公共仪式一直保持着“监狱毕业生”一被释放出来就“奖励”他们“文凭”的势头。[②] 该党还从与其他组织的联系中获益。例如，成立不久的加纳农民大会（Ghana Farmer's Congress）就因大会人民党支持其反对政府肿胀运动而给予该党支持。与殖民地行政机构的火上浇油类似的是一系列直接的抱怨，而这些抱怨对大会人民党大有裨益。例如，政府选择了6位欧洲人做大选之后各部的常务部长，违背了致力于公务员非洲化的承诺。

1950年收成欠佳，导致出现了黑市，重新引起与承诺·博讷反通货膨胀运动相关的紧张局势。此时伦敦每日镜报集团进入殖民地报业，出版了《每日写真报》，将紧张之火煽得更高。它增加了像西非商人协会1937年和1948年那样的对都市垄断的恐惧。该党可以从一系列的地方选举中获益，这些选举可以让它微调其竞选战略。出现了集会、野餐、舞蹈和街头小品，另外装有高音喇叭的篷车画着该党的色彩（红、白和绿）首次用在阿克拉市政选举中以增加宣传效应。

更有感情作用的是，该党善于利用赞美诗、祈祷和《圣经》词语在人民中推广其思想，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有很深的吸引力。一首非常流行的党歌便是根据纽曼大主教（Bishop Newman）的赞美诗“慈光歌”改编的。该党还在《阿克拉晚间新闻》上发表了使殖民地牧师蒙羞的主祷文和使徒信条。最让人难忘的是恩克鲁玛作为一个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和非宗派基督徒，号召他的追随者“你们先寻

---

①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13.

②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27.

求政治王国，那么万物都将被赋予其上”。[①] 这个对武力的呼吁装饰着阿克拉、海岸角堡和塞康第—塔科拉迪的该党报纸的头条。

此运动引起的巨大兴奋和热情，使该党的候选人选举常陷入困境而争论不休。该党许多领导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关于合适人选的挑选，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人民党当地分支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殖民地政治生活极度狭隘性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间接统治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最后的名单中多数都是当地人物，对党的忠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克鲁玛决定参选也引起了不同意见，因为有人认为如果他和同样被监禁的候选人以后丧失参选资格，该党将失去这些席位。然而，他认为是值得冒这个险的，因为他相信如果他及其同伴获胜，政府将不得不在他们刑期未满的时候将其释放。

97

因为惧怕大会人民党赢得大选，即将到来的选举也将酋长和知识分子们拉到了一起。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赢得许多民选议席，但新宪法为酋长们保留了 18 个席位。北方的选举主要选举北部选团的 19 个代表，因为大会人民党在该地区力量微小，反对派有希望控制非洲人几乎半数的席位。这并不意味着承认所有其他席位，特别在大会人民党势力最弱的农村地区，在知识分子和酋长们之间存在许多当地的联盟。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也发布了题为“国家计划”的竞选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号召成立“通过所有法律和宪法手段的自治政府”，还勾画了一个在“福利国家框架”内发展国家的 10 点计划。[②] 该宣言和题为“走向目标”的大会人民党的宣言之间除了语言更有战斗性之外并无不同。大会人民党的宣言也号召成立自治政府，许诺给人民以现实的物质利益。

除了大会人民党和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外，还有 5 个政党参与选举的竞争。他们高度集中于各自的地方区域，不可能对选举有太大的影响。到选举的时候，只有根据地在阿克拉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

① 这是他在山上布道时所引用的耶稣的话（详见《圣经・马太福音》）。

②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37.

Democratic Party）仍留在参选队伍中。结果是，大会人民党横扫参选对手，赢得29个席位，而反对派只得4席。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只赢得2席，均在阿肯—多哥兰，这里对并入黄金海岸有众多反对者。在大会人民党包揽所有5个市政席位的城镇中，对大会人民党的支持是最为明显的。在阿克拉，恩克鲁玛以所投23 122票中的22 000票赢得两席中的一席。在酋长更具有更大影响的农村地区，支持率优势微弱，有些地区记录有20%反大会人民党的票。就地区议席而言，只有较小的少数同情大会人民党。然而，当19个北方代表意识到大会人民党将组建政府的时候，他们转而支持大会人民党，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支持当政的政府。结果是大会人民党赢得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工作多数。

98

诺贝尔·雅顿－克拉克（Nobel Arden－Clarke）总督很快意识到，如果新宪法实施，恩克鲁玛及其政党一定会受邀组建政府。同样，恩克鲁玛也意识到，尽管他批评库西宪法，但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和他的同伴一从监狱中出来就接受了总督的邀请成为政府事务领导人。遵照妥协精神，他说服其政党从应选出的7位部长中只选举5位。另外两位，一位来自阿散蒂地方代表，另一位来自北方地区。总体说来，知识分子成员拥有部长职位的希望落空了，这增加了他们和暴发户大会人民党之间的不合。

第一届大会人民党政府

黄金海岸议会的新立法部门包括84名委员，33名从殖民地和阿散蒂农村地区通过选举团选出；37名由酋长地区议会选出；5名由阿克拉、海岸角堡、塞康第—塔科拉迪和库马西城镇选出；3名代表商会，3名代表矿业协会；3名由总督提名。后面这9名委员是议会仅有的欧洲委员。为了保持与过去的连续性，恩克鲁玛建议曾任前届立法会主席的埃马纽埃尔·奎斯特（Emmanuel Quist）出任议会发言人。他不是大会人民党成员。

最初对于该政体如何工作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因为官员和新选出的委员对于议会民主制如何工作都没有概念。对于大会人民党来说，

这意味着从积极行动向恩克鲁玛倡导的战术行动过渡。而实际上这是妥协而不是与官员对抗。恩克鲁玛与雅顿—克拉克总督建立的“亲近”而“友好”的关系使其变得更容易。① 起初，恩克鲁玛的头衔一直是政府事务领袖，但他的“并非徒劳的伙伴关系”表明，1952 年总督已经同意修改库西宪法，允许恩克鲁玛获得更实质性的首相头衔。②

最为重要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是殖民地的一个空前繁荣时期，这也有助于减少大会人民党和殖民地官员之间的摩擦。1948—1952 年，可可的价格从每吨 139 镑骤升到 300 镑。殖民地其他出口也出现了价格飞涨，主要依靠出口税的政府税收几乎增加了 4 倍，从 1 100 万镑升到 4 200 万镑，有了减轻战后时期困苦，进行改革的资本。政府增加非熟练工人的日工资达 30%。伴随着上层的非洲化，公务员的数量也得以大幅度增加。到 1954 年，过去任命的欧洲人公务员职位有 38% 已为非洲人所占据，比 1949 年提升了 13.8%。并非所有这些新任官员一定是大会人民党的支持者，但这个发展减少了该党与英国政府之间的摩擦。

对地方一级国家政权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旧的国家权力体系被废止或被地方、地区和市议会所取代。其成员 1/3 仍由传统的权威人物构成，另外 2/3 则由选举产生。尽管这些新机构的工作几乎毫无效率，大会人民党还是席卷了这些职位的大部分，他们也吸纳了其他党派的许多成员。随着税收的暴涨，彻底解决可可业中肿枝流行病的争议问题成为可能。大会人民党上台之后延缓了农业部非常不得民心的为控制该致命病毒而采取的砍除计划。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批评强行砍除计划，但最终又回到同样的计划中来。然而，由于政府可以提供让抗议者闭嘴的补偿，所以没有出现太大的反对。

总体说来，1951—1954 年的第一届大会人民党政府见证了一个前

① Sir C. Arden - Clarke, “Eight Years of Transition in Ghana,” *African Affairs* (January 1958): 34.

②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53.

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一位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恩克鲁玛最好的时期。[①] 1946年起草的斥资1 150万镑的10年发展规划戏剧性地扩展为花费 100 1.2亿镑的5年发展规划。在此期间，国家现有的公路全部铺就，许多新路也破土动工，例如阿克拉和塔科拉迪之间的滨海大道，阿克拉、库马西、塔马利（Tamale）和博尔加坦加（Bolgatanga）之间的国家动脉公路。沃尔特河上的阿多米（Adomi）大桥修建完成，塔科拉迪港口扩建，在特玛（Tema）修建了一个全新的港口。大大减少阿克拉和塔科拉迪之间行程的阿奇雅思—科头布（Akyease - Kotobu）铁路也开始动工。政府还完成了一系列市政房屋计划，发放住房贷款，为工人提供简易房屋；在农村地区努力提供良好的饮用水；在主要城镇扩大水的供应；在库马西修建了一个价值超过150万镑的新医院。

在教育方面，为6—12岁的儿童提供了免费初等义务教育。政府继续给予教会学校补贴，并允许当地议会建立自己的学校。结果小学生人数从1950年的212 000人增加到1952年的270 000人。政府设立了教师培训学院，到1955年每年超过一倍的教师被培训出来。到1955年，政府资助的中学数量从13个增加到31个，而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斥资150万镑在靠近阿克拉的莱贡（Legon）建立黄金海岸大学学院，在库马西建立艺术、科学与技术学院。最后，政府提供了大量海外奖学金供学生学习殖民地没有的课程，比如法律、医药和应用科学。[②]

然而，对政府的批评也开始出现。国会中的反对派称，现在大会人民党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好工作，他们现在已经抛弃了自治政府的政策”。[③] 作为回应，恩克鲁玛邀请他们参加大会人民党的另一次积极行动。他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接受这个邀请，因为他们已经对第

① Ad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ccra, Ghana: Sankofa Educational Pulishers, 2000), 73.

② Ad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ccra, Ghana: Sankofa Educational Pulishers, 2000), 177 - 178.

③ Nkrumah, *Ghana*, 145.

一次积极行动进行了批评。然而，该党中有的成员也开始抱怨。有些人感到“恩克鲁玛已屈服于英国媒体的奉承”。[①] 完全使这些内部批评销声匿迹非常困难，到1952年，大会人民党的国家行政人员不是离开就是被开除出党。于1952年在塞康第召开的党的第3次年会便以该议题为主，恩克鲁玛主席受到了来自个人代表的攻击。最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战术计划……以领导国家走向迦南乐土”。[②] 但几个月后，当英国政府因殖民地走向独立的混乱局面而终止英属圭亚那宪法的时候，恩克鲁玛平息了对他的批评，维护了大会人民党的战术行动计划。[③]

政府筹措沃尔特河水坝资金的计划也受到了批评。在阿杰纳（Ajena）峡谷筑坝拦起沃尔特河的想法可以回溯到1915年。后来，艾肯委员会也曾呼吁政府“控制沃尔特河水以生产电力并在利用其生产其他东西的同时，也此生产铝”。[④] 恩克鲁玛认为该方案是国家工业化的关键。[⑤] 然而，要想得到该计划所需资金就要给予英国政府非常优惠的条件，英政府投给铝冶炼厂60%的资金，却要求得到74.8%的利润。无论是在立法会还是在报纸上，大会人民党党员及其他人都批评其为“经济奴役”，他们感到该计划是一个威胁。[⑥]

常务部长层面的非洲化比率是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所有这些职位都仍为流亡者占据着。他们在政府的位置上反对政府，明显地迟迟不执行政策。此外，尽管公务员的非洲化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公务员总数扩大，任命的欧洲人也在增加。如此多的欧洲人占据着关键职位，对那些反感这一点的人来说相当于躲避批评的避雷针。

---

① *Daily Graphic*, March 7, 1951.

② *Accra Evening News*, August 7, 1952.

③ 英国政府于1953年向其唯一的南美殖民地英属圭亚那布署军舰，以罢免当地新近选出的首相，一个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

④ Watso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55.

⑤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198.

⑥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February 23, 1953. Quoted in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66.

此外，随着巨大的财政开支，很快出现腐败和玩忽职守的现象，甚至恩克鲁玛也未能幸免。有人传说，他从大会人民党财政委员会借了1 800英镑用来进口一部卡迪拉克轿车。最后，这些传言越传越广，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这项调查结果足以证明部长们卷入贿赂和滥用职权来获取个人财物收益。许多人建造大房子及其奢华的生活证明该党的领导在多大程度上已变成甚至恩克鲁玛都承认的“一个新的自私自利的野心家统治阶层”。[①]

102 腐败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该党持续的财政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党的规模扩大，从税收、申述、出售党的大事记及社会运作中获得资金变得更加困难。反倒是印度和黎巴嫩商人为了从有影响的党员那捞到好处而出资或捐赠越来越重要。像可可收购公司（Cocoa Purchasing Company）和工业发展公司（Indust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这样的国有公司也成为更加重要的资金、设备和党宣传的来源。然而，这些“一般认为都是有根有据的”腐败的指控并没有毁掉社会对大会人民党的支持。[②] 该党仍然是一个老百姓的政党，实际上，无论如何，权力的诱惑、上好的平房和亮闪闪的车辆都提高着统治精英的地位。

党魁的国际声誉也增强了大会人民党的地位。1951 年，恩克鲁玛应邀到联合国接受其母校林肯大学的法学博士荣誉学位。他与国会议员和纽约及费城媒体会议的谈话表明，黄金海岸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美国人的关注。最关注的是非裔美国人：像《纽约城市报》、《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评述的那样，他“得到了来自哈莱姆人的高贵欢迎”。[③] 1953 年，他是利比里亚的塔布曼（Tubman）总统的座上客，受到了“像他在阿克拉会场的自己人民一样的热情民众的鼓励”。[④] 很快，恩克鲁玛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对于英国报

---

① Kwame Nkrumah, "Dawn Broadcast," *Selected Speeches of Kwame Nkrumah*, vol. 2, comp. S Obeng (Accra, Ghana: Afram Publications 1997), 60.

②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94.

③ *New York Asmerdam News*, June 16, 1951.

④ Nkrumah, *Ghana*, 184.

纸《曼彻斯特卫报》来说，他是“天命选定的非洲人”。甚至恩克鲁玛的敌人也承认他对于非洲大地未来的重要。南非总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提出者丹尼尔·马兰（Daniel Malan）于1954年指出非洲动荡的主要原因是恩克鲁玛在黄金海岸发起的自治政府运动。

1954年大选

库西宪法规定，由于殖民地接受了很大程度的内部自治政府，立法议会的规模要有相应增长。被委以重任，对此负责的凡·拉尔（Van Lare）选举改革委员会将国家分成104个选区。许多人认为，1954年接下来的选举是走向独立的最后一步。然而，尽管大会人民党似乎在该国占据着绝对优势，但选举竞争还是诞生了地方的反对派，引发了党内的残酷斗争。

103

早在1952年，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残余和已被开除出大会人民党的人建立了加纳议会党（GCP）。其领导人是刚成立的黄金海岸大学学院的社会学讲师K. A. 布西亚。对大会人民党的一个更严重的挑战来自1954年成立的北方人民党（NPP）。北方人民党不像加纳议会党，他们得到了意义重大的地方支持，这个支持源自北方人对被激进的南方人统治的恐惧。同样，对被新大会人民党精英歧视的恐惧刺激了殖民地主要城镇的穆斯林，穆斯林协会于1954年变成穆斯林协会党（MAP）。最后，在联合国托管领地多哥兰，埃维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不想加入独立的加纳，而想重建从前的德国殖民地多哥兰。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们于1949年成立了多哥兰议会。

更具威胁的是党内为获得大选的正式候选人提名而引发的斗争。提出参选者超过1 000人。由于无法满足所有这些要求，最终出现了“叛逆候选人”向正式候选人的挑战。恩克鲁玛最终从该党中“驱除”了81名“叛逆者”。[①] 他们中的大部分作为无党派者参选，这样的候选人大约有160人。38个选区选民人数的增加和直接选举刺激了这一

① Nkrumah, *Ghana*, 209.

分裂。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帝国主义敌人需要强调进行联合抵制。这一点反映在该党笨拙的竞选口号中："投票乃普通人决定缩短通向独立之路的途径。"[1] 但是，随着公职的油水变得越来越明显，地方竞争也愈演愈烈。除了人口混杂的大城市外，没有哪个非本地人有机会在农村地区被选举出来。到选举之时，选民之间，选民和全国总部之间都存在着危险的分裂。

然而，反对派无法利用这些弱点。加纳议会党攻击大会人民党企图将腐败与独裁强加给国家，并攻击他们未能实现一个完全自治的政府。然而，他们没能赢得非大会人民党的选票。有地方根基并与主要当权者及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之间有着巧妙联系的北方人民党却更为成功。最终，北方人民党在北方 26 个选区中赢得了 15 个候选名额。它与占据了 15 个候选名额的穆斯林协会党结盟，后者代表全国大城市穆斯林团体的宗戈（zongos）。这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联盟。大会人民党可以利用存在于北方酋长之间的敌意和构成该国穆斯林人口的许多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的冲突维系北方和宗戈地区的支持率。托管地区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在那里，以埃维人为基础的多哥兰议会想从所有埃维人处得到支持都非常困难。

104

60% 的注册选民参加了选举，比 1951 年大选要好得多，但仍仅有 30% 的殖民地成年人参加了选举。大会人民党大获全胜，赢得了 104 席中的 72 席。独立候选人获 16 席，北方人民党获 12 席，而加纳议会党几乎颗粒无收，仅获 1 席。恩克鲁玛以反对者的混乱为由拒绝了正式承认他们在新政府中作为反对党的地位。但是，就选票而言，这个结果并不像表面那样势不可挡。非大会人民党候选人获得了超过 44% 的选票。在全国范围内失败的反对派也没有成功，几乎就在大选结束之后，在阿散蒂地区而不是在北方人民党为代表的北方出现了对全国的统一更为危险的挑战。此次选举破坏了民族主义最初建立起来的团结。它使建立在种族忠诚基础之上的地域分割的重要性更为明显，正

[1]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212.

如恩克鲁玛承认的那样，“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多么可能牺牲在部落的祭坛之上。”[1]

民族解放运动与权力之争

可可价格的惊人上涨成了引发早已存在的不和之声的催化剂。在赢得选举不久，大会人民党就试图借助通过《可可税收和发展基金条例（修正）草案》（Cocoa Duty and Development Funds Bill）来稳定付给可可农民的价格，即以每 60 磅 72 先令的固定价格付给可可农。表面上这是在防止通货膨胀，但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已经飙升到此价格的两倍。政府也说，世界市场价格和他们付给黄金海岸可可农的价格差可以用于国家发展，这对全国各地区都有益处。全国的可可农很快拿起武器，因为大会人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曾许诺让价格提升。最严重的是，出产几乎全国一半可可的阿散蒂地区也出现这种局面。

105

该地区已经对凡·拉尔委员会只给阿散蒂新立法机关两个席位相当不满。可可法案更成为“点燃了阿散蒂民族主义的汽油桶”。[2] 最初，该立法的反对者来自阿散蒂人青年协会（Asante Youth Association）。[3] 构成这个协会的恩宽夸（Nkwankwaa）年轻人是黄金海岸其他地区典型的对手。他们包括小生意人、职员、会计、教师，还有记者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毫不例外地都至少接受过初等教育，有些人参加了可可生产，但他们都很重视可可价格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地区经济。许多人是大会人民党的支持者，而另一些人在 1954 年大选中就已起来反抗该政党。一般说来，大会人民党没能满足他们的渴望，可可法案给予他们一个表达对过于集权且腐败的政府不满的机会。

恩宽夸的相对无权使他们迅速转向酋长们以获得其支持。他们最终招募到纳纳·巴福尔·奥塞·阿科托（Nana Bafour Osei Akot），阿散蒂亨的 okyeame（发言人）和一位富有的可可农帮助他们建设“他

---

① Nkrumah, *Ghana*, 215.

② 凡·拉尔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并于 1953 年负责针对代表与选举改革的质询委员会。

③ *Ashante Pioneer*, September 4, 1954.

们自己无法建设的桥梁”。[1] 1954年9月初的第一次公开集会吸引了数千支持者，要求“阿散蒂人民将自己从国家中分离出来”。[2] 之后不久，农民代表、加纳议会党成员和过去支持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老牌知识分子被吸引过来支持这个新的运动。几周之后，超过4万阿散蒂人在阿散蒂人传统的集会地，位于库马西的苏宾（Subin）河源头集会，宣告民族解放运动（NLM）组织成立。提出明确的强有力的民族诉求，宣誓、祭奠和唱阿散蒂战歌，求助最有效力的阿散蒂科托科，即具有1000根钢毛的豪猪。作为象征，巴福尔·奥赛·阿科托宣称，民族解放运动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将阿散蒂民族从没有法律、腐败和独裁中拯救出来的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呼吁建立联邦的政府形式以在中央政府中给每一个地区一个有效的发言权。

很快，包括阿散蒂亨在内的地区酋长都站在民族解放运动一边。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自从大会人民党掌握了政权，酋长们就盯着他们的权力和腐化的特权。酋长会议已被新的地方政权所取代，从1952年就接管了地税的征稽。阿散蒂人会议和酋长联合省议会1953年恳请成立酋长们所属的议会上院，但大会人民党拒绝了这一请求。最不幸的是，恩克鲁玛认为酋长的地位应由地方政府决定而不是作为宪法商议的一部分。[3] 这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已经带头发起该运动的阿散蒂人青年协会的年轻人早先一直在抢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风头，他们已与酋长们结盟。当阿散蒂亨最终支持该运动的时候，他很快指出“当自治政府之潮涌来之时，青年们将多少污蔑、辱骂和侮辱瞄向了他”。[4]

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幕刚刚拉开几周，宣传秘书埃马纽埃尔·尧·白茶（Emmanuel Yaw Baffoe）就被大会人民党的地方机构谋杀，为该

106

① Jean Allman, *The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Asante Nationalism in an Emergent Gha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42.

② *Ashante Pioneer*, September 7, 1954.

③ Rechard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 - 6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61.

④ *Ashante Pioneer*, October 22, 1954.

运动提供了一位殉道者。随后出现针对大会人民党支持者的燃烧弹袭击和攻击，这将阿散蒂民族主义推向狂热。库马西国务委员会热情支持该运动并从阿散蒂亨的新宫殿建筑资金中拿出 2 万镑供其使用。[①] 阿散蒂人会议（Asanteman Council）以压倒多数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写信给英女王要求成立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调查黄金海岸联邦政府的建立。

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宣称是一个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但它很快采取了大会人民党开创的大规模政治行动术，如党旗、宣传车、口号和举手礼。建立了一个名为“战斗石斑鱼”（Action Groupers）的准军事组织来保护其候选人，还成立了一个像大会人民党妇女联盟一样热情鼓吹联邦的妇女分队。到了 1954 年 10 月初，该运动宣称已有两万多成员，并从库马西向诸如苏尼亚尼（Sunyani）和奥布阿西等其他大城市蔓延。

首先，大会人民党很不成功地试图通过非正式地会见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而缓和“阿散蒂的动荡”。此举失败后，恩克鲁玛在一次阿克拉的集会上公开谴责民族解放运动为“又一次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纠集一些酋长和不满的反动政客破坏人民选出的政府的企图”。[②] 这一指责只在阿散蒂煽起了热情，雅顿—克拉克总督不得不在寻求调停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民族解放运动很快便感到他有点过于支持恩克鲁玛和大会人民党了。他最后在阿散蒂地区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以致于在一次对库马西的访问中，他和他的随从遭到了一伙野蛮暴民投石头的袭击。甚至国务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LennoxBoyd）都怀疑他的公正。民族解放运动的执行者们意识到，时间在他们一边。当运动开始得到来自阿散蒂之外的支持的时候，大会人民党准备将殖民地带人独立的主张遭到了破坏。

阿散蒂的暴力也逐步升级，且常由政府的行动刺激而来。2 月，

①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272.

② *Daily Graphic*, October 25, 1954.

大会人民党主导的议会开始考虑允许“在阿散蒂建立两个行政区”[①]的法案。他们利用了库马西酋长和库马西西北布朗地区之间先前存在的紧张。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可以回溯到前殖民地时代，当时布朗成立一个联盟对抗阿散蒂人的占领。紧张局势在殖民地时代继续存在，诱因是土地所有权的争论，1951 年泰奇曼（Techiman）州的酋长建立了布朗·齐亚姆朋（Brong Kyempen）联邦。

以这种方式与民族解放运动斗争是一个危险游戏，因为这破坏了国家统一并使大会人民党落入部落主义的手掌之中，他们正准备借此诋毁民族解放运动。这足以影响到大会人民党 3 位重要的阿散蒂成员——J. E. 阿皮亚（J. E. Appiah）、R. R. 安蓬萨（R. R. Amponsah）和维克托·奥乌苏（Victor Owusu）——放弃该党转而加入民族解放运动。阿皮亚的离开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损失，因为他曾是恩克鲁玛在英国期间最亲密的同伴，是 1945 年曼彻斯特历史性的第 5 届泛非大会的代表。他们很快担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逐渐将运动引向暴力的道路，1955 年 5 月似乎预示着对“又一次茅茅党人”的恐惧。[②]

一位来自阿散蒂的大会人民党委员议员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补选空缺议席的机会使得那些更想用宪法的方式处理阿散蒂危机的人跃跃欲试。虽然民族解放运动自称不是一个政党，但却在这次竞争中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作为一场运动和一个政党的区别由此消失了。7 月，民族解放运动的候选人大胜其大会人民党的对手，对于许多阿散蒂人来说，他们确信宪法选举方式是正确的。民族解放运动派遣布西亚和秘书长 R. R. 安蓬萨去伦敦请求殖民地国务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派遣一位“宪法专家到黄金海岸来审查各地区的权力主张”。[③]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执行者呼吁一次普选，并联合所有反对党挑战大

① Gold Coast Legislative Debates, March 25, 1955.

② *Daily Graphic*, May 19, 1955. 茅茅党叛乱那时正在肯尼亚进行。这场反殖民斗争具有很大的民族成份。它主要使基库尤人卷入其中，他们已将大部份土地丢给了白人。

③ *West Africa*, July 16, 1955.

会人民党。似乎反对党“几乎要融入忠于陛下的反对派”。[①]

然而，大会人民党的行动再次在阿散蒂地区点燃热情，一度将主动权易手给恩宽夸和那些使库马西和该地区完全无法控制的人。8 月，政府开始争论，想要通过一个修改 1952 年《国务会议（阿散蒂）条例》的草案，此举将允许一个地位低于最高酋长的酋长向总督呼吁一个国务委员会的宪法决议。恩克鲁玛捍卫这一立法，根据是阿散蒂亨及其领导的阿散蒂人会议已不再客观，因为后者已经加入一个政党从而具有党派色彩，标志就是该会议废除了阿散蒂地区支持大会人民党的酋长。[②]

最初，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几乎没有注意到该法案，尽管它已威胁要削弱阿散蒂亨和阿散蒂人以往的权力。反对这个威胁“大阿散蒂民族”的“不公正”法律的任务留给了青年协会。[③] 当宪政顾问最终于 9 月到来，提交一个针对危机的妥协方案的时候，反对派的力量已经足以挫败他调和的企图。该法案最终通过之前，恩克鲁玛在阿克拉的居所遭到炸弹袭击。库马西的暴力骤然升级。有武装抵抗和接替权力的声音出现。《阿散蒂先锋》充满了关于前阿散蒂的大会人民党成员已经倒向民族解放运动的宣言，宪政道路似乎已被堵塞。

值得注意的是，宪政顾问弗雷德里克·布恩爵士（Sir Frederick Bourne）从来没正式会见过运动领导人。他们也没参加过恩克鲁玛召集的讨论。然而，立宪主义者在阿散蒂亨的支持下重获主动。他们通过转向英国政府并成功煽动起另一次普选而化被动为主动。这一战略显然得到了回报。1955 年 12 月初，国务大臣向国会宣布“陛下的政府在给予其独立之前必须确信国家的宪法让各方都满意”。[④] 5 月 11 日，这一宣言公之于众。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决定多哥兰托管地未来前程的公民投票一直含糊其辞，结果使民族解放运动以为有希望按照他

① Allman,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117.
② Nkrumah, *Ghana*, 219.
③ Allman,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122.
④ Allman,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144.

109 们的方式普选。在该地区的南部地区，近58%的人投票支持从黄金海岸分离出去，这表明，大会人民党拒绝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

1956 年大选

民族解放运动选举科菲·布西亚为领导人，该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1954年选举的重演。为了寻求新立法机关中的多数，民族解放运动意识到其盟友北方人民党、穆斯林协会党和多哥兰会议需要在各自选区赢得多数选票。他们需要至少赢得殖民地选区的12席。这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执行一个双重选举战略，一方面吸引阿散蒂地区的阿散蒂民族主义者，同时又强调它要保护国家脱离大会人民党的“独裁”和“腐败”。[①] 该党如何分配资源以赢得两地区的选民，是竞选期间激烈争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大会人民党对民族解放运动之于联邦的承诺提出了怀疑。在政治集会上，大会人民党的候选人贬损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盟友是封建主义者、蓄意破坏者和部落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对民族解放运动企图拉殖民地选票的最强有力的还击，是勾起对南方阿散蒂人又一次入侵的恐惧。在北方，大会人民党赢得了最高酋长们的支持。在解决党内竞争问题上也比1954年选举的情况好得多，可以竞争到北方所有26个席位。在多哥兰托管区，选举恰在1956年5月非决定性的公民投票之后，但选民的42%都投票支持黄金海岸统一，以表示他们支持大会人民党。

尽管之前出现了暴力事件，选举却异常平和。登记选民只有50%参加了选举，代表大约投票人口的30%。低端选民通常会使选举工作更负责任。在赢家通吃的体系中，大会人民党获得一次彻底的胜利，赢得104个竞争席位中的71席。他们拿到了公众选票的57%。甚至在阿散蒂地区，他们也做得很好，在占选票43%多的21席的竞争中赢得8席。在多哥兰托管区，大会人民党继续保持其支持率，赢得13席

① D.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324.

中的 8 席。但毋庸置疑的是，该党在殖民地地区做得最好。在这里他们赢得了全部 44 席，几乎占所有选票的 81%。

民族解放运动试图通过他们赢得了 43% 选票的事实扩大宣传，充分利用这次失败，但显然他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大会人民党作为执政党完全利用了民族解放运动和北方人民党自以为很强大的地区间的争吵，而在殖民地，对“阿散蒂人入侵”的恐惧起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在可可种植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都遭到了失败。[①] 同样对民族解放运动起负面作用的还有其候选人和执政党候选人之间的类似。随着解决阿散蒂冲突的宪法方式的发展，有大量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和加纳议会党成员的机会主义者搭乘民族解放运动的花车。[②] 结果是曾被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公众热情难以持续。甚至在煽动与暴力事件两年后，投票率都如此之低就毫不令人吃惊了。

带着这次胜利给予他的授权，恩克鲁玛于 8 月 3 日在立法议会上提出一个呼吁独立的动议。大会人民党不仅仅满足英国政府给予他们的赢得“一个新选立法机构的理性多数”的要求。[③] 仍深陷大选失败震惊状态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起初拒绝参加新议会。再次开始坚持自己权利的阿散蒂人青年协会的青年更具威胁。他们要求阿散蒂完全从黄金海岸脱离出去。更为保守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逐渐再次控制了这一运动。他们转向英国政府，要求干预宪政危机。1956 年 8 月，布西亚为了这一目的率领一个四人代表团来到伦敦，但他们显然旨在防守。代表团没有谈联邦政治，而只主张“宪法保障”。他们特别要求“地区议会”、酋长的“第二议院”、“警察地方分权”和“法官任期保障”。[④]

殖民部对这些事务非常同情。这些事务也使当时黄金海岸对可可采购公司报告的争论显得意义特别重大。恩克鲁玛于 1952 年建立的半政府机构显然有公然滥用公共资金，给殖民地可可农提供廉价贷款的

① Allman,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153.

② Allman,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158 - 159.

③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353.

④ Allman, *Quills of the Porcupine*, 164.

行为。然而，殖民部没有转变其黄金海岸的反对派必须在殖民地立法
111 会议的限制内工作的立场，而是期望英国政府的干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代表团在伦敦表现的妥协向英国官员表明，危机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是走向独立的时候了。国务大臣在会见代表团之后很快在国会宣布，独立的日期为 1957 年 3 月 6 日。同时，他向恩克鲁玛施压，让他在殖民地立法会议不在此列式开始讨论宪法之前先与反对派讨论制宪事务。

1956 年 10 月，两个会议在阿克拉举行，所有关于联邦的议题都被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所取代。并非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些让步，当 11 月份政府公布其没有包括任何反对派要求之条款的“关于黄金海岸独立的修宪建议”的时候，在阿散蒂再次出现呼吁脱离的愤怒声音。最具煽动性的是，政府尚未放弃其将阿散蒂一分为二的计划。对这一点的不满迫使民族解放运动、北方人民党和阿散蒂人会议中的温和者也转而支持阿散蒂和北部地区分别独立的呼吁。他们将律师留在英国，要求一个分离授权。律师们向联合国申请让阿散蒂和北部地区成为成员国，同时起草计划斥资 500 000 镑在阿散蒂建立下院，并开始制定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国家之宪法的工作。

有时候，殖民地的英国官员担忧另一个塞浦路斯、肯尼亚或马来亚正在形成，因为阿散蒂人民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过去可以在这些殖民地挑战英国统治者的自由战士的数目是多么小。然而，控制民族解放运动的温和派并不真的准备同时对抗大会人民党和英国政府。他们仍然深信英国的干预，其领导最终得以说服国务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在独立前访问黄金海岸。这意味着说服了最初对该想法保有敌意的恩克鲁玛，1957 年 1 月，国务大臣终于到达。反对派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与 1955 年总督访问库马西带来的崩溃完全不同，伦诺克斯·博伊德的访问获得巨大成功。当他前往玛希宫（Manhyia Palace）的时候，7 万多民众在公路两旁欢迎他的到来。[①] 宪法的

① 这是阿散蒂亨位于库马西的宫殿。

保护措施取代了分裂谈判，国务大臣向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保证，地区自治和酋长的地位在独立的加纳宪法中将受到保护。

实际上，为宪法达成提供最大基础的是反对派。在英国国会发布的殖民地未来宪法最后白皮书中，国民议会将保有最大权力。得该组织 2/3 的多数要求，才能修改宪法，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地区议会的问题将留待独立之后处理。然而，反对派欢呼这个白皮书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布西亚在立法大会上号召全体议院成员“为了胜利和我们民族的伟大而联合起来”。[①] 政府公布对阿散蒂人议会和布朗·齐亚姆朋议会同样数量的邀请曾一度再次引起了年轻人呼吁脱离的呐喊，这些邀请标志着恩克鲁玛政府尚未放弃将阿散蒂地区，并分离出去的想法。然而，阿散蒂亨和控制民族解放运动的温和派人士毅然决然地反对这样一个动议，相反，他们希望等到独立之后再来解决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像在殖民地的其他地区一样，1957 年 3 月 6 日，国家新国旗的升起在阿散蒂地区并赢得同样热情的“自由”的呼喊。

① Gold Coast,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February 12, 1957.

第七章　独立：恩克鲁玛时代

115　1957 年，当黄金海岸成为第一个独立的西非殖民地的时候，它拥有 620 万人口，年人口增长率为 2.5%。从黄金海岸于 1921 年加上德国的托管地多哥兰形成现在的大小到该国于 1960 年完成全面的人口普查，人口几乎增长了 3 倍。人均寿命从独立前最后一次官方普查的 1948 年的 39.5 岁增长到 1960 年的 45.5 岁。平均年龄为大约 18 岁，体现了高人口增长率。人口的 44% 或 50% 的年龄在 15 岁以下。大量从西非周边国家涌来的移民增加了人口增长率，而特别高的多产率（适龄妇女平均生 7 胎）更有助于西非的高人口增长率。[1]

年人均收入约 170 美元，大约是英国的 1/9，是 1960 年独立的英国在西非最重要的殖民地尼日利亚的两倍。1955 - 1962 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 4.8%。在南方可可种植地区和北方稀树大草原之间的财富116　差距巨大。实际工资收入和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所获得的社会服务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巨大。在南方，孩子们到学校上学，村庄享有自来水和便利交通工具的方便。这些农村公社的人们在广大城镇和城市之间走来走去非常容易，城市大多在南方，那里有非常好的经济活动的机

① W. Birmingham, I. Neustadt, and E. N. Omaboe, ed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hana*, vol. 2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7), 88 - 89.

会。大量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也使南方的经济活跃起来，人们大多是迁往阿散蒂可可种植地区，但也有迁往大城市的。

毫不奇怪，正是这些都市中心记录下了最显著的人口增长。1948－1960年，首都阿克拉的人口从133 200人增加到337 800人。其他两个大城市库马西和塞康第—塔科拉迪的人口从1948年的58 600人和43 700人增加到1960年的180 600人和75 400人。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23.7%的人口住在5 000多居民的城市里，而1948年只有9%。收入也差异巨大。一位年收入超过16 000镑的阿克拉专业精英成功人士可以居住一套“按照空间宽敞，花园修剪规整并具有所有现代舒适而方便的英国乡间楼房样式修建的”[①] 房子里。相反，每天只挣63分居住在阿克拉特别拥挤的厄舍（Ussher）镇的非熟练劳动力只能住在由瑟瑟泥（一种饱经日晒的泥）修建的摇摇欲坠的房屋里，阿克拉市议会（Accra Town Council）认为，82%这样的房屋“必须尽快拆除”。一间10×15英尺的房间可以居住“10到13名妇女和儿童……一张双人床上有4名成年妇女睡在上面”。[②] 水要从公共水管处取，而唯一卫生的地方是公共厕所。

生活标准的巨大差异成为殖民地社会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都市的迅速增长强化了这些差异。1949年恩克鲁玛许诺，随着自治政府的成立，大会人民党将会使国家“10年进入天堂”。[③] 大会人民党的第一个发展规划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良好的经济环境使其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大步前行，虽然10年之后，天堂仍然非常遥远。尽管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可可的世界价格一直波动，但价格的走势却一直在上升。80%多的发展资金来自可可税收。[④] 实际上，从第二次

---

① I. Acquah, *Accra Survey: A Social Survey of the Capital of Ghana, Formerly Called the Gold Coast, 1953－1956*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8), 46.

② I. Acquah, *Accra Survey: A Social Survey of the Capital of Ghana, Formerly Called the Gold Coast, 1953－1956*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8), 47－48.

③ *Ashante Pioneer*, March 5, 1949.

④ G. B. Ka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ism in Ghana: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Statistics, 190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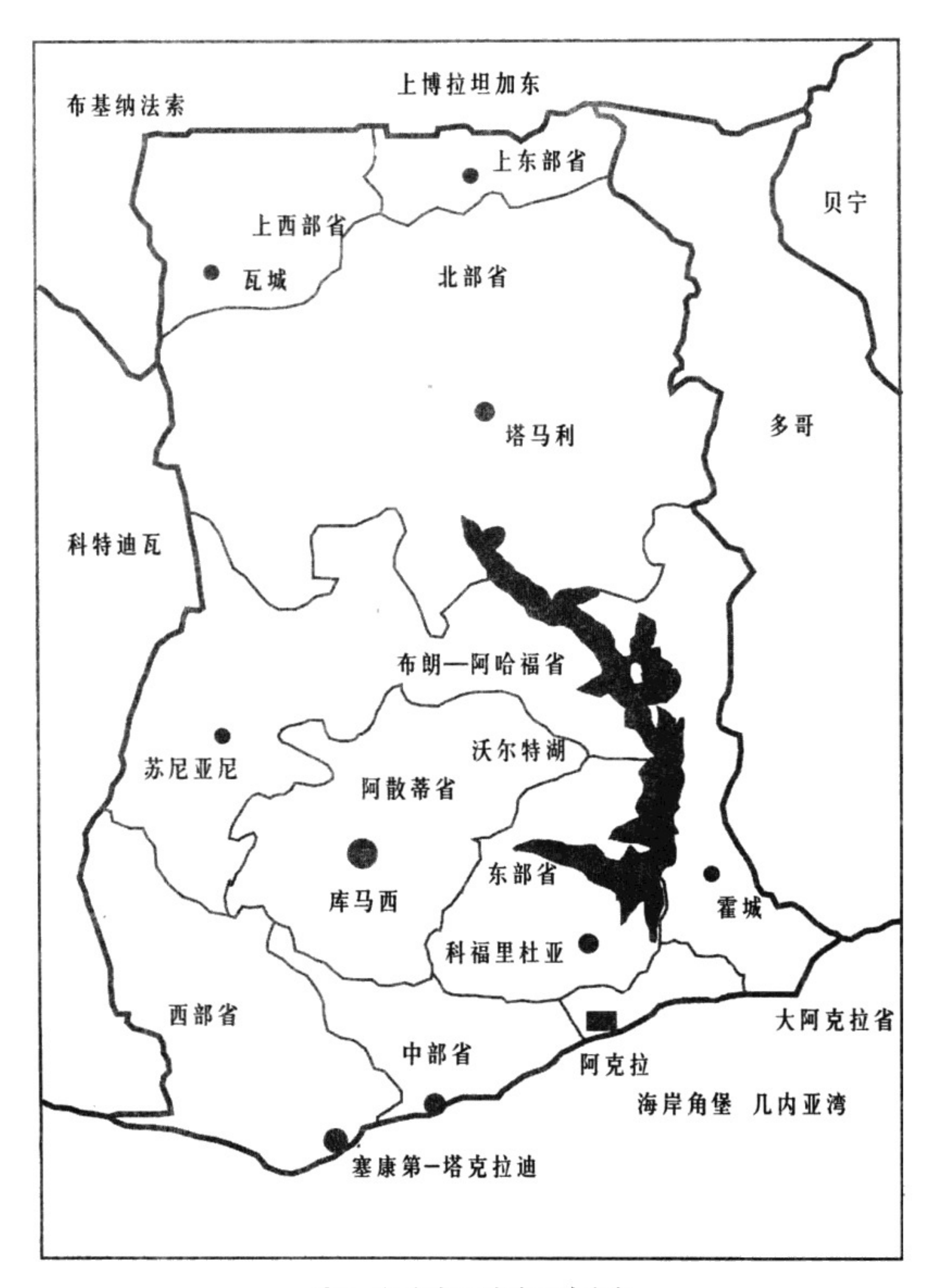


图6 加纳的10个省及其省会

118 世界大战以来，大量的储备积累起来，但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作了发展基金。这些钱主要来自可可销售局（Cocoa Marketing Board）付给殖民地可

可生产者与这些产品的世界价格之间的差。1956 年，可可每吨销售 850 美元，黄金海岸可可农只得到世界价格的 44%。1957 年，加纳仍在英国享有了超过 4.7 亿美元的丰厚的财政储备。

发展计划与经济表现：1957—1961

不幸的是，独立的到来恰逢世界可可价格下跌到每吨 490 美元的灾难水平。恩克鲁玛只能许诺一个金融和经济巩固期作为独立的代价。反对派领导人科菲—布西亚博士苛刻地将第一个独立预算描述为“火柴杆预算”。[①] 为了弥补税收的不足，收入税和政府服务费略有增加，进口税有选择的增加。这一切对于整个税收没多大作用，更重要的决定是用国库的储备支持发展。毫无疑问，从中得到的重要经验是加纳必须走向世界金融市场，为其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筹钱。最重要的显然是沃尔特河水力发电规划，恩克鲁玛将这个规划看做是他的“孩子和雄心”。他确信，该计划是其国家工业化开始的核心，但这个庞大计划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是加纳自身的财力无法提供的。[②]

最初，加纳转向英国政府和英加铝业公司，请求他们为该计划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不幸的是许多国家都有大坝建设计划，同时争夺建设资金。最重要的一项是赞比亚河上的庞大的卡里巴（Kariba）大坝修建计划，英国政府已经信誓旦旦地承诺过了。此外，世界市场上铝的超量供应使英加公司不愿意投资新项目。到 1956 年，加纳对英国政府和英加铝业公司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然而，1958 年，当恩克鲁玛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会见了美国凯撒（Kaiser）铝业公司总裁埃德加·凯撒，说服他对该项目感兴趣。如果没有诸如铝熔炉这样的电的主要消费者，加纳国内或者周边国家有限的需求很难使该计划独立生存。1959 年，凯撒的工程师们重新评估了这个项目。除了在阿杰纳河下游一公里的阿科松博选定一个地点外，他们还缩减了该项目的成本，

119

① *Daily Graphic*, June 8, 1957.

② *West Africa*, March 16, 1957.

尽管该大坝将生产25%以上的电力。该计划的公共事业方面将从制铝工业中分离出来，前者以公共财政投入，而后者由铝业公司出资。使用进口氧化铝的不是一个综合制铝工业而仅是冶炼厂。[①] 肯尼迪（J. F. Kennedy）总统害怕苏联人会在该大坝的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因为他们正在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所以他向世界银行施压资助该项工程。结果是该大坝建设的50%的资金来自世界银行或美国政府机构。剩下的9 800万美元由加纳政府出资，工程终于在1961年动工。

一般说来，发展规划需要一个更系统的计划，1957年9月，西印度经济学教授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被任命为加纳政府的经济顾问。1953年，刘易斯起草过一份有关黄金海岸工业化的报告，建议提高农业生产力，扩大国家的基础建设。恩克鲁玛于1959年公布的第2个5年发展规划更加雄心勃勃。然而，该规划本身与早期规划的购物清单风格没有太多的不同，它为政府在各个经济领域设定目标，却没有展示将如何对经济的总体增长作出贡献，[②] 也没有一个将私营部门纳入整体发展规划的尝试，将花费资金的实际总量也不确定。

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规划，在国会的辩论中分别被称作“小外套”和“大外套”。分配给小外套规划的3.7亿美元计划囊括了“立即执行的项目”的费用。按照推算，当这些资金到位的时候，另外3.3亿美元将花在更有声望的项目之上。这便是大外套计划。需要另有2.8亿美元执行全面的沃尔特河工程，除了大坝建设之外还要包括重新安置因大坝修建而迁移的7万人诸如一个下游低水头大坝的建设、电力输送线路、渔业和灌溉工程等项目。

120

刘易斯教授在这些计划的规划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将外国公共和私人投资理念引进加纳人的经济。[③] 他相信，政府在工业化

① T. Killick, "The Volta River Project," i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hana*, vol. 2, ed. W. Birmingham, I. Neustadt, and E. Ň. Omabo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7), 393.

② D. Rimmer, *Staying Poor: Ghana' s Political Economy 1950 - 1990*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86 - 87.

③ A. P. Osei, *Ghana: Recurrence and Change in a Post - Independence African Stat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59.

进程中本该起一个有限的作用，外国投资应该成为主要动力。恩克鲁玛在其自传中批评资本主义，说对于一个新独立的民族来说资本主义体系过于复杂，鼓吹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社会”。[①] 他对外国资本主义投资一直心里矛盾。然而，如果加纳要吸引这样的投资完成其发展规划，他的政府就必须使经济对外国资本具有吸引力。在刚刚独立的那些年，大会人民党政府为此目标不辞辛苦。该政府雇用了美国顾问，他们向潜在的投资者保证加纳即使是“社会主义”也是“注重实效的”，这样“外国企业……可能不会受国有化的影响”。[②] 投资加纳经济的外国公司获得免税期，公司税从45%减少到40%，对利润返还有非常宽松的规定。

可可价格的短暂反弹也对经济乐观主义的气氛作了出贡献。到1958年，1吨可可卖850多美元，政府税收大幅度增加。然而，这并不足以抵消发展规划所需的高额支出。该支出从1957—1958年的大约4 700万美元剧增到1958—1959年的7 280万美元，1960年和1962年间几乎成倍增长到1.26亿美元。[③] 即使可可价格保持在政府设想的每吨670美元以上，该支出率也将于两年之内耗尽国家的储备。对策之一是增加税收，使加纳成为发展中国家里标准的高税收国家。1958年开始的可可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的跌落也使支付给可可农的价格从1957年的每单位重量11.20美元最终降低到1961年的每单位重量7美元。然而，这项生产者价格的减少几乎无法抵消可可世界价格的跌落。可可世界价格于1958年达其顶峰之后开始跌落，直到1961年再次跌至每吨不到500美元的灾难性水平所带来的预算失衡。

减少付给农民的价格跟世界市场价格的跌落并不同步，这意味着政府可可税收的份额也开始下降。同时，可可的营销成本上升。1959

---

① Kwame Nkrumah,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x.

② G. H. Whittman, Inc., *The Ghana Re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Legal Preoblems Relative to Investment, Sociological Factors Relative to Gene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G. H. Whittman, 1959), 167.

③ Rimmer, *Staying Poor*, 79.

年，统治加纳可可收购市场的非洲联合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退出这项
121 活动，加纳农民联合会议（UGFC）接管了加纳全部可可的购买权。随着加纳农民联合会议的垄断，其成本开始急剧增加，到1960~1961年，政府可可税收份额已为负数。[①] 可可税收本身也受到来自政府复苏工业的挤压。政府统计数字虽非最可靠的数字，但还是说1960年可可营销局为可可的重新种植投入了7 500万美元，约一半用于肿枝控制工程。之前，已花3 300万美元用于喷洒农药以防治衣壳害虫。[②]

在高价格刺激下，政府移植快速成熟杂交种可可树计划，可可树杀虫剂的大胆使用，这一切都导致加纳可可农生产总量的大规模扩张。到1961年，加纳生产超过40万吨的可可，超过1957年总产量的50%。不仅仅加纳是这样，世界可可供应在巧克力需求减弱的时候得以增加，结果不可避免的带来一次价格崩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20世纪60年代加纳的可可销售总量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可可出口的税收却或多或少保持未变。加纳为了稳定世界可可价格率先尝试建立一个可可生产者联盟（Cocoa Producers Alliance），但缺乏资金，生产成本在非洲与南美生产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之从一开始就不成功。储藏可可这种易腐品的尝试也未获任何成功。

在加纳发展规划中，工业化一直是解决依靠单一种植经济问题的长远方案。但政府吸引外国投资以支持发展的尝试也未特别见效。刘易斯教授预计5年计划期间在加纳大约会有100个新工厂建起。工业发展公司将该数目膨胀到600个，但实际上建起的工厂数目甚至比100个还少。这些新建工厂包括制烟厂、杀虫剂厂和砖瓦厂以及蕃茄与牛奶加工厂、钢厂和车辆组装厂。为了促进加纳进入商业世界，1957年还建立起一个船运公司——黑星轮船公司。开始时，它只是一个同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合资的企业，但两年以后，当加纳政府决定扩大航线的时候，合作关系终止了。一个阿克拉新港已在特玛筹建，

① Rimmer, *Staying Poor*, 77-78.

② Francis Danquah, *Cocoa Diseases and Politics in Ghana*, 1909-1966 (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123. 衣壳是以可可荚和植物幼芽为食的小型昆虫。

这在加纳拓展其贸易进程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所有这些项目的建设，加纳工人阶级的数量从1948年的45 000人增加到1960年的304 000人就一点儿不令人吃惊了，几乎增长了7倍。

政治王国中对反对派的约束：1957—1960

大会人民党的既野心勃勃又经常争议不断的发展计划将最重的经济负担放在了加纳可可种植地区的肩上，却有益于最大多数加纳大都市的民众。这些计划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反对。独立只带来了短暂的兴奋。实际上，此时南方的多哥兰人已公开反叛，抵制独立庆典。很快，政府被迫派遣军队和警察前往该地，在潘杜（Kpandu）镇3人被杀。在恩克鲁玛自己的阿克拉选民中，不满也开始出现。当地加人感到他们在公共住房方面遭到了歧视，就业对外来户阿肯人有利。1957年7月，加人立场协会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政治运动。政府此前阻止运动的尝试未获成功，随即于4月暂停了阿克拉市议会，但显然此举不足以起到警告作用。之后不久，民族解放运动控制的库马西市议会也遭暂停。

恩克鲁玛意识到地方性反抗可以很容易地破坏大会人民党掌握的非常脆弱的权力，正是这一恐惧成为了实施极具争议性的《加纳国籍与公民条例》（Ghana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Bill）草案的背景。该法授权内政部长有权决定谁是公民而无需向最高法院申请。之后不久，在1957年7月，政府通过了放逐法案，并立即用该法案驱逐了两名库马西的穆斯林协会党领导人以及加纳的许多反大会人民党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①] 一个月之后，同样利用该法案又驱逐了最初来自塞拉利昂的，加纳主要日报《每日写真报》（Daily Graphic）的代理主编班克尔·蒂莫西（Bankole Timothy）。他质疑恩克鲁玛将自己的头像而不是女王的头像作为加纳新货币图像以及在阿克拉竖起其雕像的决定，

---

① Ab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ccra, Ghana: Sankofa Educational Publishers, 2000), 193 - 194.

恩克鲁玛被激怒。[1] 此时，恩克鲁玛正因为“醉心于权力”和走向独裁而受到来自加纳和英国的攻击。[2]

123 1957年12月，政府通过了《避免歧视法案》（Avoidance of Discimination），禁止以地区、部落或宗教为基础的政党的存在。该法案是设计用来对付不久前聚合起来建立统一党（UP）的反对派的。这个新政党惊人的扩展速度终于促使政府于1958年通过所有立法中最严酷的《预防性拘留法案》（Preventive Detention Act）。该法案对于被认为有损于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外交关系举动的人可以拘留时间最长达5年而无需得到法院的许可。到这一年的11月，已有39人以该法案为根据被捕入狱，全部都是加入立场协会或统一党的成员。1959年逮捕的12人中有9人为阿散蒂地区统一党的成员，而1960年被捕的16人全部都是沃尔特地区的统一党成员。[3]

政府还提出在农村地区巩固其权力的动议。地区专员在独立后很快取代了一直是公务员并全为外国流亡者的地区官员。后者成为地区专员的秘书，他们从立法议会中当选的大会人民党委员的行列中被抽调出来，跻身内阁成员之列。[4] 大会人民党发起的加纳农民联合会议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农民协会并同心协力地消除主要反对派。在阿散蒂，许多前民族解放运动最高酋长的地位下降，而前大会人民党酋长则地位提升。想要废除前民族解放运动酋长的前大会人民党集团很快得到政府的允许。阿肯人的阿布阿夸的欧科恩痕尼和阿散蒂亨被迫公开脱离自己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前者是“不被承认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对他的已经“阻碍政府执行其合法职责”的指控进行了调查。[5] 最后，他被证实滥用权力而被正式解职。

---

① “What Next, Kwame……?” *Daily Graphic*, June 22, 1957.

② “Nkrumah: I Am No Dictator,” *Daily Graphic*, June 21, 1957.

③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194 – 195.

④ Richard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 – 196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0.

⑤ Richard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 – 196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3.

1958 年，按照独立宪法给予反对派的许诺，地方议会得以建立，但只是咨询机构。反对派抵制这些机构的选举，大会人民党赢得压倒性的多数。很快，这些成员同意修改宪法，修改后的宪法将废止这些机构，1959 年国民议会通过了这次立法。这样一来，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仅能关注主要事务的地方酋长议会了。政府也无义务就影响酋长地位的立法问题向他们咨询。[①] 恩克鲁玛最后威胁要分裂阿散蒂地区，先建立 8 个新布朗国，然后于 1959 年建立新布朗—阿哈福地区，这将包括前阿散蒂 62% 的地区，此举获得成功。

124

到此时，加纳的酋长们已经失去了对其职位税收的控制，在地方议会不再有发言权，他们的"独立政治影响……几乎消失殆尽。"[②]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酋长地位的最终正寝。他们依靠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又建立了另一个政府税收阶层的渠道。这被认为是与习俗背道而驰的，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政府最后通过了更多的立法来规范该机构及其官员。1959 年，《酋长（确认）条例草案》使政府认可的解职或就职成为必要条件。甚至更重要的是，它给予政府以合法废黜酋长而无需得到习惯法批准的权力。随着该立法的通过，实际上"酋长职位的任期"完全依靠"政党的亲疏"。[③]

政府也建议控制国内的民间组织，尤其是控制工会代表大会。1958 年的《工业关系法案》建立了大会人民党控制下的有限数量的全国性工会的集权结构。此外，政府创建了一个"全国合作委员会"来取代独立的"合作组织联盟"。这些附属于政党的组织中更具争议的一个是 1957 年建立的"建设者旅"（Builders Brigade），其宗旨是减少都市失业。该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庇护源泉，但反对派指控它像纳粹劳工营。像"退伍军人"、"妇女组织"、"社会主义学生全国协会"和

① Richard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 - 196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2.

② Richard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 - 196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0.

③ J. Dunn and A. Robertson, *Dependence and Opportunity: Political Change in* Ahoafo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204.

“加纳爱国者联盟”这样的组织全都被置于该党的控制之下。恩克鲁玛将他们比作一棵强大树干的许多枝杈。他在1959年大会人民党成立10周年的集会上宣布：“大会人民党就是加纳，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①

随着大会人民党将权力揽于手中，反对派甚至开始失去了自己的据点。1959年，反对派失去了库马西的补选权，遭受到极大的侮辱。反对派领袖科菲—布西亚博士于1959年遭流放，到1960年，其他31位独立反对派成员中3位遭拘留，12位倒向政府一边，② 然而，反对派仍然存在，他们占有机构职位，如法官、总督和公务员，仍然不受大会人民党的控制。恩克鲁玛显然想要更多控制。塔布曼总统治理利

125 比亚的独裁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1958年访问利比亚后将许多塔布曼总统的程序引入加纳。③ 1960年，他的政府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决定加纳是否应该也成为一个总统远比首相有权的共和国。这次公投很像一次普选而不是公投。尽管反对派反对共和国的主张，他们仍推举丹夸作总统候选人，大选与党的纲要的关系比与共和国宪法的关系更大。④

这是一场高度不平等的竞争，因为反对派几乎无法和大会人民党抗衡。相反，他们像过去一样只能攻击大会人民党的“独裁”本性，特别是政府动不动就放逐和拘留反对派。如果统一党的候选人赢得大选，该党许诺宪法起草委员会“给全民一个我国应有的宪法”。⑤ 在这个国家的主要都市地区，有大量选民对选举不感兴趣。在阿克拉的注册选民仅有45%参加投票，有35%的选民投票反对共和宪法而支持丹夸。这一次，投票似乎是自由的。大会人民党对这一结果显然非常惊

① “10th Anniversary Address,” *Evening News*, June 14, 1959.

② Dennis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1946 – 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386.

③ W. Scott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1957 – 1966*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41.

④ W. Scott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1957 – 1966*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387.

⑤ *West Africa*, April 30, 1960.

慌，他们在内地农村选区大规模舞弊以确保高投票率和对宪法修正案的压倒多数的支持。共和宪法废除了大多数加纳人都能接受的英国人出任的总督职位（利斯托韦尔伯爵），但新宪法的问题，诸如总统任命和废除首席大法官，解除司法人员和警察部队职务的权力等问题仍一片混乱，特别是公务员问题。恩克鲁玛的确使用过这些权力，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务员随时间的演进最后都遭到解职的不安全环境”。[①]

对外政策：1957—1965

恩克鲁玛总是热切关注非洲的统一，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加速了他思想意识的激进。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斗争曾迫使他将这个梦想放在次要地位，但独立后他很快宣称“加纳的独立毫无意义，除非非洲大陆的总独立与之相关”。[②] 他很快着手实现这一目标并让加纳站在这场斗争的前沿。1957 年，他任命在伦敦时的朋友西印度群岛的乔治·帕德莫尔作为非洲事务顾问。当 1958 年第一次独立非洲全国大会党在阿克拉召开的时候，第一个泛非行动出现。这次大会宣布了要树立“非洲形象”，并在联合国建立一个独立非洲国家（IAS）非正式秘书处的联合声明。[③] 然而，表面联合之下却存在着与会的 5 个非洲阿拉伯国家和 3 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间的紧张关系。 126

是年底，更激动人心的聚会——全非人民大会（All 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再次在阿克拉举行。这反而意味着非洲人仍在殖民统治之下，它聚集了来自 28 个非洲国家 62 个民族组织和政党的 200 多个代表团。来自全非洲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彼此发现，像比属刚果年轻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和安哥拉的霍尔登·罗伯托（Holden Roberto）这样的人物，决心返回到自己的祖国，加强反对

---

①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211.

② Kwame Nkrumah, "Africa Must Be Free," *Selected Speeches of Kwame Nkrumah* vol. 2, comp. S. Obeng (Accra, Ghana: Afram Publications, 1997), 67.

③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32.

殖民统治的斗争。会议决定在加纳成立一个永久秘书处，每年召开一次同样的会议，其目的是“加速非洲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手中解放出来”。[1]

与此同时，恩克鲁玛找到了重要的伙伴塞古·杜尔（Sekou Toure），后者曾于1958年9月对法属几内亚投票法共体的成员资格负责。[2] 他也宁愿“自由的贫困也不要奴隶般的富有”，这在争取独立斗争的早期曾是恩克鲁玛最富激情的口号。11月，恩克鲁玛将其新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几内亚共和国与加纳联合从而形成加纳—几内亚联邦。法国人已经从几内亚收回所有支持，但加纳为其更穷的伙伴提供了2 800万美元的赠款。1960年，与其盟友塞内加尔分裂了的马里共和国加入了该联盟。这3个国家最终公布了一个包含非洲国家联盟14个条款的宪章，它成为非洲联盟国家的核心。恩克鲁玛被选为主席，在这一点上，加纳完全站在“一个坚定地立足于非洲自己的新泛非主义的前沿”。[3]

然而，与这些泛非主义倡议并行不悖的是一个更为保守的对外政策，为的是维持与前殖民政权及西方的良好关系。恩克鲁玛确信加纳工业化所需的经济援助正是从这些国家得到的，他感到无力与它们对抗。甚至在加纳成为一个共和国之后，他还是参加了所有英联邦大会。127 在1957年第一次参加大会时，他作为国家首脑，呼吁保证可可价格，呼吁制定一个和英联邦国家给予其亚洲成员国类似的非洲援助计划。加纳甚至跟南非保持了友好关系。1959年，恩克鲁玛邀请南非外交部长埃瑞克·劳（Eric Louw）访问加纳，而加纳外交部长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回访更有意味。为了寻求援助访，恩克鲁玛问了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在美国，车队过哈莱姆街区街道的时候，他享受到了凯旋车队的欢迎。

---

① *West Africa*, December 20, 1958.

② 法国于1958年准许其殖民地在“法共体”内部成立自治政府，圭亚那是唯一拒不执行的法属殖民地，而是代之以全民公决宣布完全独立。

③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396.

加纳的对外政策公开宣称是不结盟政策，但在如何公开表述这一政策问题上却非常含糊。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与加纳有联系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西方国家。甚至像1960年在阿克拉召开的积极行动会议都有美国和英国的左翼组织参加。但除了南斯拉夫外，却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派代表团参加。[①] 直到1959年，苏联在加纳设立大使馆，翌年加纳大使馆也在莫斯科设立。同年，加纳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新中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最有争议的是，加纳刚独立就和以色列建立了亲密关系。甚至大会人民党年轻的激进分子也被这个犹太国家所打动。除了被以色列的活力所打动外，一些观察家感到这一关系给予恩克鲁玛在黑非洲对抗埃及影响的力量。[②]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随着反殖民地运动闸门的开启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独立，加纳作为泛非运动领袖的角色受到挑战。法国和比利时对其殖民地的独立有了一个180°的大转弯。1960年，法国放弃了法共体的想法，法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加纳有了3个独立的法语邻国：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上沃尔特和多哥。很快，与象牙海岸的关系在1958年4 000名加纳人被驱逐、加纳向科特迪瓦提出领土要求后走向恶化。象牙海岸的总统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et - Boigny）也与法国保持着亲密关系，甚至到了支持法国在撒哈拉进行核试验的程度。他受到大会人民党报纸的严厉抨击，说他是一个“踩着法国帝国主义山姆普拉（Shampoolah）的节拍疯狂跳舞的傀儡”。[③] 与多哥的关系也没好到哪儿去。恩克鲁玛要多哥和加纳合并，但多哥的新领导人斯尔法纳斯·奥林匹欧（Sylvanus Olympio）对这样一个安排不感兴趣。在两国之间出现了如此大的敌意，以致于当奥林匹欧于1963年遭暗杀的时候，人们怀疑加纳政府卷入了这次阴谋。 128

在非洲挑战加纳领导角色的最重要的国家是1960年独立的尼日利

---

① Thompson, *Ghana' s Foreign Policy*, 111.

② A. Rivkin, "Israel and the Afro - Asian World," *Foreign Affairs*, 37, no. 3 (1959): 486.

③ *Evening News*, September 5, 1959.

亚。尼日利亚比加纳大得多，曾是更有财富潜力的殖民地，它一直把自己当做英语西非的领导者。实际上，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人都认为成为整个非洲的领导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加纳更早实现独立暂时破坏了这一野心。恩克鲁玛没有参加1960年的尼日利亚独立庆典，这成了两国交恶的一个信号。两国的紧张关系也随着他们对共同享有的机构大国成员命运的争吵而加剧。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就建立了许多西非机构，像西非货币发行局（1921）和西非上诉法院（1929）。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组织化的泛西非主义加速发展。这样一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跨地域性组织，应对管理、教育、市场、军事、农业、科学研究和运输事务。这些组织常常对某一地区比对其他地区更有利，正是这一感觉让加纳在1957年独立之后仅一个月就脱离了西非航空公司。

到1962年，这些跨地区组织仅有西非考试委员会保留了下来。恩克鲁玛从这些组织中退出的根据是，这只是“我们主权的一个展示”。① 他害怕许多仍在尼日利亚的英国公务员对该国领导人的影响，他感到这些跨区域组织留下来的部分会使加纳暴露在危险的“新殖民主义影响”之下。② 民族主义的对抗和社会主义加纳与保守的尼日利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地区间合作的崩溃不可避免。随着尼日利亚政治分歧沿着宗教和种族的方向越来越大，加纳利用了这些分歧直接介入尼日利亚事务。1959年，当控制尼日利亚西部地区的“议案组织”“在介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更加有力”时，该组织转向加纳寻求支持。③ 此举包括派人参加加纳的颠覆训练营，迫使尼日利亚联

① Kwame Nkrumah, *Hands Off Africa! Some Famous Speeches by Kwame Nkrumah.* With a Tribute by George Padmore written by Tawia Adamafio (Accra, Ghana: K. Owusu - Akyem, 1960), 36.

② Kwame Nkrumah, *Hands Off Africa! Some Famous Speeches by Kwame Nkrumah.* With a Tribute by George Padmore written by Tawia Adamafio (Accra, Ghana: K. Owusu - Akyem, 1960), 36.

③ T. Falola, *The History of Nigeri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9), 100.

邦政府意识到“它必须争取在泛非运动中做更大的领导”。[1] 到此时，两国互相公开谩骂、侮辱。根据大会人民党的报纸《晚报》的报道，尼日利亚首相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莱瓦（Abubakar Tafawa Balewa）爵士是一个“黑皮肤的英国人”；同时，拉各斯报纸《西非导报》称恩克鲁玛是一个“黑色希特勒”。[2]

刚果于1960年独立之后的政治危机增加了许多与其非洲对手的差异。当刚果公共秩序失控，脱离运动出现的时候，加纳是第一批向刚果派遣军队的国家。恩克鲁玛决心向世人显示非洲人能够处理他们自己的危机，避免前殖民地势力比利时利用这一现实局势重新实行殖民统治。他支持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甚至签署了一份秘密的加纳—刚果联合协议，但西非和中非大多数法语国家支持其更为保守的对手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总统。1960年12月，这些国家在布拉扎维召开会议，要求任何国家都不得对刚果的内政进行军事或外交干涉，这对加纳是一个很明显的打击。后来又要求召回恩克鲁玛的代表纳撒尼尔·维尔贝克（Nathaniel Welbeck），他卷入了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的一次枪战，有人在枪战中死亡。实际上，加纳的支持者对派往刚果的军事特遣队并不热心，就像对其过去由白人军官指挥一样不热心。

翌年，支持卢蒙巴的激进国家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恩克鲁玛感到有必要立即成立一个政治联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加纳—几内亚—马里联盟宣告成立。然而，其他国家只想要一个共同市场、一个共同最高军事指挥部、一个文化委员会和一个经济发展银行。当他请联合国给予卢蒙巴最后一次机会的建议被否决之后，恩克鲁玛仍坚持到最后。很快，卢蒙巴被其刚果的政敌抓捕并在脱离主义者控制的加丹加（Katanga）省遇害。与布拉扎维（Brazzaville）集团不同，卡萨布兰卡集团越来越指望苏联来抵制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

---

① Thompson, *Ghana' s Foreign Policy*, 239.

② Thompson, *Ghana' s Foreign Policy*, 240.

1961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德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在一次可疑的飞机坠毁中殒命，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感觉。对恩克鲁玛来说，这是“一个殖民主义不公正的可怕例证，为了实现其罪恶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①]

1961 年 5 月，保守集团在蒙罗维亚（Monrovia）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其他拒绝恩克鲁玛立即建立政治联盟呼吁的国家加入了进来。加纳的恩克鲁玛主义报纸激烈抨击泛非联盟这个软弱的方案，但 1963 年出现的全非独立国家组织和非统组织（OAU）正是从这个集团中诞生的。到了这个时候，卡萨布兰卡集团崩溃了，加纳与几内亚及马里在政治上联合的企图也随之失败。1963 年 5 月，在非统组织成立地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会议上，甚至其往昔的盟友也不再支持加纳。

恩克鲁玛的第 3 本书《非洲必须联合》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前不久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了新殖民主义的危险和建立一个非洲联盟的必要。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尼日利亚首相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莱瓦爵士的观点却占据了上风。他认为：“非洲的统一必须建立在全体非洲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无论其国家多大、人口多少、社会发展水平多高。”[②] 另一方面，加纳在有些方面也取得了胜利。非统组织成员一致同意所有非洲人民都应当自由。为了帮助南非和葡属非洲的解放斗争，建立了一个特别协调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加纳不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国。这表明加纳在外交上遭到了多大的孤立，以致“连这个泛非主义第一人都受到了冷落”。[③] 非洲解放的主要战场也离开加纳，大部分转向了南非，而南非附近的国家成为自由战士的标志性基地。

尽管恩克鲁玛签署了非统组织宪章，他却从来没有放弃其实现泛非统一的决心。非统组织秘书处建立后，他的外交官努力将该机构变

---

① *Ghana Today*, September 27, 1961.

② *West Africa*, June 1, 1963.

③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399.

成一个非洲联盟政府。对于其他非洲国家，这是个不再重要的问题，他们宁愿致力于像政治和外交合作这样的现实考虑。恩克鲁玛也激烈反对地域联合，比如提议建立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东非联盟，因为他感到这个联盟可以以法国联合协会的方式被用来当做一个“英帝国主义的工具”。[①] 1964 年坦桑尼亚发生的许多次军队哗变也破坏了联盟政府的稳固，特别是当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被迫请求英国军队来恢复秩序的时候。但对其非统组织的伙伴来说，最令其不安的是恩克鲁玛允许其他非洲国家的政治避难者利用加纳作为他们颠覆本国政府的基地。这直接违反了非统组织宪章的条款。这些在加纳的政治避难者的存在将成为加纳与象牙海岸、多哥和尼日利亚等西非邻国冲突不断的根源。

131

1964 年在刚果再次爆发的冲突让恩克鲁玛有理由强调联合政府而不是依靠“来自西方势力的无私帮助”的必要性。[②] 他在 1964 年开罗非统组织国家首脑峰会上这样呼吁，但并不比之前做得更成功。然而，他却使阿克拉获准成为 1965 年非统组织的会议地点。为一个会议中心设计了奢华的建筑规划，价值几近 3 000 万美元，而这时的加纳经济基本上已经破产。对于许多人来说，恩克鲁玛似乎期望阿克拉将成为新非洲的首都。为了确保非洲国家首脑不至于抵制这次会议，恩克鲁玛不得不对其邻国和加纳操纵的外国持不同政见者活跃的地区采取更抚慰性的政策。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让象牙海岸领导的 8 个非洲国家满意，他们还是抵制了这次峰会。到此时，恩克鲁玛已经开始认识到了非洲联盟的分裂，于是采取妥协，同意建立一个修改非统组织宪章的执行委员会，即使这样他还是无法得到所需的 2/3 支持。恩克鲁玛对此结果非常生气，威胁要退出非统组织，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和塞拉利昂的艾伯特·马尔盖（Albert Margai）爵士说服了他没有这样做。

---

①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331.

② K. Nkrumah, *Challenge of the Congo* (London: Nelson, 1967), 228.

向左转：1961—1966

对刚果政策的失败使恩克鲁玛从不结盟转向更积极地与共产主义集团增加共识的立场。甚至在卢蒙巴被暗杀前，加纳就一直在向东方靠拢。贸易和劳工部部长科乔·博齐奥在1960年就曾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苏联。他带回来激动人心的财政援助和技术合作的许诺，显然都不带附加条件。1961年，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访问加纳，到这个时候，像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东欧国家也与加纳建立了外交关系。

然而，这个政治方向转变的最为显著的标志是1961年恩克鲁玛的东欧国家之行。当恩克鲁玛的讲话越来越与苏联情投意合的时候，对于后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恩克鲁玛称赞他们将许多共和国和邦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联邦，并将苏联看作是非洲学习的榜样。恩克鲁玛总是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对接受西方资助沃尔特河工程的关切迫使其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慎重。1961年，他得到了美国对该工程的资助，社会主义信念可以更加公开了。

132

不断增加的社会主义认同在该党保守派（以长期的坚定分子如内政部长克罗博·艾度斯和财政部长克姆拉·格贝德纳为代表）和典型的年轻一代社会主义者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分歧。对于保守派，他们的关系及热情仍在西方。社会主义者自己也分为非洲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由信息部长科菲·巴阿克（Kofi Baako）领导的前一个集团，想使社会主义适应非洲的情况，而由大会人民党总书记，即后来的总统事务部长塔维亚·阿达马菲奥（Tawia Adamafio）领导的后者却反对任何适应性修正。像刚果独立这样的危急形势总的说来巩固了社会主义者的地位，因为恩克鲁玛将他的失败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罪恶操纵”。[1] 1961年，恩克鲁玛在温尼巴建立了夸梅·恩克鲁玛意识形态研究所（ideological institute），以培训立志献身的社会主义者

---

①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208.

和非洲自由战士。因为无法吸引高素质的学生，许多来自东欧国家的成员又不懂授课使用的英语而使此举并不特别成功。然而，到 1961 年，社会主义者在加纳社会中占据了关键地位。他们或者主导或者占据着像工会代表大会、报纸（《晚报》和《加纳时代》）、政党、加纳银行、加纳商业银行和意识形态研究所这些机构的实权位置。

阿瑟·刘易斯后来描绘大会人民党“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派系之间一分为二，他们之间互相仇恨，交替受到恩克鲁玛的青睐”。[①] 1961 年 4 月，恩克鲁玛发表“向全国发出的黎明讲话”，力图解决党内不断增长的分裂危险。他严厉批判当时在加纳社会中俯拾皆是的腐败。许多腐败牵涉到党员和政府的重要官员。保守派特别容易就成了替罪羊。例如，克罗博·艾度斯的夫人非常过分地从英国进口了一张镶金床。大会人民党已经成为“一个掌权者们非常有利可图的财富资源”，恩克鲁玛承认这一点，制定了党员财产规定。[②] 更有意味的是，该讲话是一个获得具有恩克鲁玛社会主义信念的新的追随者的机遇。已经“抛掉早期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老同志遭到降级或开除，最大的受害人是克姆拉·格贝德纳，他曾怀疑苏联是否能够帮助他们付清迅速增长的西方债务，因而使自己不受欢迎。[③] 他被解除了财政部长的职位，暂时担任卫生部长。几个月之后，他与其他许多保守派一起被迫辞职，他们在全国大会上谴责了《预防性拘留法案》之后，很快离开加纳，加入到国外的加纳政治流亡者的行列之中。

133

新追随者拥抱“恩克鲁玛主义”和个人崇拜，认为恩克鲁玛将成为第一任非洲总统。他们“可笑而肉麻地称呼他为‘艳舞男孩’（Showboy）、‘他弥赛亚式的奉献’、‘荣誉的源泉’和最为典型的‘加纳之父’（Osagyefo）”。[④] 1961 年，恩克鲁玛还建立了一个将取代被斥

① A. Lewis, *Politics in West Africa* (Toronto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0.

②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404.

③ D. Rooney, *Kwame Nkrumah: The Political Kingdom in Third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176.

④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209.

责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童子军”运动的“加纳少年先锋队”组织。其青年成员对恩克鲁玛的英雄崇拜已经到了一个将他神化，宣称他是他们的救世主的程度。这一点让加纳的广大基督徒和宗教民众心生反感。加纳的英国主教 R. R. 罗斯维尔牧师（Reverend R. R. Roseveare）因在加纳基督教会中领导反对该“早期无神论”而于1962年遭到驱逐。[①]“少年先锋队”受到鼓励，揭发其父母和师长的反恩克鲁玛主义情绪，这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私下里对恩克鲁玛和其政权的唐·吉诃德式举动的反抗”。[②]

帮助恩克鲁玛向左转的是1961年加纳面临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危机。到这一年年末，可可的国际价格已经直落到每吨500美元以下。国家被迫大幅度缩小其日益萎缩的储备。此外，政府不是削减开支，而是引入一个增加消费税、新购买税和最不受欢迎的对每年超过330美元的全部收入强制性征收5%税款的苛刻预算。后一项决定主要影响到了熟练和半熟练技术工人，1961年9月头一次征税，就在阿克拉和库马西的运输工人以及塞康第—塔科拉迪的码头和铁路工人中引起了一场大罢工。此时，恩克鲁玛不在国内而是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大会，但他一回来就将这次罢工看作出于政治动机。一场逮捕工人和反对派领导人的浪潮接踵而至，像 J. B. 丹夸和乔·阿皮亚（Joe Appiah）就因他们支持一场“非法罢工”而被捕。国家专横地向左而行，大会人民党下院议员的忠诚也受到怀疑并纷纷被捕。

134

经济的崩溃也引导着经济向左转。1961年，准备实施到1964年的第2个发展规划被正式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1961年开始的一个新的7年发展规划草案，该规划将进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根除殖民结构”。[③] 为此目的，他们从国外招募了两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专家：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经济学的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① J. S. Phobee, *Kwame Nkrumah and the Church in Ghana, 1949 - 1966* (Accra, Ghana: Asempa Publishers, 1988), 173. 当安立甘会给予其投票权时，他于几个月后被允许返回该国。

②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219.

③ Rimmer, *Staying Poor*, 87.

Kaldor）教授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约瑟夫·伯格诺尔（Joszef Bognor）。卡尔多特别相信强制储蓄的必要，于1961年将一个大幅度增加税收的计划纳入预算。最后，这个社会主义者的新建议在大会人民党的1962年《工作与幸福计划》和1963年的《7年发展规划》中公之于众。

在这个新经济秩序中，加纳政府要主导经济。1961年建立起来的加纳国家贸易公司成为该国进口货物的主导者及分配者。大多数金矿和钻石矿都被国有化。建筑工程全被国家建筑公司接管。国家也接管了银行和保险业。工业发展也由国家控制，到1965年完全国有的产业达22个，同时有另外20个正在进行中。依靠机械化技术的国有农业建立起来，大多农业机械都从东欧国家进口。建设者旅改名为工人旅，主要经营国营农场。国家不允许私营企业参与竞争。为了消除国营渔业公司的一个有力竞争对手，恩克鲁玛提议将这个年轻商人置于国家控制中，当时已经吸收了他的公司。他拒绝接受这个决定，但完全知道其将面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要得到经营所需的进口设备已不再可能。[①] 不受国家控制的唯一重要项目是1965年9月完工的沃尔特河工程。

这些新的经济警察成功地打破了外国资本对加纳施加影响的强大控制力，也避免了当地企业阶层的崛起。然而，国家经济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国家贸易公司的低效率和恩克鲁玛坚持从东欧国家进口货物导致了加纳依赖的进口货物的严重短缺。像糖、米、奶、面粉、肥皂、药品和汽车配件等基本物资在加纳都无法获得。接踵而来的是囤积居奇和价格飞涨。人们为了“购买一包糖”而不得不在阿克拉的体育馆排起长队。[②] 国营农场运作极其低效，耕种农田的工人旅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计划不周使计划本身常常行不通，工业处处受挫，加纳不得不向欧洲财政机构寻求异常昂贵的短期贷款以进口所需要的基本物资。到1965年，在1957年已近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减少到不足1.5亿美元。

135

① Rooney, *Kwame Nkrumah*, 190 - 191.

②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215.

让加纳经济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可可世界市场价格的持续下跌。1964—1965 年，其价格已经跌落至每吨 347 美元，不断增长的营销成本使可可销售税收的公共分配成为负数。[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纳可可农的生产那一年却获得 572 000 吨的大丰收，这个数量是 1957 ~ 1958 年产量的 1 倍还要多。作为加纳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东欧国家对加纳的帮助微乎其微。他们只增加了加纳的可可消费量，但他们却是很难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们以世界市场价格来购买加纳可可，却要加纳以西方货币来购买他们的货物。甚至他们的援助项目也都暗藏着附加条件。加纳不可避免地贡献大量硬货币以完成东欧项目，到 1962 年，加纳官员的工作已被看作主要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满足机械设备方面的出口目标”。[②] 即使是交换学生项目也是值得怀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质量很低，一般说来非洲学生的生活条件也很差，而严重的种族歧视使情况更加糟糕。

在这些困难时期，腐败俯拾皆是，使经济管理不善的情况更加严重。腐败从最高层直蔓延到社会最底层。在小说《美丽者尚未诞生》中，A. K. 阿玛（A. K. Armah）对加纳死气沉沉的恩克鲁玛主义的描述中，仅有的几个诚实人成为社会的罪犯，甚至受到其家庭的轻视，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借助欺骗和偷窃而变得富有。反抗是危险的，暗杀恩克鲁玛似乎成为实现改变的唯一途径。1962 年 8 月，在从上沃尔特返回的途中，恩克鲁玛在边境小镇库伦古古（Kulungugu）会见了莫里斯·亚米奥勾（Maurice Yameogo）总统以消除两国间的贸易困难，刺客向他投了一颗手雷，炸死一人，炸伤 55 人。恩克鲁玛自己受了些碎片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阿克拉及其周围出现许多起炸弹爆炸事件。恩克鲁玛利用这些来打击他的政敌。经常被议论为恩克鲁玛总统接班人的总统事务部长塔维亚·阿达马菲奥和曾是 1948 年被捕的六人团中的外交部长阿科·阿德杰（Ako Adjei）遭到拘留，被拘留的还有数百名其他参与暗杀

136

---

① Rimmer, *Staying Poor*, 77.

②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275.

的嫌疑人。

最后，12 人被推向一个由国家首席大法官阿库·科萨赫爵士和另外两个最高法院法官 W. B. 凡·拉尔和阿库福·阿多（Akufo Addo）主持的特别法庭接受审判。被告人中有 5 位被宣布有罪并被判死刑，但涉及阿达马菲奥、阿德杰和大会人民党执行秘书科菲·克拉布（Coffie Crabbe）企图谋杀总统的证据不足。1963 年 12 月，他们被宣布无罪。恩克鲁玛一怒之下解除了首席法官的职务。很快，国民议会通过了刑事程序法，该法让总统有权宣布最高法院的判决无效，恩克鲁玛随即对上述审判行使了这个权力。对于党报《加纳时代》的主编来说，首席法官的被解职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事先没有告诉恩克鲁玛判决结果”。[①] 恩克鲁玛也利用这次暗杀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修改了两条宪法，从而进一步加强其政治权力。一条是给予总统在理由充足的时候解除法官职务的权力，另一条实际上使加纳成为了一党专政的国家。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参加这次可笑的公民投票的人中 93% 压倒多数的投票者支持这些变化。此时，大会人民党的最大反对派不是逃离该国就是遭到拘留。1963 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有 586 人被预防性拘留。

然而，反对派仍然存在。1964 年 1 月公民投票后不久，一位在三军司令官邸执勤的巡警向恩克鲁玛开了 5 枪，但都没有击中目标，却杀死了一个保镖。恩克鲁玛又利用这次谋杀来肃清警察和安全部队中的上层。从此，警察不再允许携带枪支了。保卫总统的任务由苏联军官组成的总统精英部队接管，对于他的安全，这支部队异常偏执妄想。再次出现大量的逮捕，J. B. 丹夸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一年之后，他死于臭名昭著的恩萨瓦姆监狱。其他恩克鲁玛的主要对手加人律师和政治家奥贝泽比·兰普蒂（Obetsebi Lampety）在 1963 年也死于此。加纳大学公共教育学院主任德·格拉夫特·约翰逊博士也被指责不忠而被捕，许多外国工作人员遭驱逐。大学出现喧闹的示威活动，党的支

137

① *Ghanaian Times*, December 12, 1963.

持者大声辱骂学生并打破窗户。在这个时候，加纳大学，特别是莱贡校区，对恩克鲁玛企图控制入学、职位任命和选址的计划发起抵制。[①]

该政权变得如此不得人心，以致原定于 1965 年的大选不得不取消。选举要根据立法会规模从 104 人增加到 198 人的新选区来进行。大会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占据着这些席位，这基本上意味着恩克鲁玛亲自选定了这些成员。加纳甚至不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而是直接在总统统治下的人治国家。国会成员很少有人仍有足够勇气讲出反对政府的话，批评党员明目张胆的腐败，或国家医院中的缺医少药，这样的反对者都从立法会议中被驱逐出去了。此时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像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比马克思更马克思、比恩克鲁玛更恩克鲁玛的独断专行”。好像他们正“积极准备着为接管领导权打基础”。[②]

然而，尽管加纳有这些变化，却保持了与其先前母国的联系。尽管与英国的关系紧张，但恩克鲁玛还是能够让伊丽莎白二世于 1961 年访问加纳。甚至到了 1964 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时任英军参谋总长的蒙巴顿（Mountbatten）勋爵也访问了加纳，这是一个英国军事力量留在前殖民地地区之重要性的标志。加纳也仍然保留了其英联邦成员的身份，但 1965 年，当罗得西亚人（Rhodesians）单方面宣布从大英帝国脱离出去的时候，这一与西方联系的纽带也开始变得脆弱。加纳在批评英国没能防治这些白人少数派攫取权力方面一马当先。恩克鲁玛呼吁军事干预。1960 年刚果的例证还历历在目，他希望加纳军事力量能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最终，在来自其他非统组织成员的压力下，加纳被迫与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就是在英国外交官离开之后，一个包括一名英国陆军准将在内的军事使团仍保留了下来。

138

军事干预罗得西亚的可能对于士气不佳的加纳军队来说是最不可取的。似乎总统个人警卫团（POGR）将会接手常规的军事事务，这

---

① F. Agbodeka,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Accra, Ghana: Woeli Publishing Services, 1998), 139 - 148.

② Rooney, *Kwame Nkrumah*, 239.

既被质疑，又缺少资金。甚至当恩克鲁玛继续支持在罗得西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还是迫使一些军队中资格最老的军官解甲归田。根据 A. A. 阿弗利法（A. A. Afrifa）少校的回忆，正是这一行动导致了1966 年 2 月 24 日推翻恩克鲁玛的军事政变。恩克鲁玛曾欢迎几周之前尼日利亚发生的军事政变，并试图加强夺取政权的更为激进的军政府成员的地位。他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在自己军队的手中他倒台有多快。当政变发生的时候，恩克鲁玛正在中国访问，致力于加纳等英联邦国家发起的结束越南战争的使命。像恩克鲁玛的众多计划一样，这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任务，因为美国人和北越人都对听从一个破产了的非洲国家的建议不感兴趣。美国人确信恩克鲁玛的垮台即将到来。他们拒绝提供急需的食品援助。北越感到战争的浪潮正对他们有利，所以没有必要谈判。恩克鲁玛自己的人员已对该任务死了心，但他执行该目标的决心表明，“加纳之父”为一个外交成功已变得多么不顾一切。

政变本身在加纳受到欢迎，比国家的独立更让人热情澎湃。只有总统卫队进行了短暂的抵抗，24 小时政变就完成了。在宣称他为国家创立者的国会外面，恩克鲁玛的雕像被拉倒在地并被砸成碎片。政变后的夜晚，酒吧里挤满了庆贺的人群。街道上出现了打扮成全国解放委员会（NLC）成员的，支持新统治者的游行。甚至跟随恩克鲁玛到中国访问的 74 人代表团成员也抛弃了他们先前的领导。恩克鲁玛曾派到亚的斯亚贝巴非统组织会议抗议加纳新政府上台的外交部长奎森 - 塞凯（Quaison - Sackey）逃往阿克拉，在那里他也宣誓向新政府效忠。[①] 监狱释放了所有被恩克鲁玛拘押者，开始投入新的政治犯。拥有 200 万坚强党员和 50 万军队的大会人民党没有进行抵抗，只通过一份广播声明就将自己解散了。至于恩克鲁玛，他的朋友和有时是对手的塞古·杜尔总统为他提供了避难，并给予他几内亚荣誉联合总统的

① B. Fith and M. Oppenheimer, *Ghana: End of an Illu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2.

名份。他在新家度过了5年时光，起草计划，种植玫瑰，等待加纳人民将他召回。恩克鲁玛最终患上癌症，飞往布加勒斯特就医，于1972年4月27日在那里病逝。

评价

恩克鲁玛被推翻没有遇到任何真正的反抗，加纳人带着明显的热情欢迎政变，长达15年的大会人民党的统治这么容易就结束了，只能解释为政变得到广泛认同。对于时时引用恩克鲁玛语录的死心塌地的恩克鲁玛主义者来说，加纳已经被“民众中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某些反动分子挑唆帮助的军警中的叛徒夺取”。[①] 这次政变正像其捍卫者所说，并非滴血未流的。根据恩克鲁玛的说法，大约1 600人在随之而来的战斗、“抢掠和抢劫”中丧生。[②] 与20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的冷战思维相一致，他很容易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挑出来作为这次政变的幕后主谋。实际上，这样的颠覆曾经发生过。早在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在恩克鲁玛剥夺了他的权力之后就与多哥的克姆拉·格贝德纳联系，帮助前财政部长夺权。1962年，中情局也给予J. B. 丹奎（J. B. Dangquih）以财政援助。一般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非洲的颠覆行动被揭露已是常识。1962年，根据美国驻加纳大使馆官员所说，恩克鲁玛“已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病态困扰’，不过是安德鲁·塔利（Andrew Tully）不加选择地爆料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故事》的副本而已”。[③] 库伦古古的暗杀企图以及与多哥事件策划者的显而易见的联系都强化着这种感觉。在该政府的最后几年中，一种“阴谋和不信任的气氛……紧张地聚集着”。[④] 1965年，甚至执笔恩克鲁玛自传的，长期为他服务的英国秘书埃里卡·鲍威尔都被怀疑是一个外国间谍。

---

① K. Nkrumah, *Dark Days in Ghana*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8), 9.

② K. Nkrumah, *Dark Days in Ghana*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8), 27.

③ R. Mahoney, JFK: *Ordeal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5.

④ Rooney, *Kwame Nkrumah*, 240.

然而，政变明显得到了太多的当地支持，甚至左派人士都完全接受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这些事件作出的解释。这次政变刺激出一个对恩克鲁玛的加纳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批判了加纳发生的社会主义转变的肤浅性质。社会主义一直尝试和带有灾难结果的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在一个最有影响的分析中，依靠阿瑟·刘易斯的常规建议，加纳是想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这被看作是其主要的失策之处。投入加纳的外国资本非常少。实际上，资本一直在净流出。1961 年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发展规划姗姗来迟，还没有跟资本主义的过去有一个干净利索的决裂。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使大多数人“意识到被政治精英攻击的讨价还价对他们毫无价值”。[1] 毫不奇怪，在恩克鲁玛统治晚期，生活水准大幅下跌的工人和农民不会再支持如此黑暗地辜负他们的政权。

更传统的解释指出，加纳几乎没有真正执行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划。阿瑟·刘易斯于 1958 年得到其在加纳的职位几个月之后，作为西印度大学副校长离开加纳，回到学术界。[2] 他很快被恩克鲁玛政府缺少执行任何计划的现状所激怒。1963 年精心起草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计划不过是“一张实际效果几近于零的废纸”。[3] 恩克鲁玛从来没有执行计划的耐心和原则，特别是对那些将农业发展看做工业发展基础的计划。他也从不受现有资金的限制。一位描述 1963 年发展规划执行情况的经济学家观察到：

> 在该规划中从来没有设想过的新项目出现了，现在正在由希望支付佣金给接受这些项目的承包人推动。项目没有可行性研究，也没有竞争性招标就上马了。新企业作为私产在党的干部中分配，使他们可以给予其亲朋好友及支持者以庇

---

① Fitch and Oppenheimer, *Ghana: End of an Illusion*, 129.

② 他的合同为期两年。F. M. Bourret, *Ghana: Road to Independence 1919 – 195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9.

③ T. Killick,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Action: A Study of Economic Policies in Ghana* (London: Heinemann, 1978), 140.

护。到了 1965 年，就中央政府来说，发展项目有效地减少以便按时完成 11 月召开的非统组织国家首脑会址阿克拉新会议大厅。①

许多评论员也都将目光聚集在“恩克鲁玛本人朝秦暮楚、变化无常的性格”在使其垮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上。② 一些人甚至确信，141 在其“统治的第二阶段，他的性格和个性”有了变化。从节俭道德政治变得“迷信、腐败和邪恶”。③ 恩克鲁玛政权垮台后的许多对加纳腐败的调查都让人确信‘加纳之父’已经屈从于他身边的腐败文化。关于他依赖 jujumen、传统祭司和占卜者的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构成了这位领导人的并不完美的肖像。他不能接受潜在对手的忠告，使他被溜须拍马者包围，最终“疏远了几乎加纳社会的所有阶层”，“变得完全与加纳的现实相脱离”。④

其他人将这种政治上的孤立也看作是源自于殖民传统，并且“已经阻碍了市民精神的发展”。⑤ 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人民一个高度集权和独裁的政府，其“传统……对解决加纳紧迫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几乎没有实际意义”。⑥ 恩克鲁玛通过将自己凌驾于“政治上瘫痪，没有方向的人民”之上从而填补了这个空白。⑦ 他的个人统治在加纳存在了很长时间，原因是一直没有出现挑战，但这个统治体系并没有深深地扎根，摇摇欲坠的门面最终倒塌了。

然而，很显然，对于恩克鲁玛而言远不只是他的许多失败这么简单。他是撒哈拉南部非洲独立时代的杰出人物。他受到东方和西方的

① D. Rimmer, “The Abstraction from Politics: A Critique of Econimic Theroy and Design with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 no. 1 (1969): 195.

② Austin, *Politics in Ghana*, 416.

③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209.

④ Ibid., 221.

⑤ H. Bret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Kwame Nkrumah: A Study of Personal Rule in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6), 11.

⑥ H. Bret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Kwame Nkrumah: A Study of Personal Rule in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6), 11.

⑦ H. Bret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Kwame Nkrumah: A Study of Personal Rule in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6), 12.

引诱并不令人吃惊。他以其远见卓识直面非洲许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解决这些问题又恰逢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无法逃脱冷战争夺的特别困难的时代。他的吸引力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是，他从许多逃离非洲的人在外国的居住区中吸引了一大批反殖民主义的活跃分子回到加纳。如乔治·帕德莫尔从西印度群岛，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从美国返回加纳。在这些回归者中，有许多人撰写文章高度支持黄金海岸的革命，而帕德莫尔和杜·波依斯则想在加纳为自己安置新家。[①] 重要的是，两人死后都葬在了加纳。还有许多人也在加纳度过了许多年，为新国家的理想贡献了自己的专业和技能。美籍非裔作家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就是这些国外亡命者中的一员，他将此举描述为打开“神圣的大门”，“最终回家”。[②]

毫无疑问，恩克鲁玛持久声誉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远远超过将他推翻并取而代之的人。他在加纳的历史上留下一块在他死后仍继续吸引并激励其许多国民以及全世界的非洲人后裔的印记。在以下几章中，我们将看到其国民是怎样向他的“不朽记忆”“献上敬意”，甚至到了他的缺点和失败都被忘记的程度。[③] 加纳为大部分非洲的独立开辟了道路。恩克鲁玛被暴力推翻也不幸将加纳带入了这块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的大趋势——对政治的军事干预。

---

① 譬如，帕德莫尔出版了《黄金海岸的革命》（London：D. Robson，1953）。其西印度的同志 C. L. R. 詹姆斯则出版了《恩克鲁玛与加纳革命》（Westport，Conn.：Lawrence Hill，1977）.

② Maya Angelou，*All God' s Children Need Traveling Shoes*（New York：Random House，1986），23.

③ Rooney，*Kwame Nkrumah*，257，引自几内亚比绍反葡解放运动领袖 A. Cabral 在科纳里克市恩克鲁玛葬礼上的讲话。



1. 中部地区的雨林采伐。资料来源：作者照片，197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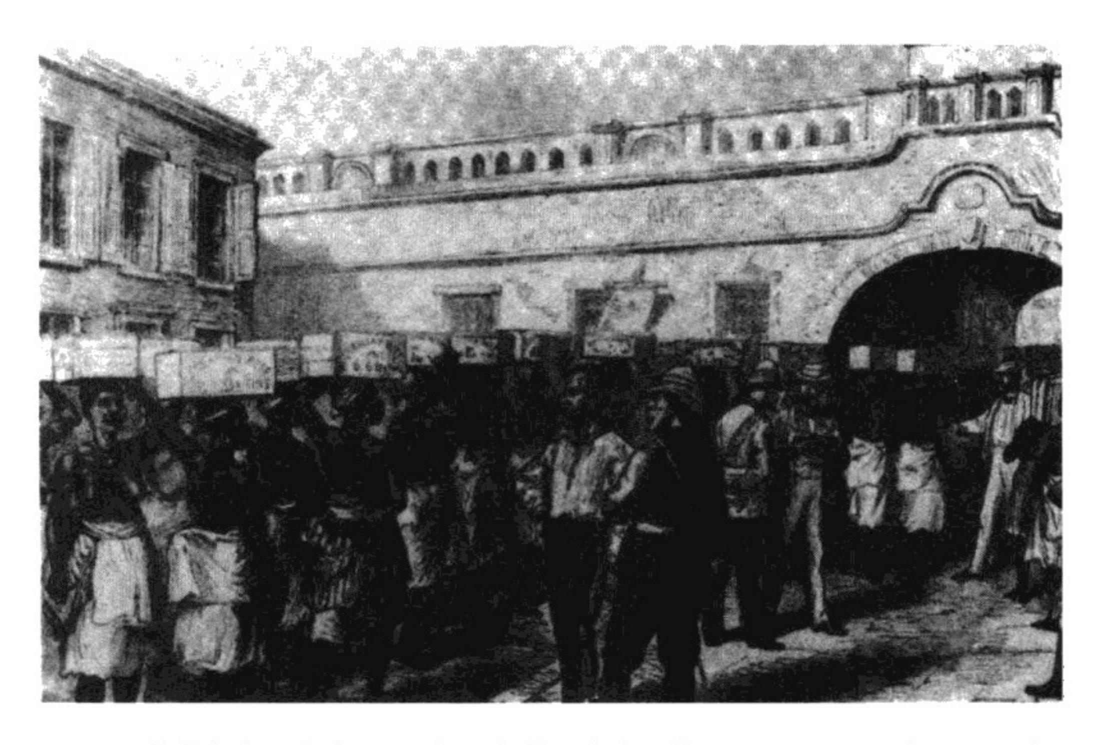
2. 生长在东部地区的尚未成熟的可可果。资料来源：作者照片，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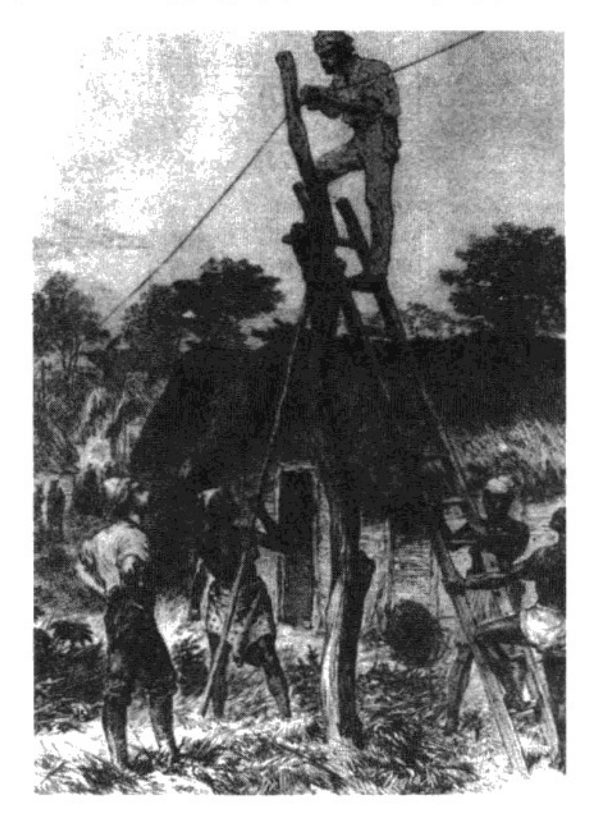
3. 靠近上西部地区瓦城的雨季热带稀树草原林地中的小村庄。资料来源：作者照片，2001 年。



4. 以总督府为背景的海岸角堡。前方操场的下面是奴隶地牢。资料来源：作者照片，1997 年。



5. 1874 年战争中运送英国军队与阿散蒂人战斗给养的妇女搬运工正在离开海岸角堡。因缺少驮畜，人力搬运在热带雨林地区十分必要。牲畜无法在这舌蝇肆虐的地区生存。资料来源：1874 年 1 月 31 日《伦敦新闻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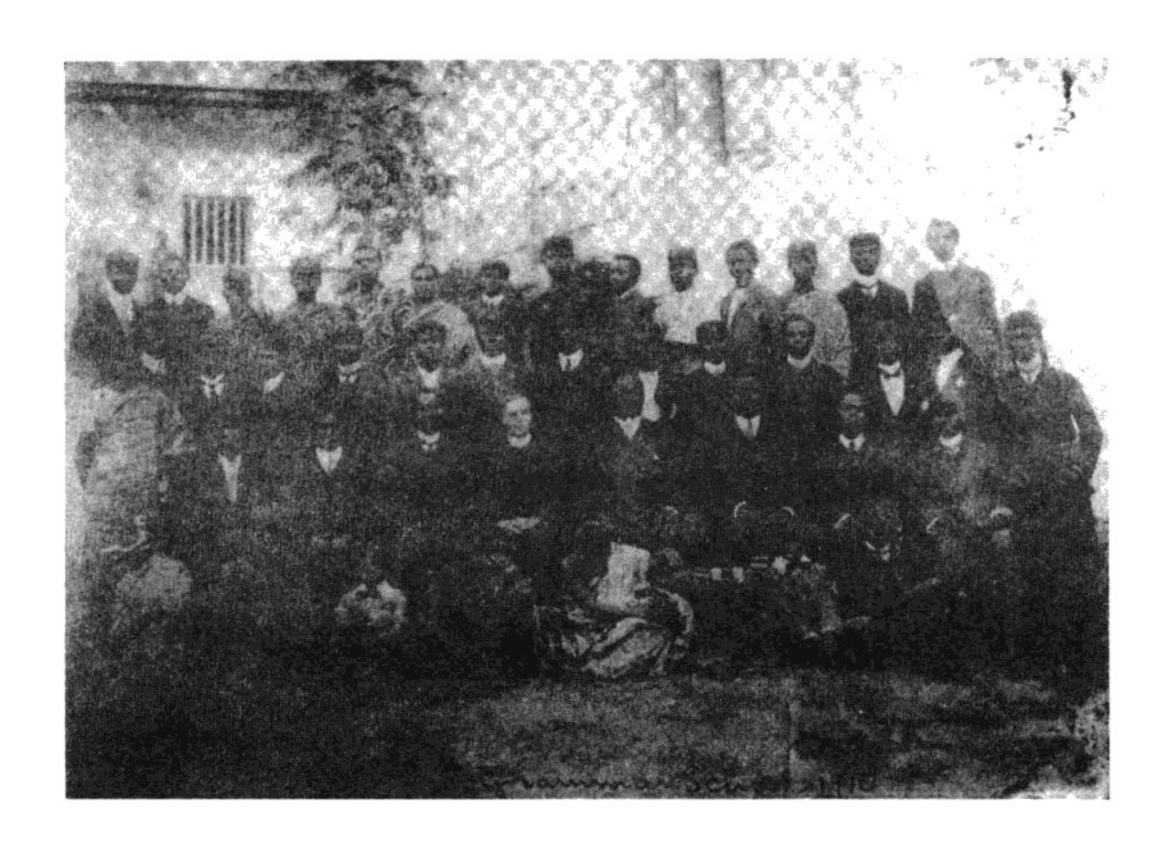
6. 1874 年阿散蒂战争期间从海岸角堡向内地架设电报线。资料来源：1874 年 2 月 7 日《伦敦新闻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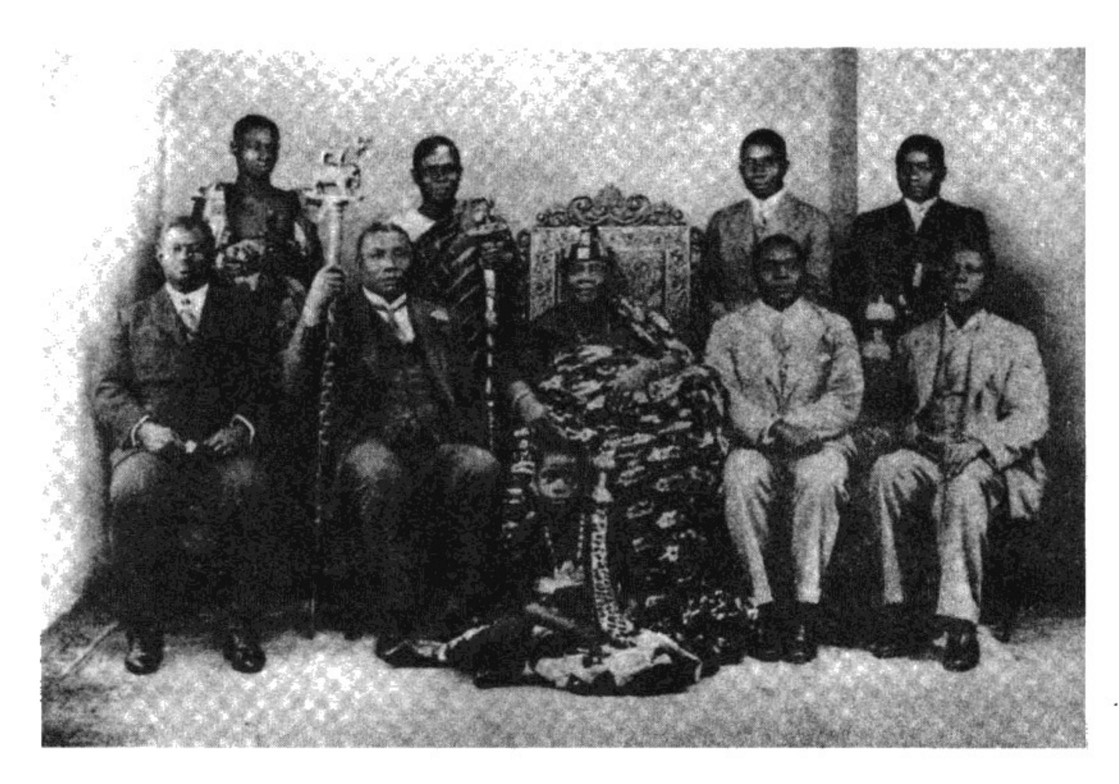
7. 1874 年战争期间从海岸角堡运出病人。像疟疾和黄热病这样的热带疾病和由污染水源造成的痢疾比战争夺去的生命还要多。资料来源：1874 年 2 月 21 日《伦敦新闻画报》。



8. 泰特赫·括西（Tetteh Quashie）的现代塑像。他曾于 1878 年前往费尔南多波（Fernando Po）岛工作，将可可带回黄金海岸。他被认为是加纳可可工业的奠基者。该塑像矗立在莱贡的加纳大学一栋宿舍楼外。资料来源：作者照片，199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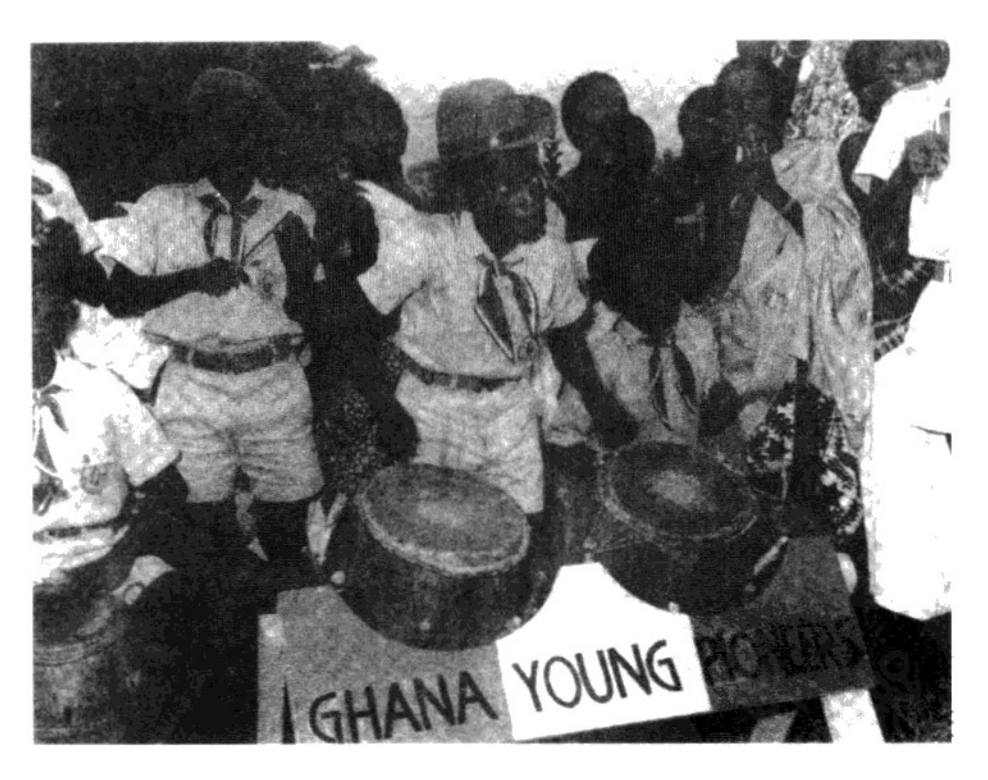
9. 高等 S. P. G. 语法学校。该校于1910年由海岸角堡的英国传教士教会建立，现在被称作 Adisadel 学院。校长乔治·B. 布朗牧师（一位英国人）是一位保留非洲人传统习俗的坚定信徒，图片中许多男孩都穿着非洲服饰就是一个证明。资料来源：海岸角堡的 L. 菲利普斯先生，197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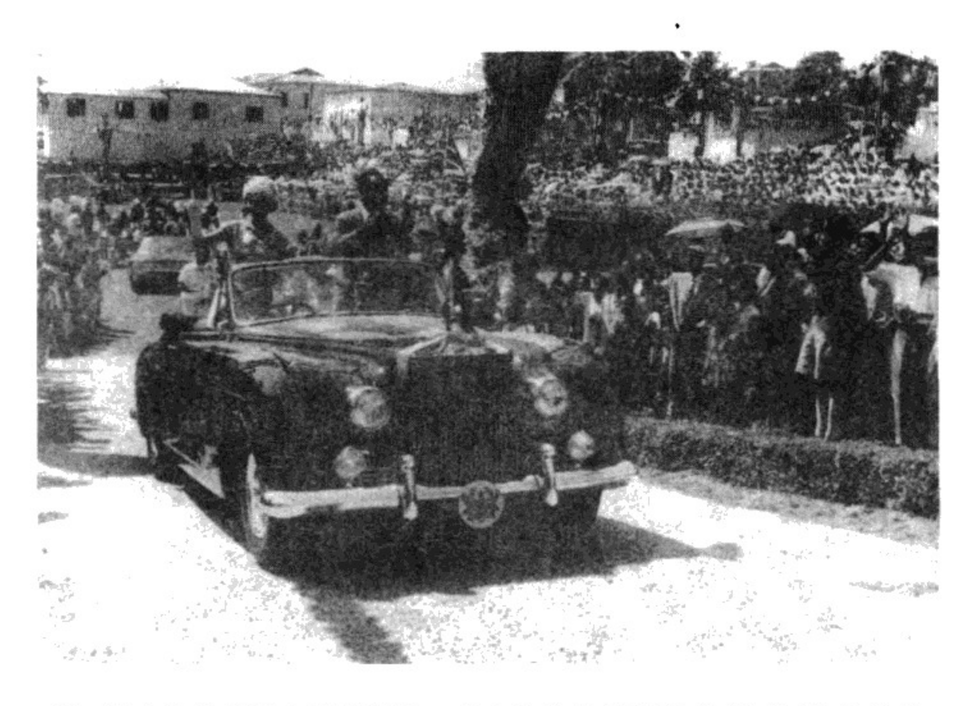
10. 1934 年前往伦敦抗议"厌恶法令"的中央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前排自左向右坐者为：阿基拉格帕·索耶（Akilagpa Sawyerr，BL），F. V. 南卡·布鲁斯（Nanka Bruce）博士，尊敬的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阿肯人阿布阿夸的阿曼亨），尊敬的 K. A. 科索（Korsoh，BL），詹姆斯·默泽（James Mercer）。后排站立者为：姚·波阿福（Yao Boaffo，为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持伞者），K. 明塔（K. Minta，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的 okyeame 或翻译），W. E. A. 奥福里·阿塔（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之子），J. B. 当奎亚（J. B. Danquiah，BL）博士。坐在前面的是琼斯·奥萨瑞（Jones Osare），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的 awoso，或称灵魂附体者。照片中没有出现的有 E. O. 阿萨夫－阿贾耶（E. O Asafu－Adjaye，BL）和 K. K. 阿杰曼（K. K. Agyeman，Kumasihene 秘书）他们代表阿散蒂人，后来加入了该代表团。资料来源：E. 阿玛夫人，海岸角堡，1974 年。



11.20世纪30年代中央省主要酋长会议会见殖民地官员。资料来源：阿克拉公共记录与档案部门。



12. 带着爱德华鼓的加纳少年先锋队员，1962年。K. 博藤（K. Boateng）摄。资料来源：加纳信息部。



13. 恩克鲁玛总统和伊莉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于1961年11月17日在海岸角堡受到群众的热情欢呼。资料来源：加纳信息部。



14.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博士（拄拐杖者）与其非洲百科全书项目的秘书阿尔菲厄斯·亨顿（Alpheaus Hunton）博士，1963年于阿克拉。资料来源：加纳信息部。



15. 1974 年，I. 阿昌庞上校到达海岸角堡的斐图—阿法西耶（Fetu Afahye）庆典（该城每年的感恩节庆典）。资料来源：作者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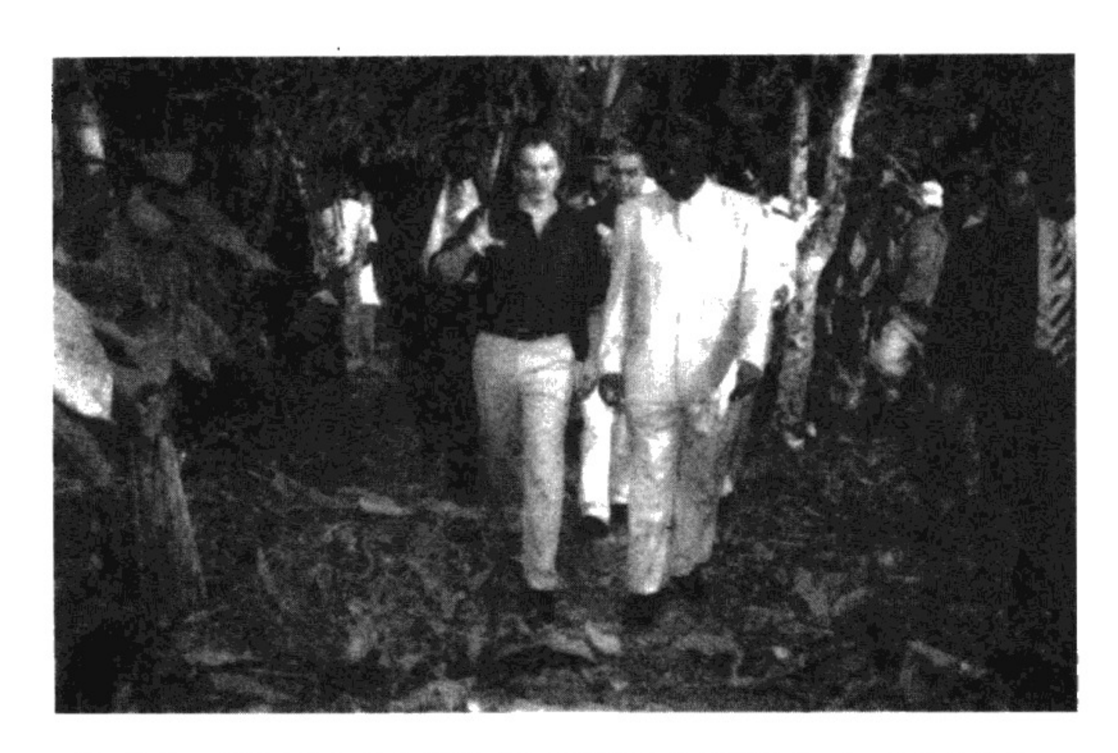
16. 第二共和国首相科菲·布西亚博士，1969 年。J. T. 奥坎西（J. T. Ocansey）摄。资料来源：加纳信息部。



17. 罗林斯总统与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罗达姆·克林顿、纳纳·科纳杜·罗林斯（Nana Konadu Rawlings）1998年3月24日在独立广场上。逾50万人齐聚广场，欢迎美国总统访问加纳。资料来源：加纳信息部。



18. 伊莉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于1999年11月7到9日访问加纳期间向首长们致意。她身后是她丈夫、菲利普亲王，右侧是罗林斯总统。约150万人涌上阿克拉街头欢迎英国君主再度访问加纳。资料来源：加纳信息部。



19. 托尼·布莱尔首相在其2002年2月访问加纳期间与J. A. 库福尔总统一起参观东部地区的可可农场。资料来源：加纳信息部。



20. 从马克斯韦尔路向远处中央广场望去，摄于加纳第二大城市库马西。资料来源：作者照片，2001年。



21. 从阿克拉中心地区向北望去，直到市中心的科乔·汤普森路。资料来源：作者照片，2004 年。



22. 阿克拉，前面的建筑是最高法院。远处的所有高层建筑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修建完成的。资料来源：作者照片，2004 年。

第八章　从军事政变到第二共和国

当权的全国解放委员会

147 策划推翻恩克鲁玛政府政变这一“冷酷手术”的军官可以将军队调入阿克拉而没有引起怀疑。军队的调动让许多人相信是进军罗得西亚的准备行动。策划者从库马西和远在北方的塔马利地区调来军队。他们很快开始控制阿克拉的关键位置，如电台和机场，而同样参与政变的警察逮捕了政府和大会人民党成员。只有在旧三军司令官邸，总统个人警卫团进行了6个小时的抵抗。这次战斗死亡人数不到20人，但他们当中却有指挥加纳军队的查尔斯·巴瓦（Charles Barwah）少将。当政变军队试图逮捕他的时候，巴瓦进行了抵抗。

参与政变的士兵和警察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根据是恩克鲁玛行使专制权力已导致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他的统治反复无常；法律条文为利于其统治的便利而遭到践踏；他将国家当作“个人财产”来

148 统治。[1] 毫无疑问，参与这次政变的战士最直接关心的是，他们看到了恩克鲁玛的统治方式威胁到了西非最庞大的群体——军队本身。政变策划者之一 A. A. 阿弗利法少校感到，43名加纳士兵因恩克鲁玛在

---

① 1966年2月24日军队在加纳电台所做的声明。引自 Robert Dowse, “Military and Police Rule” in *Politicians and Soldiers in Ghana, 1966 - 1972*, ed. D. Austin and R. Luckham (London: Frank Cass, 1975), 17.

刚果那次冲突中的灾难性政策埋骨他乡。[1] 早在 1962 年当他从刚果返回的时候，阿弗利法就一直盘算着用武力干涉政权。他于 1964 年再次考虑这样做。恩克鲁玛创立自己的警卫团、创立人民军队的提议及 1965 年解除军队统帅们的职务，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他决心把军队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就像控制国家机构一样。

政变后两天，军队和警察成立了设有 8 个委员的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是被恩克鲁玛于 1965 年解除军队司令职务的 J. A. 安克拉赫（J. A. Ankrah）中将，副主席是警长 J. W. K. 哈雷（J. W. K. Harlley）。委员会其他 6 名委员由军队和警察分享，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在策划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阿弗利法少校和克托卡（Kotoka）上校。全国解放委员会设立 4 个委员会处理经济、外交、行政和在大会人民党政府时期饱受压制人员的信仰等事务。经济是最直接的难题，为了确保外国能够援助加纳，他们富有争议地承诺兑现前政府欠下的所有债务。然而，决定权在西方一边，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继续了。西方国家提供了食品和基础药品供应的紧急援助。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 3 600 万美元的信贷以支付短期贸易账单。全国解放委员会也重新计划向西方和社会主义债权国进行中期借贷。

新政府也遵循一项经济节俭的政策。除了抛弃 7 年发展规划之外，新政府还取消了像阿克拉—特玛高速公路（Accra/Tema Motorway）和计划中将成为阿克拉交易会中心景观的恩克鲁玛塔等面子工程。各部和行政区域也进行了重组，这样一来，后者的数目就分别从 167 个、32 个减到了 47 个、17 个。外交使团也减少了 40%。[2] 新政府也试图将国营企业置于更具竞争力的管理之中，甚至引入外国公司来进行管理。然而，与此同时，政府想要确保小企业仍保留在加纳人手中。最终，全国解放委员会于 1968 年出台了《加纳企业法》，寻求通过限制小型零售、批发、提炼、加工、制造和运输企业进入加纳而达到这个 149

① A. A. Afrifa, *The Ghana Coup* (London: Frank Cass, 1966), 66.

② Ad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ccra, Ghana: Sankofa Educational Publishers, 2000), 228.

目的。为了支持这个目标，政府对移民实施了严格的控制。总的来说，第一个预算很受欢迎。它减少了对基本进口食品和石油生产的税收。免除了年收入少于468美元的人的所得税。最危险的是，全国解放委员会提高了支付给可可农的价格，依当时世界市场上每吨可可306美元的最低价，每单位重量可可销售价由4.68美元提高到5.62美元。

在对外关系领域，全国解放委员会也行动起来缓和早已存在于加纳和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的几近战争状态。1966年，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所有非洲国家以修补嫌隙，最为重要的是，全国解放委员会驱逐了一直生活在加纳的避难者群体，他们利用加纳作为对自己祖国的颠覆基地，特别是尼日利亚、多哥和象牙海岸。那些真正的难民和同意遵守非统组织决议的避难者被允许留下来。加纳最终于1967年向其邻国多哥、上沃尔特和象牙海岸开放边界。全国解放委员会重申加纳致力于不结盟并承诺支持联合国及西方的倡议。加纳很快同英国重建外交关系，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则不是结束就是严重萎缩。同美国的关系因为越南战争而变得更为复杂。起初，加纳支持联合国，但当时，在非统组织的压力下，全国解放委员会被迫转变了这一立场。

新政府成立了许多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恩克鲁玛时期的腐败问题。他们处理国有企业的管理不善和官员腐败。根据阿帕洛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恩克鲁玛本人有罪。在他被推翻的时候，他拥有的现金和其他财产价值650万美元。[①] 现在人们还在争论，这些钱有多少实际上是他的或属于国家的。恩克鲁玛在国家资源和他自己的财富之间并没有做什么分别，但显然他并没有像后来数代非洲独裁者那样将财富秘密运出他的祖国，这在其几内亚流放生活的简朴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腐败调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本可以使所有公职人员和许多会使对于维系全国解放委员会至关重要的人名声

① V. T. Le Vine, *Political Corruption: The Ghana Case*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1975), 135.

扫地的彻底调查”。[1] 前大会人民党酋长中有近200人被解职，其他人“被公众同意和政府压力”选中，但大会人民党提供给酋长的地方房产获允保留。[2] 总的说来，恩克鲁玛主义时代的组织和协会继续起作 150 用，但很快便“呈现出新政权的色彩”。[3]

政变后不久，全国解放委员会又建立了国家救济委员会给予以前被拘留者食品和衣物并帮助他们重返社会。政府还呼吁政治流亡者返回家园。没有大批人被解雇的现象出现，政府不遗余力地避免在没有全国解放委员会认可的时候解雇职员。终于在1968年，预防性拘留条例被取消，被前政府拘留人员、仍羁押在监狱中的人和政变早期被捕的许多人一起得到释放。

击退社会主义政策

全国解放委员会政府公开致力于击退大会人民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将许多国有企业卖给了个人。对外来经济大规模开放，总的说来新政府选择了回归阿瑟·刘易斯的经济战略。然而，实际上，全国解放委员会政府对纠正滥用权力比对一个完整的结构调整更感兴趣。很快，毫无经验的士兵和警察便转向高级官僚寻求指导。两个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经济咨询委员会（EAC）和政治咨询委员会（PAC）。前者的6位委员都是高级公务员，而后者则都是些反对恩克鲁玛及大会人民党的政客。官僚控制在1966年末很快严重到不得不任命委员会来领导政府各部的地步。尽管他们宣称赞同自由市场，但实际上新的统治者根据“在经济中政治家和官员可以比个人更能追求共同利益”的

---

① R. Rathbone, "Ghana," in *West African States: Failure and Promise: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d. J. Du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

② D. Austin, *Ghana Observed: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a West African Republic*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6), 107.

③ D. Austin, *Ghana Observed: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a West African Republic*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6), 107.

前提行事。①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国家调控和政策的混用对于改善加纳的经济环境影响有限。在制造业、渔业和地方食品生产数额方面都有一些增加。② 但是，在全国解放委员会统治的3年半的时间里，因为无法实现他们宣称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而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196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塞地贬值也没有导致进口的下降和更多的出口。加纳面临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还在继续，通货膨胀越胀越高。③外债增加，加重了还债的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饱受财政束缚的国家却成了"一个发达国家的资本净出口国"。④饱受这些政策之苦的是工人和农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对人满为患的国营企业紧缩开支，结果在生活费用同样急剧上升的时候失业也激增。毫不奇怪，罢工浪潮四起。1966年有32次；1967年27次；1968年36次；1969年，全国解放委员会统治的最后一年高达51次。⑤最大的一次罢工在1966年末爆发，当时有5 000名工人在在奥布阿西金矿参与罢工。1968年，在塞康第也有一次8 000名铁路工人的令国家瘫痪的罢工。这之后不久，塔科拉迪码头工人步其后尘。1969年爆发了最具破坏性的罢工，还是在奥布阿西金矿。军警开枪镇压，许多矿工死亡。

农村居住条件也受到了政府节衣缩食政策的影响。在可可种植地区，阶段性尝试通过提高支付给农民的价格来改善其生活条件。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可可的世界市场价格在此时期稳步提升。但总的来说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总体发展的支持在不断下降。最为重要的标志

---

① D. Rimmer, *Staying Poor: Ghana' s Political Economy 1950 - 1990*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106.

② J. D. Esseks, "Economic Policies," in *Politicians and Soldiers in Ghan 1966 - 1972*, ed. D. Austin and R. Luckham (London: Frank Cass, 1975), 51.

③ A. P. Osei, *Ghana: Recurrence and Change in a Post - Independence African Stat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81.

④ A. P. Osei, *Ghana: Recurrence and Change in a Post - Independence African Stat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81.

⑤ Y. Petchenkine, *Ghana: In Search of Stability, 1957 - 192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40.

是可可生产的全面萎缩，从 1966 年的 410 000 吨降到 1969 年的 334 000吨。不断增加的向多哥和象牙海岸的走私要对可可生产萎缩负些责任。此外，政府对可可疾病防控的支持开始减弱。在全国解放委员会统治时期，杀虫剂的供应急剧减少，甚至政变前的政府也应负些责任。对可可农来说，最具灾难性的是他们的出口价格份额从政变前的 71% 下降到 1969 年的 36%。在新秩序中，“可可继续被看做是加纳的摇钱树”。[①]总的说来，经济裹足不前。1966 年，国民生产总值（GNP）仅增长了 0.6%，仍然保持在全国解放委员会（原文如此，疑为恩克鲁玛——译者注）统治时期的水平。与此同时，人口却以每年约 2.4% 的速度增长。

然而，全国解放委员会似乎对军队和公务员特别慷慨。国家国防预算高于 1965 到 1966 年。高级公务员和低工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急剧扩大，到 1969 年达到 39∶1。在高级职位中，腐败问题再次出现，1967 年，全国解放委员会发现自己陷入激烈的批评之中。身在科纳克里（Conakry）的恩克鲁玛进行了猛烈的全面攻击，很明显在加纳仍然有其支持者。这使全国解放委员会心神不宁，他们悬赏28 000美元将他及其最亲密的 3 位伙伴无论死活捉回加纳。实际上，部分军队实则更加可怕。一旦高级指挥官有所表示，心怀不满的低级军官很快就会跟随他们自己的政变计划。最严重的一次出现在 1967 年 4 月，当时一群激进的中尉试图推翻政府。克托卡将军在战斗中被杀，政变曾一度成功。全国解放委员会受该事件震动很大，两名政变领导人最终被行刑队公开执行死刑。[②]

152

新统治者以恩克鲁玛同样的方式将媒体看作是一个宣传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当其夺得权力的时候，他们使日报国有化。然而，却允许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新的独立出版物出现，如加纳大学教师出版的双周刊《莱贡观察家》（*Legon Observer*）

---

① Rimmer, *Staying Poor*, 113.

② K. Nkrumah, *Dark Days in Ghana*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8), 127.

和将成为一个新生政党喉舌的《晚间标准》。然而，随着政府支持率的下降和批评的增多，报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1966年10月，全国解放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被称作反颠覆的法令（“禁止谣言法令”），用意就是防止报纸猛烈攻击新政府。“传播任何可能造成对全国解放委员会、警察和武装部队不满的言论，即使是真话也是犯罪”。[①] 根据该法律，1967年，一位《晚新闻》的主编因报道军中不和被判3年徒刑。之后不久，4位国家日报主编因批评政府计划让一个美国公司接管财政陷于困境的国有医药公司而被开除。[②] 1968年，《莱贡观察家》也因为批评国家法院工作拖沓而受到攻击。主编被迫公开道歉，但仍被解雇。[③]

回归政党政治

新统治者预想只掌权一个短暂的时期，同时寻找对他们忠诚的人交接权力，但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支持率下降导致了这一进程的加速。1966年9月，支持率开始回落之前，全国解放委员会成立了首席大法官阿库福·阿多领导下的，由16名委员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为国家起草一部新宪法。大多数委员都是民族主义时期的领导人物，不是曾反对恩克鲁玛，就是对他和大会人民党非常失望。[④]他们也是全国解放委员会乐于接受的人。该委员会也征求经常矛盾重重“无法接受的”公众意见。[⑤] 最后，还是该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主要负责

153

① C.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fica, 1996), 43.

② C.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fica, 1996), 47.

③ C.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fica, 1996), 48.

④ R. Luckham,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1966 - 69," in *Pelitians and Soldiers in Ghana* 1966 - 1972, ed. D. Austin and R. Luckham (London: Frank Cass, 1975), 63.

⑤ R. Luckham,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1966 - 69," in *Pelitians and Soldiers in Ghana* 1966 - 1972, ed. D. Austin and R. Luckham (London: Frank Cass, 1975), 66.

其希望“持续几代人，甚至几百年”[①] 的宪法。尽管包含一些基于斯堪的纳维亚案例的调查营私舞弊官员的条款，作为委员们的背景之反映，这部宪法主要受威斯敏斯特型宪法的启迪，比如英国宪法和美国宪法。用语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哲学家像 J. S. 穆勒（J. S. Mill）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语言。宪法只有两处提及社会主义，而且是贬义。[②]

不出所料，该宪法保护了军队和公务员的利益。在试图平衡政府不同部分的权力方面，它也创造了一个非常笨拙的体系，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权力之间存在有巨大的模棱两可之处。这个混乱并不使人吃惊，因为该宪法试图将英国议会制和美国的立宪制度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该法案没有解决谁将被禁止参加将要举行的选举这一有高度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留给了全国解放委员会通过政令来决定，但那些不够资格者无法通过程序来请求例外，然而，谁会被排除在外的问题却卷入了种族对抗之中，很快破坏了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团结。埃维人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顾问委员会中都很难在比例上形成气候，但其进攻性看法还是在警察和其许多高官都是阿肯人的军队之间播下了仇恨。身为加人的空军少将、1968 年的加纳军队首席国防参谋长迈克尔·奥图（Michael Otu）的所谓政变加剧了这些分歧。这样一来，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另一个加人安克拉赫中将的政治举动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他鼓励一个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支持他的事情被曝光后，他被迫辞职。

然而，恩克鲁玛的前任财政部长克姆拉·格贝德纳（Komla Gbedenah）返回政治巅峰一事使种族问题变得突出。他被看作潜在的，可以赢得曾将大会人民党推向权力者所支持的人，恐怕最终将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实际上，他在全国解放委员会中已经同 J. W. K. 哈雷警长和同为埃维人的该党副主席 J. W. 德库（J. W. Deku）结成同盟。 154

① *Memorandum on the Progosals for a Constitution of Ghana* (Accra, Ghana: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16.

② Luckham,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1966 - 69,” 69.

1968年11月，格贝德纳成功地向豁免委员会申请，其主席阿帕洛（Apaloo）法官也是埃维人，但全国解放委员会颁布了一个宣布该例外及同类决定无效的政令。然而，全国解放委员会很快又颁布了另一个废除对格贝德纳进行限制的政令。但是，他的麻烦还没有结束。在1969年大选前的几个月，他被宣布在其担任大会人民党政府部长的时候犯有财政渎职罪。当时当政的制宪会议决定在宪法中加入一个禁止这样的人进入政界的条款，但格贝德纳可以就他的情况上诉。他在等待国家最高法院裁决的时候可以竞选公职，后者最终做出了对他不利的裁决。这些跌宕起伏引发出关于种族联盟的强烈联想，一下子将种族分裂问题推向人们关注的中心。

除了就禁止谁出任公职问题进行角力之外，1969年1月成立的制会宪议还不得不与其他问题，诸如首相和总统间的权力平衡及中央应给予地方多少权力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角力。总的来说，从地方机构和组织中选出的150名成员组成的制宪会议拥有支持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国会政府那些有声望的人。他们尽管有时也相当激烈，但只带来对宪法起草委员会提议的适度调整。例如，他们决定不给部长以薪水，减小法官的权力，使修改宪法不那么容易。该议会最重要的特点是，允许层出不穷的政治党派获得那些享有类似地位者广泛的支持。实际上，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1969年5月，全国解放委员会就被迫取消了对各政党的限制。结果是甚至在议会于8月份完成其工作之前，该议会中像科菲—布西亚博士和乔·阿皮亚这样的主要领导成员就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大选争取支持了。

举行选举的机构已经随着1968年选举委员会（EC）的成立而就位。该组织负责将选举带给制宪会议。在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之后，155 该委员会被赋予决定哪个政党可以注册的权力。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防止种族党派形成的尝试。有20多个组织申请登记，但到1969年8月29日选举时，他们已经形成5个政治党派。对于全国解放委员会推进选举的速度，所有党派都有些不满。特别是资源不足、进入竞选，并且发展较慢的小党派。作为加纳人组织该选举是多么重要的标志，

超过75%的潜在选民登记参选，这几乎是1951年第一次大选参选人数（40.5%）的两倍。1951年，只有登记选民的47%投了票，但1969年该数字达到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63.5%。在对140个席位的竞争中，科非—布西亚博士领导的进步党（PP）以几乎57%的选票赢得105个席位；克姆拉·格贝德纳的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NAL）以30%稍强的选票赢得29席；剩下的席位由其他3个党派和独立候选人占有。

总的来说，选举进行得很顺利，只有很少的抱怨，但紧随种族的路线，加纳的阿肯地区都投票支持其阿肯人科非—布西亚博士。沃尔特地区几乎都投票支持埃维人克姆拉·格贝德纳，非阿肯—埃维地区有点分散，但进步党比其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对手得票更多。两大主要政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真正重要的不同选区作为平台。他们基本上都支持全国解放委员会对加纳社会未来的展望，其中一点就是私营部门将主导经济，而直接的目标是推进“农村的复兴……鼓励加纳企业……建设更多的公路和医院，整顿粮食市场体系，增加教育机会，为外国投资建立一个有利的环境”。[①]

结果，除了种族的考虑之外，进步党的压倒性胜利也受到加纳选民看待主要候选人的影响。格贝德纳因为他与大会人民党过去的亲密关系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曾积极参与恩克鲁玛对1961年铁路罢工的破坏，而当时布西亚的反对大会人民党的统一党得到了支持。大会人民党对可可农施以重税的记忆也使前财政部长在可可种植地区处于不利。格贝德纳不能像有些人害怕的那样成为民粹主义者。他从来都不是制宪会议的成员。全国解放委员会特别怀疑他，有传言说，如果他赢得大选的话，他将被取消当选资格。实际上，这也的确发生了，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最终不得不物色一位新领导伊拉斯马斯·麦基提（Erasmus Madjitey），他曾是恩克鲁玛的警察局长，但已被预防性拘留

① 选自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1966年3月2日的广播讲话。引自Y. Twumasi，“The 1969 Election,” in *Politicians and Soldiers in Ghana 1966 - 1972*, ed. D. Austin and R. Luckham (London: Frank Cass, 1975), 142.

两年时间。

与此相反，布西亚利用他在制宪会议中的便利赢得了许多议会成员，这样一来，大选开始的时候，议会中 2/3 的成员都已经加入进步党阵营。许多制宪会议成员都与政变之后涌现出来的代表地方和地区利益的组织有联系。他们是对大会人民党实行的专制的一种反抗，由长期反对大会人民党的人员以及更年轻的对大会人民党没有仇恨理由的新人组成。从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新政治秩序中最光明、优秀的人员，布西亚可以招募他们中尽可能多的成员，意味着进步党的候选人比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成员要有优势。毫无疑问，最为吸引人的是布西亚本人。其对手指控他在 1959 年离开加纳接受荷兰的社会学教授职位的时候抛弃了祖国。然而，他通过此举避免了遭到拘押并有可能"活下来"。① 对于他的朋友和支持者来说，这位有着加纳政治生活经历的，孩子一样的教授获得了先知般的声望。②

进步党当政：1969 - 1972

1969 年 9 月 3 日，大选后仅 3 天，布西亚接任加纳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他的政府显然准备奉行前政府的政策，许多全国解放委员会任命的人都保住了他们的位置。维克托·奥乌苏首先成为外交部部长，但后来将其职位调换为全国解放委员会政府的总检察长和司法部长，而曾是全国解放委员会财政和经济规划委员的 J. H. 门萨则成为了财政部长。实际上，当门萨提出加速经济的加纳化这样重要的提议时，布西亚政府为实现这一结果而大幅度加快了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时间表。就任后两个月，布西亚政府颁布了《外国人遵行法令》，要求没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要在两周时间内办理许可，否则离开加纳。这些人中最多的是西非人，特别是尼日利亚人。1969 年 12 月到 1970 年 4 月期间，大约有 150 000 名外国人被迫离开加纳。③ 他们大多数是商人、工

157

① *West Africa*, September 13, 1969.

② *West Africa*, September 13, 160.

③ *Ghanaian Times*, August 5, 1970.

匠、苦力及其家属。

1970年6月，政府通过《加纳企业（促进）法》，进一步加快加纳化的步伐。该法取代了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加纳企业法令》，后者规定，5年之内，许多加纳小企业都应收归国有。而新法则扩大了小企业的范围，解除了对外国人的限制，并于两个月之内生效。该法令又详尽规定了7个行业全部留给加纳人。像《外国人遵行法令》的情况一样，实施这一法案异常严格。然而，没有足够的加纳人有资本或专门知识接管所有真空企业。政府部门，特别是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不得不介入。不像大会人民党，进步党政府想支持私营企业扩大其在加纳经济中的作用。它已经缩减了黑星航运公司、加纳航空公司和国家渔业公司的活动，加纳国家建设公司失去了对公共工程合约的垄断地位。然而，当地加纳企业家的缺乏限制了该大规模商业活动可以由私人接替的范围，实际上，政府也不得不允许国营角色扩大。

不过，全国解放委员会统治时期就已开始的微小扩张仍然继续着。手工业产品的价值在增长着，到1971年中，几乎所有国营公司都盈利了。随着国家幸运地赶上大丰收，沃尔特湖捕鱼规划更好地建立起来，食品生产也在增长。新政府还给予农民贷款，修建道路支线以帮助营销，甚至保证一些商品的价格稳定。[①] 实际上，政府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来改善国家财富来源的农业地区的环境，有意识地寻求转变恩克鲁玛时期一直被强调为中心的工业。

但是，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的增长并不同步。1970年，失业率达到了50%还要多。布西亚政府特别关注于此，因为政府意识到，大量的失业者是从农村经历的变化中一无所获的城市居民，但从历史上看，他们还是比农村的居民受到了更多的政治关注。20世纪60年代，加纳人口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而大部分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每年不到2%，所以如此高的失业率就不足为奇了。进步党经济政策的主要受益人是数量相对较小且能够进入驱除外国竞争者后出现的真空地 158

① Esseks, "Economic Policies," 51.

带的商人。

像以前历届政府一样，进步党以一个单项出口，即他们无法控制其价格的可可来维系其独立。可可价格持续着从 1965 ~ 1966 年谷底的水平持续上扬的势头，这样，到 1971 年，已经攀升到每吨 300 美元的水平。可可生产也开始从 1968—1969 年只销售了 334 000 吨的大欠收略有回升，总销售量在 1971—1972 年达到了 457 000 吨。[①] 为了提高产量，政府付给可可农的价格提高了一倍，从每单位重量 3 塞地长到每单位重量 8 塞地。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如果可可价格的世界市场价格降低，政府支付这样的价格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经济扩展，那就几乎没有外汇留下来购买需要的外国货物了。随着可可的价格开始下降，政府无法用现金向可可农支付，进而出现了极不受欢迎的白条支付体系，农民不得不接受基本上是白条的做法。

此外，早年的艰苦产生了一种对外国消费品的被压抑了的需求，为了对付这一情况，新政府大幅度放宽了全国解放委员会的进口管制政策，废除了绝大多数的进口禁令。结果是进口花费猛增，这又进一步限制了投入发展规划的资金总量。同时，新政府继续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兑现恩克鲁玛时期签署的债务的政策。1969—1970 年，加纳实际支付的债务要多于接受的外国援助。1971 年，政府就国家债务开始重新谈判。只有原订数额的 10% 必须偿还，资金流入此时已经开始超过偿还的债务。[②]

新政府经济上的努力同样遇到了关于国内政策的激烈争论。布西亚政府掌权后不久就寻求修改宪法以使其可以在 6 个月之后解雇任何全国解放委员会任命的官员。1970 年 3 月到 4 月间，政府解雇了 568 名官员。大部分是不支持新政府的埃维人和加人。[③] 加纳国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 E. K. 萨拉赫（E. K. Sallah）就是这些官员中的一位。他

159 就此案向法院起诉，因为对他的任命是在全国解放委员会之前。上诉

① Rimmer, *Staying Poor*, 112.

② *West Africa*, August 27, 1971.

③ Petchenkine, *Ghana: In Search of Stability*, 49.

法庭决定支持他，裁决政府应该恢复其职位并赔偿其损失。许多被裁撤官员也提起诉讼，裁决显然影响巨大，因为加纳法律像习惯法一样是建立在案例法基础之上的。布西亚被激怒了。他指责法庭玩弄政治并通过广播和电视宣布“没有法庭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想要迫使政府雇用或重新雇用任何人的决定”。[①] 他的行为使政府和法院走向冲突，特别是首席法官阿祖·克拉布在报纸上回应对萨拉赫案判决方式的批评时宣布，“法官不想与任何人分享权力”[②] 之后。

布西亚承诺，他的政府“义无反顾地致力于在加纳建立新闻自由”。[③] 尽管他并不想向政府控制下的国家主要报纸投降，但报纸无疑比恩克鲁玛统治时期要自由得多，但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首先卷入冲突的是《每日写真报》编辑卡梅伦·多杜（Cameron Duodu），他不同意布西亚与南非种族隔离政府进行对话的号召。相反，多杜号召革命行动并谴责支持少数种族主义白人政府的对话。他连载了一系列批评布西亚对话方式的社论，最终被解雇，由一位比较驯服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段时间，政府还逮捕了反对派双周刊《代言人》（*Spokesman*）的主编科菲·巴杜（Kofi Badu），因为他“传达了一个可能会伤害行政声誉的错误意见”。[④] 他的报纸刊载了关于一个政府部门在阿弗利法少校家乡花钱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指控被撤回。

当冲突还在继续的时候，出现了如何确保加纳新闻自由的激烈争论。加纳大学的阿杜·波汉（Adu Boahen）教授在一次加纳艺术与科学学会（Ghana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讨论会上建议，政府拥有的日报——《每日写真报》与《加纳时代》（*Ghanaian Times*）归于独立报业信托机构经营。但很快，该建议在国会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⑤] 但是，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撤销了《每日写真报》主席乔治·奥夫

① *Daily Graphic*, April 21, 1970.
②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54.
③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51.
④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55.
⑤ *Daily Graphic*, November 19, 1970.

苏—阿玛阿赫（George Ofusu - Amaah）的职务，因为他还是警察局特别部门的首脑，这就使其非常不适合兼任二职。[1] 尽管政府垄断着日报，但仍保留了许多生气勃勃的周刊——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的《观察者》（*Spectator*）、库马西主导的《先驱者》（*Pioneer*）和阿克拉的《回声》（分别与两个小反对党结盟），以及《莱贡观察家》——它们并不害怕在诸如驱除外国人和主张与种族主义的南非对话等情绪化问题上挑战政府。

160

政局的失控

毫不奇怪，当布西亚努力控制其政治王国的时候，居住在几内亚的恩克鲁玛成了他的心病。社会主义再次开始对他产生比进步党的笨拙的市场政策更大的吸引力，后者非常依赖于不受欢迎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早在 1971 年，以激进的阿克拉律师约翰尼·汉森（Johnny Hansen）为领袖并任总书记的人民民众党就在“旧的大会人民党的歌声中”[2] 在库马西成立了。偏执的政府很快封杀了这个党派。之后不久，加纳学生民族联盟（NUGS）公开要求大赦恩克鲁玛博士，他应该得到“一位老资格政治家的待遇，表彰他过去取得的成就……鼓励其退休后住在家里”。[3] 布西亚感到这些动向威胁巨大，公开警告前恩克鲁玛主义者不要寻求恢复大会人民党，之后不久，他的政府通过立法确定，任何人通过任何手段促使前总统复辟都成为一项罪行。

更为严重的是，公务员及独裁者拥有的工程公司的工人、木材厂工人和铁路司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这说明加纳工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加纳工会的保护伞组织——工会代表大会起初呼吁忍耐新政府为国家经济所做的努力，但到 1971 年，工人们不再等待。该年中期可可价格的突然跌落迫使政府于 1971—1972 年紧缩预算，这又导致更多工

① *West Africa*, May 14, 1971.

② *West Africa*, January 23 - 29, 1971.

③ *West Africa*, April 30, 1971.

人的不满。诸如石油产品等基本项目的价格陡然增长，由于进口限制，加纳人习惯使用的商品从市面上消失。政府征收的总收入 980 美元以上的 1% 到 5% 之间的国家发展税非常不得人心，使人想起了大会人民党的强制性节约计划。让大学生支付其生活费或向政府贷款以缴纳生活费的决定使学生跟工人一起起来反对政府，用类似法国 1968 年的瘫痪性学生—工人罢工来威胁政府。政府回应工人的威胁，通过了禁止工会代表大会的法律，根据是它是大会人民党时代的遗存。之后不久，政府宣告工会领导人在策划全国范围的罢工以推翻进步党政府。[1]

加纳身处危机。预算紧缩把赌注押在既增加政府开支，又刺激出口上，并期望可可价格上涨。然而，尽管可可价格回升，但进口仍然多于出口，到 1971 年底，加纳短期债务不到一年便累积到半年进口额。[2] 加纳几乎没有储备，到了破产的边缘。布西亚政府同意偿还恩克鲁玛时代的中期债务，也成了经济上的负担，到该年年底，布西亚与财政部长 J. H. 门萨都在恳求英国贷款以使加纳挺过此次危机。然而，真正重要的决定正在阿克拉制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来到该地“评估经济并建议补救措施”[3]。当可可价格于年初开始回落的时候，有人提出国家应使货币贬值以最有效地提高进口价格。是年末，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个不受欢迎的方案，加纳的货币贬值了 40%。在不到 4 年时间里，加纳塞地贬值了两次。领袖们用改善生活水平的许诺取代了恩克鲁玛，但其诺言显得越来越空洞。

结果是，在这次贬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 1972 年 1 月 13 日，布西亚还在伦敦就医，加纳军队以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他的政府。政变领导者阿克拉第 5 部队司令伊格内修斯—阿昌庞上校为他所称的“1 月 13 日革命”辩护，其方式跟全国解放委员会的 1966 年起义者推翻恩克鲁玛时的所做所为如出一辙。[4] 他声称，“不当行为、贿赂、腐

---

① *West Africa*, October 22, 1971.

② Esseks, “Economic Policies,” 55.

③ *West Africa*, November 26, 1971.

④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59.

败、部落主义、任意解雇、法律事务以及一系列其他恩克鲁玛政权所具有的不当行为都回到了加纳。”① 布西亚的对手甚至将他也描述为另一个独裁者。然而，此次垮台却没有引发像恩克鲁玛垮台时所带来的群情欢腾，但仍有许多人“在阿昌庞夺得权力的时候歌唱‘hosanna，hosanna’”② 在布西亚短暂的执政时期，他努力疏远其最初的支持者，对批评者过于敏感，但他从没有像恩克鲁玛那样行使反复无常的权力。他试图压制批评者，无论他们是公务员、法官还是学生，试图使他们闭嘴，但他没有将任何人预防性拘留。实际上，1972 年中期，他的政府正计划举行地方政府选举，正如影响巨大的新闻周刊《西非》（*West Africa*）在加纳政变时所说的，在“加纳举行的自由选举中……布西亚政府将再次夺取权力”。③

---

① Mike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1972 - 1979* (Accra, Ghana: Tornado Publications, 1980), 7.

② Mike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1972 - 1979* (Accra, Ghana: Tornado Publications, 1980), 11.

③ *West Africa*, January 21, 1972.

第九章　军人重返政坛

救国委员会

阿昌庞及其他政变领导人也像1966年推翻恩克鲁玛政府的军人一样，对布西亚政府对待加纳军队的方式特别不满。1971年的紧缩预算大大减少了国家军事力量的投入，几乎减少了25%。军队从国外订购货物要上税，这使得更换零件和一般供给都变得不再可能。他们的很多设备都无法胜任工作，没钱训练和演习。此外，布西亚政府试图重新定义军队的角色，使其从严格的国防变为协助边防军打击走私、帮助警察打击犯罪和辅助抗霍乱运动，以及协助发展诸如道路修建和卫生设施建设。对于军官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他们失去了许多特权。这使得阿昌庞抱怨，“甚至一些恩克鲁玛统治时期军队拥有的设施和设备都被拿走了”。许多损失皆非大事，这足以让布西亚将阿昌庞的介入描述为“起于我节省开支努力的军官政变”。[①]

阿昌庞与支持他的中层军官也利用了在恩克鲁玛时期就已经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委员会和进步党政府时期的军事力量中的巨大

① *Nen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72. 例如，他们丧失了其汽车保养补助，不得不交水电费。其经费补助也遭削减，他们的房租却在增加，还有传言即将发生的减薪。

裂痕。这产生了一个软弱、缺乏经验及早期尝试政变的历史所显示的无法控制其成员行动的指挥体系。许多中层军官感到不公平，他们被置之不理、不被提拔，理由是他们的非政治性质或种族。① 早在1970年，阿昌庞就一直准备着政变，这表明酿成政变的不只是设备缺乏保养。然而，到了1972年，进步党政府甚至将最初支持其政府的人也归为异类，政变反映了加纳当时强烈的反布西亚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反恩克鲁玛政变曾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积极支持，阿昌庞的政变则没有这样的支持。此时一般的想法是，起初拥有崇高理想的布西亚政府“毫无信誉”，“教授”最好“回大学去讲课”。②

新政府——救国委员会最初由7位军事政变领导人（少校和中校）和一位文官组成，文官E. N. 摩尔（E. N. Moore）在1962年库伦古古谋杀恩克鲁玛案的审判中曾任辩护律师。他成了检察长。然而，为职位铺路的迹象还在继续。一天之后，更多的高级官员大部分被解职，只留下3位原来的官员。最后，到1月底，13位救国委员会成员得到了部长的职位，新政府基本上是代表“全国解放委员会和布西亚时代‘在野党’的联合政体”。③ 新政府没有包揽全国解放委员会时代单个的高级官员。实际上，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国家首脑阿弗利法中将曾是布西亚的支持者，他已被捕入狱并被拘留一年有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军人统治者非常年轻，平均年龄40岁，种族背景各异，但埃维人占其绝大多数。该政府中阿昌庞的主角地位可由下列事实表明，他自己控制了两个最为重要的政府部门：财政经济计划部和国防部。

167 政府听上去颇具宗教色彩的名字表明其高尚的道德目标，显然想通过向左转完成其“革命的”日程。一种模糊的社会主义再次盛行。

---

① V. P. Bennett, “Malcontents in Uniform——The 1972 Coup D’ etat,” in *Politicians and Soldiers in Ghana 1966 - 1972*, ed. D. Austin and R. Luckham (London: Frank Cass, 1975), 304 -5.

② Letter to the editor, *West Africa*, January 28, 1972. 他的确重反讲台并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了社会学教授的职位。

③ Bennett, “Malcontents in Uniform,” 308.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救国委员会中的年轻一代官员“对老一代反恩克鲁玛的态度并不像60年代的‘殖民官员’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相反，他们对“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滑稽可笑”十分“恼火”。[①] 除了扭转布西亚的塞地贬值政策之外，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偿还其认为遭致屈辱的加纳外债。实际上，这只是估计约26 800万美元国家中期债务中的约8 400万美元，约占恩克鲁玛统治时期签订债务合同所欠英国债务的一半。对于许多高喊“yentua，yentua”（“我们不还，我们不还”）的学生和工人来说，这仍然不够。塞地的升值也是不充分的。进步党政府44%的升值调整至20%，这使1塞地折合78美分。

总的来说，政府许诺“捕捉经济制高点”。作为此次“经济战争”的一部分，救国委员会从4大外资木材公司以及加纳在阿散蒂的主要金矿公司“强制收购多股股权”。[②] 起初，政府禁止进口对加纳人来说已成为基本进口需求的货物，比如咸牛肉、沙丁鱼、牛奶和糖。阿昌庞攫取权力后不久，就告诫加纳人，“国家一直入不敷出”。[③] 然而，政府最终设立了一个中央机构负责购买这些基础商品，并责令其价格降低到贬值前的水平，并为此次购买提供了2 300万塞地的补贴。

为了填补紧缩进口造成的缺口，救国委员会启动了一项自力更生、“自给自足”（OFY）的计划。起初，该计划得到广泛的支持，每一部分都得到救国委员会最热情的首脑之一、时任农业部长的弗兰克·伯纳斯科（Frank Bernasko）上校的鼓励。甚至都市专业人士都一度被吸引到后院种植中来了，而大学生们自愿为中部地区的科门达糖厂收割甘蔗。政府也慷慨贷款，鼓励种植并提供种子、幼苗以及化肥、杀虫

① Kofi N. Awoonor, *Ghana: A Political History from Pre - European to Modern Times* (Accra, Ghana: Sedco Publishing, 1990), 225.

② D. Rimmer, *Staying Poor: Ghana' s Political Economy, 1950 - 1990*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134.

③ "How Can Ghana Recover?" *West Africa*, February 4, 1972.

剂和农业专家的指导。[1] 救国委员会还开始了许多灌溉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灌溉上部地区的多诺（Tono）灌溉工程和阿克拉平原的道痕亚（Dawhenya）工程。[2]

168

“自给自足”无疑是救国委员会最成功的计划。为该成功做出贡献的还有1972—1973年为期两年的充沛的降雨。在此期间，加纳生产了很大一部分所需的粮食。实际上，1973年，加纳甚至可以出口稻米，总体上享有了前无古人的贸易顺差。加纳从1971年5 600万美元的贸易赤字，到1973年取得2.04亿的贸易顺差。“自给自足”后来又补充了向市场输送食品的经营。政府受到“自给自足”成功的鼓励，1975年开始了该项目的第2阶段——自给自足工业——目标是为当地工业或出口生产经济作物。最初生产亦有斩获。然而，对于批评者来说，所有这些收获并非都是救国委员会控制的结果，像国际价格的增长，只是来自布西亚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的农业项目的结果。

更具长远重要性的是强调影响经济作物生产的食品作物生产，特别是一直为国家主要税收来源的可可的生产。种植可可的回报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在减少，产量也因为缺乏维护和树的老龄化而在跌落。布西亚驱逐了许多在可可园工作的外国人，是对该工业的又一次打击，使劳动力价格更加昂贵。相反，劳动力转向种植诸如玉米、木薯、山药等获利更多的食品作物。此种情况很具讽刺意味，在阿昌庞取得权力不久，可可和许多其他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飞涨。到1973年，可可每吨卖到900美元。结果是，政府给可可农的价格增加了25%。这甚至还不足以补偿国家货币官方贬值所造成的损失，此外，实际价值还在受到打击。毫不奇怪，那些靠近加纳边境的邻国可可种植区如多哥和黄金海岸地区，可可走私不断增长。在这些法语国家，用非洲联合会（CFA）法郎支付，是用来购买加纳紧俏商品的硬

① Mike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1972 - 1979* (Accra, Ghana: Tornado Publications, 1980), 13.

② 上部地区于1983年分为上西区和上东区。多诺灌溉工程位于上东区的Navrongo镇附近。

通货。[①]救国委员会严词谴责这种“颠覆罪”并很快通过一项法令将其定为死罪。[②]

但是，开始时救国委员会与加纳人度过了一段蜜月期。政府的多次行动都受到欢迎。救国委员会废除了不得民心的国家发展税，工人的工资提高了30%，工会代表大会再次得到承认，公务员的额外福利也得以恢复，政府许诺取消大学生贷款计划。军队严格规定，军人卷入政府事务的，参照腐败和炫耀程度定罪。他们不再乘坐色彩炫目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 - Benzes）旅行，而是使用较不张扬的军用吉普。他们按时上班，一些热情的军官试图对无精打采的公务员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对他们加强纪律。救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曾一度公开拒绝接受因额外职责补偿给他们的增加的工资，而只是当国家报纸敦促时才接受，理由是“没有哪个军队可以空着肚子取得胜利”。[③]

169

恩克鲁玛之死及其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恩克鲁玛在阿昌庞夺取权力之后不久的1972年4月27日逝世，这也为救国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和解与体现政治家大度的机会。前总统逝世于布加勒斯特之后，其遗体被运回几内亚，塞古·杜尔为他举行了国葬。开始时，塞古·杜尔拒绝将遗体运回加纳，直到加纳给予恩克鲁玛一国之君的荣誉。然而，一直在试探与几内亚关系正常化的救国委员会最终向几内亚总统证明，恩克鲁玛应该没有先决条件地葬于自己的国家。以尼日利亚戈翁将军（General Gowon）为代表的最具权势的其他非洲国家首脑也认为恩克鲁玛的遗体不应该最终葬于几内亚，而应葬于加纳。

塞古·杜尔几乎不必担心这个“真正的非洲之子”在他的祖国得到合适的安葬。对于这位失势的领导人，人们有很强的同情心，其中

---

① 非洲联合会法郎流通于14个前法属殖民地非洲国家。它可直接兑换为法郎。

② *West Africa*, August 4, 1973.

③ “All Eyes on Nkroful,” *West Africa*, May 12, 1972.

夹杂着"失落和有时觉得他死于远离国土之地的罪恶感"。[1] 甚至那些遭受过恩克鲁玛迫害的人也受到了影响。曾被预防性拘留一年的乔·阿皮亚和恩克鲁玛于1961年将其解职而逃亡的克姆拉·格贝德纳都成为救国委员会派往几内亚谈判归还遗体代表团的成员。他的死讯一经公开，救国委员会就派代表团前往恩克鲁玛的出生地恩克罗富尔（Nkroful）向其80多岁的老母尼雅尼巴（Nyaniba）女士表示哀悼，开始准备在这个位于阿克拉以西200公里的偏远小村举行国葬。在加纳的宗教信仰中，恩克鲁玛的遗体不被葬于其出生地是不可思议的。

170

总的来说，死亡激起了布西亚时代刚刚开始就已经出现的对恩克鲁玛饱含同情的重新审视。在几内亚的督促下，救国委员会同意结束反恩克鲁玛运动并同意其身在几内亚的追随者返回家园。然而，塞古·杜尔最初要求的对这位前总统的完全认同将救国委员会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阿昌庞和他的战友们是1966年推翻'加纳之父'的同一个军队的成员，阿昌庞公开承认这次政变是必要的，理由是"恩克鲁玛所犯的错误"。[2] 于此同时，他的政府开始走向对经济的更多国家控制，这正是恩克鲁玛时代的一个标志。该政府也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批评西方世界。阿昌庞将自己的政府描述为革命政府。这似乎是一个没有恩克鲁玛的恩克鲁玛主义，但救国委员会通过告诉加纳人尊重恩克鲁玛和那些将其推翻的人而深陷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挣扎。令人不安的是，起初对恩克鲁玛之死不以为然的《先驱者》（先前的《阿散蒂先驱者》）也开始为恩克鲁玛的大敌J. B. 丹夸争取合适的承认。他还在恩克鲁玛将其预防性拘留时就死去了。

历时两个多月的时间谈判，尽管几内亚强烈反对，恩克鲁玛的遗体最终返回加纳。遗体在阿克拉正式存放10小时，包括阿昌庞上校在内的数千人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是在恩克罗富尔举行的2万多人参加的葬礼。参加葬礼前由塞康第—塔科拉迪罗马天主教主教引领

---

① "All Eyes on Nkroful," *West Africa*, April 28, 1972.

② "Acheampong' s Revolution," *West Africa*, May 19, 1972.

参加教堂仪式的有恩克鲁玛的埃及妻子和恩克鲁玛时代政客中的名人法蒂雅·恩克鲁玛（Fathia Nkrumah）女士。对于《加纳时代》来说，葬礼是一个“成熟理性”的胜利。这本来是“不可想象的……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为实现统一而奋斗的人，在其死后，要在两个非洲国家间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①] 解决这个冲突显然强化了救国委员会的公众形象。许多官方代表团参加了葬礼，在库马西甚至一度出现离奇的谣言说，毛主席将亲自来参加葬礼。[②]

171

围绕恩克鲁玛遗体回国问题与几内亚的谈判也为加纳同西非邻国更和谐的关系奠定了基调。葬礼之后不久，救国委员会对布西亚政府的“外国人遵守条令”进行了重新检查，之后不久又取消了这一法令。救国委员会派代表团到邻近的非洲国家去改善与他们的关系。阿昌庞亲自访问多哥，在那里他发表讲话，呼吁建立西非经济共同体。之后不久，加纳开始出口电力到多哥和贝宁。从 1973 年开始，许多西非国家的首脑前来加纳访问，1973 年与象牙海岸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加纳放弃了与南非的对话政策，1973 年非洲团结解放委员会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s Liberation Committee）在加纳召开了会议。此外，加纳还恢复了 1966 年中断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虽然并没有复兴已经放弃的经济计划的企图，但政府公开承认在苏联和东欧接受过训练的加纳人和在西方接受训练的加纳人在素质上完全一样。

然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非常紧张。阿昌庞是通过推翻民选政府获得权力的。布西亚曾在英国避难，而英国拒绝了救国委员会将他引渡回加纳面对泰勒资产委员会（Taylor Assets）的要求，该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调查进步党部长财产状况的。债务偿还问题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外国公司的国有化加剧了西方对加纳再次走向社会主义的怀疑。1973 年底，阿以冲突之后，加纳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纳对阿拉伯国家石油的依赖，但此举增强了认为加纳

① “Nkrumah Laid to Rest,” *West Africa*, July 21, 1972.

② *Ghanaian Times*, May 12, 1972.

转向了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看法。

对抗升级

尽管救国委员会开始时非常成功，但仍有很多人反对其军事统治。救国委员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拘留 1 000 名进步党官员，直到 1973 年中期，许多前部长被羁押。1972 年 7 月，救国委员会报告说，政府挫败了一系列政变企图。据称，布西亚的支持者试图利用 172 "低级军官个人的不满""颠覆救国委员会"并召回布西亚博士。[①] 政府在这个挑战面前感到不安，并通过了一个颠覆法令，对颠覆政府罪要处以死刑。科乔·鲍乔（Kojo Botsio）和约翰·泰特（John Tettegh）本应因其于 1973 年 8 月政变而被判死刑，但像以前的政变策划者一样，他们的判决注定是终身监禁。[②] 然而，对策划者这样激烈的反应却毫无效果。到 1977 年，已有 6 次政变企图，到政权于 1979 年被推翻时，已有 20 人因颠覆罪沦为死囚。[③] 毫不奇怪，救国委员会审理判决的记录受到了来自大赦国际的严厉批评，认为"基本人权在加纳受到了践踏"。[④]

官员一就任，救国委员会也开始反对国家的报纸。3 个国家报纸的主编都被短暂拘留。为了确保报纸总体上支持革命，救国委员会于 1972 年 5 月颁布了《报纸诽谤法令》，同时阿昌庞改组政府以控制信息与公共关系部。阿昌庞一夺取权力立即通过一个法令确保救国委员会不受任何与推翻布西亚政府相关行动的惩罚。法令防止任何法庭听证反国家案件，国家控制的报纸也不准报道。在报纸上曾被诽谤的布西亚政府成员被禁止寻求法律追索权。

私人报纸所受压制更为严重。在第 2 次政变企图之后，政府通过了《救国委员会出版物约束法令》（National Redemption Council Control

① *Ghanaian Times*, July 28, 1972.
② *Ghanaian Times*, April 22, 1974.
③ Awoonor, *Ghana: A Political Histroy*, 230.
④ "Amnesty and the Detainees," West Africa, November 13, 1972.

of Publications Decree)，禁止了《先驱者》和《回声》的出版。禁止令最终被取消，报纸于1973年恢复出版。然而，《先驱者》更换了主编，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非常像一个救国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①] 1973年3月，当救国委员会开始受到更多的批评时，通过了相当于恩克鲁玛的1963年报纸许可条例的立法，没有得到信息部颁发的许可，出版和发行印刷品都是非法的。受到威胁的报界人士号召建立一个报纸托管机构。但是，对于救国委员会来说，利用大众传媒促进革命远比报纸的自由重要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批评救国委员会的出版物逐个被迫关闭。这就是早在1974年就曾在3个加纳大学校园支持学生抗议政府政策的《莱贡观察家》的命运。之后不久，该双周刊因无法找到愿意为其冒险的印刷商而被迫停刊。

173

到1974年，不断恶化的经济在对救国委员会越来越多的不满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些因素中有些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于1973年戏剧性地提高了石油价格。1972年和1973年的好雨之后紧接着大旱，甚至在加纳的雨林地区也出现了干旱，可可产量剧减。虽然1975年和1979年的世界市场价格几乎涨了3倍，但到1979年其产量已降到250 000吨。然而，毫无疑问，是政府的愚蠢的经济政策使加纳的问题更加严重。到1979年，加纳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保持石油产品价格下降的决定在上升的成本面前加剧了收支差额的迅速恶化。政府对价格上升的反应一般是在批发层面对基本商品给予补贴并开始限价。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囤积和投机以及越来越紧俏的基本商品如糖、面粉、米和罐头食品黑市的欣欣向荣。排长队等候这些产品的少量供应成为那些时代加纳人生活的一个特征。为了满足其开支，政府通过印制钞票予以应对，这又点燃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以致于到197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16.4%。[②] 加纳继阿根

① C.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60-61.

② Y. Petchenkine, *Ghana: In Search of Stability, 1957-199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70.

廷之后享有了世界上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的荣誉。

最初，救国委员会对加纳工人作出了重大让步。其早期的法令中就有一个取消了布西亚政府推行的发展税。政府还启用了5天工作制，改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失业保险体系，以及最受欢迎的——将最低工资从每日1.29塞地提高到2塞地。然而，到了1974年，国家的急剧通货膨胀将这些利益一扫而光，相对平静的劳动者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到此时，罢工行为超出了进步党统治最后一年的情形。[①] 情况可能一直很糟，但却为其他国家准备了大量过剩的训练有素的工人。据报道，14 000名教师在1975到1981年间离开了加纳教育行业。在石油价格飞涨中获利的尼日利亚成为最重要的目的地，它吸引来的不止是教师，还有工人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特别是那些收入固定的公职人员受到了其生活标准急剧下降的影响而成群结队地离开，奔向更绿的牧场。

174 随着经济开始瓦解，腐败也发展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程度，一个新的词汇 kalabule 开始在此时被用来描述“囤积、投机和肆无忌惮的欺骗，由少数人惩罚多数人”。[②] 救国委员会通过将经济中央化而使这样的谩骂像20世纪60年代经历的一样持续恶化不可避免。恶性通货膨胀意味着官方价格和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关系，这就为行贿提供了无尽的机会，而最后救国委员会成员不断增加的受贿为社会其他领域树立了榜样。为喜欢的人，经常是年轻女人，开条子进口稀缺物品是腐败中更为令人愤慨的形式。蓬勃发展的黑市因加纳被高估的塞地而起。大量的可可回款在海外私人账户上终结。可可向多哥和象牙海岸的走私急剧增加，在此期间象牙海岸迅猛发展，超过了加纳，成为世界农作物的龙头出口国。

---

① Y. Petchenkine, *Ghana: In Search of Stability, 1957 – 199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67.

②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17. 该词可能来自豪萨语 Kerekabure，意为“保持安静”。豪萨人通常指加纳北方的尼日利亚人。他们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北部。

最高军事委员会取代救国委员会：为联合政府而斗争

救国委员会最初一直由发动政变的数量广大的中级官员构成。1975 年，军政指挥官们害怕出现的经济危机将使整个军队丧失信誉，强行改变救国委员会的结构，几乎将阿昌庞本人解职。最高军事委员会（SMC）取代了救国委员会，包含了全军的指挥官以及警察总监。为了与整个革命指挥体系的升级保持同步，阿昌庞由上校晋升为将军。这个晋升没有带来任何变化，政府发现自己正在转向外国放债者，寻求高息短期贷款，就像大会人民党最后几年曾经历过的一样。到 1977 年，它“已经债台高筑，与其前任政府没有任何区别”。[①] 军队最高官员无力解决国家的问题，并陷入猖獗的腐败，使低级官员从其指挥官那里异化出去，其严重的后果 4 年之后显露出来。军队进一步失信。那些“退休”官员，即使他们已经卷入腐败，都不可避免地被“恢复了”发给进口许可证的资格以供个人使用。[②]

1976 年，阿昌庞孤注一掷，试图夺回一些立法权；起草一部新的宪法；给予军队在一个国家的政府中永久地位，但要使无党派的平民进入政府。他称这样的政府为“联合政府”，或统一政府（UNIGOV）。他认为，“政党政治”已经“造成分裂、部落化、欺骗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罪恶”，他想要一个“民享、为民的”“每个人必须归属的”政府。[③] 他指出，1954 ~ 1956 年大会人民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痛苦斗争是一个加纳曾经历多么严重的党派分裂的标志。党派的忠诚加剧了部落化，他认为这一直困扰着布西亚政府。阿昌庞感到军队介入国家政府会保证稳定。1977 年，他建立了联合政府特别委员会以了解公众舆论，拟定该体系应如何工作的具体建议。不像“移植过来的外国

---

①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22.

②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31.

③ 英国广播公司于 1977 年 1 月 14 日同步播出的采访。引自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68.

政府体系”，以没有“限制或改动”而被接受，这个新政府形式将“适合加纳的政治需要”。[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进统一政府的努力使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反对派形成。1976 年，加纳律师协会（GBA）在年会上呼吁文官政府在 1978 年前回归。协会要求废除军事法庭并要求其成员不要在这些机构中露面，这给予他们以“合法的外表”。[②] 此外，该协会还要求建立一个为国家起草一部新宪法的委员会。此后不久，工人专业团体协会（ARPB）也呼吁政府辞职。毫不奇怪，大学生也在这抗议声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自从恩克鲁玛垮台以来，加纳的大学生就越来越政治化。加纳大学开始遵行的牛津、剑桥体系——学生控制在自治总部内但在学生和总部导师之间有紧密联系——已与加纳学生民族联盟分道扬镳。政府通过直接对付加纳学生民族联盟而不是大学校方进一步深化这一发展。[③] 开始时，学生支持救国委员会政变，但随着经济开始崩溃，摩擦不可避免会出现。早在 1974 年，学生就开始示威，反对政府，结果导致政府关闭全国所有 3 所大学数周。1977 年，随着与联合政府冲突的强化，学生在阿克拉举行示威，盛怒下的政府再次以关闭大学一个月相回应。之后不久，工人专业团体协会停止了其活动，加纳的社会服务陷入混乱。

最高军事委员会对其批评者反应强烈。利用其对媒体的控制支持联合政府而没给其批评者一点回应的机会。政府日报《加纳时代》的主编在捍卫联合政府思想上特别积极，在其社论中对加纳的专家们进行了一系列攻击。许多组织应运而生以支持联合政府，甚至通过示威支持政府。还有著名的政治家，如乔·阿皮亚和克罗博·艾度斯也给予了重要支持。前者被任命为“国家首脑的部门长官和特别顾问”，

176

---

① 英国广播公司于 1977 年 1 月 14 日同步播出的采访。引自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92.

② 英国广播公司于 1977 年 1 月 14 日同步播出的采访。引自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57.

③ F. Agbodeka,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Accra, Ghana: Woeli Publishing Services, 1998), 224.

被派往国外去为联合政府的构想赢得国际支持。政府对工人专业团体协会罢工的反应是取缔了这个组织，冻结了该组织的财产及其领导者的银行账户。在一次对该组织中影响很大的医生成员的恐吓中，武装士兵冲进了科尔莱布医院并强行将医生及其家属从家中赶出去。①

然而，在如此强烈的反对面前，最高军事委员会也被迫承认应该于1979年7月1日回归宪法统治，但不是回归平民统治。更为重要的在于，政府同意于1978年3月30日举行一次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公民投票。公民投票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次对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信任投票，帮助建立了极端的反政府政党。最大、最突出的是1978年1月成立的自由正义人民运动（PMFJ）。其领导人有全国解放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A. A. 阿弗利法将军、六人团最后一人威廉·奥福里·阿塔（Paa Willie）、第二共和国的国会反对派领导人克姆拉·格贝德纳和加纳大学教授阿杜·波汉。在布西亚统治时期一直任农业部长的夸梅·萨福—阿杜博士和进步党重要成员维克托·奥乌苏组成了预防独裁阵线（Front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ctatorship），而曾因在电视上激励反对联合政府被称作“不先生”的G. W. 阿玛特菲奥（G. W. Amartefio）在建立“第三力量”② 上起了重要作用。

联合政府也有民众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认同先前的大会人民党，受到阿昌庞早期恩克鲁玛倾向的吸引。他们构成了像朋友会与和平团结委员会（Peace and Solidarity Council）这样的组织，它们所起的作用非常像萌芽中的政党。实际上，这些组织中的领袖人物后来建立了人民国家党（PNP），并于1979年赢得大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联合政府运动映衬的是加纳的传统党派联盟，是一个为什么该运动如此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府享有比其反对者大得多的优势条件。它确实帮助自己从可可销售局筹集资金并许诺废除像“取消资格法令”一样的残酷的立法。政府归还了从声名狼藉的大会人民党政客如

①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59.

②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84.

克罗博·艾度斯、A. E. 尹坤萨赫（A. E. Inkumsah）和J. E. 黑根（J. E. Hagan）手中夺取的财产以换取支持。另一方面，无论是反对联合政府的，还是漠不关心的军界人士都退休了。反对联合政府的或不可信任的文官也都退休了。这是反对联合政府的国家首席大法官塞缪尔·阿祖·克拉布和曾质疑政府资助其运动的可行方式的加纳银行行长安蒙·恩科伊（Amon Nkoi）博士的命运。

也出现了许多对联合政府反对者的人身威胁，他们几乎无法指望可以提出政治抗议。然而，尽管政府享有着一切便利，很明显，随着3月30日的临近，联合政府运动正在衰落。联合政府特别委员会连军队如何加入联合政府三方构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军人在是否应该从军队退役还是可以留在军队现职的问题上非常混乱。在越来越混乱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所有军人返回兵营的紧迫感。阿昌庞归咎于加纳人是一个“有问题的民族”的惯用手法也没能帮他让那些怀疑其政府有能力将国家引向富有的人相信他。

意识到他可能正走向失败，阿昌庞介入全民投票日，要求所有投票箱都运往中心地区点票，而不是在每个投票点清点。选举专员I. K. 阿峄（I. K. Abban）法官试图挑战这一指示，因为他知道这将可能篡改表决结果。结果他被解职，不得不到处隐藏。最初的结果显示联合政府失败，但第二天新选举委员宣布联合政府赢得55.6%的选票。预料到其对手要反扑，阿昌庞很快取缔了他们的组织并警告说“慈悲的日子已经过去”。[①] 最高军事委员会几乎立即逮捕了联合政府的重要反对者如克姆拉·格贝德纳、维克托·奥乌苏和威廉·奥福里·阿塔以及许多大学讲师和学生。到1978年6月，这些反对派人士不是在监狱里就是躲藏起来了。

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取代第一任最高军事委员会

此时，加纳已陷入可怕的燃料危机，如果最高军事委员会不被取

①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108.

代，暴乱似乎便不可避免。7 月 5 日，一小群官员将阿昌庞与其保镖分开，迫使他签字辞职。这次政变背后的动力是中层军官，但他们转向弗雷德·阿库福（Fred Akuffo）中将，后者曾是国防总长，阿昌庞之下位列第二的将军，也是一名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阿昌庞被控“一人独裁”，拒绝接受“最高军事指挥部成员的建议”。①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些资深成员也退休离职，一些文官进入新政府。这是其前任政府的一个改革了的版本，第二任人员成为最高军事委员会。那些因反对联合政府而被捕的人得以释放，支持阿昌庞的组织遭到解散，但没有起诉那些对腐败应负责任者或管理不善者。阿昌庞本人被剥夺了军衔，被短期逮捕，但最终允许他返回家乡阿散蒂地区。阿库福宣布他打算保留 1989 年还政于民的联合政府宪法。这充分显示了新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178

新政府的确通过执行比其社会主义前任更保守的政策努力控制经济。首先做的是将几乎一文不值的塞地贬值。它可以浮动，到 1979 年初已经贬值 58%。此外，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改变国家的货币，用新纸币取代已被人们称作“阿昌庞塞地”的货币。货币在银行柜台上以 1∶1 进行兑换，但在货币流通中会有一点点的变动。政府尝试遏制猖獗的通货膨胀，但在腐败无孔不入的情况下，操纵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且似乎有意对拥有银行账户的富人有利，而付出代价的则是没有银行账户的穷人。一般说来，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似乎无法在加纳人的生活中灌输进阿库福声称为最重要目标的原则。其实相反，有许多高层丑闻处理得虎头蛇尾，这表明政府的高级成员至少像其前任一样无能并也有不可见人的东西隐藏。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新政府似乎像是“有不同驾驶员的同一辆车”。②

反对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声音越来越高。激进者反对贬值和政府的经营企业地位的提升。阿库福不受欢迎的卫生计划和 1978 年出

---

①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113.

② Oquaye, *Politics in Ghana*, 132.

台的紧缩措施引发了一轮罢工浪潮。最具破坏性的一次是国有电力公179 司工人的罢工。作为回应，阿库福于11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向工人开了枪。甚至国家新闻都在批评，《加纳时代》描述紧急状态下举行的不受支持的地方选举是“富人的选举”。[①] 到该年年底，局势明显，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阿库福被迫解除对政治派别的禁令。作为加纳的政治生活受压抑的标志，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29个政党建立起来。只有16个政党想要注册，到1979年4月竞选真正开始的时候，只剩下6个政党。两个最为重要的党是将自己打扮成恩克鲁玛主义继承者的人民国家党和将自己认同于统一党和布西亚的进步党的人民阵线党（PFP）。然而，他们阵线的不清表明两党都多么想将一切献给全体人民。

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

5月15日，大约在大选开始之前1个月左右，又出现一次政变企图。其领导人是一位年轻的空军中尉杰里·约翰·罗林斯，他与陆军和空军的基层军官政变同伙试图夺取阿克拉的军事总部。罗林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追查高级军官滥用国家财产的无能不满。开始时，他的主要兴趣似乎是要“推动与高级军官的对话”。[②] 但政变失败后，罗林斯被审判，很快成为军队官兵的英雄。最后，6月4日，他被释放出狱，罗林斯从支持他的广播电台呼吁革命委员会取代最高军事委员会。因为军队方面仍然忠实于最高军事委员会，将会发生什么曾一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他们和释放罗林斯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最后，反对派领导人陆军少将奥达尔提·韦林顿（Odartey Wellington）在冲突中被杀，反对派解体。

政变策划者很快建立起代表基层的，由中级和低级军官组成的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AFRC）。罗林斯被推举为主席。与此同时，加纳

---

①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40.

② *Ghanaian Times*, October 14, 1978.

还存在着爆炸性局势。军人洗劫商店，重新分配财富。牺牲最大的是黎巴嫩商人。囤积商品被罚没并以限价公开出售，被认定囤积居奇和价格欺诈的女店主被剥光衣服、殴打，甚至枪杀。在对被看成是加纳市场根深蒂固的 kalabule① 的愤怒反应中，士兵们捣毁了阿克拉的马科拉（Makola）市场。他们逮捕了高级官员并羞辱他们。阿昌庞政府利用因腐败而千疮百孔的可可销售局为联合政府筹钱，销售局因此被立即取消。社会氛围以复仇为主题，大学生的示威游行打着呼吁“向国家的祸害开火”和“流血”② 的标语加剧着这个歇斯底里。最后，阿昌庞被带到阿克拉，在国家电视台面对其错误。他执迷不悟得有些不管不顾，结果在 6 月 6 日，他和他的前边防军司令乌图卡（Utuka）将军一起当众被行刑队执行死刑。

180

尽管经历了流血，但安排在 6 月 22 日的总统选举还是平静而公正地举行了。人民国家党以微弱多数战胜人民阵线党赢得选举，其候选人希拉·利曼博士不得不面对与人民阵线党候选人维克托·奥乌苏的最后竞争。人民国家党的胜利是恩克鲁玛传统力量仍然存在的一个标志。该党的组织从布西亚的进步党得到启发，比人民阵线党的组织保存得要好。恩克鲁玛主义者可以指出大会人民党的成就并许诺将加纳恢复到在早期非洲事务中显赫的地位。比较起来，布西亚在位 3 年似乎没什么创新。在大选期间，公众的兴趣偏离了对“人民正义”的渴望，但大选一结束很快便走向新一轮的处决。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问题的组成部分”，需要他们“协助我们拯救和恢复国家完整”的罗林斯无法控制这一情绪。③ 甚至曾一度出现谣言说，如果他尝试制止流血的话就将会下台。只有《每日写真报》的主编伊莉莎白·奥海内公开反对这种情绪。大学生闯入她的办公室，在墙上刷写让她去死的标语。幸好她不在办公室。

最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 6 位前成员很快在特别秘密法庭上被判

① 西非词汇，意为国家控制产品的非法买卖。—译者注

②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52.

③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48.

决，罗林斯被迫签署死刑令。他试图延缓执行，但最终军队接管了这些事务。1979 年 7 月 26 日，6 人在大批集结在行刑地点道路两旁的人群的热情欢呼声中被枪决。6 人中包括两位前国家首脑，A. A. 阿弗利法将军（1969）和弗雷德·阿库福将军（1978—1979 年在职），还有空军副元帅 G. Y. 伯克耶、海军少将乔伊·阿梅杜姆（Joy Amedume）、前国防参谋长 E. E. A. 科泰（E. E. A. Kotei）将军和外事委员罗杰·费利（Roger Felli）上校。

181 奥海内非常恼火，号召教会和各大团体谴责杀人和在交易市场上发生的任意鞭笞。他们做事还算谨慎，但随着罗林斯宣布不再杀人，加纳历史上最混乱的日子结束了。他们有一个新的对手要打击。同样经历了从军事政府向文官政府转变的尼日利亚对加纳随意处决人的行动反应强烈，切断了出口加纳的石油。加纳 80% 的石油来自尼日利亚，其经济遂陷于停顿。可此举非但没有破坏到对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描述的“打扫房间行动”的支持，反倒出现了全民支持革命的大规模的爆发。人民走着去上班，大学生打着“尼日利亚囤积你的石油——我们就打扫我们的房间”的标语示威游行，更多的秘密审判仍在继续。[1] 然而，这次没有处决，只有大量高达 150 年的入狱判决。

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张贴公布这些判决。对于被称作过渡性条文的新宪法增加了一些特别条款，保护政变者并维护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官方既定方针。实际上，罗林斯非常自信，他的“打扫房间行动”将持续到将政府交给最后赢得总统大选的希拉·利曼博士。总的说来，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对于其 3 个半月的执政非常骄傲。食物短缺，但其严刑峻法使价格大幅度下降，缓解了通货膨胀。支付给可可农的价格增加了 50%。在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罗林斯撤销了一直由一小部分人用来非法大量获利的可可销售局。

---

① B. Okeke, 4 *June*: *A Revolution Betrayed* (Enugu, Nigeria: Ikenga Publishers, 1982), 57.

另外，给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倍受欢迎加分的是收取了大量未交税款。最令人难忘的是，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唤醒了加纳人民的热情。罗林斯本人就广受欢迎。他显然打算站在一旁观看新文官政府如何行动。在选举中，投票人数稀少，只有36%的注册选民投票，说明加纳人大多对人民国家党驾驭国家大船驶入平静水域的能力不太乐观。

第十章　第三共和国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

第三共和国

185　1979年9月24日，希拉·利曼博士就任加纳第三共和国总统。他面对一个艰巨的任务：加纳的经济仍然步履维艰：生产一直下降，直到国家工业仅有10%到15%在运转的地步。1979年，可可出口降到了独立以来最低的189 000吨。木材出口登记情况同样下跌，下跌的还有黄金、钻石和加纳的其他出口矿产。1971—1982年间国民经济总产值下降了12%，而人口却增长了30%还多。[①] 1979年早些时候连续10年持续上升的可可价格开始跌落，这正与世界油价大幅上涨同步，使得加纳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石油产品非常困难。加上运输的问题，即加纳公路系统每况愈下到了将其产品运送到市场上去都非常困难的程度。缺乏道路运输的备用线路意味着高达70%的此前送往国内市场的货物不得不整柜提货。[②] 加纳的铁路系统也越来越糟。比如，对于将

① D. Rimmer, *Staying Poor: Ghana's Political Economy 1950 - 1990*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143.

② J. D. Striker, *Trade, Exchange Rate, and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ies in Ghana*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0), 112.

可可运送至塔科拉迪至关重要的西部地区的铁路线已停止运营。

显然，严厉的经济政策呼之欲出。最重要的是，需要用塞地贬值 186 来抵御一旦取消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实行的严厉措施就会导致的急速飙升的通货膨胀。然而，利曼当局不太敢这么做，因为同样的情况曾致使布西亚政府垮台。人民国家党政府却因无力出台政策而显得突出。仅部长的任命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政府似乎一直在等待外国投资者来援助加纳。同时，人民国家党用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收取的税款来支付满足大选的进口花费。为了让工人满意，最低工资从 4 塞地提高到 10 塞地，最终，于 1980 年末提高到 12 塞地。1981 年，通货膨胀率猛增到 70%，购买一块面包就需要 12 塞地。国营工厂试图通过支付工人实物以平息他们的不满，期望他们以高出控制线的价格将这些物品卖出去。毫不奇怪，这样做还是引发了愤愤不平的罢工，政府非常粗暴地处理这些罢工事件。直到 1981 年末，支付给可可农的价格也只有原来的 3 倍，但此时的真实价格却不到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掌权时的 1979 年翻番后的一半。

应付增加开支的压力导致了庞大的预算赤字，而这又引起更大的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到 1981 年底，通货膨胀已达 100%。1980 年的税收不抵公共支出的一半。1981 年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国会否决了政府的预算草案，反对派利用这种情况宣布举行不信任投票。对于加纳人民来说，这次经济混乱意味着阿昌庞统治期间开始的平行经济仍然没有改变。官方经济中的价格与市场毫不牵涉。在官方经济中购买而在平行经济中出售显然有利，塞地在平行经济中只值官方经济的 1/8。例如，一位农民在加纳以官方汇率购买一袋化肥，然后就可以将其走私到境外以极高的利润卖掉。他之后可以在加纳将空袋子以高出他开始时购买整袋化肥的价格卖掉。[1] 无法利用这些机会的人则退回到自己的农业中去进一步减少政府的税收基数。Kalabule 带着复仇的

---

[1] Naomi Chazan, *An Anatomy of Ghanaian Politics: Managing Political Recession 1969 - 1982*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197.

心态回来了，至少其情况像阿昌庞（Acheampong）统治时期一样糟糕。丑闻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政府成员及其支持者。最具破坏性的一起事件涉及到人民国家党领导层，有人被指控从一家获得印制加纳货币这一大订单的英国公司接受了2 700万英镑“好处费”。①

187

利曼无力阻止这个持续滑坡成为政治深渊的部分原因在于，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本质。该宪法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却有一个很强总统的宪法为蓝本。不幸的是，利曼几乎没有可能实现这一期望。他是北方人，又是个政治上的新手，这是他的有利条件，因为他没有像许多人民国家党领导人那样被政治丑闻所玷污。然而，这也说明他并没有自己的根基，要依靠那些助其选举的人。他们期望得到回报，这意味着总是有巨大的幕后阴谋。

种族的紧张关系也在埃维人间存在着，他们将自己看做游离于政府之外的人，认为政府是由像利曼这样的北方人统治的。另一方面，阿肯人也离政府甚远，等待机会挑战政府。② 1981年，丑闻和争斗导致该党领导人开始清除异己。利曼已无力恢复秩序。已与人民国家党建立起联合阵线的全国联合大会（UNC）脱离前者，加入到当时选票已与政府一样多（71：69）的反对党阵营（PFP）。事实上，人民国家党被分裂成想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左翼和更实用主义的右派。到1981年末，反对党也出现混乱。他们没能给出比人民国家党更吸引人的政策选择。③ 大选迫在眉睫，下院议员不是履行职责，而是对为谋得一官半职铺平道路更感兴趣。

掩盖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随着第三共和国的诞生，新闻比独立以来更加自由了。少数党派比以前拥有更多报道来发表他们的意见，利用新闻指责政府无能。政府则试图通过任命更为支持政府的主编给加纳第一大日报《每日写真报》来控制局面。宪法规定成立

① Y. Petchenkine, *Ghana: In Search of Stability, 1957 - 199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115.

② Chazan, *Anatomy of Ghanaian Politics*, 316.

③ Chazan, *Anatomy of Ghanaian Politics*, 319.

新闻委员会来管理国有大众传媒，并保障其独立，这些任命很快引起争议。新闻委员会试图通过建立国有媒体董事会平息被称作“写真报喧嚣”的混乱。然而在1981年，《每日写真报》的新董事会却要求对社论的更多控制权，这又引起另一个冲突。这些冲突的根基是从1979年的政治运动开始就存在于报纸社论部的宗派主义。当一些成员支持人民国家党的时候，另一些人就支持人民阵线党。新闻委员会从未解决过困扰该报纸的争端，有些争端甚至最后诉诸阿克拉高等法院。[1]

188

如何处理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遗产的问题，比所有这些巨大挑战都更为严峻和更有争议。首先是处理仍十分受欢迎的空军中尉杰里·罗林斯。为了防止出现再一次政变，利曼政府试图阻止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同军队的直接接触。与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有关系的许多官员不是被劝说从军队中退下来，就是被派往很远的国外去。罗林斯拒绝这些诱惑。最后，政府强迫他从军队退役，理由是他“继续作为一名现役军官呆在军队中与其以前的身份不匹配”。[2] 同时，政府解除了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关键职位：首席国防参谋长约瑟夫·努努·门萨准将；陆军司令阿诺德·奎努（Quainoo）准将和警察总长C. O. 兰普蒂（C. O. Lamptey）。[3] 政府还精心策划了一个使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受到怀疑的事件。据称，他们收缴的税收没有交给人民国家党政府。政府军事情报部门发布报告和谣言说，罗林斯和他的同伙正在策划政变的阴谋。甚至在他退役之后，他们继续监视着他，防止高层的朋友拜访他。曾向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提出左翼建议的科乔·齐卡塔（Kojo Tsikata）上尉也受到监视，军事情报部门一度意欲除之而后快。[4]

---

① C.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87.

② 这是一则广播报道。引自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68.

③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68.

④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69.

对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法庭宣判的案件也有攻击。利曼意识到了这是在玩火，但他无法阻止法律界的朋友检查大选前过渡性条款的合法性。尽管 1981 年 6 月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过渡性条款使加纳法院无权检查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判决，到该年年底，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多数罪犯被高级法院法官以技术理由释放了。对于许多人，特别是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支持者来说，这似乎像一个破坏 6 月 4 日革命的精心之作。[①]结果是左翼组织开始联合并构成对议会政党越来越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 6 月 4 日运动（JFM）和新民主运动 189（NDM）。最初由左翼学生和学者建立起来的这些组织用马克思主义解说加纳的形势。[②] 他们要坚持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并继续进行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打扫房间行动”。

罗林斯对利曼政府非常失望。1980 年，他接受了 6 月 4 日运动主席的职位。他是一个大众革命领导人的理想人选，还带来了可以成为未来攫取国家权力中充当马前卒的军队激进成员。6 月 4 日运动主席给了罗林斯一个借以攻击利曼政府及其缺陷的平台。其成员将会成为执行新的革命政府规划的骨干。随着军事情报人员继续不断骚扰军界人员，国家经济情况更加恶化，这些高度政治化的军人实际上在制定人民国家党政府最害怕的方案，即再次军事政变。

复临：1981 年 12 月 31 日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

1981 年底，随着人民国家党的继续自我毁灭，有传言称军中左翼和右翼均在策划推翻现政府。12 月 23 日，塔科拉迪军队发动了一次未遂政变，但像 1979 年事件一样，参与政变的年轻军官在审判中鼓动军中其他人员行动起来。之后不久，当加纳人都在庆贺新年节日的时候，罗林斯和他的军队追随者再次出击。这次不只是一次兵变了，政

---

① 6 月 4 日革命得名于罗林斯被军中的普通士兵从狱中释放的日期——1979 年 6 月 4 日。

②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76.

变军方很快结束行动。政客们大吃一惊。当军队政变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都在过新年，短短几天，利曼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就都束手就擒了。然而，罗林斯不想很快就审判并处决人民国家党的领导人，尽管他将他们说成是“一伙罪犯”。[①]他意识到，这样的反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举动已经破坏了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声誉。这足以宣布终止第三共和国宪法并解散议会，禁止所有政治党派。

与此同时，罗林斯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告诉大家，他正在寻找的“不外乎是一次革命”，同时又是一次反腐败的“圣战”。[②]他许诺将继续人民国家党未能践行的“打扫房间行动”，作为一个与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联系的明确暗示，他恢复了努努·门萨准将作为首席国防参谋长的职务，恢复了阿诺德·奎努陆军司令的职务。新政府被称作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罗林斯成为整个组织的主席。其他 6 名委员是努努·门萨和奎努以及两位年轻的军官，一名劳工领导人，6 月 4 日运动的书记和一位热心服务穷人的天主教牧师。按照规定，可以将委员会委员人数最多扩大到 11 位。另外还会有一个国防委员会为新政府提出建议，1979 年大选中负责登记选票的选举委员会变成了国家民主委员会（NCD）。其职责将是确保中央政府解决人民的需求。 190

除了将文官纳入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之外，罗林斯还寻求通过创立包含“决策制定程序中人民积极参与”[③]的新机构将此次政变与之前的区别开来。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建立起工人防卫委员会（WDCs）来监督工厂和工作场所的活动。人民防卫委员会（PDCs）在都市和乡村公社中起着同样的作用，保护当地利益并于需要的时候组织社区工会。国家临时调节委员会（INCC）的任务是协调他们的活动。国家调查委员会（NIC）代表企业和个人调查腐败，而公民数据

---

①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80.

② 1981 年 12 月 31 日广播。引自前引书，第 80 页。

③ Kevin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82.

审核委员会（CVC）所做的事情基本相同，旁听公共活动，却像司法机构一样可以采取惩罚行动。罗林斯也承诺建立可以代表“合理收集证据的”但不是“被过去伪证遍及法庭、罪犯可以逃避惩罚的技术规则束缚的”人民陪审员制度。[①] 这些革命正义的工具将成为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人民革命法庭（People's Revolutionary Courts）的对应机构。然而，它们要更具组织性并同正常的刑事法庭一起存在。正如罗林斯所说，“两种体系判决的正确与否要留待人民来决定”。[②]

谋杀法官

最初，此次革命得益于有限的热情，但当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让人民参与政策制定程序的决心变得更加清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1月8日，在阿克拉出现了群众示威。他们高举标语，声称“JJ”是191 “我们的摩西”，拥抱“圣战”。[③]在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示威。学生自愿帮助将收获可可的果实封锁在特玛港口的农业地区，防卫委员会的诞生速度之快使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不得不建立起地区协作委员会来确保行动一致。然而，新政有意排斥中产阶级，将他们定义为市民以与人民区分开来。中产阶级很快被看做是革命的敌人，因为他们表现出对推翻一个合法的文官政府的不快。毫不奇怪，他们成了防卫委员会、武装部队成员和警察的靶子。记者们过于害怕而不去报道这些残暴行为，而已被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接管的媒体则要淡化革命的阴暗面。根据工人专业团体协会的说法，1981年12月31日到1982年，有180人未经审判就被杀害。

这些极端行为中最令人发指的是，1982年6月30日晚，3名最高法院法官F. P. 萨科棣（F. P. Sarkodee）、K. A. 阿吉埃庞（K. A. Agyepong）、塞西莉亚·柯蓝腾·阿都（Cecilia Koranteng Addow）和1

---

① *Daily Graphic*, January 7, 1982.

② *Daily Graphic*, January 7, 1982.

③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85. 罗林斯的全名是Jerry John Rawlings. 他作为“JJ”和“小耶稣”一向为公众所熟知。

名退役陆军少校，加纳工业控股公司（GIHOC）主管人萨姆·阿夸赫（Sam Acquah）的惨遭绑架和被残忍谋杀。他们从家里被抓走，带到离阿克拉不远的军事射击场射杀，尸体被部分焚烧以掩盖这一罪行。当他们的尸体在几天后被发现的时候，颤抖的罗林斯主席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谴责“革命的敌人”犯下的“这些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罪行”。[①]然而，立即出现传言，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卷入了谋杀，因为这些法官曾负责推翻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设立的人民革命法庭转交来的裁决。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牧师成员文森特·杜马（Vincent Dumah）神父呼吁全面调查已经发生的法外处决案件。之后不久，他就从委员会辞职了。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处于守势，而罗林斯被迫公开宣布他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无辜。

尸体被发现后建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SIB）很快发现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实际上卷入这些谋杀的证据。案件牵连的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乔基姆·阿玛蒂·奎（Joachim Amartey Kwei）和阿洛尔加·阿卡塔－珀尔（Alolga Akata－Pore）警长。阿玛蒂·奎是加纳工业控股公司的前工会秘书长，因对萨姆·阿夸赫少校于1981年在阿克拉举行示威的处理方式而心怀极度不满。据推测，这是后者为什么同另外3名法官被纳入名单的原因，他们被看作是“革命的敌人”。根据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阿玛蒂·奎是“卷入阴谋车轮的轴心”。[②]委员会还建议，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特别安全顾问科乔·齐卡塔上尉因据称是“阴谋设计者”而应被起诉。最后，只有阿玛蒂·奎和4位开枪者，全是士兵或退伍老兵，于1983年被送上阿克拉公共法庭，被控犯有谋杀罪。他们最终被判有罪，于8月15日被判处死刑。之后不久，5人中的其他3人也被行刑队处决。[③]

然而，审判留下了太多未能解答的问题，无法平息关于齐卡塔及其他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卷入此事的谣言。特别调查委员会主

---

①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91.

② “SIB Murder Investigations,” *West Africa*, June 13, 1983.

③ 另外两人S. K. Amedeka和H. E. Tekpor于1983年6月19日的未遂政变期间越狱。

席塞缪尔·阿祖·克拉布法官将其描述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继续着它的回响。[①]审判之后不久，国防参谋总长约瑟夫·努努·门萨辞职，声明“他拒绝罗林斯的领导目标和方法”。[②] 面对批评，尽管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可谓全面，似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更关心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弄清罪行的真相。在法官和退役军官周年纪念仪式上，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在这谋杀中的角色被重新提及，这个案子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时代的其他审判，公开法庭的快速审判似乎并不那么盲目。首先，怀疑继续集中在齐卡塔在该事件中的角色上。1992 年，齐卡塔对英国日报《独立报》（Independent）出版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称，他“操纵”了绑架和系列谋杀提起诽谤诉讼遭到失败一事标志着此问题继续引发的争论是多么激烈。[③]

该案件更直接地表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是多么需要控制已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军队和警察。为了这个目的，建立了一个军事法庭以审理威胁到平民的军人和警察。还出现了完全重新编制的军队以恢复 1979 年反对军官的兵变以来被严重破坏的纪律。许多密谋在其未完成的时候就被发现，两次分别发生在 1982 年 11 月 23 日和 1983 年 6 月 19 日的大的政变企图表明军队是多么的不羁。头脑保守的和激进的官兵都卷入了这些政变。种族的紧张也在此次由罗林斯所属的种族集团埃维人对政府的过度控制引发的不满中推波助澜。在第一次政变尝试之后，议会的两名最初成员阿卡塔·珀尔和克里斯·阿迪木（Chris Atim）中士被解除职务，因为有证据怀疑他们知道政变计划却没有通知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④] 这之后，不同意见非常强烈，议会被多次改组。

193

---

① “SIB Murder Investigations,” *West Africa*, June 13, 1983.

② Petchenkine, *Ghana: In Search of Stability*, 127.

③ 1992 年 6 月 18 日《独立报》。齐卡塔最终胜诉。《独立报》于 9 月 29 日就对他造成的伤害公开致歉。

④ 珀尔被捕，而阿迪木则设法逃往伦敦。

第一个经济复苏计划

对付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危机使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内部的分歧恶化。起初有呼吁“从已经存在的新殖民地关系中和已经存在的外国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垄断中彻底脱离”的声音。[①] 这似乎表明国家政体在倒向亲社会主义者，作为这一倾向的标志，1982 年早期，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派遣两个寻求援助的代表团前往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前往利比亚，另一个前往古巴、东欧和苏联。利比亚可以减价提供大量石油，但一般说来加纳并不接受它需要的那种财政援助。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如努努·门萨准将确信，加纳应该“与每个人交朋友而不论其意识形态或政治信仰”。[②]

社会主义阵营无力提供实质性援助，罗林斯和他的财政秘书及经济规划者奎西·博奇韦（Kwesi Botchwey）博士只得转向务实立场。他们意识到要想得到较大的援助，加纳就得转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慷慨解囊者，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是来自苏联的建议。然而，这是一个对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中社会主义中坚力量的诅咒性决定，他们“认为即使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谈判都标志着对革命的背叛。”[③] 对于 6 月 4 日运动中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罗林斯成为了革命的敌人，用暴力驱除他是 1982 年和 1983 年许多阴谋和政变企图的动力。博奇韦之转向“使徒和传播者”以向西方寻求财政援助，使那些在他早年于加纳大学做经济学讲师时认识的人也感到震惊。在那个时代，他已宣称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无论政府是左是右的‘与生俱来的批评家’……一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极端憎恶者”。[④]

---

① Rimmer, *Staying Poor*, 180.

② *West Africa*, January 25, 1982.

③ Donald Ray, *Gha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6), 37.

④ “Botchwey's Volte-Face,” *West Africa*, September 4-10, 1995.

任何国际基金组织的介入，都意味着为刺激出口必须贬值加纳被高估的货币。在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1982年12月宣布的经济复苏计划（ERP）中，贬值这个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问题被伪装成一个支付给出口产品的补贴，就像木材、可可、咖啡、矿物和制造业产品一样。重要进口产品除了石油都要收取附加费。经济复苏计划关注的中心是刺激出口，削减政府给进口的补贴，减小赤字，更有效地收取税收。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不是坐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条件，而是起草了一个紧跟标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这是一个根据加纳现实调整了的金融改革计划。[1] 对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领导人来说，这是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绝望中的加纳提供贷款的唯一方法。

1983年10月，加纳最终承受了一次彻头彻尾的贬值，对美元塞地的兑换率从2.75塞地降到30塞地。1983年，农业生产的价格也得以增长，继续向上攀升。到1989年，支付给可可的价格增加到1982年的14倍。这使可可农更愿意改种更为高产的杂交可可。结果是加纳的可可产量大大增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83—1984年空前的160 000吨的低产猛升到80年代末期的300 000吨。加纳可可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直接向可可农进行支付的体系，废除了过去导致走私泛滥的用白条代替现金付款的操作体系。当地食品的价格也以牺牲都市人口为代价以利农民。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还制定了鼓励可能赚到外国货币的外国投资的投资法规。在1984—1986年之间，可用新资本的70%流向私营部门，帮助复苏之用。[2] 政府还付出巨大努力收税，同时使税收更为合理并小幅递减。

这些变化足以打动西方投资者向加纳投资。1982年收入不到1 500万美元的木材工业至1990年达到了1.3亿美元的收入。黄金工业也随着投资而复兴，到1990年，其产量已经比低迷的1983年的28.3万盎司翻了一番。在芒果、西瓜和熏鱼等非传统产品出口方面也有进步，

---

① Ray, *Gha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130.

② Ray, *Gha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131.

1990 年为国家赚取美元超过 6 万。这些变化给西方国家以很深的印象，在 1984 年他们的年援助承诺是 4 亿美元，到 1989 年几乎达到 10 亿美元。[①] 加纳有能力向这些国家保证他们会“忠实地”对待其债权国，这些国家中的许多成员免除了大笔加纳欠它们的债务。[②] 通货膨胀从 1983 年的 120% 降低到 1985 年的 10.4%。[③]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 1983 年微不足道的 0.7% 上升至 1984 年的 5.5%，之后的 10 年每年都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到 1985 年，加纳已成为其他非洲国家所追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克服经济衰退的典范。

这个转机是一大成就，因为已经开始面对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无法控制的重大挑战。1983 年 1 月，尼日利亚政府为回应国家经济的衰退决定驱除所有未登记的外国人，称他们从尼日利亚人手中抢走了饭碗。100 多万在民日利亚石油业迅速成长的年代到来的加纳人受到了影响。在尼日利亚政府规定遣返的最后两周期限期间，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和私营组织成功地让这些遣返者返回加纳。大多数人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在一种惊人的社区精神之下，几个月内大多数人被重新纳入加纳的生活中来。这次吸纳比 1983 年流行的干旱造成的困难更大。1983 年那次森林大火甚至肆虐到加纳热带雨林地区，毁坏了可可农田，而通常雨林里是不会发生森林火灾的。加纳的主要电力资源沃尔特大坝水位过低使得 1983 年中期阿科松博发电站的 5 个机组只有 1 个机组运转。1983 年 6 月不得不停止沃尔特（Valco）铝炼厂的发电，输送给多哥和贝宁的电力出口减少了 60%，国家税收损失巨大。

因此，开始企业资源计划之后造成的价格剧涨本不该在加纳人更困难的时期到来。随着政府补贴的取消，对大多数进口征收了附加费，甚至基本物资的价格都增长了 100%—300%。在 1983 年 4 月新预算开

---

① Rimmer, *Staying Poor*, 190.

② Kwame Boafo - Arthur, “Ghana’ s External Relations since December 31, 1981,” in *Ghana Uner PNDC Rule*, ed. E. Gyimah - Boadi (Chippenham, England: Anthony Rowe, 1993), 150.

③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116.

始之后，发生了许多反政府示威。因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重组大学董事会，已经拿起武器的大学生在库马西和阿克拉走上街头抗议预算。作为回应，政府最终关闭了加纳的3座大学。为镇压持不同意见学生在最重要的莱贡中心校区的抗议，政府派遣一组“革命干部”到该校区“上课”。[①] 关闭大学持续到1984年3月，在以后的10年间还有3次类似的行为或停课。

196

预算将最低工资从12塞地提高到21塞地，这有助于让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通过建立工人防卫委员会来使工会代表大会这个加纳主要工会抗议者的声音消退，工会代表大会已被削弱了。比学生或工人抗议者更为严重的是6月19日的政变企图。8名来自1982年11月23日未遂政变的军人从多哥渗入，从监狱里救出那些因企图政变而受审的犯人。很快，叛乱者占领了阿克拉的加纳广播公司总部，宣称他们是“受苦民众支持的革命战士”。[②] 然而，忠实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士兵很快又控制了这座建筑物，政变失败。

为了赢得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财政经济计划部长奎西·博奇韦威博士把经济复苏计划比作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③] 那个时候，苏联求助于资产阶级以重建经济，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内战而遭破坏。这样做能否赢得温和的，更喜欢务实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是有争议的，但仍有大量来自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称之为“小儿超级革命者”的反对派要从“从来没有给革命贷款”[④] 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但是，作为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背离激进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的标志，像国家垄断进口贸易、人民商店以控制价分配商品和对银行业务的更多政府控制等较早的政策被悄悄地丢弃了。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中的成员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第一代成员中有4人为

① Francis Agbodeka,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Half a Century of Higher Education 1948 - 1998* (Accra: Woeli Publishing Services, 1998), 230.

② "How the PNDC Won June 19," *West Africa*, June 27, 1983.

③ Ray, *Gha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63.

④ *Worders' Banner* (The JFM' s paper), September 16 - 23, 1982.

军人。到1983年，只有罗林斯和约瑟夫·阿德杰·布阿迪（Joseph Adjei Buadi）准将有军人背景。重要的是后来者中有一人是国营渔业公司的一位女经理，一位工会官员，还有一位是上西部地区的酋长。作为一个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寻求更多社会参与的标志，1984年，D. F. 安南（D. F. Annan）法官作为一位退休法官也被安排进了委员会。

第二个经济复苏计划

1985年，罗林斯认定加纳经济不仅需要稳定，还需要一项重大的重组。1986年，第二个经济复苏计划正式推出。重组加纳银行体系的工作开始了。1986年，塞地的价值由每周的行情决定，汇率很快从90塞地兑换1美元变为150塞地兑换1美元。两年后，政府允许建立由加纳银行颁发许可的外汇局，个人可以以市场汇率兑换。塞地成为可兑换货币，这导致了许多过去一直在破坏经济稳定中起重要作用的黑市活动的终结。几乎所有的价格控制都取消了。随着计税基数的提高，降低免税的门槛以及减少企业税和销售税成为可能。政府也表明了其脱离许多资源耗尽的国有企业的意图。32个农业、渔业、手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受到该决定的影响。毫无疑问，第二个经济复苏计划最有争议的地方是国内服务业和公共部门中的裁员。国内服务业将每年失去12 000名工人，而公共部门约失去40 000—50 000名工人，可可局（Cocobod）失去20 000名雇员。[①]

还有一个改造国家基础设施的重大尝试。工作从两个港口的现代化开始，即特玛和塔科拉迪。有大量投资用来修补道路和改善其他方面的条件。新灌溉计划开始实施，有具体计划将饮用水和电力供应扩展到每一个地区首府。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还开始了国家教育体系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变化是1987年开始的初中计划，是为了扩大中等教育的机会并将重点放在课程设置上，以及从基础文科转向更实际更有文化内涵的课程而设计

① Kwasi Anyemedu,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PNDC," *in Ghana Under PNDC Rule*, ed. E. Gyimah - Boadi (Chippenham, England: Anthony Rowe, 1993), 22.

的。进入国家大学的资质也相应调整。政府还提出削减中等教育和大专教育的补贴，这意味学生将不得不支付其所受教育中的许多费用。1986 年，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更自由的国内收入署，有意重组税收体系。过去避交所得税的自谋职业者被列入税收名单，有义务缴纳这部分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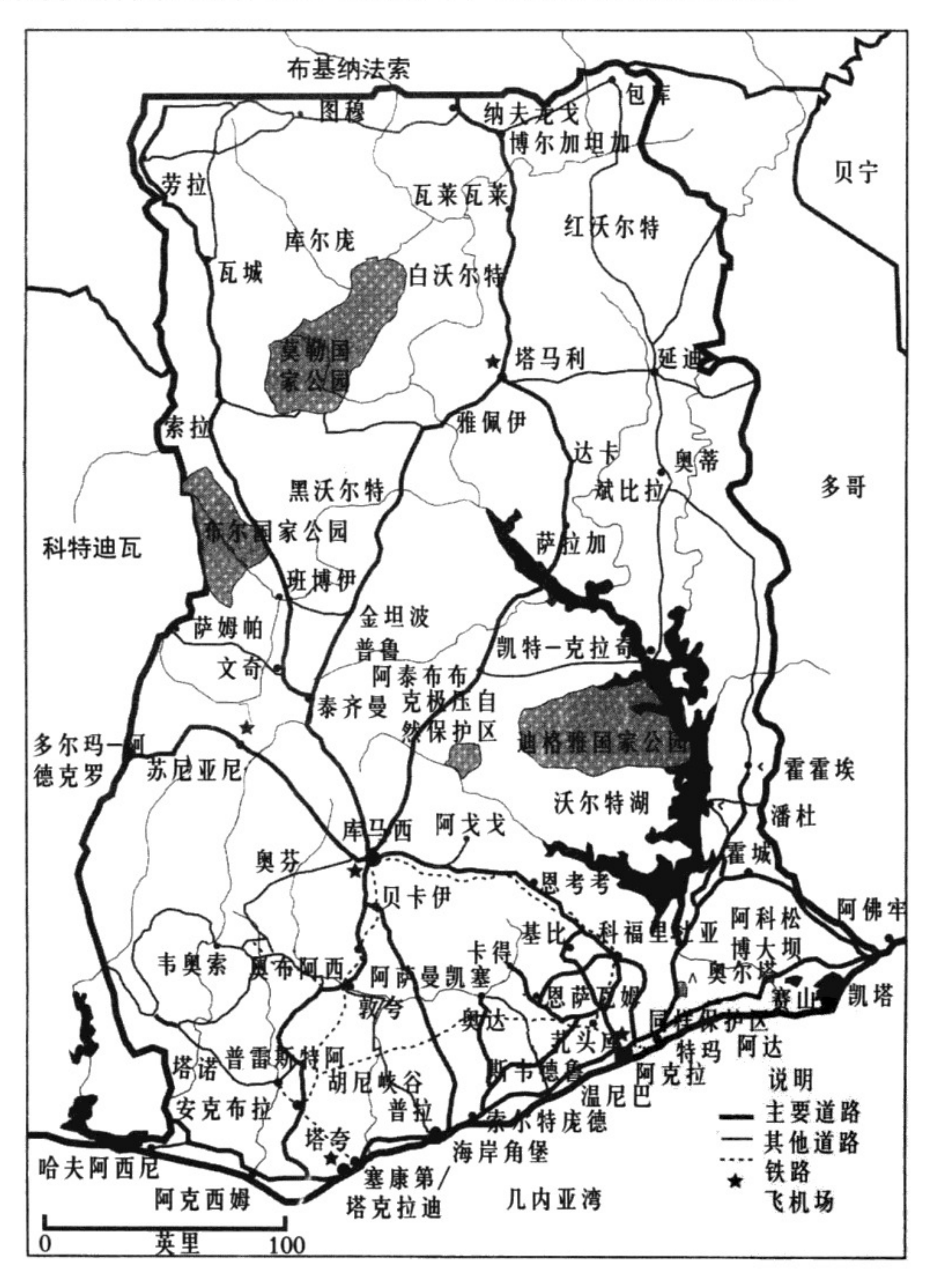


图 7　加纳的交通运输

实际上，第一个经济复苏计划和第二个经济复苏计划的区别并不像其表面上显示的那么巨大。官方表述的稳定阶段、结构调整、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有时候稳定的短期需要和更长期的发展需要间可能会出现冲突。然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甚至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批评者都承认政府在国家经济方面带来了重要的全面的改善。一直存在着经济衰退的转机和增长的恢复。慢性预算危机结束了，国家基础设施的复兴正在进行。然而，批评者可能将矛头指向在经济运行中没有任何真正的结构改变，因为加纳仍然对一些出口作物有依赖性。实际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出口作物的价格在下降。到 1987 年，可可的价格已经降到每公吨 1 500 美元，这比世界银行预计的价格还要低，并最终于 1989 年降到每公吨 600 美元。

199

然而，像过去出口价格跌落时一样，加纳没有解决收支平衡问题。资本的大量流入意味着增加进口已不可能，仍然维系着总体平衡的国际收支顺差。然而代价是国家债务激增。到 1987 年，长期债务比 1983 年翻了一番，并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增长。对于批评者来说，加纳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济政策的控制，大批外国顾问接管了日常的经济运行。

毫无疑问，对经济复苏计划最严厉的批评是无论宏观经济如何成功，对普通加纳人却几乎没带来什么好处。对于大多数加纳人来说，1986 年政府宣称的真实收入每年增长 2% 过于空泛。商店里的东西更多了，但随着补贴的取消，大多数人买不起它们。农民买不起昂贵的化肥和杀虫剂，这就破坏了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加速农业生产的既定目标。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设施使用费意味着许多人不再从这些服务中受益。随着政府削减开支、减少雇员，出现了许多没有得益于增加私营部门就业机会之举的失业者。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取得权力并宣称要捍卫“辛苦流汗的大众”的利益，但第一个经济复苏计划和第二个经济复苏计划都没有真正解决长期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

政府 1989 年推出的减轻调整社会代价行动规划（PAMSCAD），表明他们意识到弱势群体的生活尚未得到改善。罗林斯坚称，政府的主

要目标之一就是改善“加纳人在农村长期劳累的”环境。① 但是，尽管付给可可农的生产价格在增长，但他们贫困依然。这种不平等在加剧，正如1989年报告所说，国民贫富分化巨大，其中32%的人得到的是国民总收入的94%，而68%的人只得到6%。② 已经降低到1985年的10%的通货膨胀率在1986年又回升到了25%，1987年则到了40%，这10年的其余时间里都在此通胀率之下徘徊。

200 根据一个1988年访问加纳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的报告，特别是都市里的加纳人不相信他们会从经济复苏计划中获益。政府官员承认这些计划不受欢迎，如果进行表决，会在都市地区失败。甚至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科乔·齐卡塔上尉都意识到，在国际金融机构赞美“经济复苏”的溢美之词和“值得享有越来越多复苏果实的普通人生活之艰难”③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加纳人都受到经济复苏计划政策同样的负面影响。对于有固定收入的人来说，当通货膨胀超过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给予的工资增长时，统计数字的确表明他们在1985年后的生活标准每况愈下。④ 在自由职业者当中，情况更为复杂。例如，随着加纳道路的修复，汽车的数量急速增加，路旁的机修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行业。⑤ 然而，总的说来，甚至支持者也承认“政府以人民为代价来拯救国家”。⑥ 在1986年12月31日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罗林斯许诺进行“对经济方向的自由坦率的辩论”。但是，他显然不敢让这样的事发生，害怕这将退化为他设想的“互相掐住对方脖子的帮派敌对”。⑦

---

① “Forward Ever: Davina Doughan Interviews Flt - Lt Jerry Rawlings, PNDC Chairman,” *West Africa*, February 9, 1987.

② Anyemedu,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PNDC,” 37.

③ *People' s Daily Graphic*, October 21, 1989.

④ Richard Jeffries, “Urban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s the Economic Revovery Programme and the PNDC Government in Ghana,” *African Affairs* 91 (1992): 211.

⑤ Richard Jeffries, “Urban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s the Economic Revovery Programme and the PNDC Government in Ghana,” *African Affairs* 91 (1992): 214.

⑥ Richard Jeffries, “Urban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s the Economic Revovery Programme and the PNDC Government in Ghana,” *African Affairs* 91 (1992): 214.

⑦ “Forward Ever,” *West Africa*, February 9, 1987.

保持控制

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倍加包容，并寻求控制国家的各部门并利用它们，在需要的时候，消除反对派。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统治开始时起，罗林斯对加纳新闻媒体的管理就有了改变。为了保证革命目标更好地推进，改组了公共媒体的编辑和董事。为了反映这个新的重点，在 1983 年初，《每日写真报》变成《人民每日写真报》（*People's Daily Graphic*）。像以前的政府一样，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报纸法律，在出版一份新闻报纸之前必须取得许可。最初，一些独立出版业无视这个要求，但在一系列这样的报纸被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支持者攻击为试图颠覆革命之后，它们接受了这个现实，最为重要的是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已经有所克制。

不让独立报纸得到新闻纸是一条迫使这些报纸停业的锦囊妙计。更直接的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禁止一些独立报纸，指控它们“曲解新闻”，“编造故事”，像在 1985 年《天主教旗帜》（*Catholic Standard*）事件中那样，“报道不爱国”。[1] 甚至政府的报纸都可能招致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不快，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犯忌主编的离职。这是一种甚至罗林斯也承认的导致“缄默文化”回归的状态。[2] 到 1990 年，加纳仅增加了更多的体育和落托数卡牌戏报纸而不是铺天盖地的政治经济新闻。

201

甚至宗教组织都屈从于国家的控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督教信仰复兴运动便横扫加纳南半部，部分受美国新约教会启示，新约教会发现加纳像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是一块传教活动的沃土。美国和欧洲来的外国信仰医疗师成为加纳的常客，他们到处推广教义的录像和磁带，许多加纳人批评这是“利用其信徒的无知”进行“精神欺骗……的造钱机器”。[3]

---

① Asante, *The Press in Ghana*, 108.

② *People' s Daily Graphic*, April 6, 1987.

③ "Spiritual Onslaught," *West Africa*, April 17—23, 1989.

1989 年，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府“命令取缔”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摩门教）教会和耶和华见证人教会这两个在加纳活动的外国教会。两个本地教派也遭禁止。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加纳的教会向官方申请批准传教，[①] 当时新约或五旬节教会和教派有 600 个。从属于基督教会理事会和天主教会议的主流宗教机构抗议这项宗教机构法，称其“毫无道理”，是对加纳宗教自由的最大侮辱。[②] 然而，政府坚称，该法是为了保护全体民众的利益。

加纳许多自封先知的“不道德”及其贪婪的敛财之举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③] 国有媒体也含沙射影地指出外国传教士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潜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和叛国者。[④] 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通过控制他们的活动维持其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特点，利用加纳基督教会应该保持高标准行为规范的信仰。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于 1985 年通过的一系列家庭法案也得到了巨大支持，因为他们有意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儿童。户主（问责制）法使户主有向全体家庭成员进行说明的义务，以防止这些常为没有文化的人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中受到欺骗。《无遗嘱继承法》力求通过保证未亡配偶和子女继承该财产的大部分来解决无遗嘱获得财产遗产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而不是借助宗教。

202

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还利用各种调查机构来威慑“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几乎“每一位社会知名的专业人士或商人都被阿克拉的公民数据审核委员会或其办事处传唤过”。[⑤] 律师被特别挑出，《人民每日写真报》公布了未交赋税的“挖掘出的惊人的数字”。[⑥] 工人防卫委员会和人民防卫委员会也扮演了司法角色，包括租金案件、土地争执

---

① “Crackdown on Religious Sects,” *West Africa*, June 26 – July 3, 1989.

② Mike Oquaye, “Law, Justi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Ghana Uner PNDC Rule*, ed. E. Gyimah – Boadi (Chippenham, England: Anthony Rowe, 1993), 173.

③ “Spiritual Onslaught,” *West Africa*, April 17 – 23, 1989.

④ “Crackdown on Religious Sects,” *West Africa*, June 26 – July 3, 1989.

⑤ Oquaye, “Law, Justice, and the Revolution,” 161.

⑥ “Lawyers and their Taxes,” *West Africa*, May 30, 1983.

和劳工纠纷。这些机构独立于普通法庭之外。他们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和弱势群体一边，试图纠正普通法庭的不公，这种不公被看作是唯富人和有影响者的马首是瞻。在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统治的早期，政府控制的报纸尽一切努力来败坏“阿昌庞/阿库福”专制法庭的名誉。[①] 这是一个破坏政权的最激烈批评家的有效方法，这些批评家不是律师就是法官，他们与法庭的关系异常密切。

高级法院法官的被谋杀增加了革命者和普通法庭之间的敌意，但也突显了整顿混乱重叠的公共司法体系的必要性。1982 年 9 月，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在阿克拉建立起一个公共法庭，无疑是对该局面的最强烈的反应。这个法庭和其后建立起来的法庭一起，都是要平息人们对“使用非常手段”的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时期革命法庭的恐惧。[②] 陪审主席不必是律师，但实际上都是律师。3—5 个协助主席进行判断的陪审团成员都是外行，但他们通常都是像退休警察和法律工作者之类的熟悉刑法的人。

起初，法庭被用来取代人民防卫委员会和工人防卫委员会的角色，但仍可以有外行参与者出现。然而，随着反对集团的出现，法庭负起对可能判处死刑的颠覆分子进行审判的责任。卷入 1982 年 11 月 23 日的政变者被审判，阿克拉公共法庭宣布他们有罪，但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对于 1983 年 6 月 23 日那场更具威胁的政变，惩罚则更为严厉。19 人被法庭判处死刑，许多人在判决之后被立即执行。与此同时，谋杀法官者也被处决。[③]

20

到 1984 年，加纳的 10 个地区都有了地方审理法庭。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还承诺在下属地区和社区建立审理法庭。审理法庭体系似乎一度将要取代普通法庭审理刑事和民事司法案件。1983 年 6 月，阿克拉和特玛的工人防卫委员会控制的阿克拉最高法院声称，司法委员会

---

① Oquaye, “Law, Justice, and the Revolution,” 156.

② *Daily Graphic*, September 1, 1982.

③ Roger Gocking, “Ghana’ s Public Tribunals: An Experiment in Revolutionary Justice,” *African Affairs* 95 (1996): 207.

已被“解散”，首席法官的位置已被“取消”，法学院也将被“关闭”。他们想用“人民法院”取代老的体系。[①] 实际上，对于刑事案件，两个体系同时并存，此类案件应该在普通法庭还是在审理法庭起诉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

一般说来，公共审理法庭起诉被称作颠覆国家的犯罪，策划政变者高居罪名清单之首。紧随其后的便是包括贪污和黑市贩卖在内的“蓄意破坏经济罪”，而对于严重的银行欺诈罪可能会判处死刑。1983年，公共法庭委员会主席乔治·阿吉耶库姆也建议，可可走私要接受同样的惩罚。审理法庭出现之后也很快被用于起诉普通犯罪。在数千加纳人从尼日利亚返回之后，因几乎没有工作可做而使持械抢劫大大增加。持械抢劫常伴以杀人，但即使没杀人，那些被定罪者也可能被判死刑。与普通法庭的继续存在并因其延迟和缓判而赢得的好名声不同，公共法庭以速度和高效著称。

随着利害重大并有这么多人卷入司法管理，公共法庭不可避免地会在运行中出现丑闻。工资不高的审理法庭人员公开受贿。一个最臭名昭著的特殊案件是阿散蒂公共法庭主席夸梅·阿尔欣（Kwame Arhin）被定罪为收受贿赂。在许多情况下，国家首脑都迫使审理法庭重审其裁决。最为重要的是，公共法庭体系的建立使革命和其批评者发生冲突。加纳律师协会公开谴责，这是“误导取消加纳普通刑事法庭机构”，并号召其成员抵制审理法庭。[②] 该组织指出审理法庭缺乏上诉体系，缺少刑事审理经验，忽略应有的技术环节等。

204

然而，到了1984年，加纳的绝大多数刑事审判都是审理法庭进行的，甚至律师业的高级成员都感到抵制审理法庭有违道德准则。此外，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回应了对公共法庭审理的批评，建立了以阿克拉的全国公共法庭为终审上诉法庭的上诉体系。但是，拒绝普通法庭的监管，自由而快速地执行死刑判决和死刑定罪，有时会引起国际上对

---

① *People's Daily Graphic*, June 25, 1983.

② *Daily Graphic*, September 28, 1982.

审理法庭体系运行程序的反对。

保持控制的一个更加严厉的方法是通过一项立法，允许预防性拘留和否定法庭调查此类监禁之理由的权力。有了这个立法，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就可以把“逮捕和关押当作镇压的重要工具”。[①]对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批评者而言，比起恩克鲁玛时代，政府更系统地破坏了加纳人的公民权利。到1984年，超过1 000人被投入监狱。为获取口供，国家调查局（BNI）经常使用酷刑。随着公共法庭的运行，这种酷刑的使用一直使加纳的人权受到关注。像非洲人权观察（Human Right Watch）和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特别关注许多被他们看作是政治性质的审理法庭起诉的犯罪。他们强烈反对死刑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剥夺其反对者之法律保护权的做法。

罗林斯坚称，“大多数加纳人民”支持他的政府“并保证了其生存”。[②]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在武装部队友善基础之上的力量”至少同样重要。[③] 有些年，曾经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特别顾问的科乔·齐卡塔上尉成为负责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的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位埃维人和罗林斯的长期伙伴，他受到信任，主要负责创建确保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得以生存的罗林斯安全网的工作。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还巧妙地赋予许多创始人以改革家的形象。对批评国家机构工作的加纳人来说，这颇有吸引力。甚至像公共法庭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机构都享有大量的公众支持，因为他们似乎比普通法庭对罪犯更严厉。他们在防止加纳陷入暴力和无政府状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暴力和无政府状态是许多非洲国家军事干预政治的典型特征，尽管他们在历史悠久的法律传统方面的过渡性和失败在加纳是显而易见的。

205

① Oquaye, “Law, Justice, and the Revolution,” 171.

② “Forward Ever,” *West Africa*, February 9, 1987.

③ Rimmer, *Staying Poor*, 197.

反对派与控制的松动

限制公民自由和加纳对非洲及其他地区“进步政府”的支持足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早年统治时期的加纳是反对西方的。西方政府非常害怕其他非洲人也追随加纳革命的榜样。1983 年，加纳的北方邻国，当时称作上沃尔特（现在的布基纳法索）的确是这样做的，其军政府宣布的目标就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目标如出一辙。之后不久，尼日利亚的谢胡·沙加里（Shehu Shagari）文官政府同样也是被军队推翻的，军政府许诺严厉的改革。加纳与利比亚的联系和对古巴及尼加拉瓜的支持不可避免地招致美国的不快，中央情报局势必支持在多哥、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这样的邻国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根据《人民每日写真报》和《加纳时代》的报道，西方大使馆预先知道 1982 年 11 月 23 日的政变计划。

同恩克鲁玛时期的最后几年一样，在加纳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扮演支持和武装政变策划者角色的疑神疑鬼的猜忌。1985 年，当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网在阿克拉被发现，8 个加纳人被“开除国籍”并与在华盛顿被捕的一位加纳间谍交换的时候，紧张达到了高峰。之后不久，4 个美国外交官因“完全不可接受和并不致力于加纳与美国友好关系的活动”[①] 被驱逐出加纳。美国终止了对加纳的援助并宣布加纳不再是美国援助的候选国。这些交锋让国家媒体向激进的城市工人、学生和东方阵营国家持续宣泄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言论。反美声明与加纳支持南非进行的反隔离斗争和试图恢复与社会主义东方阵营国家的关系一起，维持着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反西方姿态。

毫无疑问，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确实有充分理由害怕政变的阴谋。1982 - 1989 年间发生过 20 多次政变策划和企图。[②] 他们当中许多人的

206

① “Ghana/US Expel Four Diplomats,” *West Africa*, December 9, 1985.

② J. Haynes, “Ghana: Indebtedness, Recovery, and the IMF, 1977 - 1987,” in The African Debt Crisis, ed. T. W. Pafitt and S. P. Riley (London: Routledge, 1989), 115. 1987 年有超过 20 起。1989 年的另一次政变涉及军方高官。

目标都是暗杀罗林斯。反对派团体可以在象牙海岸、尼日利亚，特别是在多哥进行活动。大量的加纳可可通过多哥被走私出去，政变指责你来我往，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非洲之外的反对派也加入了策划。最特殊一次策划的参与者包括一艘名为 MV 诺比斯特号（MV Nobistor）的船，停泊在巴西海岸处，载有从阿根廷装载的价值 100 万美元的武器。船上的 8 名美籍越战老兵混入另一艘船上的 80 名加纳人当中，驶向该国上演一场反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政变。这次策划的国际性质使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相信，加纳的反对派“与某些国外情报机构和势力密切合作”。[①] 加纳政府还愤愤然地责难西方媒体，“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②]

实际上，加纳正在遵行一个其外交部长奥贝德·阿萨莫阿（Obed Asamoah）所说的双轨政策。一方面，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试图维持其与加纳左翼派系和东方集团国家的革命信任，同时又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和贷款。甚至在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更多的也是保守国家而不是激进的国家。来自中东的贷款主要是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样的保守国家。1987 年，甚至与美国的关系也开始改善。当 3 名包括曾任布西亚政府财政大臣的 J. H. 门萨在内的加纳人因试图购买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而被捕并被带到美国审讯的时候，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此时的苏联深陷于自己的问题，不再有冷战顶峰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这也对该转机大有帮助。

受苏联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政策的刺激，风向的改变也吹遍了非洲大陆。[③] 1986 年和 1987 年，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国家民主委员会表达了通过在首都地区举行一系列政治研讨来促进加纳民主形式开放和民主化的扩大。[④] 1987 年，委员会公布了报告并提议建立地方议会选

---

① “Osei Recruited U. S. Mercenaries,” *West Africa*, April 7, 1986.
② “Osei Recruited U. S. Mercenaries,” *West Africa*, April 7, 1986.
③ 戈尔巴乔夫于 1985 年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引入重组和开放的政策。
④ 国家民主委员会成立于 1982 年，但直到 1986 年它才完成达成政治共识的角色转变。

举体系。这些地方议会是由国家民主委员会挑选出来的110个议会选207区的最高政治统治机构。他们指导、监督、管理和控制所有其他地方政治管理机构，并有权从特定源头提高税收。他们可以启动开发，最终控制医疗和教育部门。其成员的1/3，被“任命为传统机构和其他关涉地区生产命脉之组织的代表”。[①]

这一切都建立在无党派的基础之上，这最能说明权力下放的意图。每个地区的候选人限制在5个以内。竞选限制在3周时间，不允许有钱的候选人对于贫穷的竞争对手有优越地位。所有人都在同一天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回答全体选民提出的问题。结果是，候选人来自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有助于引起对实践领域，特别是农业地区的非常大的兴趣。

在1988年11月开始的选举中，参选人数远远多于上一次在加纳举行的1979年大选。注册选民的59%投了票，而1979年大选的投票人数只有35%。罗林斯主席的夫人纳纳·科娜杜·罗林斯在组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12月31日妇女运动（DWM）使妇女比过去变得更加政治化，她们构成了选举中一个不成比例的百分比。农村比都市地区有更多的对选举的支持，许多以前的政治家批评这一选举为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使其统治合法化的伎俩，是重启阿昌庞政府的联合政府的建议。

然而，地方议会立即提升了地区议会的可能性，国家民主委员会开始举行讨论下一步的地区论坛。似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正在严肃地思考其临时性。但是，仍然有像加纳律师协会这样的组织发出批评声音。他们认为整个事情只是一出闹剧，但论坛却成为反对派呼吁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下台和立即解除政党禁令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对保存他们身在其中的体系有既定利益的地区议会代表主张，全民议会选举应该同样在无党派的基础之上，这样就使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民可以在地方层面上参选。

---

① “Timetable for Districts,” *West Africa*, July 13, 1987.

1992年选举

到20世纪80年代末，变革之风不可阻挡地吹向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加纳著名大学历史教授阿杜·波汉1988年在加纳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他直截了当地谴责了罗林斯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造成了“沉默的文化”。这是一次勇敢的加纳人在仅有的立足之地站立几个小时倾听的演说。[①] 一个松散的政治集团联盟最终于1990年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称自由正义运动（MFJ）的压力集团。该集团由阿杜·波汉教授做主席，恰如其份，其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是与第一、第二和第三共和国联系密切的人。它超越统一党一大会人民党界限，团结了反对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便利联姻。自由正义运动清楚地感到它在镇定自若地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窃取主动权。它批评罗林斯赞同的无党派全国议会的思想，将其比作“痛遭斥责的1977—1978年的阿昌庞联合政府方案”。[②] 总的说来，对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府的批评都非常坦率，沉默文化被打破。

208

但是，罗林斯不像1979年的阿昌庞，他没有失去主动权。和最高军事委员会比较，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拥有8年半相当有效的政府，其信誉没受大的腐败困扰。它可以指望军队的支持，在农村也有大量的支持者，甚至在自由正义运动拥有最大支持的都市地区，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仍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对手。许多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在反联合政府运动中一直很活跃，并清楚地意识到阿昌庞所犯的错误。他们拒绝了自由正义运动的正式承认，给国家民主委员会以很大的余地。他们最终接受回到多党体系但要制止过去多党政治不良特征的规章而加强了公信力。1991年5月，一个宪法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

---

① Paul Nugent, *Big Men, Small Boys, and Politics in Ghana: Power, Ideology, and the Burdern of History, 1982 - 1994* (London: Printer Publishing, 1995), 164.

② Richard Jeffries and Clare Thomas, "The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2," *African Affairs* 92 (1993): 335.

会成立，前司法部副部长 S. K. B. 阿散蒂（S. K. B. Asante）博士为主席，其任务是为协商会议提出建议。

尽管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去除了自由正义运动“公众的逆反效应”，但它允许一种非常宽松的政府控制，结果保持了其道德制高点。[①]《天主教旗帜》被允许恢复发行，许多独立出版物也随之诞生，《加纳纪事》（*Ghanaian Chronicle*）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些报刊大部分激烈地反对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并卷入曾被看作诽谤的“揭发丑闻和黑幕”当中。[②] 然而，政府只在很少几个事件上采取行动反对这样的新闻。相反，受到攻击的政府成员不得不在政府的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还于 1992 年 10 月释放了被拘留者和政治犯，废除了大部分与人身保护权、报纸注册和无审判拘留有关的严酷立法。[③]

209

1991 年 11 月，一个协商会议最终根据新宪法开始审议。自由正义运动和加纳律师协会都批评其组成和运作方式，但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却强调会议更能代表加纳社会的全体成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通过介绍 1979 年美国式宪法表明其独立性。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仅仅是介入这个程序就粉碎了一个作为过渡性条文的一揽子赔偿条款。宪法于 1992 年 4 月提交给加纳人民，得到了普遍的接受。[④] 之后不久，政党禁令解除。不允许任何标志将争执中的党派与过去的党派相联系，但对从哪里筹款及数量多少仍建立了严格限制。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定于 1992 年 11 月和 12 月。

1992 年 5 月，政党禁令取消，但直到 9 月各政党才最终正式登记。毫无疑问，这给予罗林斯一个胜过对手的有利条件。他直到 9 月 30 日才宣布他参与总统竞选，但之前他显然已经准备了几个月并非常

① Shillington, *Ghana and the Rawlings Factor*, 171.

② Jeffries and Thomas, “The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2,” 336.

③ Amnesty International, “Ghana: Release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New Arrests,”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6, 1992.

④ 3 608 973 张选票中 92% 投了支持票。*West Africa*, May 11 - 17, 1992.

有效地利用了任期的有利条件。他还将自己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过失分离开来，赢回了很大的声望。他周游全国，正式开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工程，利用这样的机会强调其政府的政绩，同时攻击知识分子及其误导民众的企图。此外，他还努力赢得酋长和教会首脑的支持。他甚至向加纳五旬节协会（Pentecostal Association）发表讲话，表达他对在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期间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犯错误的歉意。尽管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失去了其早期多数的支持，罗林斯本人却很轻易地维持了大多数加纳人的支持。在他政党内部有一些对于他参选的反对意见，但最终外交部长奥贝德·阿萨莫阿博士领导的中坚派和务实的书记们建立了以罗林斯为总统候选人的全国民主大会党。全国民主大会党还接管了起初是草根组织的加纳全民党（EGLE），但大多数支持来自革命防御委员会（CDRs）。1984年，当人民防卫委员会和工人防卫委员会得到更严密控制的时候，该组织最终站稳脚跟。

反对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有6个与过去的政治集团结成密切联盟的其他党派。他们当中许多党派甚至在党派禁令解除之前就一直都在准备着。4个主要党派从恩克鲁玛主义传统中诞生。保守的恩克鲁玛主义政治家的最大集合体构成国家独立党（NIP），前总统希拉·利曼博士建立了人民全国大会党（PNC），一些较年轻的恩克鲁玛主义者形成了人民传统党（PHP），而恩克鲁玛政府中的一位前部长最后建立了全国大会党（NCP）。后来的党派最后与全国民主大会党联合。丹夸·布西亚政治集团决定不再犯1979年的错误，当时他们分裂成两个党，他们同意再度联合成一个党，称作新爱国党（NPP）。

最有希望领导该党的是阿杜·波汉校长，他一直是罗林斯的主要批评者。但也有挑战者，最重要的是约翰·阿吉耶库姆·库福尔（Kufour），一位拥有牛津大学政治哲学学位的律师，一直担任以库马西为基地的加纳最重要的足球俱乐部阿散蒂科托科的执行主席。像波汉一样，他也是一位阿肯人，并将1954－1957年和1979－1981年阿散蒂地区的政治运动联合起来。然而，他的主要不足是他曾作为地方政府官员在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行政机构中任职，对于许多人来说，

他似乎缺乏"一个勇敢民族"的"勇敢"。[1] 这显然对他不利，他最终在1992年8月政党大会选举中落后波汉总统得票居第三。[2] 尽管有这次分裂，新爱国党显然已经成为全国民主大会党的主要对手，在所有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反对派中经济实力最强。

新爱国党宣称他们将很好地实现国家经济需要的市场改革。其领导人声称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从他们那里偷走了他们的经济复苏计划。他们有商业、专业人士和高级公务员的支持，这使得他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谈判变得非常容易。他们称，罗林斯不是真的支持市场经济，因为他神经质似地反对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他们从来没能真正地将此变成一个选举的议题，主要的竞争变成一种人身攻击，确切地说是加纳人是否感到杰里·罗林斯11年的统治已经足够。另一方面，罗林斯一手包办了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取得的所有成就，但却没有总现一个许诺。相反，他坚持说未来不会好过，仍需继续努力工作。

211

让反对派大吃一惊的是，在12月举行的非常和平的选举中，罗林斯以58.3%比30.4%的选票赢得了对与之最接近的对手阿杜·波汉的重大胜利。官方投票人数为48%，但这个数字似乎是根据对潜在选民夸大的估计作出的。与投票人数更接近的估计是多于60%，这使此次选举几乎与1969年选举一样激烈。英联邦观察团（Commonwealth Observer Group）和联合国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都注意到在选举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违规现象，但这不足以使结果无效。[3] 然而，新爱国党发布公告，题为"被盗的裁决"（Stolen Verdict），挑战此次选举的有效性。他们认为选举名册遗漏了1988年地方议会选举时拒绝注册的反对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支持者，该名

① Ivor Agyeman - 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A Biography of J. A. Kufour* (Trenton: N. J.: African World Press, 2003), 60.

② 波汉得到了56.6%的选票，一名库马西的医生——K. D. Selby博士得到了17.3%的选票，而库福尔得到了16.5%的选票。

③ 卡特中心派出18名国际观察员，英联邦观察团派出15名。此外，还有欧共体等组织的观察员。

册人数也扩大了，使得可能出现双重投票的现象。他们还列举更多的公然恐吓和投票舞弊的案例。他们同其他反对全国民主大会的政党一起呼吁国家临时选举委员会（INEC）搁置选举结果，直到所有违规都调查清楚为止。①

国家临时选举委员会拒绝了这一请求，曾一度似乎要出现大的暴乱，特别是阿散蒂地区。幸运的是阿散蒂亨采取行动将所有党派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在加纳阿散蒂地区和其他地区出现过的示威、暴乱和爆炸都就此结束。但是，反对党宣布他们将不参加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除非有一个新的选民名单和选民身份证。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完成这样的改变费时费钱，结果反对党抵制了选举。全国民主大会党赢得200席的189席，8席被全国大会党占据，1席归于加纳全民党。据公布的数字，仅29%选民参加了投票，这对于反对派来说进一步证明了总统选举的舞弊。实际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大约应在30%左右，因为许多国会席位都没有争议，这已是一个相当客观的数字，恰与总统选举中投给罗林斯票的百分比非常接近。②

212

在总统选举中惨遭失败对于新爱国党和其他反对党来说显然非常惊讶。他们预测选举政治将意味着罗林斯时代的结束。他们不仅没能意识到在位者的优势，还明显地低估了罗林斯持续的声望。到1992年，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丢掉了其早年积累的大部分声誉和吸引力，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罗林斯个人工作努力和正直的声誉仍未受到影响。甚至在新爱国党认为同阿散蒂人站在一起的布朗—阿哈福地区都投票支持罗林斯而不是设想中的埃维人。给农民较高的可可价格和农村电力规划明显比攻击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人权纪录得到的分数更多。甚至在反感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不能容忍批评和封闭式治理的受教育人口更多的都市地区，罗林斯都与新爱国党战平。较富裕的城郊投票

① 这一原则已在1991年11月得以确立并用来指导修宪和总统及议会选举。

② Jeffries and Thomas, “The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2,” 363.

支持新爱国党，但较穷困地区却投票支持罗林斯。他的公开演讲显然比因过度思辩而经常失去听众的大学教授阿杜·波汉的演讲更有效。罗林斯还通过借用大会人民党时代的颂歌和口号来树立一个尊重恩克鲁玛的形象从而消解了恩克鲁玛主义政党的影响。[1]

---

① 大选前的几个月，前总统的遗骸被改葬在新建的、位于阿克拉的夸梅·恩克鲁玛纪念公园中那令人过目难忘的陵寝内。*West Africa*, July 20 – 26, 1992.

第十一章　第一届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1993—1997

议会政府及其挑战

加纳第四共和国于1993年1月建立的时候，反对党拒绝加入议会选举，这意味着全国民主大会党没有了重要的反对党。甚至对于许多投票给全国民主大会的人，这都是令人失望的。为使一个有效的反对派发挥真实作用，罗林斯应该被迫“采取一项更缓和的统治方式”而不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时期的统治方式。[①] 然而，变化还是明显的。加纳议会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16位女性，其中两位赢得了独立地位。然而，新爱国党的领导人阿杜·波汉认为议会选举的糟糕结果是“整个选举实践，包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欺诈的结果”的一个标志。他确信“享有真实多数支持的不是J. J. 罗林斯和他的全国民主大会党”，也没有必要承担另一次选举的羞辱。[②]

217

不是所有的新爱国党成员都同意这个立场。如前J. A. 库福尔派

① R. Jeffries and C. Thomas, “The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2,” *African Affairs* 92 (1993): 331.

② “Predictable Landslide,” *West Africa*, January 11 - 17, 1993.

218 系，他们认为选举存在欺诈，但强调尽管新爱国党在议会中是少数，仍可以制约政府。库福尔显然比阿杜·波汉从这种情形中得到的更多。在其输掉同阿杜·波汉竞争政党领袖之后，他安排阿散蒂地区阿忒马（Atwima）家乡选区的下院议员支持选举。不幸的是，他本该赢得这一席位并出任议会中反对派的领导人。① 但作为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阿杜·波汉在其组织中本来没有位置，结果被对手抢尽风头。库福尔的支持者认为抵制议会选举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此害怕。4个反对党没有参与议会，却组成了“影子内阁”以起到有效的反对派的作用。他们“呼吁一次真正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和一次新的选民登记，以及无条件大赦所有流亡的加纳人”。作为希望“和解”的一个标志，他们呼吁“给予全国民主大会党领导的政府一次机会，证明他们真的对真正民主的回归和建立感兴趣”。② 然而，选举之后的一段时间，随着不安的持续，更为常见的是冲突而非和解。阿杜·波汉拒绝作为目击者到阿克拉审判“法瑞干”（Farighan）爆炸案的公共法庭上作证。爆炸者被控对阿克拉/特玛地区的5次爆炸负责，属于一个想要“推翻罗林斯政府”的反全国民主大会党集团。③ 4人最终被带到阿克拉公共法庭受审，而阿杜·波汉被要求作为证人出席司法程序。他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又说如果案件是由传统法庭审理，他可以出庭作证。

爆炸中没有人员受到严重伤害，但波汉没有冒疏远公众的风险而拒绝与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时代最恶劣暴行缩影的机构合作。他最终被控蔑视法庭，但他成功地挑战了审理法庭审理该案的权力，因为他们的权力在1993年1月7日就到期了。④ 这次法律争议对当时不得不对付独立报纸公布的有关公共法庭丑闻的新政

---

① Ivor Agyeman - 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A Biography of J. A. Kufuor* (Trenton: N. J.: African World Press, 2003), 69.

② “Shadow Role for Opposition,” *West Africa*, January 18 - 24, 1993.

③ *Daily Graphic*, November 9 and December8, 1992. 在致加纳新闻机构的信中，这一组织自称“法瑞干”。

④ 最终，波汉藐视法庭一案面临着加纳最高法院的裁决，但其时，受其支配的公共法庭已不复存在，此案由阿克拉高级法院审结。*Ghanaian Times*, July 13, 1993.

府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堪。

新爱国党还在最高法院挑战一系列现存的法律和法令，认为这些法律、法令违反了1992年宪法。在迫使加纳广播公司认可他们使用同等设施的权力并抗议违宪逮捕其成员方面，新爱国党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它还迫使法庭作出不同意将每年12月31日庆祝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夺取权力周年纪念作为公众节日的裁决。在一项新爱国党的其他反政府的宪法诉讼中，最高法院甚至要求罗林斯作为证人出庭，这也是一个反对党重要的象征性胜利。

219

被新爱国党称作“杀手预算”的，全国民主大会党第一预算案的不受欢迎也为攻击政府提供了弹药。最不受欢迎的是燃油价格60%的增幅，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运输和食品的价格。新爱国党很快指出这项增长恰逢世界燃油价格大幅回落之时。该党还通过公布题为“被盗的裁决”的证据汇编而使总统选举中的“作弊”事作一直被热议。[①]然而，卖一个官要价2 500塞地，只有中产阶级的财富才支付得起，根据选举结果判断，他们投票支持了新爱国党。[②]

因为议会中没有正式的反对党，独立报纸也可以将自己看做是新宪法的看门狗。大多数报纸都是“不足4页的，非常仓促地拼凑起来且让人几乎无法读懂的丑闻周刊”。[③] 然而，他们持续对政府的激烈攻击，从指责“邪恶”、“危险”而“麻木不仁”的预算提案到攻击全国民主大会庆贺像6月4日和12月31日这样的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节日。[④] 对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成员也进行了愤然的人身攻击，包括总统夫人纳纳·科娜杜·罗林斯。政府官员抱怨此种攻击让人感到彼此疏远，这些报纸通过“公布半真半假的新闻”“在政治党派间挑起了没有必要的紧张”。[⑤] 诽谤诉讼的威胁也没能遏制该丑闻的流传。尽管

---

① “The Stolen Verdict,” *West Africa*, April 26 - May 2, 1993.

② 按目前的汇率，这相当于4美元出头。它看似不多，但当时加纳的年人均收入只有400美金左右。

③ “The Press as Opposition,” *West Africa*, January 25 - 31, 1993.

④ 6月4日是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1979年发动政变的日子。

⑤ “Uneasy Calm Prevails,” *West Africa*, May 15 - 22, 1994.

幕后有很大的压力，《加纳纪事》还是公布了奎西·博奇韦博士和一位前加拿大高级专员生了一个“私生子”一事的细节。[①] 《言论》(Free Press) 则指控副总统 K. N. 阿卡阿（K. N. Arkaah）同一个女学生有染。

在国际方面，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的处境更令人鼓舞。从军人政府向民选政府的基本顺利的过渡给外国捐助者以很深的印象，所以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所期望的 1993—1994 年援助许诺大大超过了 17 亿美元。[②] 保持这个水平的支持需要加纳履行其新的民主理想，满足捐助者对财政义务的需要。这走的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钢丝。值得注意的是，在 1992 年大选中，政府的花费增加了 13%，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务员的基本薪金增加的缘故。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4.8% 的预算赤字。[③] 1993—1994 年捐助援助的条件是实现该年预算略有盈余，尽管加纳主要产品的世界价格在下降。在政府正式转交给全国民主大会党之前两天宣布的 1993 年预算是一个满足该条件的尝试。然而，在一个沉默文化被高呼开放取代的社会里，冲突不可避免。最为公开的一次冲突是在加纳主要大学区莱贡的警察行动，示威群众要求政府贷款给学生翻一番还多。他们的抗议被警察暴力制止一事令人想起了军人执政时期的黑暗岁月。[④]

全国民主大会党统治的到来释放了党内控制国家经济复苏计划应该走哪条道路的斗争。像奎西·博奇韦博士这样的技术专家、财政经济计划部长想要紧缩财政和预防赤字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一只眼睛看着下届选举的政治家却更多关注赢得选民支持的计划。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选择部长用了很长时间，这让人想起了利曼政府 1979 年遇到的同样的问题。110 名部长和副部长的执行委员规模成了这届政府

---

① “Kwesi Botchwey has Child with Canadian High Commissioner,” *Ghanaian Chronicle*, August 1 - 3, 1994. 据《加纳编年史》报道，他已婚并素以出轨闻名。

② “High Expectations,” *West Africa*, July 18 - 26, 1993. Ghana was promised $2.1 billion.

③ Eboe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The Paradox of Reform*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215.

④ “Furoe over Legon Brutality,” *West Africa*, April 12 - 18, 1993.

庞大臃肿的又一个标志。毫不奇怪，前任政府的腐化问题开始再次比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时代更严重地重新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在其统治的头4年时间里，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没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条件。1993年，经济目标几乎全未完成。在那一年开始的政府加速增长计划（Accelerated Growth Program）中，国民生产总值预定增长5%，尽管收成良好，采矿业也势头强劲，但却只勉强增长了3.9%。通货膨胀率是27.4%，而不是预计的8.5%。预算赤字一直存在而不是计划中的盈余。毫不奇怪，塞地继续贬值，到该年年底，几乎贬值了50%。不仅如此，对比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时代，随着税收比重的下降，政府的开支已经超过了税收。 221

1994年预算是一次更现实的尝试，但结果再次出现严重的亏空。为了对付不断增长的赤字，政府寻求从当地银行借款，这导致私人投资资本数量的减少，引起了1995年12月高达79%的通货膨胀。塞地继续贬值，到这个时候，塞地仅值1993年初价值的一半。增长在以每年3.9%左右的速度持续领先于加纳人口每年的近3%的增长率。外债也有很多增长。已从1990年的35亿美元增长到1994年的50亿美元。这个增长主要是因为加纳没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条件，外援停止。[①] 在将这些债务调整为长期而不是短期贷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仍意味着政府最大的花销是支付给这项债务的利息。1994年，政府还能取得一个不大的预算剩余，但这仍很虚幻，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拥有的阿散蒂金矿公司（AGC）被出售了25%。实际上，全部税收比之前3年的降低了14%。[②] 政府的批评者很快指出，加纳已经落入了世界银行定义的重债穷国（HIPC）的行列。

1995年，随着燃料价格的进一步增长，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开始了对包括教育、卫生、食品、金融服务和某些器材类的服务业和零售

---

①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216.

② "Is Ghana the Success Story?" *West Africa*, May 15 - 21, 1995.

业征收的17.5%的增值税（VAT）。目的是建立一个宽泛的间接计税基数，以前一直依赖征收可可出口的税收、石油产品出售的税收、许多进口货物的税收和企业及个人所得税。这一直是一个非常变化无常的系统，随着世界可可市场价格和原有价格的变化而有很大的变化。此外，由于经济变得更加市场化，许多进口和出口税被废除，以刺激当地的经济。税收的降低随着政府开销而增加，显然需要建立一个更有效、更合理的税收体系。这无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情况，不仅加纳如此，非洲的其他地方也不例外，那里，增值税已成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项重要的创收成分。[①]

222 1995年之前在学校、商业和政府高级官员中执行这项税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几乎没有打算让公众意识到政府正在计划的事情。毫不奇怪，政府一开启这个新体系，立即出现反对的声音。在阿克拉，有50 000到100 000名示威者被反对派组织起来称作变革联盟（AFC），走上街头，最后与亲政府的国防革命公社协会（ACDR）发生冲突。在接下来的混战中有4人死亡。[②] 变革联盟示威的口号是阿肯语“hume preko”，意为“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这实际上已经在一些示威者身上应验了，这是全国民主大会政府一个严重的困境。罗林斯总统很快召开议会，到1955年6月，增值税法律和规定被废止，以前的间接税系统得以恢复。

回顾过去，开始增值税的尝试在许多批评中搞砸了。议会通过该法案时一拖再拖，然后试图保证如期立法，而实施又太过仓促。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公众讨论，该立法正值加纳食品生产最为困难的时期开始实行。仓促地注册零售商和服务业商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使人异常担心，试图在很短的时间里塞入太多的活动破坏了公众对该计划的信

① 譬如，多哥于1995年引入了18%的增值税，乌干达也于1996年引入了17%的增值税。

② “VAT Rising Shakes Capital,” *West Africa*, May 29 – June 4, 1995.

任。[①] 15%的过高的税率也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在前宗主国英国，该税率是17.5%，但当该税于1973年第一次开始实行时，其起点非常低，只有8%。在该税实施的斗争中，承诺了很多的免税而不是一开始就强征，这使得高税收变得必要。没有得到此类豁免的商业不可避免地感到该系统是专横而不公正的。毫不奇怪，增值税的反对者指责它是一个价格增长的加速器，这是加纳生活中的一个永久性特征。

到1995年，经济没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税收短缺已很明显。塞地比以前预料的贬值还快，通货膨胀也在加剧，到1995年12月已经超过了70%。政府继续从当地银行借债，这实际上将地方商业排挤出了 223 金融市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私人储蓄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增长，政府储蓄却只有负增长。进行1996年大选的预期花费不可避免地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恢复旧税收体系的过程中，政府为税收体系的扩大留了一条后路。变革联盟很快指出，这是将增值税“通过后门卷土重来”[②] 的企图。然而在现实中，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就到大选年了，全国民主大会政府被迫等到大选结束后再重新考虑重征增值税的问题。

在短期内，实施增值税失败的最大牺牲者是财政经济计划部长奎西·博奇韦博士。一些反对者认为，他应该在政府收回增值税立法后立即辞职，但却等待了数月后才辞职。他在声明信中集中论述了加纳天然气公司的失控所造成的损失而不是启动增值税的失败。加纳的其他机构更是如此，这种国有企业向加纳银行的过度借贷导致1994年面临的国家赤字。对这种借贷的无能为力是博奇韦所说的政府实施其决议失败的表现。在指导加纳经济复苏13年之后，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对罗林斯更有影响的其他人边缘化。失宠的标志是博奇韦没有陪同总统前往英国和美国寻求投资，不久他便辞职。在英国期间，罗林斯甚至批评那些“开始失去与我们人民的现实生活接触”的政府成员，许多

① Seth Terker, “VAT in Ghana: Why It Failed,” *Tax Notes International* 12, no. 23 (1996): 1806.

② “Ghana: Revenue Shortfall Certain,” *West Africa*, July 24 - 30, 1995.

报纸认为这是对经济复苏主要设计师的间接批评。[①]

博奇韦不是保守派中唯一的牺牲品。1996 年，总统政府事务顾问 P. V. 奥蚌（P. V. Obeng）离开或称被迫离开他的职位。几乎同时，科乔·齐卡塔辞去安全总长一职，还有更多的人从财政部辞职，还有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一直有联系的外交部门的人也辞去了职务。有些将成为新团队的管理模式的批评者，但腐败的惊人增加更令保守派中的许多人不安，腐败正在“侵蚀着在调整的困难时期让政权良好运行的正面形象”。[②]

种族与地域的挑战

224 伴随管理加纳经济提出的挑战，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上任不久还面临着严重的种族骚乱。1993 年底，有报道说肯克姆巴（Konkombas）人生活的达干巴传统地区已不受管束，他们和达贡巴人、贡贾人和纳农巴人之间的冲突可谓山雨欲来。这种冲突是令新的冲突。1981 年肯克姆巴人与其宿敌纳农巴人（Nanumbas）之间就有过激烈冲突。冲突中有多达2 000人死于非命。[③] 1993 年，冲突的主要根源是肯克姆巴人要求把萨博巴（Saboba）酋长提升到最高地位。肯克姆巴人的一个核心集团早在 17 世纪就一直居住在围绕着延得里（Yendri）的地区，但许多人在殖民地时代从多哥移居该地区和加纳北方的其他地区。[④] 这些肯克姆巴人最初是无国籍人，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成为不错的农民，常常比他们所归属迁入地的酋长的生活还要好。

这个冲突还有宗教层面的原因，随着许多肯克姆巴人皈依基督教，

① “Where wad Dr. Botch?” *West Africa*, July 24 – 30. 1995.

② Hutchful, *Ghana' s Adjustment Experience*, 223.

③ Artur Bogner, “The 1994 Civil War in Northern Ghana: The Genesis and Escalation of a ‘Tribal’ Conflict,” in *Ethnicity in Ghana: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ed. Carola Lentz and Paul Nug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185.

④ Artur Bogner, “The 1994 Civil War in Northern Ghana: The Genesis and Escalation of a ‘Tribal’ Conflict,” in *Ethnicity in Ghana: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ed. Carola Lentz and Paul Nug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196.

达贡巴人和肯克姆巴人周围其他种族集团的人却主要都是穆斯林。作为肯克姆巴人不断增长的对其从属地位不满的标志是，他们建立了肯克姆巴青年协会并请求达贡巴传统会议（Dagomba Traditional Council）给予最高酋长权力。对于其他种族集团来说，这似乎像是一扇“‘外人’走向土地主的后门”。[1] 因为加纳的大部分土地在北方，这条路托管给最高酋长们，他们则可以分配这些土地给最需要的人。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该委员会自然拒绝了肯克姆巴人的请求。

据《加纳纪事》报道，当全国民主大会党没有提供帮助的时候，群情变得越来越激愤，因为肯克姆巴人支持了1992年大选，所以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北部地区部长阿卜杜雷·易卜拉欣（Abdulai Ibrahim）中校只向达贡巴传统委员会请求“冷静”而“客观地”对待肯克姆巴人的请求。当请求被拒绝的时候，他力劝“领导人诉诸法庭以求改正”。[2] 然而，鉴于政府和独立的新闻出版业之间既有的敌意，《加纳纪事》加诸迫在眉睫的冲突上的报道大打折扣。最终，1994年2月，肯克姆巴人和纳农巴人之间的相对小的争吵却提供了导致这些集团之间大规模战斗的火花，根据官方报道有1 000人在冲突中失去生命，144个村庄被毁。[3]

政府派遣3 000名士兵和警察去恢复秩序，与多哥的7个边境地区被关闭，这又使与邻国的已然伤痕累累的关系雪上加霜。肯克姆巴人已经移民到北方的很多地区，甚至北方地区首府都没有幸免于严重的骚乱。在一次事件中，士兵向一群正要进攻在当地银行办理业务的肯克姆巴人的达贡巴青年开枪，12人当场死亡。[4] 政府为20 000名失去家园的人拨款，但伴随暴力的迅速蔓延，数量迅速超过150 000人。随着许多农业地区的耕作无法进行，北部的食品供应减少到时有时无的地步。

---

① “Fatal Miscalculation,” *West Africa*, February 28 – March 6, 1994.

② “Fatal Miscalculation,” *West Africa*, February 28 – March 6, 1994.

③ 该国媒体常称之为“飞禽战争”。因为事件缘起于一场关于一种几内亚飞禽价格的争吵。死亡率的非官方统计高得多，从5 000至10 000人被杀不等。

④ “Tension Remains,” *West Africa*, March 14 – 20, 1994.

反对党立即指责政府通过“煽动冲突的火焰”而酿成大祸。[①] 罗林斯为了赢得肯克姆巴人在1992年大选中的支持而向他们许诺。那些反对肯克姆巴人的军事派系打算同意这个条件。另一方面，肯克姆巴青年协会指控比姆必拉（Bimbilla）的下院议员，同时也是议会第一副发言人的穆罕默德·伊本·钱巴斯（Mohammed Ibn Chambas）博士支持另一派。他们还抱怨特遣部队在对付交战双方时缺少公正。[②] 总的说来，感觉是政府反应过于迟缓，它将在下次大选中为失去北方地区的选票埋单。

在甚至更宽的层面上，冲突轮廓分明地凸显了一个理应和平的国家如何迅速陷于法律和秩序的瘫痪。一年之前，邻国多哥在法律和秩序方面陷入瘫痪。军队横冲直撞，射杀政府成员和反对派成员。种族对抗同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多哥的埃维人涉嫌寻求与其加纳同胞的某种联系。90 000多名难民流入加纳，加纳武装部队“三级警戒”，而多哥威胁如果加纳军人“卷入任何阴谋破坏行动”就炸毁加纳的阿科松博大坝。[③] 加纳和多哥最后还是化干戈为玉帛，但同样由种族对立点燃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艰苦内战成为内部冲突扩展成危及到地区安全的主要例证。卢旺达爆发的种族灭绝恰好与加纳种族冲突同时出现，但却大得多，成为冲突可以毁灭一个非洲民族的标志。[④]

226

然而，即使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因其处理北部种族冲突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罗林斯还是有威望担当起此类地区冲突的调节人的。作为加纳重返西非影响地位的标志，1944年，他当选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主席。他很快参与结束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内战的尝试性谈判。这些冲突中的各派于1994年在加纳召开会议。1995年，在第20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纪念日时，该组织于阿克拉召开大会，恢

---

① “Opposition Throws Down the Gauntlet,” *West Africa*, March 28 – April 3, 1994.

② Paul Nugent, *Big Men, Small Boys, and Politics in Ghana: Power, Ideology, and the Burden of History*, 1982 – 1994 (London: Printer Publishing, 1995) 278.

③ “Togo Squares Up?” *West Africa*, February 8 – 14, 1993.

④ 加纳派遣了700名军人去参加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

复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和平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对于近邻，罗林斯总统与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 Eyadema）修补关系。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会议之前，两位总统在多哥会面。他们达成了足够的和解以便让埃亚德马参加阿克拉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峰会。

筹备 1996 年大选

北部的经济挣扎和种族冲突并不是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面对的唯一头痛的事。高通货膨胀率和塞地的持续贬值不可避免地甚至在国家劳动大军中工资较高的成员中间都造成了相当大的不满。1994 年发生了一次年轻医生的罢工。他们批评政府为加纳卫生保健体系私有化的计划提供了肥沃土壤。甚至下院议员也对其工资不满，他们在议会为高缺勤率辩论。然而，1994 年底他们得到了新的更加丰厚的薪水。参加 1995 年罢工的大学讲师没这么成功，最后没涨一分钱工资就回去工作了。[①] 产业工人和公务员，虽比其更为专业的同侪们地位更低，却成功地令政府在 1995 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出丑，当时他们包围了财政部并封锁了大楼。

参加 1993 年 12 月高中考试的学生的糟糕成绩被看作政府改革加纳高中教育失败的反映。在参加此次考试的 42 000 多名学生中只有 1 656名通过了考试。[②] 1987 年，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府将大学之前的教育期从 17 年缩短为 12 年，试图以此削减教育费用，以使更广泛的大众可以上学。当时引来了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此项计划实施过于仓促，第一批从新体制毕业的学生的差劲表现似乎成为这些担心的明显证明。公立学校在教育学生上的失败增加了私立学校的数量，这对支付不起学校费用的人将会起作用。被认为是革命的政府再次眷顾了特权阶层而不是社会下层的利益。

22

① "Lecturers Call off Strike," *West Africa*, January 22 - 28, 1996.

② "Poor Exam Results Raise Hackles," *West Africa*, June 6 -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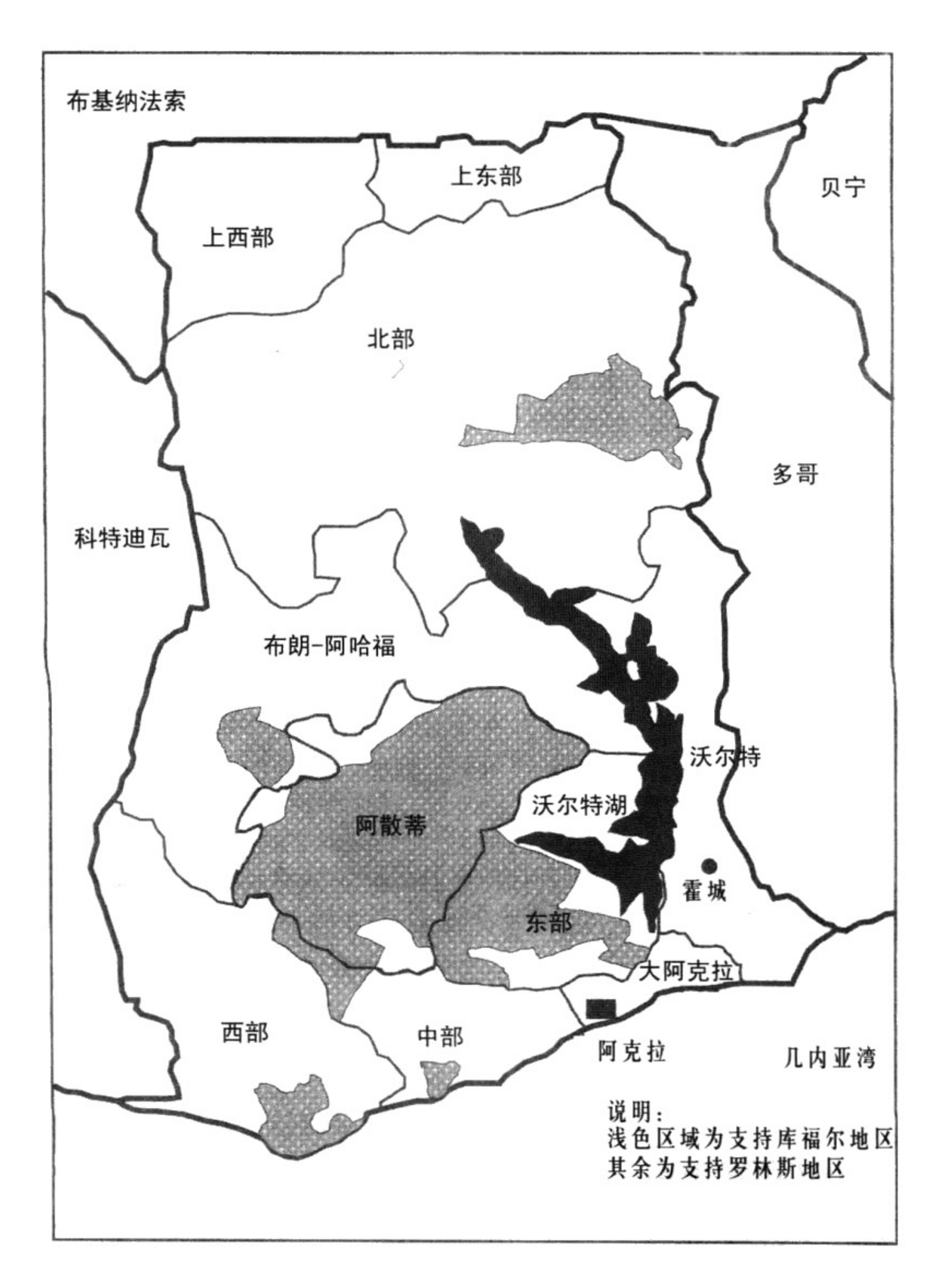


图 8　1996 年大选

对于任命 I. K. 阿岅为新法院院长也出现了伤痕累累的争斗。1995 年，加纳律师协会试图通过最高法院使他的任命无效，理由是“他不

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和被证实诚实的人”。[1] 他被指控曾在一次审判中更改他做出的判词而拒不承认。这是关涉到新爱国党、独立报纸《言论》和总检察长的高度政治化事件。这次冲突使法律界和政府之间早已出现的敌意继续下去。

更麻烦的是，全国民主大会党在 1995 年上东部地区递补选举中的失利。这是全国民主大会党第一次遭受这样的失败，成为一个因政府处理 1994 年种族冲突导致的加纳北部支持下降的标志。更为不祥的是，4 个主要反对党联合起来支持一个候选人，他最终击败了全国民主大会的敌手。这对于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的含义显而易见。

全国民主大会党没有受到像 1992 年对国家媒体一样程度的控制。1994 年，政府对广播电视的垄断受到一个独立调频台“无线之眼”（Radio Eye）的挑战。政府最初试图以非法的理由封杀该台并将其创办者送交法庭。然而，将近 60 年对国家广播电视的垄断之后，结局清晰可见，1995 年初，政府被迫开放加纳的广播。有 60 多个许可申请，到 1996 年，当大选真正开始的时候，加纳广播公司不再享有其早年的垄断地位。许多电台都不同程度地批评全国民主大会党。他们在宣传、披露全国民主大会党下院议员腐败的声浪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腐败事件在人权委员会和行政司法听证会上已被揭露。他们还在 228 大选年击败政府修改宪法的企图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罗林斯总是对 1992 年宪法的许多方面进行批评，当副总统 K. N. 阿卡阿在全国大会党停止与全国民主大会党的联盟并加入到反对派之后拒绝辞职时，他对宪法的批评更为激烈。宪法规定，如果一个下院议员越了界，他就必须辞职，但对副总统却没有这个规定。罗林斯和阿卡阿之间的关系最终变得锈迹斑斑以致在 1995 年 12 月内阁会议上总爆发。除了修改宪法以迫使不再是执政党成员或同盟党成员的副总统辞职之外，全国民主大会党还想使加纳人拥有双重公民身份成为可

---

① “Lawyers Sue Chief Justice,” *West Africa*, April 3 – 9, 1995.

能，允许酋长们参与政治，并想将警察和海关等准军事机构从公共机构中撤销。随着大选的临近，反对党不可避免地将这些修改看作是政治企图。攻击它们成为将全国民主大会置于防御之地的另一种方式。

然而，对于反对派来说，充分利用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弱点被证明绝非易事。甚至为新爱国党选择一位领导人都存在一个巨大分歧。最初阿杜·波汉教授的支持者认为，因为 1992 年大选舞弊，没有理由参与另一个党的大会，选举一个新的候选人。其他潜在候选人认为，这将有悖于该党自己的宪法，它规定大选前 24 个月内必须进行党内选举。最后，1994 年，波汉让步，同意召开一次党的大会。关于他竞选的能力以及对他“独裁”和“感情用事”倾向的抱怨对他都非常不利。[1] 领导该党进行 1996 年大选的 7 位竞选者之间立即产生了争斗。

许多新爱国党支持者看好夸梅·皮阿宁（Kwame Pianim），一位曾为联合国工作的耶鲁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在广播电视中攻击全国民主大会党的经济政策之举特别有效，比他两位主要竞争对手波汉和 J. A. 库福尔都更有魅力。但是，最终最高法院却否决了他参选的权利，理由是他曾于 1983 年参与了一次企图推翻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行动而被定罪。[2] 这是一次高度矛盾的否决，因为他要为同一罪过受罚两次。严重的对抗出现在新爱国党内部，对皮阿宁竞选权利的挑战由一位新爱国党党员最先提出。不像皮阿宁或波汉那么受媒体欢迎的库福尔无疑从皮阿宁的落选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他要克服围绕着他的，曾经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府早期短暂充当地方政府干事的疑云。他是通过仔细争取将在党的会议上投票的2 000名代表的支持而做到这一点的。他最终赢得 52% 的选票，波汉赢得 35.7% 的选票，其他选票分散在其余 4 个候选人中间。

229

直到 1996 年 4 月，离大选不到 7 个月的时间，新爱国党最后决定了谁作为他们的旗手。与其他政党的联盟也没那么容易完成。直到 6

---

① Agyeman - 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73.

② 他被判入狱 18 年，当 1992 年获释时已服刑 12 年。这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无条件大赦的一部分，此举开启了还政于民之路。

月被称作大联盟的谈判才开始。在时断时续的3个月的谈判之后，前副总统、大会人民党（PCP）的阿卡阿同意作为库福尔的竞选伙伴参选。[1] 这个在恩克鲁玛主义党（即大会人民党——PCP）和属于丹夸/布西亚传统政党（即新爱国党——NPP）之间建立联盟的尝试从未完全成功过。全国民主大会指明这种安排的机会主义，它只能“重放阿卡阿证明其双重标准的电视片段和广播评论”[2]，从两个政党的阶层中选出候选人导致了同样具有损害性的争吵而没有最终达成一致的联盟官员名单。其他恩克鲁玛主义政党甚至没能完成自己的团结，只有在新议会中赢得席位的政党——人民全国大会党决定单独参选。1979年曾领导这个党取得胜利的希拉·利曼博士因健康状况不佳，最终将竞选人资格交给了并不出名的爱德华·马哈马（Mahama）博士。虽然马氏在阿克拉做事，但像利曼一样最初从北方起家。

在反对党不太完美的联盟表面之上，全国民主大会党依然决定建构其自己的联盟——进步联盟（Progressive Alliance）。它包括加纳全民党和民主人民党（DPP）；是否当选举上并不重要，但有了他们在一条船上就更容易宣称该联盟是真正的恩克鲁玛主义政党。罗林斯从来就不是伟大“加纳之父”的粉丝，显然全国民主大会党的经济政策和大会人民党遵循的经济政策全然不同。相反，联盟强调，它更关注的应该是大会人民党标榜的“平民”。[3] 对人民全国大会党的一些背叛也有助于这些声明，就像联盟选择了J. E. 阿塔·米尔为副主席一样。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温尼巴思想研究所、恩克鲁玛主义培训中心度过了很长时间。 230

然而，进步联盟并非没有发生伤害性的内部争吵。75名全国民主大会党下院议员被“中途淘汰，部分原因是内部派系竞争，部分原因是全国民主大会党在寻求提升其认为可以更好地在下届议会中勇敢地

① “The Great Alliance,” *West Africa*, September 2 - 8, 1996.

② Agyeman - 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88.

③ *Daily Graphic*, September 21, 1996.

面对大联盟正在面对的沉重压力的议会代表的质量”。[1] 除了经常包括声誉可疑的人之外，对于忠诚该党的人似乎缺少奖励。为了报复，许多被中途淘汰的在职人员抵制议会会议，这就进一步使全国民主大会各阶层内部的不满公开化。他们公开要求 2 000 万塞地作为“结束任期补贴”并要获得政府机构委员会和公务员工作的委任。[2] 进步联盟不像大联盟，它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收买和压制这样的抗议，提出一个单独的候选人名单。

进步联盟还享有其他超过其对手的优势。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新闻都是坏消息。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旅游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 50 000 人的微小数字扩展到 1995 年的解禁后的 300 000 人的数量。这一年，旅游业为国家创收 2.37 亿美元。[3] 像 1992 年开始之后每年一次的泛非历史戏剧节（PANAFEST）这样的事件将加纳融入了旅游国行列，特别是对于散居在外的非洲人的后裔。[4] 非传统出口也有巨大的增长，从 1984 年的微不足道的 200 万美元增长到 1996 年的超过 2 亿美元。[5] 这只代表了加纳总出口的大约 1/15，却标志着对很少几种特色出口产品经济依赖的摆脱。更为重要的是，大联盟并不真正拥有不同于全国民主大会党的经济政策。联盟中的老牌搭档传统政党基本同意政府的结构调整规划。它可以更有效地实行这个计划，因为它“在如何帮助个体企业和吸引外国投资方面拥有更胜一筹的专门知识”。[6]

缺少有说服力的民主承诺也是对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攻击。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在受到法庭挑战和面对来自独立报纸敌意批评的时候常

---

① R. Jeffries, “The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6: Towards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African Affairs* 97 (1998): 196.

② “MPs Demand Pay Off,” West Africa, July 22 – 28, 1996. 这相当于 1 1940 美元，以加纳的标准是笔相当大的数目。

③ ISSER. *The State of the Ghanaian Economy in* 1997 (Accra, Ghana: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1998), 138.

④ 1999 年，泛非历史戏剧节的日程中加入了“解放日”，以纪念被卷入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非洲人。

⑤ 这些非传统的出口物资是菠萝、芒果等水果和山药、腰果及各种海鲜。

⑥ Richard Jeffries, “The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6: Towards the Consolation of Democracy?” *African Affairs* 97 (1998): 194.

常退让，尽管不总是温文尔雅地退让。能够接受来自议会中没有席位的反对党批评是大选临近的最好标志。尽管反对派怀疑他是罗林斯的支持者，全国民主大会任命的选举委员会主席 K. 阿发利·吉安（Afari – Gyan）博士还是作出很大努力将所有党派聚拢在一起，让他们投入到选举中来。1994 年，他建立了党内咨询委员会，每月与党代表见一次面。尽管有些最初的政府反对派，但选举委员会还是编制了一份新的 1995 年选民登记册。为了满足反对派的另一个请求还颁发了带有照片的登记选民身份卡。大选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包括刚满 18 岁人员在内的补充登记，最后，在如何记票以防止任何操纵选举问题上对反对派作出了很多让步。 231

加纳与国际捐助者的良好信誉在使这些让步成为可能方面有很大帮助。尽管加纳的经济表现不总是那么令人瞩目，但他们还是要让即将到来的选举成为一个开放的典范和试图巩固其民主的其他非洲国家的样板。5 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提供了 2300 多万美元用于电脑设备和软件、选票、转运票箱、安全袋和选举工作人员的培训。选举受来自英联邦秘书处、欧盟、非统组织和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及一些地方人权组织观察员的监督，以避免像 1992 年那样是一次“被盗的裁决”。

1996 年选举

12 月 7 日，总统和议会选举开始。参选人数记录显示，注册 927 万选民中 77.9% 参加了总统和 200 名议员的选举。罗林斯获得 57.4% 的选票，库福尔得到 39.6% 的选票，马哈马获 3% 的选票。全国民主大会党赢得 134 席，传统政党 60 席，其同盟大会人民党 5 席，人民全国大会党 1 席。投票模式跟 1992 年选举非常相似，全国民主大会党很快为其公正和初步获胜辩护。像 1992 年的波汉一样，库福尔横扫阿散蒂地区，但罗林斯在加纳其他所有 9 个行政区获胜。在沃尔特地区，罗林斯再次取得压倒性胜利，横扫选票的 94.5%，但不仅是埃维同胞的种族忠诚参与。大量的非埃维人投票给罗林斯，而甚至在布朗—阿 232

哈福的阿肯地区，他都轻易胜过其阿肯人对手库福尔。尽管对北方的种族紧张关系很担心，罗林斯在北方的竞选也惊人地成功。传统政党仅在 3 个选区赢得了多数。

同 1992 年一样，罗林斯和他的全国民主大会党议会候选人在农村比在都市获得更大的成功，而传统政党在都市做得最好。正是在这些 233 地区，结构调整规划的影响最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从经济自由化中受益最多的较富裕的上流社会选区，全国民主大会党的竞选结果最糟糕。教育水平低下使人们认为罗林斯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发户。然而，生活水平较低的穷困选区仍然坚持支持全国民主大会党。罗林斯显然可以利用布西亚/丹夸等传统的大人物对人民缺乏真正关心引发的恐惧。他们也没有尝试寻求北方人或来自博尔塔（Bolta）地区的人出任党的领导人。一般说来，在农村及像阿克拉和塔科拉迪这样的多种族公社地区，这只“印证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阿散蒂傲慢的刻板见解”。[①] 全国民主大会党在农村的道路建设、电力和提供饮用水的记录很大程度上成为该党在这些地区获胜的原因。这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难确定。更重要的是，反对派认为“工程政治”在任何地区无差别地执行，这给人一个印象，罗林斯是“一个坚定执行其许诺的强大的领导人”。[②]

考虑到对选举自由的努力程度，反对派很难称它是一个“被盗的裁决”。然而，他们却争论着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正的，全国民主大会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在位的职权。他们抱怨国有媒体基本忽视了反对派，全国民主大会党利用政府的车辆搬走整个国家，并通过确保只有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支持者才获得国家的合同的手段，他们使传统政党潜在的支持者商人，在支持反对派上犹豫不决。结果，大联盟在财政资源上得到的很少。这在全国民主大会党竞选工作做得好的农村对

① Paul Nugent, “Living in the Past: Urban, Rural, and Ethnic Themes in the 1992 and 1996 Elections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Studies* 37, no. 2 (1999): 308.

② Paul Nugent, “Living in the Past: Urban, Rural, and Ethnic Themes in the 1992 and 1996 Elections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Studies* 37, no. 2 (1999): 205.

他们特别不利，因为他们不能有效地进行竞选游说。大联盟接受选举结果但带有很强的不满。他们发出“威胁，如果政府拒绝采取诸如2000年为反对党公开拨款以确保更为公正的竞争平台的措施的话将会发生什么”。①

然而，跟饱受争议的1992年大选相比，当库马西宣布五天宵禁，一位全国民主大会党塔科拉迪/塞康第地区主席被政治上的反对派从家里绑架后，遭到毒打，被火烧，直至死亡的时候，1996年选举期间或之后却几乎没有出现暴力事件。阿克拉的商业活动在投票前后停止了3天。在库马西禁止政治活动以防止对大选胜利的庆贺演变成暴力事件，但很快禁令就取消了。与1992年不同的还有，库福尔参加了罗林斯的第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因为他也宣誓就任下院议员。然而，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反对派的心服口服的失败提出了加纳是否实际上已成为一党制国家的问题。 234

① Jeffries,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6,” 2007.

第十二章　第二届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1997—2001

237　当杰里·约翰·罗林斯于1997年1月7日宣誓就任第二任第四共和国总统的时候，加纳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民选政府完成一届任期。他也成了这个国家任期最长的总统，任期6年，超过了与其最接近的对手夸梅·恩克鲁玛。根据1992年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这就成了他的最后一个任期了。此时的罗林斯只有50岁，正值其权力的顶峰。他是全国民主大会党仰赖的基石，没有他作为党的旗帜，2000年再次赢得大选是不可能的。他获胜之后不久，在全国民主大会党方面就出现了一个要改变宪法，将总统任期延长到7年的运动，以“让在位者有效地执行其党的政策”。他们还认为，这将“减少费用”，“不让加纳人熬过大选引起的频繁的焦虑期”。[①] 这样的修正要在一个激烈的公开辩论早已取代了早年的沉默文化的国家得到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

238　从第一届议会开始，很明显，反对派就想挑战被同样看做是威胁宪政的企图。他们要求财政部长夸梅·佩普拉（Kwame Peprah）在其作为部长行使职权之前要接受议会任命委员会的审查。因为在议会中

①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West Africa*, January 27 - February 2, 1997.

缺少赢得这项要求的多数，他们就像过去做的一样诉诸法庭。当这也未能阻止该部长提交年度的预算时，他们又一次上演了退出会议。他们以前已经使用过两次这种方法抗议其领导 J. H. 门萨所称的“将导致议会放弃其宪法义务的程序的开始”。最终，在实际上是象征性的抗议之后，反对派决定加入到预算的争论中去“以保证加纳善良的人民得到最好的结果”。①

因为有立法争议的挑战，这样做理由充分。在其预算演说中，夸梅·佩普拉宣布，政府意欲再次开征增值税。然而，这次要有一年的准备时间提供“足够的公众教育”。税率也将大大低于 10%，以便与 1995 年提出的 17.5% 相区别。这个“更合理、更公正、基础更广泛的税收”的制定旨在校正税收和花费之间的失衡。② 大选年支出已经加剧了这一局势，1996 年的通货膨胀大大高过前一年。佩普拉到 1997 年底减少至 15% 的许诺甚至遭到了独立经济分析家们的极大怀疑。根据一个阿克拉的非政府研究机构政治分析中心的报告，政府会在预算平衡上比以前做得更好是几乎不可能的。③ 曾任布西亚政府财政部长的 J. H. 门萨很轻松就能批驳反对派认为不提交报告的政府各部缺乏透明度的指责。

没有能力控制经济的最明显的标志是持续贬值的“溜冰鞋上的塞地”。1997 年 6 月，当塞地降至 2 000：1 美元的时候，它开始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引发这次贬值并造成税收和支出之间失衡的是加纳主要出口所走过的坎坷路。加纳第二重要的出口商品可可的世界价格在 1997 年略有上升，但第一重要的出口物黄金的价格却从每盎司 390 美元下滑到 350 美元，而 1996 年曾升至每桶 20 多美元的原油价格几乎仍保持在这个高度上。塞地全年都在持续贬值。最后，在年底，财政部长被解除结构调整规划主席的职务，取代他的是加纳银行“鹰派”

① “Walk - outs Galore,” *West Africa*, March 3 - 9, 1997.

② “VAT to Return,” *West Africa*, March 2 - 9, 1997.

③ “Is Ghana’ s Economy Shaky?” *West Africa*, June 23 - 29, 1997.

总管夸贝纳·杜福尔（Kwabena Dufuor）博士。[①] 他的处理国家高通货膨胀率和塞地贬值的策略是拒绝将导致政府赤字的信用检查。

1998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因为大旱减少了加纳阿科松博大坝10%的发电能力。幸运的是，石油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到大约每桶12美元，而可可的价格继续在世界市场上升。这些因素同加纳银行严格的货币政策一起将通货膨胀率降低到每年21%以下，该年的塞地只贬值了4%。但尽管这样也还是有代价的，实际上政府将赤字负担转嫁给了没有得到补偿的私营承包商。结果是经济活动的衰落、破产的上升和失业的增多。[②] 同时，给农业补贴的减少导致食品价格飞涨，这给了反对派许多批评这些政策的口实。

1999年，甚至这严格的货币政策所取得的很小的成果都随着石油价格的飞涨，可可和黄金价格的下降而遭到破坏。来自捐助国的资金也都滞后，政府维持紧缩开支政策的企图崩溃。政府寻求从中央银行大量借款，结果塞地价值锐减。1999年11月至2000年4月间，塞地汇率从1∶2 700跌到了1∶5 000塞地。这是自1991年允许塞地浮动，从而有助于货币黑市回归以来塞地最高的贬值率。2000年是大选年，政府增加费用以赢得选票的作法使这种情况恶化。到2000年年底大选之前，美元对塞地的汇率已经超过1∶7 000。通货膨胀戛然而止，到这个时候，通货膨胀率已达每年40%。

与这个暗淡的经济前景相伴的是当时冲击加纳最重要的外汇资源——黄金的冲击波。生产超过加纳黄金出口量60%的阿散蒂金矿公司由于其过度扩张性的对冲政策而几乎一夜之间就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在前10年里，臭名昭著的阿散蒂金矿公司一直能够保护其在同意长期将黄金以平均价格卖给买家的上下波动的市场中的所得。随着黄金价格从1987年的每盎司500多美元降低到1997年的300美元，以这种

240

① Eboe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The Paradox of Reform*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217.

② Eboe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The Paradox of Reform*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217.

方式对冲就特别成功。然而，在1999年6月，西方工业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出售他们的黄金储备，表面上是为了筹集资金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黄金的世界价格暴跌到每盎司250美元，来自像加纳和南非这样严重依赖黄金矿藏的非洲国家异口同声的抱怨立即出现。欧洲中央银行留意到这些抱怨，很快决定结束出售黄金。其结果是黄金价格的出乎预料的迅速回升，阿散蒂金矿公司不得不通过以实际上高出这些合同价值的世界市场价购买黄金来完成“长期合同”。9月，阿散蒂金矿公司发现自己因签署长期合同而欠美国金融机构5.7亿美元。[①]

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撤资行为将政府在该公司的股份从55%降到22%。然而，政府仍然是一个大股东，阿散蒂金矿公司的财政危机变成了一个大的政治问题。该公司的加纳籍首席执行官萨姆·乔那（Sam Jonah）和罗林斯总统之间糟糕的关系恶化了这一问题。他们在1999年早期一个新的阿散蒂亨选举问题上意见不同，这很容易让罗林斯责怪乔那的公司的“过度负债”是其“管理不善的结果”。[②] 可以拯救公司的选择也很矛盾。阿散蒂金矿公司的股价暴跌，公司很容易遭到收购。这种性质的合并是公司控股者隆明（Lonmin）所喜欢的。另一方面，加纳政府认为这将损害公司的加纳属性，它要卖掉一些非加纳人持有的份额已筹资还债。政府最终使用了否决权组织了一次收购并解雇了他们自己在公司中与隆明站在一起的阿散蒂金矿公司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遭解雇的人包括土地和矿产资源部部长以及时任该委员会主席的财政部长夸梅·佩普拉。乔那仅设法保住了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为了筹集资金，阿散蒂金矿公司最终决定出售50%的股权给坦桑尼亚一个潜力最大的矿山。

政治路线

由于经济如此混乱，反省国家的结构调整规划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

① Eboe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The Paradox of Reform*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85.

② “AGC Crisis Not Over,” *Daily Graphic*, February 23, 2000.

241 的大门就此打开。加纳独立40周年是在1997年，有许多人对重新审视恩克鲁玛的过去感兴趣，看会有什么样的教训可以借鉴。恩克鲁玛的一个儿子，杰马勒·果尔凯·恩克鲁玛（Gamal Gorkeh Nkruma）是加纳独立庆典的座上客。还有许多非洲国家的首脑及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回访者让这些庆典具有浓重的泛非味道。加纳第一位具有泛非视野的总统似乎特别生逢其时，前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重复恩克鲁玛的警告，非洲的经济拯救在于政治上的统一”。[①] 无论是政府的还是独立的，加纳的报纸都同样赞美恩克鲁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作为标志，库马西科技大学恢复了其最初的名字夸梅·恩克鲁玛科技大学。

但是，这个对恩克鲁玛主义兴趣的复苏不一定导致恩克鲁玛主义联盟的更加团结和使命感。解除大会人民党禁令运动导致了谁将继承这个名字的激烈争论。有个试图接过恩克鲁玛衣钵的政党大会党被高院传唤以暂时阻止其召开自己的全国大会。前总统希拉·利曼的政党——人民国家党拒绝加入任何恩克鲁玛联盟。全国民主大会党继续坚持它是真正的恩克鲁玛主义者的天然总部。尽管罗林斯以对‘加纳之父’冷静著称，该党一些最充满活力的领导人还是试图利用1996年大选前成立的阳台男孩女孩俱乐部（VBGC）吸引被恩克鲁玛传统点燃激情的年轻人。该组织的名字取自20世纪50年代到处闲逛并经常睡在加纳较大城镇主要街道商店的阳台上的失业青年。术语“阳台男孩”开始用于这些热情支持恩克鲁玛的不满者。从等级上看，他们构成了大会人民党的先锋队。

在全国民主大会里，也有对政府官员中不断滋长的腐败和该党内部缺乏民主的最基层的反应。全国民主大会的组织者也抱怨普通加纳人所经历的经济困难，这是对政府1997年实施的很不受欢迎的税收措施不那么含蓄的批评。结果是全国民主大会党内部改革运动的出现，由前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代表该党的左翼。

① “Who Will Claim the Mantle?” *West Africa*, July 7 - 13, 1997.

他们特别批评了被认为是多权力中心的党外执行机构。根据引发话题的周刊《公共议程》（*Public Agenda*）的说法，“在罗林斯的两个权力支柱之间隐约出现的是最后的摊牌。一方面是多年来维持秩序并将他扶上权力宝座的步兵。另一方面是政界的实权人物”。[①] 该运动的领导人古西·塔诺（Goosie Tanoh）太年轻，以致于不能在大会人民党的红火之时起作用，但其平民主义言论却大多清晰无误地具有恩克鲁玛主义的特色。 242

在全国民主大会党等级的划分中，更为重要的是谁将继承罗林斯成为该党2000年大选旗手的问题。修改宪法以使他能够继续担任总统的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这将会导致一个抗议的大潮，破坏加纳与捐助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继承人的斗争几乎引起冲突。总统夫人纳纳·科娜杜·罗林斯想要得到该党任命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除了产生关于开创这样一个先例的规则问题之外，她在与独立媒体的数次交锋中有众所周知的非常难缠的名声。然而，作为在1992年选举中确保妇女对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支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12月31日妇女运动（DWM）的主席，她拥有一个重要的权力基础。12月31日妇女运动也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得到基金，后来她被指控用这笔钱进行政治活动。她还利用阳台男孩女孩俱乐部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权力基础，得到一些该俱乐部最为重要的组织者的支持，其中就有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奥贝德·阿萨莫阿博士。很多人猜测，他将成为她的竞选伙伴，或他们可能一起脱离全国民主大会，联合全国民主大会党中的左翼和其他非传统政党的支持者成立一个新党。[②]

但是，罗林斯不支持其夫人当总统的野心很快明朗，相反，他开始为其副总统——阿塔·米尔斯教授接班做准备。在1998年6月全国民主大会在斯韦德鲁城市中心地区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他赞扬米尔斯的“勤奋工作和能力”。对于党内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对副总统将

① *Public Agenda*, August 11 - 16, 1997.

② P. Nugent, “Winners, Losers, and Also Rans: Money, Moral Authority, and Voting Patterns in the Ghana 2000 Election,” *African Affairs* 100 (2001): 414.

成为2000年大选全国民主大会总统候选人的认可。[①] 这个"斯韦德鲁声明（Swedru Declaration）"就像其为人所知的那样，显然成为一次解决继承问题的尝试，但这样做的不民主方式格外激怒了改革运动的成员。他们最终于1999年从全国民主大会党中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全国改革党（NRP），古西·塔诺成为其总统候选人。

243 甚至在此之前，当1997年12月阿萨莫阿家中有大笔金钱被盗的时候，卡纳杜-阿萨莫阿（Konadu - Asamoah）联盟就已经开始崩溃了。据称，罪魁祸首是他的助手，但他将一包一包的塞地藏匿家中引出了各种各样令人尴尬的问题，这些钱来自哪里？用于何处？全国民主大会党高级官员开始质疑阿萨莫阿与阳台男孩女孩俱乐部的活动，因为后者是一个其成员并非全国民主大会党成员的组织。他声称这是一个将前恩克鲁玛主义者吸引到进步联盟中来的重要计划，但在做此声明的时候他开始疏远罗林斯夫人，后者最后停止从DWM资金中为其提供支持。随着阿萨莫阿的星光开始黯淡，她意识到自己作为米尔斯的竞选伙伴参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一共才有一张入场券。她作为一个阿散蒂人而米尔作为一个芳蒂人，这在罗林斯将其形象地比作政府的"世界银行"的沃尔特地区令埃维人不安。

阿萨莫阿仍希望将成为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因为他非常熟悉全国民主大会内部的工作。他一定想过，这个位置只要他想要就一定是他的。然而，作为这次选举激烈程度的标志，直到2000年9月大选前的3个月，这个决定才最后做出。当米尔斯最后宣布谁是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选择的不是阿萨莫阿而是其副手马丁·阿米杜（Martin Amidu）。除了显然不想被在全国民主大会党中根基更好的阿萨莫阿挡住外，阿米杜有一个重要的优势，他是北方人，这会使重要地区和种族的候选人名单平衡。米尔斯和阿萨莫阿作为芳蒂人和埃维人也会这么做，但作为一个北方人在党内会有持续的压力。提议一个北方人作副总统候选人可谓使北方选区的规模在重要性上足以使沃

---

① "Gospel According to Rawlings," *West Africa*, January 18 - 31, 1999.

尔特地区黯然失色，这一地区毫无疑问将继续像过去一样以压倒多数支持全国民主大会。

所有这些政治阴谋的结果对于全国民主大会党都会有严重影响。阿萨莫阿被丢弃之后，他公开从对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支持中退出，但从这时候开始，他也从积极参与选举活动中退出了。因为他是全国民主大会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这造成特别大的损害。米尔斯没有做任何要解除他职务的表态。当竞选开始的时候，米尔斯被迫依靠“启动一些公共工程以取得公众的注意”。[①] 然而，随着经济困境和早已严重的预算赤字的迫近，公共工程远比 1996 年时要少得多。该党像 1996 年一样再次将自己打扮成包括加纳全民党和民主人民党在内的进步联盟，但两党在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弱势地区都既不拥有自己的资金，又不拥有多数的支持。 244

全国民主大会党也试图避免 1996 年大选中出现的选区一级的激烈竞争。那次，富有的候选人买通了选举委员会成员以取代任内的国会议员，因此没有初选。这次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民主大会党决定不举行初选，大多数任期内的国会议员有效，其他人由该党来选出以“避免 1996 年的不体面的争夺”。[②] 然而，这加深了全国民主大会党内部缺乏民主的印象，“关于强加给地方党组织不受欢迎的候选人……的喧闹的抱怨”[③] 不断。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候选人会被全国民主大会的选民所拒绝，但支持他们的人数可能要比 1996 年低得多。对在许多情况下都很少在其选区出现并且没做过什么的候选人缺乏热情，将对全国民主大会党维持国会中多数的能力有重大影响。

反对派的挑战

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混乱不一定就转化为传统政党[④]的优势。在传

① Nugent, “Winners, Losers, and Also Rans,” 415.
② 对该党活动家 T. Aidoo 的采访，引自前引书，第 416 页。
③ Nugent, “Winners, Losers, and Also Rans,” 416.
④ 指新爱国党。——译者注

统政党的成员内部也有很多关于谁将在2000年大选中成为党的旗手的争斗。1996年总统候选人J. A. 库福尔不是下议员，最终被那些在任的直接挑战全国民主大会立法倡议的人所遮蔽。他们中有很多人作为他的主要挑战者出现。最重要的两名是传统政党的少数派领袖J. H. 门萨和另一个传统政党国会议员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iffo－Addo）。后者很快成为最重要的挑战者。他比门萨年轻20岁，来自显赫的加纳家族。[①] 他父亲曾一度担任加纳首席法官，而他本人有在20年代末挑战军事独裁统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他很容易成为3人中最善表达的人，对党的年轻支持者更有吸引力，也是加纳独立媒体青睐的人选。

除了这些对手，库福尔还不得不对付该党主席，曾是阿杜·波汉支持者的彼得·阿拉·阿杰蒂（Peter Ala Adjetey）的敌意。尽管后者健康状况欠佳，并不会再次参选，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发表尖刻的关于库福尔无能的公开讲话。为了反击这些攻击，库福尔竭尽全力控制该党的选举协会。他认识到，传统政党旗手的人选最终会尘埃落定。同时，他试图尽可能超然事外，不像阿杜·波汉那样经常卷入有争议的问题。他在党内保持良好口碑的主要策略是参加党的忠诚战士的葬礼，并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参加国际大会。最重要的是，他想让该党旗手的人选在大选前一段较长的时间就选出，在其支持者的帮助下，他使党同意在1998年党的大会上完成这一工作。[②]

245

阿库福－阿多通过有条不紊地巡游全国并得到自由媒体和加纳超过30个电台的大量宣传来反击这些举措。但是，对于他的竞选不幸的是，他给人留下一个优雅而自命不凡的印象甚至到了其反对派说的过分绅士的程度，而远不像库福尔那么平易近人。[③] 然而，大多数独立

① 门萨72岁，而阿库福则53岁。

② Ivor Agyeman－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A Biography of J. A. Kufour* (Trenton: N. J.: African World Press, 2003), 94.

③ Ivor Agyeman－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A Biography of J. A. Kufour* (Trenton: N. J.: African World Press, 2003), 97.

报纸都确认阿库福－阿多将赢得选举。[①] 这次竞选中还有另外4名候选人，可笑的是，最初的领跑者J. H. 门萨最终却落到了最后，只得了3票。他在大会的演讲中犯了个错误，挖苦地抨击库福尔，称他是一个"过时的木薯"，这使那些想要支持他的人疏远了他。[②]

通过很早就解决了谁将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传统政党可以避免1996年所犯的竞选开始过晚的错误。另一方面，竞争非常残酷使已经输掉它的人被边缘化了。有人公开表示支持库福尔，但几乎没有人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巨额债务从1996年竞选时就积累下来，库福尔尝试从英国和美国的加纳人社团筹款，但不太成功。大会后不久，许多高层人士辞职或背离了该党。第一位是传统政党创始人之一并充当该党主要代言人的琼斯·奥福里博士。他声称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能够为和解而工作，但全国民主大会党的解释是对库福尔领导选举的没有信心。更具伤害的是库福尔自己的竞选部长阿尔哈吉·伊萨卡·伊努萨（Alhaji Issaka Inusah）倒向了全国民主大会党。可能这是因为他没法确保作为传统政党议会候选人的提名，但对于全国民主大会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政变，他们利用这件事向人们展示传统政党的队伍是多么混乱。 246

对后者而言，选举一位副总统像对全国民主大会党一样是个挑战。对于许多传统政党的支持者来说，一个库福尔－阿库福－阿多式的候选人名单似乎最有吸引力，因为这将会使库福尔的"温文尔雅的成熟"同阿库福－阿多的"对青年的清新吸引力"结合在一起。[③] 也有将库福尔与传统政党副主席，第二共和国总统科菲布西亚的女儿阿玛·布西亚配对的议论。在加纳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么配对，除了性别的平衡外，通过与这个"被认为是当时由传统政党代表的所谓丹夸－布西亚传统的精神之父"的男人建立联系还会有巨大的"鼓舞人

① "It' s Kufuor Again," *West Africa*, November 9 - 22, 1998.

② Agyeman - 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99.

③ "NPP——Search for Fitting Running Mate," *West Africa*, November 29 - December 4, 1999.

心的"效果。[①] 然而，因为这与更重要的维持种族和地区平衡的需要相抵触，所以也不适用。布西亚和阿库福－阿多像库福尔一样都是阿肯人，他最终于2000年9月正式提名一位北方人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他选择的人阿尔哈吉·阿柳·马哈马，一位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相对名气不大，但被誉为有钱人，这是库福尔竞选所急需的。[②]

大选

在前两届大选中，现任职位是执政党的一个重要优势，但在2000年大选中，优势却并不明显。当竞选于9月真正开始的时候，世界可可价格跌破每吨不到900美元的记录，而同时油价却升到了超记录的每桶30美元。这一年政府不得不3次提高石油产品的价格。增值税于1999年实施，之后很快升至25%。塞地似乎在自由下落，这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加纳人依赖的进口物品的价格。面对这些生活费用的增长，工人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7月，工会代表大会进行了3—4个小时的示威，抗议政府拒绝其提出的可接受最低工资的谈判。尽管竞选在9月份就要开足马力了，局势对于财政部长夸梅·佩普拉来说足够严峻以致他公开拒绝工会代表大会的要求。[③] 这几乎很难成为对执政党有利的条件，而只能宣称经济是不利的贸易条件的受害者。他们的竞选口号是"逐步改变"，想要强调其日积月累的政府经验，而反对派却缺乏经验。挣扎中的经济似乎并不支持其这一宣传。

247

传统政党如其口号说的那样非常有效地选择了"积极改变"的需求。通过这样做，他们"让全体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不喜欢的全国民主大会政府的所有事物上来，然后去想象另一种景象。"[④] 这意味

① "NPP——Search for Fitting Running Mate," *West Africa*, November 29 – December 4, 1999.

② Agyeman – Duah, *Between Faith and History*, 111.

③ "Govt Can't Afford ¢5, 500," *Daily Graphic*, September 8, 2000.

④ Nugent, "Winners, Losers, and Also Rans," 418.

着传统政党不必特别关注其将进行的改变，而是声称自己是有理想的政党，和全国民主大会党相反，是行家里手，一个众志成城的政党。这也的确是加纳记者协会、加纳广播协会和一家美国基金会自由论坛组织的总统论坛（Presidential forum）上的主旋律，这次论坛在加纳历史上第一次将7个政党中的6个政党聚在一起做竞选辩论。只有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旗手——阿塔·米尔斯教授缺席，称对论坛的“外国导向”担忧，另一个原因是他作为副总统的繁忙日程。[1] 较小的政党对于经济都有非常具体的抢救方案，一致批评全国民主大会党对外国援助的过分依赖。他们不大可能取代当政的全国民主大会党，也不可能与国际财经机构打交道，所以能够表达这个民粹主义立场。重要的是，库福尔更注重德政的问题。

高官的腐败再次成为主要问题。在1998年的国会开幕会议上，罗林斯承认kalabule多大程度上以新的伪装出现。[2] 他自己的正直一直受到指控。在是年末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他被迫宣布自己是不可收买的，以平息他接受了当时已故尼日利亚国家元首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将军500万贿赂的谣传。很难平息其他国家官员腐败的传言。《加纳纪事》刊登了一篇揭露威胁退休金供款的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信托（SSNIT）之弊端的文章。[3] 危害更大的是时任规划、地区合作与整合部长的夸米纳·阿霍伊德（Kwamena Ahwoid）的活动。他同其弟弟一起利用政府的门路从可可销售局拿下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恢复可可农场的合同。独立新闻很快提醒加纳人，罗林斯的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府似乎已经任命了8位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行为如出一辙。

248

总的说来，以前将自己打扮成革命者的人都变成了企业家，许多人并不依靠其官方俸禄生存。多数党领袖J. H. 奥乌苏·阿昌庞的事例被媒体广泛报道，他以超过75 000美元的费用将3个孩子送往美国

---

① “We' ll Tackle Economy,” *Daily Graphic*, September 28, 2000.

②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wlings,” *West Africa*, January 18031, 1999.

③ *Ghanaian Chronicle*, October 4 - 5, 2000.

大学读书，而他的政府工资还不到每年 6 000 美元。罗林斯夫妇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关注。他们将其女儿送往国外学习。对此，罗林斯被迫在阿克拉调频广播电台公开答辩。[①] 曾几何时，加纳因为没有教材及其他基础教育必须品而使孩子们无法通过基础水平考试。所有革命理想被资本主义行为取代的最好象征是总统本人外观的转变。瘦高，几乎是憔悴的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空军上尉和早年在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形象，早已演变成一种对其身材变化而言特别令人敏感的肥胖的政客形象。

传统政党也高调赢取青年的选票。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出生在 12 月 31 日革命之后。对他们来说，得到教育和工作的困难比全国民主大会党唤起的革命的过去更为让人关注。传统政党更好地利用了这个不满，使之不受过去历届大选中表现的呆板形象的影响。在加纳许多地方兴起的健身俱乐部成为传统政党吸引青年的一个很好的标志。俱乐部成员自觉地慢跑过城市，“跑向心不在焉的全国民主大会党支持者”，吸引了其他青年选民加入他们的行列。[②] 对于这些传统政党的支持者，全国民主大会“没有过多地留意青年人”。[③]

与 1996 年大选也不同的是，传统政党没有寻求进入任何其他竞选联盟，尽管竞选联盟比 1996 年大选要多。像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形一样，不断增长的民主化导致了党派的繁殖，其中一个便是从传统政党分裂出来的加纳联合运动（UGM）。其领导人查尔斯·沃瑞克－布拉比（Wereko-Brobby）成为第一位挑战政府的媒体垄断地位的人。他于 1994 年成立了埃维人广播电台——一个调频广播电台。他在反对增值税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与阿库福－阿多发生了冲突，因为二人都有做总统的野心。249 这很像全国改革党的出现，全国民主大会党中年轻激进的成员分裂出去，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加纳统一运动党和全国改革党在大选中都

① *Ghanaian Chronicle*, June 26 – 27, 2000.

② Nugent, “Winners, Losers, and Also Rans,” 420.

③ E. Gyimah – Boadi, “A Peaceful Turnover in Ghana,” *Journal of Demacracy* 12, no. 2 (2001): 104.

没有太多的机会，但他们显然不可能与其父母党建立联盟。

加纳政治结构中的恩克鲁玛主义派也经历了1996年大选中惨淡表现之后的巨大反思。一个派别最终赢得了称自己为大会人民党的权力。他们的旗手是位于莱贡的前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和曾经身为格贝德纳的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成员的老牌的恩克鲁玛主义者乔治·黑根教授。不是所有的恩克鲁玛主义者都来到了大会人民党的旗帜之下，另一个国家自由主义者联盟成员丹尼尔·拉蒂（Daniel Latey）就建构起大联合人民党（GCPP）。再次像1996年大选的情形一样，人民全国大会党也不愿意加入其他恩克鲁玛主义者，其旗手是爱德华·马哈马博士。这些政党对全国民主大会党比对传统政党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分化反对派的潜在选票。然而，当传统政党试图与恩克鲁玛主义的大会人民党联系时，随着大联盟所表现的软弱无力的记忆，任何想重蹈覆辙的动机都已不复存在。

在2000年大选中，执政党也丢掉了过去一直享有的对媒体的垄断。有30多个调频广播电台开播电话交谈节目，为各种思想提供舞台。此外，因为有两个独立的电视台，加纳广播公司也失去了对电视播放的垄断。同《加纳纪事》、《远征指南报》（*Crusading Guide*）和《公共议程》这样的私人报纸一道，独立媒体在平整政治环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反对派也可以走近国有媒体。国家的广播和电视每天都有自由时间给所有注册的党派，加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国有的《人民每日写真报》也有公平与客观报道的准则。

选民登记的激烈斗争是这一公正的标志。全国民主大会想要将指纹身份证作为可接受的选民注册的证明，但反对派害怕这将为假身份证参选打开大门，所以只承认照片身份证。根据全国民主大会的说法，禁止指纹身份证将伤害农村选民，因为他们不太有文化，不能掌握照片身份证的更为复杂的程序。约150万选民可能受到了这个决定的影响，许多人是农村选民，全国民主大会党与他们一直关系良好。然而，选举委员会最初站在反对派一边，但全国民主大会党诉诸最高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反对派遭到了失败，

250

但报纸上对斗争的广泛报道却给予他们重温所有以前全国民主大会称为为了选举目的而滥用国家资源的例证的机会。群情激愤，呼吁抵制大选。

像1996年大选的情形一样，国际社会也将这次选举看做是非洲民主政体发展的关键，所以投入1 700万美元资金。这大大少于1996年大选的投入，但由于从以前的选举中学到了许多，最好为资金设定目标。[①]例如，英国在为将指纹身份证变成照片身份证提供资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对化解争吵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许多捐助者捐助了大选的监督系统，与1996年不同，这次主要是由地方机构执行的。在电视摄像机和记者在场的协力下，这些观察员在保证选举公正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实际选举之前，有各种关于如果选举是全国民主大会获胜将阴谋阻挠选举的传言。许多传言都指向罗林斯，他仍然是制造了许多矛盾讲话的焦点。罗氏在讲话中或攻击选举委员会，或宣称若反对党获胜的话，将威胁到国家的和平稳定。

结果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担忧且有几件暴力事件出现并直指选举，但12月7日这个选举日却非常平静而有序，只有上东地区的包库（Bawku）中心选区有些例外。那里，酋长地位的争论起了选举争执，7人在冲突中死亡。[②] 总的来说，民间和宗教组织是帮助维持和平选举的关键。选民参选人数比1996年大选人数低很多：61.7%对77.9%。重要的是，这个下降在传统上一直支持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地区是最高的。传统政党认为这是个确凿的证据，它证明1996年选举在这些地区存在两次投票和未成年人投票的现象。可能对这种现象更现实的解释是许多对其党的候选人并不热心的全国民主大会党支持者放弃了投票。城乡251 差别比以前的大选甚至更明显，除了沃尔特地区的霍城（Ho）和上西

① E. Gyimah - Boadi, "A Peaceful Turnover in Ghana," *Journal of Demacracy* 12, no. 2 (2001): 111.

② "Power to the People," *West Africa*, December 18, 2000 - January 14, 2001.

部省的瓦城（Wa），传统政党在主要城市区赢得了所有席位。像以前的竞选一样，此次大选是一次全国民主大会党和传统政党之间的双人竞赛，其他党派只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选票，大多数选票集中在大阿克拉地区，只有人民全国大会党例外，得到近 200 000 张选票，大多在北部地区。第一轮总统候选人的选举结果，J. A. 库福尔赢得 48.2% 的选票，而 J. E. 阿塔·米尔斯赢得 44.5% 的选票。传统政党赢得 100 个国会席位，全国民主大会党 92 席，人民全国大会党 3 席，大会人民党 1 席。

1992 年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赢得至少 50% 的选票方可当选，这意味着在库福尔和米尔斯之间要有一场对决。6 个反对党成立了一个竞选联盟反对全国民主大会党，作为报复，全国民主大会党寻求种族忠诚。他们在西部和中心地区"力劝酋长和人民""'振作起来'投票支持他们自己人"芳蒂人阿塔米尔斯，而不是投票支持一个阿散蒂人库福尔。[①] 总的说来，全国民主大会党利用的是长久以来的对埃维人和阿散蒂人、加人统治的恐惧，而传统政党求助的是沃尔特地区的埃维人，他们的票有 88% 投给了米尔斯，以求走出孤立，加入到国家其他地区的行列。这次竞选的 3 周时间也以对个人攻击的增多为标志，两个候选人互相败坏对手及其竞选伙伴的名声。加纳历史上第一次电视"政治辨论"在促成"一次惨烈的媒体智慧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②]

尽管竞争白热化，大选的结果是从来不存疑问的。库福尔以 56.73% 对米尔斯的 43.27% 相对轻松获胜。显然在第一轮选举中支持小的反对党的人实际上在最后的选举中支持了库福尔。参加投票的人也有小幅的下降，下降到了全体选民的 59.8%，这可能再次影响了米尔斯而不是他的对手。然而，总的来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投票转变并给人以假象，认为加纳人就应该投票支持在任者以报答他们。显然还存在着对

---

① Gyimah - Boadi, "A Peaceful Turnover in Ghana," 108.

② "It' s Been a Fierce War on the Airwaves," *Daily Graphic*, December 27, 2000.

阿肯人政治家巨大的不信任，尽管传统政党在努力消除这种恐惧。

对于这个结果全国欣然接受，可怕的暴力语言没有出现。实际上，253 这次大选在加纳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一个执政的政府第一次通过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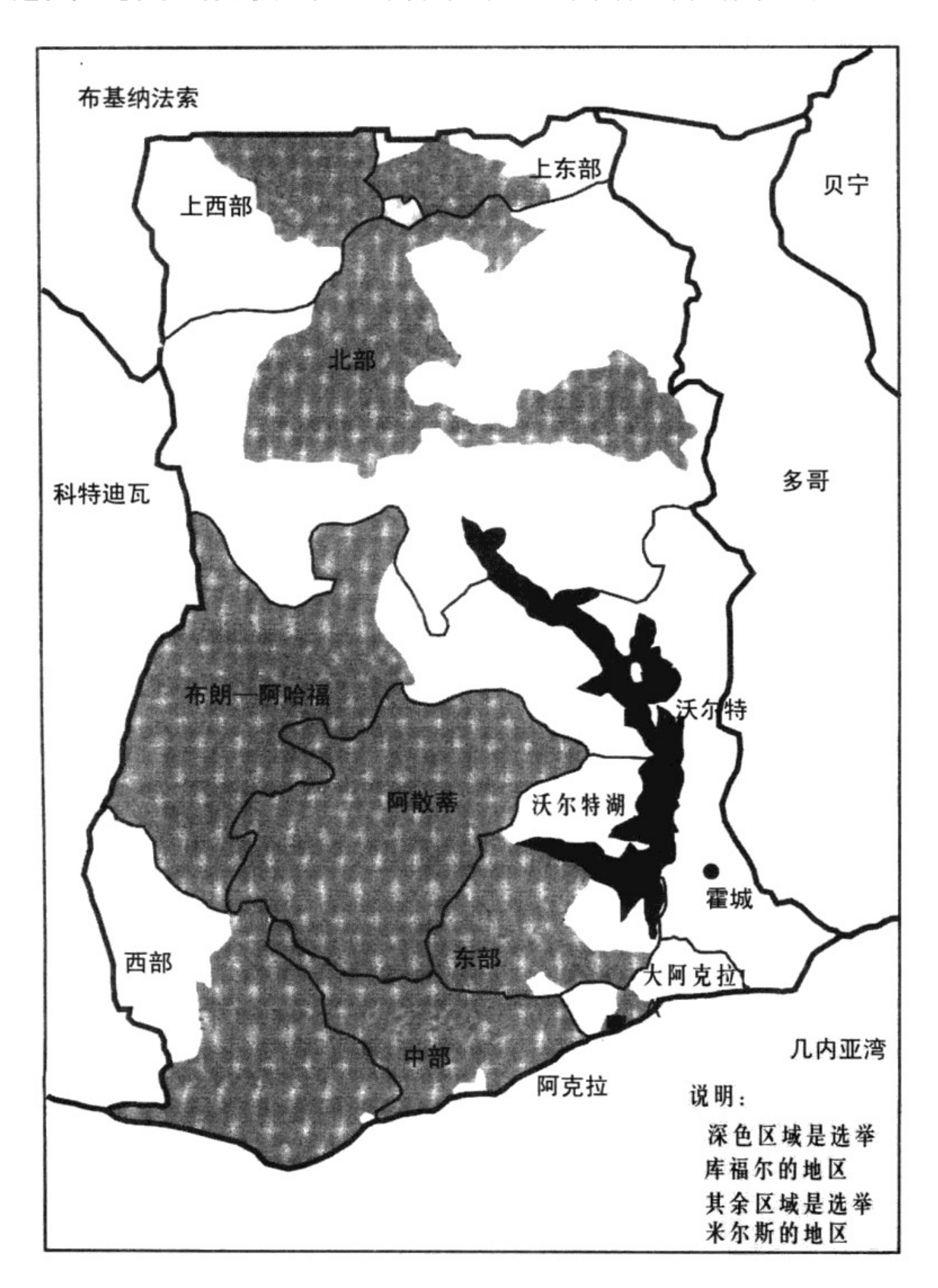


图 9　2000 年总统选举形势

法手段被取代。第二轮选举也是少见的，第一次整个反对派集合在一起，克服一直是反对派运动主要弱点的不团结。这次团结甚至在大选之后仍在继续，传统政党将许多部长的任命都给予了支持它的政党的党魁。竞选的透明度和强加给竞争政党的问责制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被迫召开新闻会议，发表声明来反驳或解释立场。甚至过去把官方信息当作国家机密的官员都被迫泄露关于谁从国家支持的海外医疗中获利或谁以什么价格购买了国有企业的信息。

竞选和传统政党的胜利也对加纳社会产生了一个使人更为自由的效果，"被当地作为加纳'第二次独立'来庆贺"。这是"一次选民力量对武装力量的强有力的展示"。[①] 这次"解放"在电波中最为引人注意，大量过去被赶出国家媒体的人作为分析家和评论者参与进来。以前的全国民主大会政府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一直忽视他们的批评。新的传统政党政府将来这么做显然非常困难。

对于全国民主大会党，此次失败对其士气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出现许多自我批评的声音。缺少内部争论、党的队伍内对竞选资金的贪腐，最重要的，领导权的问题是被提出的主要问题。内部对抗似乎曾一度有造成党内分裂的危险。该党显然失去了执政党的有利条件，好像也失去了过去曾提供过最为重要资金的 12 月 31 日妇女运动的支持。[②] 另一方面，该党在国会中享有许多代表席位，这使其成为一个潜在的比过去传统政党更有力量的反对党。但即使这样，仍有未知的"水域"。如果全国民主大会党在 2004 年大选中获胜，传统政党通过诉讼和退出的方法挑战全国民主大会立法动议的策略就远远不够了。

毫无疑问，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前总统究竟是个什么角色。罗林斯仍然是个精力充沛的 53 岁的政客，并在其权力的高峰。他曾两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主席。其在位的最后一个时期中，他已经成为一个被世界认可的领袖，迎接过访问非洲的第一个美国总统比尔·克

① Gyimah - Boadi, "A Peaceful Turnover in Ghana," 112.

② Nugent, "Winners, Losers, and Also Rans," 428.

254 林顿到加纳，不久后又迎接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他如此掌控着大选以致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旗手阿塔·米尔斯看上去就像是“副驾驶”。[①] 后者甚至做了破坏性自白，如果当选，他将每天24小时地请教罗林斯。他的内政只在风格上不同而“不是根本上”。[②]

国际社会试图让罗林斯从这一局面中顺利走过，呼吁他自己萌生留下一笔积极遗产的政治家的感觉。联合国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于2001年称他为一个“知名人士”并认为他将志愿者的精神传遍整个世界。[③] 实际上，大选之后他成为一位开始影响加纳的讨论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问题论坛的异常活跃的参与者。然而，对他与加纳军界联系的担忧却依然存在。大选期间有几次全副武装的军人作为安全人员出现在投票站唤回了人们对过去政变时的不安记忆。[④] 最为令人不安的是，不可避免的对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期间滥用职权的重新检查，罗林斯无疑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库福尔在竞选期间曾许诺他将建立一个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的机构，非常像当时调查种族隔离统治下滥用权力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罗林斯期待这一倡议的兑现，他在2000年1月最后的国会演说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道歉”。这显然不足以令那些认为他们不只是像罗林斯所说的“做错事的人”的那些人满意，而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人”。[⑤]

① Nugent, “Winners, Losers, and Also Rans,” 415.

② “High Office is No Personal Prize - Mills,” *West Africa*, May 15 - 21, 2000.

③ Gyimah - Boadi, “A Peaceful Turnover in Ghana,” 111.

④ Gyimah - Boadi, “A Peaceful Turnover in Ghana,” 109.

⑤ “Rawlings Qualifies Apologies,” *West Africa*, January 31 - February 6, 2000.

第十三章　传统政党当政：2001—2004

艰巨的任务

恰与传统政党2000年大选获胜相伴的是阿克拉足球俱乐部阿克拉橡树之心（Accra Hearts of Oak）获得非足联非洲足球联盟杯的胜利。这是加纳足球俱乐部第3次捧得该杯，这次胜利增加了弥漫于“足球疯狂王国”[①] 的兴奋感。库福尔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利用了这一“自发的欢乐和友好感情”勾勒了他认为将是其政府的主要目标。他许诺打造“未来的团结”。“过去动荡的时代不会被忘记”，但他也说“我们试着原谅”。他还承诺“对腐败的零容忍”并表明要树立一个个人榜样。他呼吁“继续支持并得到外国朋友的帮助”，强调需要减免债务，这样更多的国家税收才能被用于经济建设。他号召加纳商人带领国家进行经济转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许诺“要开始一个商业企业的黄金时代”，在下一个10年里改变加纳人的生活。[②] 257

作为新政府决心创造团结的标志，它给反对党领导人一个姿态。大会人民党的旗手乔治·黑根教授被任命为国家文化委员会（NCC） 258

① 这是库福尔总统（阿散蒂科托科足球俱乐部前执行主席）在向非足联陈述如何支持加纳队成功进军2008年非洲杯时的描述。

② “Launching a ‘Golden Age’,” *West Africa*, January 15 -21, 2001.

主席；加纳统一运动党总统候选人沃瑞克－布拉比博士被任命为1961年成立的管理沃尔特河水电工程的沃尔特河管理局局长；曾是大会人民党的一位中坚力量，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管理学博士帕阿·奎西·恩多姆（Paa Kwesi Nduom）博士被任命为能源部部长。他后来在部长级层面继续升迁成为经济计划和区域一体化部的部长。

库福尔就任后要出访多哥6天的决定更为引发争议。这次访问加纳东部邻国的幕后原因是通过向其老朋友纳辛贝·埃亚德马总统“伸出橄榄枝”来实现区域团结。[①] 这位总统曾经常和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争吵。随着加纳西部邻国科特迪瓦的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混乱，这次访问似乎特别恰逢其时。在库福尔就职那一天，西非最稳定的国家出现未遂政变。吞噬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暴力在蔓延，与多哥保持良好关系似乎非常符合加纳的国家利益。然而，在加纳和多哥都出现许多抗议。对于两国的反对党，西非民主最闪亮的榜样要拥抱该地区最长时间的军事独裁领导人似乎“令人费解”。[②]

之后不久，库福尔访问尼日利亚以加固与西非最重要国家的关系，罗林斯曾与之展开为实现饱受战火蹂躏的区域实现和平的工作。除了大力推进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经济一体化，如开启该地区的共同货币，库福尔也与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探讨有争议的加纳所欠尼日利亚的巨额石油债务的问题。有人建议，加纳政府应该减少提供给其人民购买石油产品的大量补贴，这已经导致了加纳炼油厂这些年出现了巨额债务，还引起了向临近国家的大量走私。这些国家的石油比加纳的石油价格要高出1倍还多。库福尔显然感到了，解决这些困难问题需要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的讨论。总的来说，他感到应该经常出访以维护其国家利益。这些访问似乎没完没了且花费巨大的特性成为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一个争论焦点。

259

为了应付动荡的过去，他快速行动，让司法部长起草从速公布武

① “Arguments over Kufuor Visit,” *West Africa*, February 12－18, 2001.

② “Arguments over Kufuor Visit,” *West Africa*, February 12－18, 2001.

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时期国家得到的财产的指导原则。全国民主大会政府已经归还了大量这样的财产，特别是像房子这样的较小的财产，但仍保留了私人企业。它们被国家没收，后来变卖或转交给跨国公司。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拥有者是印度人或黎巴嫩人。在其他情况下，有问题的房产都状况不佳，有待修理，而谁应该承担翻新费用是问题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那么容易。

库福尔还承诺建立一个全国和解委员会（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NRC）"为那些委屈的没有机会表达其不满的人提供一个论坛以提升全国和解的目标"。[1] 要研究这个机构如何起作用和什么时间开始很快成为饱受争议的问题。将调查限于罗林斯时期显然被看作是全国民主大会支持者的政治动议。围绕着坦白是否意味着给予宽恕或自证其罪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于6月在阿克拉召开了国际会议研究这些"烦人"的问题。[2]

为了进一步取得和过去的和解，库福尔政府还允许3个前国家首脑和5个1979年被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处决的军事官员的遗体被挖出并交给其家人，安排一次比1979年举行的更合适的葬礼。他希望这可以"让加纳历史上许多悲伤事件中的一个落幕"。[3] 同年晚些时候，为8个人举行了一次联合宗教仪式。[4] 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这个和解行为，因为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政府感到该决定树立了一个坏的先例，将点燃早年政变被执行死刑者的家属如法炮制的火花。最为令人不安的是，他们承认这个举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让步，像取消1992年宪法过渡性条文的赔偿条款。这使那些执行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和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命令的人免受起诉。

传统政党政府同样着手处理严重腐化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他们自己部长中的一员为其提供了第一次展示"对腐败零容忍"的

---

① "Kufuor Promise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West Africa*, February 26 - March 4, 2001.

② "Reopening Wounds or Reconciliation?," *West Africa*, June 25 - July 1, 2001.

③ "Reburial for Executed Generals," *West Africa*, May 14 - 20, 2001.

④ "Ghana Buries (some of) its Past," *West Africa*, January 14 - 20, 2002.

260 机会。仅在他被任命为青年和体育部部长后两周的时间，马拉姆·尤西夫·伊萨（Mallam Yusif Isa）就因为“丢失”用来支付国家足球队“黑星”在世界杯赛对苏丹的1/4决赛之后的46 000美元奖金而被免职。最后，他因“造成国家财政损失”被起诉，被判有罪，判处4年监禁。[①] 之后不久，因其具有政治意味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指控前财政部副部长维克托·塞洛梅（Victor Selormey）造成国家财政损失超过100万美元。该案恰在将加纳的法庭记录开始输入计算机时出现。100多万美元被付给了一位无所事事的私人顾问。最后，塞洛梅因此受审，被控有罪，判处8年监禁。[②] 对于反对党，这个定罪特别令人难堪。定塞洛梅有罪的法律是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于1993年通过的。

塞洛梅案之后不久，政府以类似罪名起诉前财政部长夸梅·佩普拉博士、前农业部长阿尔哈吉·易卜拉欣·亚当（Alhaji Ibrahim Adam）、总统的参谋总长纳纳·阿托·达志（Nana Ato Dadzie）和两位卷入造成国家200万美元丢失阴谋的罗林斯政府的官员。这桩被称作“优质粮食事件”的丑闻诞生于一个在沃尔特地区种植稻子以减少国家进口大米的计划。受控官员让加纳政府承担了近2 000万美元贷款的义务而并没有国会的批准。这笔钱中至少有600万从来没有投到稻米项目上来。[③] 这个丑闻牵涉一位很有魅力的非洲裔美国女商人。她最终被美国地方法庭判定欺诈，被判15年徒刑。该案在报纸上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将罗林斯本人牵扯进来的浪漫情感的传闻。像以前的腐败审理一样，这一次也使用了一个速审法庭。这些法庭被建立起来以加速加纳那臭名远扬的司法体系的车轮。[④]

早在2002年，加纳国家石油公司（Gha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前总经理，也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接受速审法庭审判的查

---

① “The 75 - day Inquiry into the Missing $46, 000 Ends Mallam Issa Jailed 4 yrs——Lawyer to Appeal,” Daily Graphic, July 21, 2001. 他还被责令退还钱款，否则将面临另外的刑期。

② “Corruption, Justice and Party Politics,” *West Africa*, December 17 - 23, 2001.

③ “Quality Grain Scandal can’ t be Justified,” *Daily Graphic*, May 1, 2001.

④ 它们与普通法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微机化，而后者的法官则要通过手写吃力地转录庭审记录。

楚·齐卡塔（Tsatsu Tsikata）暂时停止了这些法庭活动。因为他赢得了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些法庭非法。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很容易将他的案子转到普通法庭。此外，通过复审，最初最高法院关于速审法庭的合法性的决定被推翻。到2003年，更多的前全国民主大会党官员发现自己要走上速审法庭，面对造成国家财政损失的指控。就“优质粮食事件”来说，佩普拉最终被判4年徒刑，而其同伴易卜拉欣·亚当部长作为该案的另一名被告被判两年徒刑。①

总的说来，这些审判激起了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很多怨恨。他们感到正在作为一个“政治世仇”的派别“惩罚对手”。其他观察家对于法律的合法性和是否这些定罪将“让行政自行决定权负有法律责任并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② 不解。对于这些批评，传统政党的支持者回答说，这些起诉将“使公务人员在处理国家财产的时候更加小心”。③然而，这些案件也很可能树立一个继任政府谋求指控参与不成功的财政计划的前任部长和官员的先例。

传统政党政府上任后不久也开始提出同样富有争议的经济措施。作为对新政府的良好姿态，许多国家取消了加纳所欠的债务。作为交换，库福尔政府必须表明它愿意解决自己继承的巨大的经济遗留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特玛石油精炼厂为进口石油所欠的债务。政府提供给燃料的巨额补贴使其无法保持税收和花费有序。许多从国内银行借的钱用来弥补这种差异，反过来促发了高利率和通货膨胀并导致塞地的持续贬值。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政府于2月份将燃料价格提高了60%。之后不久，政府想通过将每日最低工资从4 200提高到5 500塞地来缓解对公众的这一打击。④

然而，最重大的决定是关于加纳是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

① “Ghana’s Rice Scheme Trial: Judgment and Controversy,” *West Africa*, May 5 - 11, 2003.

② “Ghana’s Rice Scheme Trial: Judgment and Controversy,” *West Africa*, May 5 - 11, 2003.

③ “The Questin of Integrity,” *West Africa*, May 5 - 11, 2003.

④ “Minimum Wage Now ₵5, 500,” *Daily Graphic*, May 1, 2001.

银行重债穷国计划的问题。重债穷国计划的倡议是1996年为许多穷国无力偿债发起的。作为交换，重债穷国必须满足其经济接受苛刻管理的条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它们提供了大幅度减免债务的措施，直到两者认定的可承受的债务水平。18个非洲国家加入了这个倡议，这可以保证加纳每年减免2亿美元。这时加纳正花费其税收的1/4偿还债务，在英国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它加入重债穷国计划以释放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发展。①

262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对于投资者来说什么样的国家是潜在的“贫穷且严重负债”的国家，这一点就有人质疑。实际上，日本是加纳主要的债权国之一，它很快就提出对这个倡议的不满。加纳工会代表大会指出，加纳已经有一长串结构调整的条件要去满足，“其中大部分因其社会的影响而落后于计划”。②还有些人甚至持有更激进的立场，“所谓债务”无论如何都是非法的，应该被取消。这样做是对奴隶买卖暴行的正当赔偿。③ 由于有许多美国和非洲的组织一直在建立这种联系，所以在这个围绕重债穷国的争论期间在加纳浮出水面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挣扎于600万美元债务之间的；一个2001年开始执政时通货膨胀率超过40%的；一个塞地比上一年贬值了100%的政府，重债穷国计划太难以拒绝了。加纳的整个经济地位几乎立即有了提高。塞地贬值率大幅下降，从每年3%下降到2.5%。这是从1988年允许塞地浮动以来的贬值的最低水平。到该年年中，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7%，库福尔总统预计到是年底会降到20%左右。政府设法与尼日利亚开放信贷额度以获得足够的原油供应，这和政府刚组建时只有6天的供应量形成了鲜明对照。④ 尽管加纳两大重要出口商品可可和黄金的世界价格都很低迷，但还是取得了这些成就。

---

① “What to do About Ghana’s Debt?” *West Africa*, March 12 - 18, 2001.

② “What to do About Ghana’s Debt?” *West Africa*, March 12 - 18, 2001.

③ “What to do About Ghana’s Debt?” *West Africa*, March 12 - 18, 2001.

④ “Kufuor Confident,” *West Africa*, July 9 - 15, 2001.

作为在野党的全国民主大会党

随着这么多有争议的倡议的进行，在野党的问题亦被裹挟其中。然而，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最高法院的诉讼，它们挑战了库福尔总统任命部长而无需国会和国务会议批准的权力。这很像传统政党于1997年启动的反对全国民主大会党的情形，但却更像一个宪法的法律地位问题而不是真正的诉讼。但是，通过发出这一挑战，全国民主大会党表明它想确保“民主文化根深蒂固”，没人可以“超越宪法”。①

传统政党政策的影响，像油价的大幅度增长一样，也提供给全国民主大会党国会议员许多批评政府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增多恰好在收获季节之间到来，此时加纳传统的食品供应不足，这一点反映在价格上。上调燃油价格显然于事无补，全国民主大会很快指出传统政党政府的执政让普通加纳人的生活费用变得很高。反对党还批评新政府无力减少恶性犯罪惊人的增长。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阿克拉地区一系列残暴杀害妇女的案件。新政府最终邀请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来协助调查。虽然警方最后逮捕了一名嫌犯，但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他只承认了发生过的30多起案件中的8起。

一连串的谋杀使得流言四起，传统政党和全国民主大会党的追随者公开凭售他们对于谁应对已发生之事负责的指控，同样，政治党派要想阻止发生在阿克拉的，加纳两个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阿克拉橡树之心和阿散蒂·科托科（Asante Kotoko）比赛期间的体育场灾难的政治化倾向是非常困难的，这次事件也发生在这个时期。这场灾难由于警察处理一群不守规矩的人群不利而突然发生，126人死亡。阿克拉出现骚乱，青年人“高喊罗林斯归来”。②

这次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间的健康取舍。两者都接近活跃的报纸、电视报道和电话交谈广播节目。重要的是，

---

① “Writs Have Started Flying,” *West Africa*, February 5 - 11, 2001.

② “Ghana: Thousands Attend Soccer Disaster Memorial,” *African Sun Times*, May 17 - 23, 2001.

这一年晚些时候，在一次少有的两党关系的展示中，他们走到了一起，废除了刑事诽谤和煽动叛乱法（Criminal Libel and Sedition Laws）。在有些情况下，即使你的报道是真实的，该法也可以宣布你为刑事诽谤。显然，加纳从全国民主大会党统治早期独立报纸和政府的那种紧张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像罗林斯统治时期，独立报纸的记者选择跟随总统的公务旅行。入主政府 100 天之后，库福尔总统建立了一个新的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回答来自全国报纸记者提问的传统。与此同时，记者的“不受约束”可能会令人不安。根据署理首席大法官 E. K. 威尔铎（E. K. Wiredu）的说法，刑事诽谤法的废除使得无良记者可以到处“胡说八道”。[①] 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像两党之间的战线已在尖刻放纵报纸的协助下划定并加以了怂恿。

一系列前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部长的受审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因素。[②] 就像前总统罗林斯说的，“试图使全国民主大会党所做的一切有罪”，这似乎是一个毁掉全国民主大会党及其成就的精心策划的阴谋。新的总检察长纳纳·阿库福－阿多就任后不久宣布，政府要取消公共法庭。这曾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党的一个主要司法革新。作为这些曾一度恐惧革命工具的司法体系陷入混乱状态的标志，只有无声的抗议。调查小组成员之外的人员的困难越来越限制了这些法庭的审理。在加纳的有些地方，这些法庭已经空闲了“一年之久”。[③] 很难为所耗开支辩解，对于一直怀疑该项革命性的司法试验的普通法官，这又是应该结束这一体系的有力理由。然而，作为让步，地区法庭保留了审理涉及毒品犯罪的权力。

同样，关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创建的国家调查局的未来也有不少热议。有些人甚至走极端地建议一并取消。[④] 更令人情绪激动的是，新政府决定取消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 1979 年发动政变的 6 月 4 日作为

---

① “Reviving a Dead Debate,” *West Africa*, October 15 – 21, 2001.

② “We Can Live with each other in Peace,” *West Africa*, September 9 – 15, 2002.

③ “Judges Back Move,” *Daily Graphic*, October 5, 2001.

④ “Intelligence Service Uner Fire,” *West Africa*, June 18 – 24, 2001.

全国的节日，因为它是军事叛乱因此“有悖于民主原则和宪法秩序”。①

然而，最有争议的是罗林斯的重新安置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战斗所打响的第一炮与这位前总统的安全有关。在他任总统期间，从精英部队抽调来的士兵负责他的安全。卸任以后，他继续拥有一批从这些部队抽调的21人构成的保镖，但对其许多敌人来说，鉴于他的政变记录和该种政变所需士兵的数量，这对于国家的安全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在与这位前总统进行了一系列敌对的交流之后，新政府最终用一支警察支队取代了他的保镖。在一次交流中，罗林斯称他的房子遭到了包围。

这位前总统和政府之间的敌意随着他在一次党的庆祝6月4日起义大会上的讲话而升级。他比较了自己所看到的加纳所发生的事情和1979年发生的事情，意在指出其结果应该是相同的。显然罗林斯没想淡出，去接受联合国指派给他的做一个知名人士的角色，满足于将他的注意力转向非洲大陆的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他仍然是全国民主大会党的主席，非常想继续控制其命运。然而，12月在该党的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要求更换他。这被看作对于他的维持现状的决定有很大的不满。缺乏内部民主被认为是2000年大选失败的主要责任。这种不满反映在党的大会上，会议选举了奥贝德·阿萨莫阿博士为新的党主席。“为了避免冲突”②，大会还取消了以前副主席的位置。这就防止了罗林斯正式享有该党的领导权。

领导的换届是全国民主大会党创痛的经历，似乎该党面临解体的危险。该党与政府之间保持党派合作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性分歧意见。阿萨莫阿批评传统政党过于密切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没能给加纳农业提供补贴。这并不很有说服力，因为全国民主大会党执政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情况，给罗林斯提供了从党

① “Erasing ‘Rawlings Day’,” *West Africa*, June 11 - 17, 2002.

② “Touch Political Battle Ahead,” *West Africa*, July 1 - 7, 2002.

的效率低下中振作起来的机会。在 2002 年 6 月 4 日的庆典上，他攻击政府的征兵政策和军队的退休政策。① 更富煽动性的是，几周之后，在一次在库马西对新成立的全国民主大会妇女派别的演讲中，他称传统政党政府是加纳历史上最糟糕的政府。他呼吁对他所称的“非法秩序”进行“积极的反抗”，建议加纳人不要“等到下次大选再防止腐烂”。②

他的话释放了某些“来自一些政府高级部长的”同样“急促的声明”。讲话后第三天，他被“邀请”到国家调查局在阿克拉的总部去解释他的讲话是什么意思。③ 他的支持者侵入国家调查局驻地，高唱全国民主大会歌曲，呼吁结束“骚扰”。④ 警察增援部队不得不被招来以维持秩序。同时，罗林斯被卷入进口 4 辆丰田陆地巡洋舰到加纳一事，其中两辆可能是防弹车。此举有助于潜在政变计划的谣言突然出现。甚至有人建议，他应该离开阿克拉以使他更难策划政变。罗林斯显然乐于受到关注。这表明他仍然是加纳政治中的一大力量。

与此同时，党代会结果表明，甚至在全国民主大会党内部都有许多人感到了是他从党的积极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了。是年末，当该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以选举 2004 年大选旗手的时候，这就变得更为明显。重要的是，这是一次公开透明的竞争，很快便有许多竞争者出现。最后，变成了前副总统约翰·阿塔·米尔斯和前财政部长奎西·博奇韦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前者有罗林斯和该党元老派的支持，而后者有党的主席奥贝德·阿萨莫阿的支持。这次竞争的结果存在着很大的紧张和不确定性，但作为罗林斯和保守派仍在党内享有支持的标志，米尔斯以压倒多数战胜博奇韦，结果是 1 116 票对 194 票。⑤ 两周以后，传统政党再次选择了库福尔总统做党的旗手。作为他在党内

---

① “Mode of Retirement from GAF Dangerous – Rawlings,” *Daily Graphic*, June 6, 2002.

② “Rawlings Becomes a Hot Issue,” *West Africa*, August 26 – September 1, 2002.

③ “Rawlings Becomes a Hot Issue,” *West Africa*, August 26 – September 1, 2002.

④ “Rawlings Becomes a Hot Issue,” *West Africa*, August 26 – September 1, 2002.

⑤ “NDC Chooses Mills Again,” *West Africa*, January 13 – 19, 2003.

266

地位和党更加团结的标志，没有其他竞选者，他未经选举就在一致的喝彩声中被党接受了。[①]

新倡议与新挑战

在其执政第一年的年末，传统政党政府可以宣布一些国家经济整体性的重大成就了。尽管加纳两大出口物——黄金和可可的价格仍然低靡，但还是取得了重要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减少了花销，也减少了从国内借债。结果是比前些年低的利率和较小幅度的塞地贬值。然而，经济仍然很容易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除了出口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石油的价格。2002 年政府发现特玛炼油厂（TOR）的债务比预计的更高了。任何将这一业务私有化的尝试都需要截断政府的主要财源，而这正是该厂的业务所贡献的。私有化曾是传统政党大选时的承诺。

2001 年早期的燃油价格的 60% 的增速曾是处理这一问题的尝试。加纳人支付燃油的钱远比其实际价格要少得多，尽管有增长，仍然保持了很大程度的补贴。令事态恶化的是 2002 年石油的价格开始上涨。塞地价格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这样，到该年年底，塞地贬值率从 3% 上涨到 13%。2000 年，全国民主大会党曾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因为是大选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经济几近崩溃。传统政党没想到自己会陷于同样的困境，这在全国民主大会党 2000 年大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3 年 1 月，就在大选之前，政府采取了极不受欢迎的步骤——将燃油价格提高 100%。

这次涨价本身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涨价的幅度却让人感到震惊。政府寻求一下子让加纳进口石油恢复全价。反对党坚持认为这一直受着对该政府经济表现不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摆布，还要增加增值税。[②] 燃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不再需要增值税的尝试。传统政

① "Two Johns to Contest Again," *West Africa*, January 13 - 19, 2003.

② "New Fuel Prices are Outageous - NDC," *Daily Graphic*, January 20, 2003.

党记得非常清楚，当全国民主大会党于1995年首次提出增值税，骚乱在阿克拉接踵而来的时候，它曾多么猛烈地攻击这项税收。政府作出极大努力宣传燃油价格增长背后的原因。这次政府下对了赌注。尽管对新的燃油价格有很多的不满，但没有出现骚乱。为了减轻交通的负担，政府开始从欧洲进口双层巴士。它们比加纳大多数公共交通所用的典型的私人小巴（tro - tros）要大，也更便宜，但更拥挤，也更不舒服。然而，燃油价格的大幅度增长对整个经济都有连锁反应，许多企业疑惑，用这样的新成本它们怎么继续经营。①

在许多方面，牵涉回收成本的更有争议的问题是政府邀请私人投资者参与为加纳城市人口供水的决定。② 反对派立即攻击这个“公私伙伴关系”（PPP）是一个国家供水系统私有化的委婉说法。③ 整个计划的反对者再次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看作是将水这样的生活基础供给商品化的主谋。实际上，他们认为水的私有化是加纳是否符合重债穷国债务减免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设立的一个条件。④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机构实际上一直在推广这一做法以应付不断增长的提供足够水量给第三世界迅速扩大之城市人口的挑战。第二届世界水问题论坛于2000年在海牙召开，许多参与提供这些服务的跨国公司参加了会议。会议赞同这一“设想”并呼吁“用可承担的价格用水”。⑤

然而，到这个时候，针对这个市场驱动的付款供水方法出现了非常多的反对。许多非政府组织集会反对私有化。在加纳，反对派来自英国非政府组织联盟和像教会和工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它们成为了反水私有化全国联盟。这些非政府组织最大的声音来自综合社会发展中心（ISODEC），一个由荷兰资金和周刊《公共议程》出版商支持的当

268

① “Oil: Cost Recovery and the Suffering Public,” *West Africa*, January 27 - February, 2003.

② “Ghana Water Privatization Controversy,” *West Africa*, October 15 - 21, 2001.

③ 它又被称为“私人部门的参与”（PSP）.

④ “Water Privatization is HIPC Condition,” *Public Agenda*, September 27, 2001.

⑤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f The Hague on Water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March 22, 2000. http://www.waternunc.com/gb/secwwf12.htm

地非政府组织。综合社会发展中心最初一直参与评估加纳改善供水方法的努力，但到了2001年，他们陷入一场与一个新成立的监管私人参与水务部门的政府机构——供水部门结构调整秘书处的激烈的“媒体神经战”中。① 综合社会发展中心的担忧是“在初创时期甚至政府都无力控制庞大的垄断”。② 他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PURC）无法胜任这一任务。

政府的态度也有很大转变。在2000年大选中，传统政党反对水的私有化，但上台之后很快意识到改善不断蔓延的城市地区水的供应问题不能依靠加纳水务有限公司（GWCL）。实际上，多年来，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很多尝试。加纳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司（Water and Sewage Corporation）注册成立了加纳水务有限公司。多次尝试培训、再培训人员，还雇来外国顾问“帮助提高能力”，③ 但收效甚微。根据加纳水务有限公司自己的估计，城市供水一半左右因泄露和非法偷水而损失掉了。④ 泄露的损失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些供水管道许多都已经使用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间，加纳几乎没有投入一点维修的费用。加纳首都只有60%的水是水管供水。几乎一半人口依靠水罐、支付加纳水务有限公司收取的相当于商业用户水价10倍的价格。

通过邀请私人资金参与国家水务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从1994年全国民主大会时期就在讨论，毫不奇怪，他们反对私有化有点含糊不清。然而，参与对私营公司很有吸引力的水务部门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毫无疑问这需要很大一笔花费以更新加纳的供水系统。现行的水价太低无法保证这项投资能赢利。2001年，政府试图通过将城市地区的水的计费率提高95%来应付这一困境，试图使可以支付市场利率的水务部门对私有资本更有吸引力。接踵而来的哪里有农业用水供应，哪里的成本回收就异常困难的世界银行的“分类计价”战略

① “Ghana Water Privatization Controversy,” *West Africa*, October 15 - 21, 2001.

② “Ghana Water Privatization Controversy,” *West Africa*, October 15 - 21, 2001.

③ “Water: Minister Defends Policy,” *West Africa*, October 21027, 2002.

④ “We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Water Safe,” *West Africa*, April 7 - 13, 2003.

仍然是政府的职责。在阿克拉地区也有预付水表的实验。水表是由私人公司安装的，可以用比以前更便宜的价格供水。但是，这个系统受经常发生故障的制约。在这项工程头 3 年的时间里，水的成本翻了一番。[①] 根据联合呼吁程序（CAP）竞选协调员鲁道夫·阿蒙加 - 艾特格（Rudolf Amenga - Etego）的说法，水务私有化方案已经引起一种由遭污染水源传播的寄生虫——麦地那龙线虫的增加。[②]

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与反对其目标同为成本回收的殖民政府 1934 年水务方案不同，现在对私有化的抗议不能被视为非洲人的“松散思维”。这曾是殖民地国务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对 1934 年来自黄金海岸前来抗议这项立法的代表团作出的回应。[③] 相反，传统政党政府被迫缩减其计划，着手于为“公私伙伴关系”赢得支持的公共关系计划。从 2004 年 4 月开始，整个加纳有许多利益相关者论坛为国家起草水务政策。随着大选在 12 月的到来，在不远的将来作出任何激进的决定都是不可能的。像需要一个新政府实行的增值税一样，公私伙伴关系在向前推进之前也毫无疑问需要同样的条件。

在过去一直由国家控制的加纳社会的其他私营部门参与（PSP）的问题也出现了争论。1997 年，过去一直享有加纳通讯垄断地位的邮政公司被正式私有化了，马来西亚电信公司得到新公司股票的 30% 的股权。加纳政府在新公司——加纳电信中保留了 70% 的股权，但其所希望的是新伙伴将在运营中投入大量资金。但这并未发生，马来西亚电信只成为一个比管理机构略强的伙伴。这比生意遭到了传统政党的猛烈批评，称其缺乏透明度，但 2003 年，传统政党政府与挪威电信签订了一项同样的协议以取代被看作与马来西亚电信失败的协议。[④] 这比生意再次因缺少透明度而遭到批评。人们怀疑已经给予挪威电信许

① “Tema Residents Cry Foul Over Pre - Paid Meters,” *CAP Water News*, July 16, 2004.

② “Paying the Price for Clean Water,” *West Africa*, April 7 - 13, 2003. 他于 2004 年荣获美国加州的一个环境基金会颁发的奖项。

③ “Are We Loose Thinkers?” *Daily Graphic*, July 12, 2004.

④ “Unease over Ghana Telecom Deal,” *West Africa*, February 17 - 23, 2003.

诺，如果公开，将引起一场已经高度怀疑跨国公司的社会抗议风暴。

尝试在国家高等教育运行中寻求收回成本同样富有争议。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系列重要改革出现，开始减少以前一直是国家单独负责的加纳大学的融资操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实行贷款计划和使用费，这样一来，到 1998 年，政府少支付了自 1992 年起一直支付给学生上学费用的 40%。[①]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增长巨大，学生人数翻了两番，结果是高等教育的国家总投资增加了。贷款计划有国际社会保障协会（SSNIT）给予财政支持，实际上国家给予高额补贴。因许多学生毕业时找不到工作造成的贷款拖欠率高也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一般说来，大专院校资金严重不足，许多毕业生，特别是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即资金需要最多的领域，都离开加纳去寻找“更绿的牧场”。2001 年，加纳大学副校长伊凡·阿达－门萨（Ivan Addae－Mensah）教授指出，该大学想要通过收取学费来收回每位学生的全部培训费用。[②] 到目前为止，这一设想还没有实施，但该计划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这已经大大减少了给予公立大学每位学生的补贴。[③] 加纳大学体系实施的变革一直存在争议。副校长宣布这一计划之后，加纳的莱贡大学生代表会议（SRC）立即断然拒绝他提出的双重学费制度。[④] 无疑，这个变化将继续争论下去。由学生会——加纳学生民族联盟帮助的加纳大学学生有着悠久的反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历史，但直到现在，传统政党政府还没有尝试过关闭这些大学。

在许多次反对之后，大专教育的私有化也开始改变着加纳的高等教育。加纳的许多主要宗教组织借用这一挑战，许多此类机构也开始出现。除了提供宗教培训之外，它们全都提供商务、会计和信息技术

① Eboe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The Paradox of Reform*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137.

② "Call for Tuition Fees at Legon," *Daily Graphic*, October 22, 2001.

③ "Ghana's Universities Consider Full Cost Recovery," *West Africa*, March 31 - April 6, 2003.

④ "Controversy Over Tuition Fees," *Daily Graphic*, October 23, 2001.

等职业课程。其学费比加纳大学目前收取的学费要高出很多。然而，他们更接近收回全部成本，这比有较长臃肿而低支付历史的国立大学的成本要低得多。毫不奇怪，这些私人学院可以用更好的工资从国立大学抢走教师。只有大约半数申请进入国立大学的学生可以被大学接受，这样，私立大学尽管收费很高，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他们的招生目标。

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踌躇不前的时代开始，这个进程就毫不令人吃惊地被很大程度上纳入了传统政党的商业黄金时代，当时国营企业私有化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近来还有人谈论关于加纳航空、加纳铁路和加纳商业银行的私有化。在加纳航空公司的例子中，他们的飞机很老且经营亏损。航空公司债台高筑，人浮于事。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个投资者会提供超过其微薄资产的投资，但随着加纳旅游产业的起飞，"对于幸运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以一个银盘的价格购买一个潜在的金矿"。[①] 出售国家的"财产和……遗产给外人"在加纳一直有着政治上的敏感。[②] 就加纳航空公司来说，就有着特别敏感的记忆，因为航空公司仍与早期独立密切相关，它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时代的到来。铁路的私有化没有这么大的政治敏感，但其本身严重失修，从来没有实现收回成本，甚至在殖民地时期，也很难想象它会对任何私人投资者有吸引力。一般说来，加纳银行业也需要大笔资金的注入来使其现代化，但私有化的尝试会引起争议的风暴。

像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一样，除了面对巨大的私有化问题的挑战，传统政党还不得不对付北方严重的种族骚乱。2002 年 3 月，达贡（Dagon）地区育库布·安达尼（Yukubu Andani）的亚娜（yaa - naa）惨遭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北方地区的 28 名其宫廷官员。肇事者是一个深陷持续两代人的酋长纷争中的对手"门"（氏族）内的成员。谋杀的残酷和亚娜在加纳酋长等级体系中的重要性（他是北方的最重要

① "Ghana Airways Will not Die," *Daily Graphic*, July 22, 2004.

② Roger Tangri, "The Politics of State Divestiture in Ghana," *African Affairs* 90 (1991): 529.

的传统权威，可能是全国仅次于阿散蒂亨的第二号重要人物）立即使之成为一个全国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如此敏感以至于政府实施了对加纳媒体的官方审查，这不可避免地引燃了“阴谋决策的熊熊大火”①

传统政党以根深蒂固的传统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任命一个包括新阿散蒂亨——奥通富沃·特威福·韦尔二世和许多来自北方的主要酋长在内的调解委员会作为回应。更为直接的是，政府不得不派遣一支军队和警察力量到该地区，一年以后，政府已花费了70亿塞地（80多万美元）来维持这支部队。延迪（Yendi）地区的动荡引发了北部其他地区的骚乱，这不可避免地与加纳主要政党发生联系。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延迪传统地区的所有地区以及北部首府塔马利都处于紧急状态，直到最近才被解除。② 加纳人充分意识到北部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与可怕的20世纪90年代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发生的事情的对比。在那里，种族冲突同样开始于外围地区，最后却吞噬了整个国家。③ 北方大量的支离破碎的民族和他们对于其他加纳人来说过时了的习俗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使加纳整个地区特别容易发生动乱，对此各大政党的政治家们发现很难不被利用。就像全国民主大会党在1994年冲突之后的保持中立受到挑战一样，传统政党经历了同样的困难。

2004年大选前奏

2004年12月，加纳人将再一次走向投票站，选出一届新政府。在大选前的6个月，有5个政党正式向选举委员会注册，但像以前第四共和国的大选一样，毫无疑问，最后的竞争应该是在传统政党和全国民主大会党之间进行。当前的迹象似乎更倾向于传统政党获胜。过去，执政党一直拥有强大的优势。重要的是，传统政党在过去3年半

---

① “A Long - standing Conflict,” *West Africa*, April 8 - 14, 2002.

② “State of Emergency Lifted,” *Daily Graphic*, August 17, 2004.

③ “NDC, NPP Tension in Tamale: Save Ghana from a Liberia Situation - Security Agencies Told,” *Ghanaian Chronicle*, July 16, 2004.

的时间里赢得了所有7次补选，其旗手——现任总统库福尔在党内获得了所向披靡的地位，很像杰里·罗林斯做全国民主大会党旗手时所享有的地位。作为其地区地位的标志，他现在正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第二任主席的任期内。他在邻国象牙海岸交战各方的谈判中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加纳和尼日利亚成为西非地区和平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国家。

273 库福尔总统还得以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国际声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总理杰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的成功访问可资为证。[①] 布莱尔是继1960年M. 哈罗德·麦克米伦（M. Harold Macmilan）之后访问加纳的第一位英国首相。施罗德的选访是德国领导人自其独立以来的第一次访问。库福尔本人一直努力工作，通过分享环球旅行并会见许多世界重要领导人以赢得一个国际存在。他热情拥抱非洲发展新经济伙伴关系计划（NEPAD）。这是一个八国集团（G 8）于2002年设立的计划。[②] 该倡议呼吁贸易和投资而不是贷款和捐款以促进非洲的发展，非常符合他自己关于私人资本角色的想法。同样，他是一个泛非主义者，在非洲联盟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联盟于2002年用一个模仿欧盟的组织取代了非统组织（OAU）。

在经济方面，他的政府于2000年避免了许多曾破坏过全国民主大会党的陷阱。在减少塞地贬值率方面也做得很出色。2003年，塞地贬值了4.7%，现在则轻微贬值。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成就，因为石油的世界价格的增长已经远超出政府的预期。尽管2003年燃油价格大幅度上升，政府却继续向加纳消费者提供大量的补贴。毫不奇怪，通货膨胀率很难控制。2003年4月最高达30%，然后，该年年底降到24%以下，尽管原油价格甚至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到该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在继续下降，这样一来，在2004年5月，降到只有11%，为近年来的

---

① 布莱尔于2002年2月到访，而施罗德则在2004年1月来访。

② "Implementing NEPAD in Ghana," *West Africa*, May 5 - 11, 2003.

最低水平。[①] 毫不奇怪，财政部长奥萨福－马福（Osafo－Maafo）在对国会所做的关于2004年预算的讲话中，对加纳经济的总体情况非常乐观。他指出，实际国内增长（指GDP）是5.2%，好于2003年规划的4.7%。政府还几乎达到预期的预算赤字的目标，结果“国内贷款是1995年以来的最好表现”。[②]

加纳两项最重要的出口——黄金和可可的高价在让经济抵消原油高价造成的冲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可笑的是，影响原油价格的中东的不稳定性也同时弱化了美元，黄金从中获利。同样，世界最大的可可出产国的邻国象牙海岸的不稳定性将该商品的物价哄抬了上去。2002年，可可价格达到了每吨2 000美元，是15年中的最高价格。[③] 274 这意味着加纳政府可以提高支付给农村可可生产者的价格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他们的作物几乎可以达到世界市场价格的70%。除了减少象牙海岸和多哥边境的走私，据估计有40 000吨加纳可可通过边界，可可的提价被筹划用来在加纳主要可可种植地区帮助传统政党。[④]

传统政党政府还达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重债穷国完成点”。这意味着加纳可以让其经济与这些机构建立起来的标准保持一致，享有最高的所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的取消权。实际上，这意味着用于偿还这些债务的资金可以用在加纳的发展项目上了。对这些机构债务偿还的缩减一直在进行着。传统政党政府一直在通过表明近来的工程因加入重债穷国计划而得到注资来为这一决定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甚至到了声称一些政治对手所言不存在的程度。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经济成就，但对于重债穷国如何才能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纳“加强并巩固对经济政策管理进行控制”仍存在

① “Effect of Declining Inflation Rate on Economy,” *Daily Graphic*, May 5, 2004.

② “Budget 2004,” *Daily Graphic*, February 7, 2004.

③ “Cocoa Market Still Unpredictable,” *West Africa*, September 23 – 29, 2002.

④ “Cocoa Market Still Unpredictable,” *West Africa*, September 23 – 29, 2002. 这相当于可可年产量的12%—13%。

很大的反对。[1] 加纳将“滞留在重债穷国兄弟会”中多久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2] 一般来说，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加纳的经济进步相对满意，但燃料成本的提高，水电费的大幅增长，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近期资助全国健康计划的所得税，这些一同增加着许多普通加纳人的越来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的幻灭感。捐助机构欢迎的宏观经济的成功很少能以很易察觉的方式涓滴至百姓。甚至像道路和排水系统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改善都加剧了已经是高度拥挤的许多加纳城市地区的状况从而加重了人们的不满。大量的报纸和电台播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表达的对所有这一切不满，特别是在都市地区，有些人认为“花数小时排队，为一个对你的回报只是生活水平毫无改善的政党投票没有意义”。[3]

然而，潜在的投票者的淡漠或对“库福尔经济学”坦率的批评多 275 大程度上有助于反对党，特别是全国民主大会党值得商榷，因为许多现行的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都可以追根溯源至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全国民主大会党时期。毫不奇怪，全国民主大会党少数派有 90% 的时间都是和国会的多数派合作的。[4] 另外，全国民主大会党同独裁和任意使用权力的名声抗争着，这个名声源自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时期。新近完成的全国和解委员会（NRC）如果说有什么能肯定的，那就是这个观点。可以预见，3 位最高法院法官和退伍军官被谋杀的高度情绪化的问题会在其听证会期间出现。不可避免会有许多人试图将前总统罗林斯和前国家安全部部长科乔·齐卡塔与该暴行直接联系起来。毫不奇怪，没有令人吃惊的进展，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从 1982 年发生时起就成为了十分严肃的被调查对象。许多试图涉及罗林斯和齐卡

---

① Charles Abugr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SODEC), “Three Years into HIPC: What for Ghan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Legon Economic Students Society, Legon, Ghana, March 17, 2004), 4.

② “NDC Disputes Minister’s Claim Over HIPC,” *Daily Graphic*, July 20, 2004.

③ “2004 General Election in Ghana,” *Daily Graphic*, February 10, 2004.

④ “Minority, Majority in Parliament, so far so good, says Bagbin…Aa Minority Cooperates 90% with Majority Gov’t,” *Ghanaian Chronicle*, June 17, 2004.

塔的目击证人甚至在听证会之前就已经没有多少个人信誉了。然而，关于让人想起对过去的不快回忆的其他暴行，有着太多的肮脏细节。相反，传统政党政府根据宪法进行公开辩论，无疑借助对比受益良多。

全国民主大会党反对派试图使政府中的腐败问题成为其竞选的主要内容。前总统罗林斯一直希望，如果全国民主大会党在 12 月大选中成功，政府将开始审理传统政党政府中的腐败官员。[①] 无疑存在丑闻。最近，总统事务部副部长阿尔哈吉·班巴（Alhaji Bamba）因在“其业务往来中的不谨慎”而被迫辞职。[②] 其他部长也卷入暗箱操作，许多人被严重欺诈办公室指控有罪。然而，对于传统政党的对手来说，似乎好像“腐败的零容忍”用于北方人比用在阿肯人身上要严厉得多。他们试图借此破坏非阿肯地区对传统政党的支持。[③] 利用加纳政治中的种族问题意在重要性上玩弄盈亏圆缺。[④]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是否成功却是个问题，因为全国民主大会党的记录也不是没有污点的。更重要的是，再次像全国民主大会一样，传统政党政府小心翼翼地向全国各地推广发展计划。为了放弃全国民主大会“世界银行的名声”并融入到加纳其余地区，他们甚至利用了该记录挑战沃尔特地区。[⑤]

---

① “Jerry in His Element…Attacks NPP Gov’ again…Says NDC Gov’ s will Imprison Corrupt NPP Officials,” *Ghanaian Chronicle*, July 22, 2004.

② “Alhaji Bamba Resigns,” *Daily Graphic*, February 7, 2004.

③ “Kufuor is Pursuing Injustice and Nepotism, says Alhaji Dauba,” *Ghanaian Chronicle*, July 19, 2994.

④ Carola Lentz and Paul Nugent, “Ethnicity in Ghan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Eghnicity in Ghana: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ed. Carola Lentz and Paul Nugent (London: Macmillian Press, 2000), 22.

⑤ “NPP Enjoys Goodwill in the Bolta Region,” *Daily Graphic*, June 15, 2004.

后记：走向未来，回顾过去

279 1957年，当加纳独立的时候，其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韩国相似。两国都主要是农业国；出口的主要产品都包括一些矿产资源；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殖民统治；人均收入也极其相似。而今天，韩国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也是加纳的8倍有余，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名列第二。这一经济运行的惊人差距长久以来一直是加纳知识分子感兴趣的话题。他们清楚地意识到：1957年，加纳在许多方面都曾有更好的发展潜力。加纳面积更大，不仅有山区，还拥有更多的矿产资源，与朝鲜战争之后半岛荒芜的景象相比，加纳拥有几乎达到5亿美元的储备。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解释像加纳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缓慢的原因时，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非常流行。像加纳这样欠发达的国家，其中很多都经历了欧洲的殖民统治，其发展的缓慢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寻求剥夺第三世界资源以满足其自己的经济发展并阻止完整而具有竞争能力的海外经济的结果。用该理280 论经典作家的话说，是通过将第三世界限制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以剥

夺其主要产品，使之注定只能“欠发达地发展”。[1] 在加纳人的话语中，这种解释最好地体现在了夸梅·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当中。该书认为，在这个新殖民主义的阶段，“所有享有国际主权外在标志的国家”“实际上都有其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样，他们的政治政策就受制于外部。”[2]

最近，随着似乎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重要契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及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其他“亚洲小虎”的崛起，决定论理论遇到了其他解说的挑战。新一代的批评家现在又更多把眼光投向了发展失败的内因的解说，比如，“领导的失败”，“调动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无能”以及“政治的不稳定”。[3] 特别是马来西亚，与加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结果却相去甚远。两国都是热带国家，有着相同的人口规模，都有主要产品出口的漫长历史，一个出口锡和橡胶，另一个出口黄金和可可。两国都是典型的英国殖民地，经济上都受都市企业集团操控。不像韩国那样，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国家。马来西亚的种族也比较复杂，有严重冲突的潜在威胁，最终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以加纳从未见过的残酷程度爆发。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马来西亚却找到了一条变成一个主要产品出口国的正确道路。人均收入达到加纳的 4 倍。[4] 今天，马来西亚已成为一个人均收入是加纳 4 倍的中等收入国家。

从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它也实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

---

① Gunder Frank,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Essays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3 – 17.

② K. Nkrumah, *Neo – 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Nelson, 1965), ix.

③ H. E. A. Kyerematen (Ghan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peech given at the Forty – 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December 6, 2002. 类似的批评参见 Dr. Paa Kwesi Nduom (minister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paper delivered at the Workshop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Framework, Washington, D. C., August 10, 2004.

④ Eboe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The Paradox of Reform*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238.

的发展战略。像加纳一样，马来西亚在独立之后立刻开始了私营经济成分的发展，然后于20世纪80年代再一次转向私有化。这一自然进程的不连贯无疑会成为加纳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随着朝令夕改的发展策略的不稳定影响，这些经济变革使1970年的加纳比刚刚独立的时候更为贫穷，这些策略正是其发展经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混乱的历史中建立起可预见的秩序可能是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全国民主大会的最为重要的遗产。加纳并没有做得像马来西亚那样有效。毫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在经济上还是有了些许的增长，对于任何一个熟悉这一段加纳历史的人来说，281 这些变化实际上都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但是，毫无疑问，加纳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这种情形也注定使关于加纳经济政策应该走哪条道路的争论持续下去。

库福尔总统在2000年就职演说当中，许诺在10年之内改变加纳人的生活，并使加纳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亚洲四小虎”的榜样在这一愿景中清晰可见，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而容易实现的蓝图。这些亚洲战略因素有时与国际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相左，而后者对于建构加纳国家的未来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对于现实可能的分析一直存在着错误或至少存在着错误的判断。所有这些不确定性促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争辨，在今日加纳持久不衰，其中一方对今天被称为全球化的东西非常怀疑，而另一方则以库福尔总统为代表，相信“为私营部门经入活力是在这个国家创造财富唯一可行的办法[①]。这个开放争论的根源可以再一次回溯到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全国民主大会统治时期，但在库福尔的政府里面，该争论变得尤为激烈。沉默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激烈争论及不和谐的声音所取代。

这种摇摆不定的局面显然已经转向了国家对经济控制较少的方向，这正是殖民时期的特点。然而，同样开始于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时期的剥离与私有化却一直并不顺利。甚至在库福尔总统所希望

①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West Africa*, March 4 – 10, 2002.

的商业黄金时期对于加纳的企业家仍存在着很大的怀疑，特别是对那些看上去比加纳企业家做得好的外国人。毫无疑问，加纳企业家要面临更多的不利条件。在殖民地时期，经济的制高点都留给了大都市企业集团，像黎巴嫩人、印度人以及少量的尼日利亚人。这些外国人都可以在零售业站住脚跟，可能就像马来西亚的华人后来居上，得以进入制造业，但加纳的企业家却是对私营企业充满敌意氛围的受害者，而这是早期独立时期的标志。

毫不奇怪，给一个收回成本都面临争议更不用说获利的国家吸引国外私人投资是很困难的。20 世纪 80 年代，加纳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是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和政府间贷款支撑的，这就形成了国家收入的沉重负担。只是到了最近才尝试征收使用费，这至少能收回当初的成本。正如一位观察家最近指出的，流入加纳的资本所起的作用更像是“福利”而不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投资。[①] 随着经济不再像以前一样完全依赖可可，随着旅游业呈现出极为明亮的前景，加纳的经济出现了一些多元化的倾向。但尽管如此，还是呈现出一种混合的成功。随着加纳可可生产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停滞，邻国科特迪瓦（象牙海岸）扩大了其可可的生产，现在取代加纳成为占世界可可生产 40% 的国家。

282

然而，今日加纳外汇的最重要的源泉变成了移居欧洲、北美、亚洲和其他非洲国家侨民的侨汇。2003 年，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侨汇总量达 19 亿美元，相当加纳总出口量的 80%。[②] 现在加纳总是有人哀叹，技术人员都跑到海外去寻求更适宜的土壤去了，但他们寄回来的钱却成了这个国家“财富”的最为重要的源泉。作为姗姗来迟的对散居国外的加纳人重要性的认识，2002 年传统政党政府最终承认了他们

① D. Rimmer, “Learning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Africa,” *African Affairs* 102 (2003): 477.

② “Budget Speech,” *Daily Graphic*, February 7, 2004

双重公民身份的选择。[①] 除了支付基本必须品之外，这些寄回来的钱很大一部分用在了投资购置财产，主要用于退休安居房，这说明他们与加纳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投资将转向更为商业化的方向，但在此之前，一些争议激烈的财产所有权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必要的。众多从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中有一项源自遗产争夺体系的财产所有权一直被混淆。建立在一个家庭母系或父系观念之上的遗产继承的本地传统之间相互牴牾，又与西方的核心家庭及个人财产观念相龃龉。本身就多种多样的殖民地司法体系从来也没能真正解决这些冲突，一直在英国习惯法和当地传统法之间徘徊。结果是以财产争端在殖民法庭审理到判决被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已经拖延数年。今天的“土地卫士”像一只私人警察部队保护有争议的土地而这些争议仍在该国的法庭上让人闷闷不乐。最近，有人建议建立“速审土地法庭”来解决普通法庭已无力解决的问题。

殖民地的历史还留下了一个酋长在现代加纳社会中地位悬而未决的问题。独立的时候，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传统体制就要被日益逼近的现代化浪潮横扫而去。[②] 但情况并未如此，当今加纳酋长的地位似乎比其间接统治的全盛时期更有活力。今天，文盲已经不再适合被作为对酋长的刻板印象，“受较高的教育已经一成不变地成为登上加纳任何职位的条件。”[③] 然而，关于酋长地位的争论仍是一些最不稳定的潜在问题的核心。这不仅是北方的情况，今天这已经有些成为热点了。在中心地区，现在有超过200个酋长地位的纠纷摆在加纳各级法庭面

283

① 作为这一移民群体有多重要的证明，90年代中期美国的加纳裔人口达20到40万人。E. Akyeampong, “Africans in the Diaspora: The Diaspora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99 (2000): 211.

② 这一想法的最佳例证之一请见 David Apter, *Ghan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Atheneum Press, 1963), 161.

③ Kwame Boafo - Arthur, “Chieftaincy in Gha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2, no. 2 (2003): 132.

前。[①] 他们也可能不时地被引爆，结果会导致生命或财产损失。

这很像殖民地时期存在的情况。殖民政策再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特别是海岸“文明”地区，最初仇视酋长，支持直接统治。然后，转向一种通过酋长实现的间接统治，但在殖民地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却抛弃了酋长转而支持当地选举出来的官员。两者对传统的公职人员的态度，在独立时期都没有更多的一致性。恩克鲁玛政府对酋长尤其憎恨，将其看做是“亲英的走狗”。[②] 在布西亚时代，他们最受重视，建立了自己的议事机构——全国酋长议会（National House of Chiefs），政府同意不再干预酋长事务。然而，在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统治时期出现了转变，再次出现“驯服酋长”[③] 的企图。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法第 107 条规定，酋长要得到政府的承认。最后到 1992 年，随着第四共和国宪法的通过，酋长们再次得到保证——其独立地位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但不许参与政党政治。随着这多变的经历，这个制度无法成为一个稳定的形式就毫不令人吃惊了。

无论谁在 2004 年大选中获胜，在加纳建立宏观经济的稳定都是头等大事，但这也必须解决更多的个人和地方性的问题，比如说财产所有权问题和稳定酋长地位的制度。这两个问题密切关联，因为当今加纳的大量土地是“习惯保留土地”或国家酋长控制下的土地，而大多数关于酋长地位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这些土地的使用问题。在独立斗争开始的时候，恩克鲁玛嘱咐加纳人要“首先寻求一个政治王国”。[④] 但这显然并不这么简单，独立早期的庞大规划帮助加纳摆脱其国内的挑战。现在，钟摆似乎摆回到了过去殖民地时期较为温和的独立前夕。改变显然比期望的更为缓慢，更为困难。描述独立初期的思想也需要有灵活性而不是坚持既定的规划。

---

① Kwame Boafo - Arthur, “Chieftaincy in Ghana: Challenges and Pros p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2, no. 2 (2003), 147.

② George Padmore, *The Gold Coast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of an African People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London: D. Robson, 1953), 105.

③ Boafo - Arthur, “Chieftaincy in Ghana,” 142.

④ 这一训诫见于阿克拉，海岸角和塞康第/塔科拉迪的大会人民党报纸的报眼。

“每一位聪明人都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但只有傻瓜才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是桑科法（Sankofa）鸟的规劝和告诫。头向后看而身体却朝向前方，这个阿肯神话传说中的形象象征着，人们需要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学习，从而避免错误。今天的加纳就采取了这样的姿态。

加纳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阿昌庞，伊格内修斯·库图（1931－1979）生于库马西，在库马西和埃朱拉（Ejura）的天主教学校和阿戈纳－斯韦德鲁的中央商学院接收教育。他于1959年受命入伍，参加了英国和美国堪萨斯州的军事训练。作为一位上校，他成为1972年军事政变的首领，并成为1972—1978年间救国委员会的首脑。1978年，他被其军队的同僚解职，并拘留了一段时间，被剥夺了再次担任公职的资格，并被开除出了军队，没有得到退休金。1979年，在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政变时，他遭到逮捕，被判叛国罪并执行枪决。

阿弗利法，阿夸斯特·阿曼夸（Akwast Amankwaa，1936－1979）出生于曼旁（Manpong），先后在曼旁的阿迪萨多尔（Adisadel）高中和海岸角堡的阿迪萨多尔高中读书。1961年，他被送到刚果，开始相信恩克鲁玛的政治对加纳是个威胁。他同其他官员一起领导了1966年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他最初是全国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之后于1969年成为国家元首。他因反对1972年针对布西亚政府的政变，被救国委员会逮捕。他还反对联合政府。1979年，阿弗利法参与组建全民联合大会党并入选国会，但入选后一星期被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处死。

艾多，克里斯蒂娜·阿玛·阿塔（Aidoo，Christina Ama Atta，

1930 -)生于中央地区的索尔特庞德，在循道卫理联合会学校和位于莱贡的加纳大学接受教育。她曾在英国和美国学习过，1982 年成为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府的教育部长，但在这个职位上只呆了一年的时间。随后，她在津巴布韦讲授英语文学，之后返回加纳。她最有名的著作是《这里没有甜蜜》，是 1970 年出版的一部短篇故事集。她的许多戏剧和小说都集中描写非洲妇女。

阿库福，弗雷德里克 · W. K.（1937 - 1979）生于阿夸佩姆（Akuapem）的阿库洛庞（Akuropong）。他于 1957 年参军，在英国接受训练，1961 年在刚果服役。反布西亚政变时，他是一位上校，到 1976 年，他已经是一名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国防参谋长了。1978 年，他从阿昌庞那里夺得政权，成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当罗林斯于 1979 年攫取权力的时候，他被逮捕，最后被处死。

阿玛，阿伊 · 奎（1939 - ）出生于塔科拉迪。他先在阿奇莫塔上学，然后求学于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学校，而后又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得到了一个社会学学位。之后，他来到阿尔及利亚，为《革命非洲人》周刊做翻译，后来回到加纳教书并为加纳电视台工作。1967 年，他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计划之后又为《非洲青年》工作一年，而后在美国和坦桑尼亚做教授。他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塞内加尔度过。阿玛因其早年的小说而成名，这些小说多描写独立之后的加纳。他晚期的小说更多寓言性而很少有社会现实作为根据。

阿乌那尔，科菲（Awooner，1935 - ）生于沃尔特地区的维达（Wheta）。他早年在阿奇莫塔上学，在加纳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之后又于 1972 年在斯托尼布鲁克纽约公立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还曾在位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任教一段时间，之后返回加纳，在海岸角堡大学任教。1975 年，他因卷入策划推翻政府的密谋而被最高军事委员会逮捕，最后被赦免释放。他被全国临时防卫委员会任命为加纳驻巴西大使，后来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任驻联合国代表。他是加纳最多产的一位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地球，我的兄弟》（1971）。

波汉，阿杜 A.（1932－）生于阿基姆－阿布阿夸的欧西姆（Osiem）。他先后在欧西姆的长老会学校、阿散蒂地区阿索科尔（Asokore）的循道卫理联合会学校和海岸角的姆凡齐聘（Mfantsipim）学校接受教育。1956 年，他接受了黄金海岸大学学院的历史学名誉学士学位，后于 1959 年获得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在加纳大学任教并于 1971 年升为教授。1983 年，他因出版 8 卷本丛书《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8－1935》而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席。1985 年，波汉从加纳大学退休，进入政界。他因于 1988 年批评罗林斯政府的 J. B. 丹夸纪念讲座而被认为在加纳恢复政党政治中起了分水岭的作用。他是新爱国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在 1992 年大选中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大选失败之后，该党批评大选的公正性，似乎波汉将会在 1996 年大选中对罗林斯构成挑战。然而，他却未能获得该党的这次大选旗手的提名。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波汉教授撰写了 6 部著作，最近的一部是《姆凡齐聘和加纳的创造：1876－1976》，该书荣获非洲诺玛出版奖（1997）。

博奇韦博士，奎西（1943－）出生在塔马利，但他的父母来自中央地区的阿戈纳。他先后在奥杜马寨－克罗博的长老会中学和海岸角堡的圣奥古斯丁学院求学，1967 年获耶鲁法学院硕士学位，1970 年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后相继任教于赞比亚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加纳大学。1982 年，他成为全国临时防卫委员会的财政和经济计划部部长。1993 年，当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取得权力的时候，他担任财政和经济计划部长。1995 年，他从部长位置上退休，为非洲发展银行工作。此后，他成为哈佛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博奇韦曾一度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工作。2003 年，他与约翰·阿塔·米尔斯竞争 2004 年大选全国民主大会党总统候选人，没能成功。

博齐奥，科乔（1916－2001）出生于温尼巴，先后就读于海岸角堡的阿迪萨多尔学院、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和牛津大学。返回黄金海岸后在阿基姆－阿布阿夸国立学院任教。他在英国期间结识恩克鲁玛并成为其心腹。他是大会人民党的创立者之一，并担任其第一任秘

书长，1950年因大会人民党的积极行动运动而被殖民当局逮捕。他于1951年人选国会，成为新内阁的第一任教育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他还在大会人民党政府中担任过许多其他部长职务。1966年政变后，博齐奥被羁押一段时间，之后随恩克鲁玛到几内亚流放。1972年，他送恩克鲁玛的遗体返回加纳。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因策划推翻政府被阿昌庞政府判处死刑，但随即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他于1977年获释，之后很快成为1979年大选中人民全国大会党党的竞选委员会主席。

布鲁，詹姆斯·赫顿（1844－1915）生于阿诺马布。其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8岁的时候将他送往英国接受教育。1861年，他回到黄金海岸做律师，在1871年的芳蒂联盟运动中非常活跃。1874年，他创办了《黄金海岸时报》，成为一位在黄金海岸寻求非洲人民族自决的领袖。1885年，他创办了另一份报纸《西方回声》，并用该报劝告国人让非洲人在立法会当选代表。他是黄金海岸一位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锋。

伯恩斯爵士，阿伦·卡斯伯特·马克斯韦尔（1887－1980）出生在西印度圣基茨的一个供职于当地和非洲殖民地的公务员家庭。他在西印度开始其事业，但后来却多次供职于尼日利亚，最后于1941年被任命为黄金海岸总督。除了战争之外，他还面临过源自在殖民地被称作“吉备谋杀”的危机。这是一次发生在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死后的1943年的仪式性谋杀。1946年，伯恩斯总督将一部新宪法引入殖民地，该宪法给予非洲人立法会以多数的地位。在他从黄金海岸总督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不久便写出了自传《殖民地公务员》（1949）。

布西亚博士，科菲·阿布雷法（Abrefa Busia，1913－1978）生于布朗－阿哈福地区的文奇，先后在昆西（Kumsi）姆凡齐聘的循道卫理联合会学校和库马西的韦斯利学院接受教育。1936年，他在阿奇莫塔任教，之后前往英国，获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一返回黄金海岸就被任命为地区助理专员。布西亚于1949年来到莱贡的新大学学院任职。在此期间，他出版了研究加纳酋长地位和塞康第/塔科拉迪社会学考察的著作。1951年，他人选立法会，并于1957年成为反

对大会人民党的联合党的领导人。1959年，他开始流亡，在牛津大学做教授，1966年政变后重返加纳，最后创建了进步党。该党于1969年赢得大选。他遂成为加纳第二共和国总统，但1972年他的政府被军队推翻后，布西亚返回牛津大学任教。

凯斯利·海福德，约瑟夫·艾弗里恩（Casely Hayford，Joseph Ephriam，1866－1930）生于海岸角，在塞拉利昂福拉湾学院学习。在黄金海岸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报纸工作之后，他前往英国学习法律并于1896年成为律师，回国后加入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从此以后兼做法律、政治和新闻工作，于1902年创立自己的报纸《黄金海岸领导者》。信报一直是殖民地一份最为重要的报纸。1911年，他出版了准知识分子自传《埃塞俄比亚不作承诺》，书中提出了他的西印度维尔莫特·爱德华·布莱登思想。同年，他还出版了《西非问题真相》，其中攻击了殖民当局的土地政策。他是最早意识到需要站在非洲人一边的泛西非政治鼓动的西非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英属西非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阿克拉召开，凯斯利·海福德当选为副主席。1916年，他成为立法会议非正式成员，在讨论中起到了主要作用。然而，由于西非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角色及其反对格吉斯伯格总督于1925年为殖民地制定的新宪法，他与殖民地领导人纳纳·奥福里·阿塔在政治上闹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与纳纳·奥福里·阿塔闹僵，他一直是黄金海岸和英属西非最为重要的非洲裔发言人。

丹夸博士，约瑟夫·伯克耶（Joszef Boakye，1895－1965）出生于夸胡的Bepong，是奥福里·阿塔的兄弟。他也在巴塞尔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到伦敦大学学习，于1927年在伦敦大学获得伦理学博士学位，还获得了律师资格。他在伦敦期间出版了《阿基姆－阿布阿夸手册》、《阿肯人法律与习俗》和《阿基姆－阿布阿夸宪法》。回到黄金海岸后，他创办了《西非时代》日报。1937年，他创立了黄金海岸青年大会，并于1974年成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创建者之一。1948年，丹夸因殖民地骚乱而同恩克鲁玛等人一起被捕，但1949年殖民政府任

命他为库塞委员会的委员。这时他已与恩克鲁玛分道扬镳并成为一个主要反对者。他相继于 1954 年和 1956 年参加大选，第一次是代表全国解放运动，第二次是代表联合党。1960 年，他成为统一党的候选人，但惨败给恩克鲁玛。他于 1961 年入狱，1962 年被释放，1964 年再度入狱并于一年之后死于狱中。

弗里曼，托马斯·伯奇（1809 - 1990）生于英国，父亲是非洲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于 1838 年来到海岸角堡做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传播卫理派教义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 3 次造访阿散蒂人首都库马西，留下了大量日记。1839 年到 1843 年间，他还数次前往达荷美和尼日利亚，二者都有重要的历史资源。19 世纪 40 和 50 年代，他在黄金海岸做循道卫理联合会的负责人。从总负责人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他曾一度成为阿克拉地区的民事长官。他生命的最后 20 年主要在阿克拉和曼凯西姆度过。

格贝德纳，克姆拉·阿格波利（Gbedemah，Komla Agbelli，1912 - ）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瓦里，父母都是沃尔特地区的加纳人。他在海岸角堡上的中学，在阿奇莫塔完成中学教育，之后当了几年老师，然后又去经商。1948 年，他成为青年组织委员会主席。他还加入了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并成为大会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恩克鲁玛在狱中的时候，他负责领导大会人民党并主编该党机关报《新闻晚报》。他在 1951 年大选中赢得了一个席位，1951—1952 年任卫生劳工部部长，1952—1954 年任商业工业部部长，1954—1961 年任财政部长。当恩克鲁玛转向左派的时候，两人失和，格贝德纳最终辞职。他很快又回到原来的卫生部长的位置上来，但 1961 年被恩克鲁玛解职，并被流放了 5 年。1966 年之后他返回加纳，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商人之后重返政界，在 1969 年大选中组建了全国自由联盟。他在国民大会中赢得一个席位，但遭到阻挠，未能就任。1972 年政变之后，他被救国会议任命为巡回大使，但最终因联合政府问题产生分歧。他被捕入狱很短的一段时间，随后被禁止参加 1979 年大选。

格里菲思爵士，威廉·布兰德福德（1824 - 1997）生于西印度的巴

巴多斯岛，1861 年到 1874 年任殖民地立法会成员，1880 年成为黄金海岸的副总督。1885 年，当黄金海岸从拉各斯分离出去的时候，他成为殖民地的总督，任职到 1895 年。他是英国总督中在位时间最久的。在他的漫长任期内，格里菲思扩展了英国在黄金海岸的权威，与德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划定了边界，总体上扩大了英国的管辖范围。

格吉斯伯格爵士，弗雷德里克·戈登（1869 - 1930）出生在加拿大，曾在英军中服役。1902 年到 1908 年，他在黄金海岸做测绘工作，之后成为尼日利亚的测绘局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于 1919 年任黄金海岸的总督。他坚信殖民地需要重大的基础设施，所以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 10 年发展计划。在他做总督的 10 年里，黄金海岸修建了一个深水港、几条新铁路、几座医院、一个重点中学、供水系统和许多其他设施。他坚信，非洲人应该接受培训以填补公务员职位，殖民地宪法应该改变，以使非洲人在责任政府中得到锻炼。在黄金海岸任职后，他又转到英属圭亚那赴任，但糟糕的身体健康状况使他没能干多久。

克托卡，埃马纽埃尔·夸西（Kotoka，Emmanuel Kwasi，1926 - 1967）出生在沃尔特地区的阿拉克坡里（Alakple）。他是在天主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1947 年加入黄金海岸军队，1954 年接受委任，前往英国和德国一段时间，后作为联合国紧急部队成员前往刚果。1965 年，他成为库马西第一步兵旅的指挥官，参加了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政变之后他成为全国解放委员会成员、加纳武装部队的司令官、国防部长、卫生部长、劳工部长和社会福利部长。他在 1969 年阿克拉机场前的政变失败时被杀，作为纪念在他死的地方竖立了一尊雕像，机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库福尔，约翰 - 阿吉耶库姆（1938 - ）生于库马西。毕业于普列姆佩学院，之后成为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学员，1961 年进入律师业，1964 年进入牛津大学，1964 年获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名誉学士学位，1967 年被指派为库马西的市政会委员。他于 1968 年至 1969 年及 1979 年任议会议员。这个议会起草了第二和第三共和国的宪法。他是

1969 年进步党、1979 年人民阵线党和新爱国党的创始成员。他还当选过第二和第三共和国的下院议员，这两届政府被推翻后他都曾遭到短期监禁。在全国临时防卫委员会执政期间，他做过短时间的地方政府书记，在 1992 年竞选过传统政党领导人但未能成功，1996 年再次参选并获得成功。然而，他却在大选中失败。1998 年，他再次被提名担任传统政党的领袖，在 2000 年大选中当选为加纳总统。2004 年，他再次当选加纳总统。

博士利曼，希拉（1934 - 1998）出生于上西部地区的果卢，在罗拉邦联母语管理局学校接受教育，曾在塔马利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还是地区议员。1954 年，他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竞选议员失败，之后前往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一个政治学学位；然后先后在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得到法语学位，在伦敦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巴黎大学获得政治学和宪法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后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教师，之后为大会人民党做起外交工作。他是第二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79 年被由一群恩克鲁玛主义者组成的人民民族党提名，竞选第三共和国的总统。1981 年，他的政府被杰里·罗林斯及其军人同伙推翻。利曼被捕，直到 1983 年一直受到保护性监禁。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试图将四分五裂的恩克鲁玛主义者重新团结起来，而他则充任了团结会议的主席。

门萨· 埃马纽埃尔·特泰（E. T.）（1919 - 1996）出生在阿克拉。他的音乐天赋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被发现了。离开学校后和他的兄弟等人组成了阿克拉节奏乐队。这之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其音乐趣味一直高度欧化，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加纳音乐家深受美国和西印度的影响。这里还有前欧洲职业音乐人在加纳，他曾一度和他们合作。他于战后加入节拍乐队，因为这个乐队有一个成员到欧洲和美洲旅行去了。这个乐队深受古巴黑人音乐的影响并在其影响下，创造了一种基于非洲节奏的需要，于是出现了“西非上流社会”。1948 年，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1950 年，乐队访问尼日利亚。他还开始录音，录制了许多加纳语歌曲。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正是他最受欢迎之

时，以“上流社会之王”著称。1969年，他的伦敦之旅非常成功。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形式的流行音乐开始挑战并取代“上流社会”。

阿塔教授，米尔斯·约翰埃文斯（1944－）生于海岸角堡，就读于阿奇莫塔学院，之后就读于莱贡的加纳大学，于1967年在那里获得学士学位，并得到一个法律专业证书。当他就要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当选为斯坦福法学院的富布莱特学者。他的第一个教职是莱贡的加纳大学法学院讲师，在这里他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在此期间，他曾任许多大学董事会和委员会的委员。他还曾是坦普尔大学和莱顿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税收和投资领域著述颇丰。1988年，他成为加纳国税局代理总干事并于1996年被任命为总干事。1997年，他被任命为加纳共和国副总统。

纳尔逊，阿祖马（Nelson，Azumah，1958－）生于阿克拉，像许多在阿克拉博库姆（Bokum）地区长大的年轻人一样，他很年轻的时候便开始了拳击生涯。他的第一个桂冠是1978年联邦比赛的羽量级拳王。获得这次成功之后，他转向了职业拳坛，10战胜利之后，他成为加纳、非洲和英联邦的金腰带拥有者。1984年，他赢得了世界拳击委员会羽量级冠军头衔，并拥有这一头衔三年。1988年，他获得世界拳击委员会超羽量级冠军头衔。他想要升级到轻量级，但遭到了失败。他的拳击生涯起伏跌宕，这次失败之后，他又重新夺回超羽量级金腰带但最终于1997年失去了世界拳王的头衔，1998年退出拳坛。阿祖马·纳尔逊曾是加纳最伟大的一位拳王。他因为能在拳击比赛中教训他的对手而被拳击界称作“教授”。2004年，他入选国际拳击名人堂。

恩克鲁玛，夸梅（1909－1972）出生在西部地区的一个小村恩克罗富尔，后在哈夫—阿西尼（Half－Assini）和塞康第的罗马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之后进入阿奇莫塔学院，并在这里任教很短的一段时间。1935年，他前往美国，他之后进入宾夕法尼亚的林肯大学，得到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学位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45年，他前往英国学习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很快被反殖民运动所吸引，最终成为西非学生会的副主席。他于1945年和乔治·帕德莫尔一起成

为在英国曼彻斯特成立的第5届泛非大会组织委员会的书记。1947年，他回到黄金海岸做象牙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1948年暴乱之后，他和5位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领导人一起被捕。到这个时候，他已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失和。1949年，恩克鲁玛组建了大会人民党，要求“现在就自治”。因为该党1950年提出的“积极行动”，恩克鲁玛和其他大会人民党领导人一起被捕。他入狱期间入选议会，因此反被释放出狱，1951年成为政府事务的领袖人物。1952年，他成为首相。1953年，他提出加纳独立的“命运动议”，但接踵而来的是历时3年关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激烈争吵和争论在加纳1957年独立之前两次大选是必要的。他的统治很快变得专制。1958年，他的政府通过了预防性拘留法。1959年，反对派被清除出国会。次年，加纳成为共和国。曾有几次暗杀他的企图。1962年，恩克鲁玛成为终生总统。1964年，加纳成为一党制国家。1966年，当他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的主要支持者——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宣布他为自己的联合总统，恩克鲁玛在几内亚度过了余生。恩克鲁玛写了好几部书，包括他的自传和在几内亚流亡期间的辩解书。

奥福里·阿塔一世，纳纳爵士（1881－1943）阿肯人的阿布阿夸的阿曼亨（1912－1943）。他在巴塞尔的教会学校和阿克鲁庞的神学院接受教育。他曾做过几年职员，供职于西非边防部队，雅阿·阿赫桑特瓦战争期间，他在那里服役。1912年，他升任为阿肯人的阿布阿夸的统治者。1916年克利福德总督任命他为立法会议成员。1920年，他与凯斯利·海福德就知识阶层或像他一样的传统统治者是否是非洲人的真正领导人的问题发生冲突。他是黄金海岸最有影响力的传统统治者，在1927年本土管理条例草案的通过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同一年，他被封为爵士。1943年，就在其去世前夕，他成为两个被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的非洲人之一。

奥乌苏，维克托（1923－2000）出生在阿戈纳－阿散蒂，先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和林肯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他于1952年取得律师资格。在恩克鲁玛执政的岁月里，他成为一位声誉卓著的律师，

当选为1964年—1967年加纳律师协会会长。1966年政变之后，全国解放委员会让他做了首席检察长和司法长官。他帮助建立进步党并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最初，他成为外交部部长，然后出任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1972年政变后，他被拘留，但在1978年，他帮助组织了统一的政府反对派。他被拘留了很短一段时间，阿昌庞被迫于1978年将其释放，但他失去了常务公职。不过，他与前进步党成员一起组织了人民阵线党，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在大选中未能获胜。第三共和国期间，他继续做人民阵线党的领导人并试图合并所有的反对党。1982年的罗林斯政变结束了这些努力。

皮勒，阿布迪（Pele，Abedi，1964 – ），出生在沃尔特地区的多姆（Dome）。他在皇家塔马利联（RTU）俱乐部开始其职业生涯，并于1982年帮助加纳赢得非洲杯。然后，他离开加纳到卡塔尔踢球，转会到FC苏黎世俱乐部，然后返回加纳，为其过去效力的旧俱乐部皇家塔马利联和贝宁的龙队踢球。他继而转会到法国乙级足球联赛。皮勒后来加入甲级联赛马赛奥林匹克队并帮助他们赢得欧洲俱乐部杯，最终在慕尼黑1860队结束了他在欧洲的职业生涯。他入选国家队，被加纳政府授予国家最高荣誉——沃尔特勋章。皮勒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加纳运动员。

普列姆佩一世（Kwaku Dua III，1873 – 1931），1888年作为夸库杜阿三世登上阿散蒂金凳宝座，但因王国内战而直到1894年才得到最后承认。英国利用了阿散蒂人的不满作为1896年入侵其王国的理由。国家被宣布解散，普列姆佩遭到逮捕，他与家人被带到埃尔米纳，然后又到塞拉利昂。经过1900年雅·阿散蒂娃战争这次阿散蒂的最后反抗，普列姆佩一行被送往塞舌尔。直到1924年他才获准返回，但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而已。1926年，英国承认了他的统治者地位。

奎克尤（Quacoe，1741 – 1816），出生于海岸角堡，一个富裕的非洲奴隶贩子的儿子，与其他3个男孩一起被送往英国进行培训，以便将来成为英国圣公会牧师，并最终在黄金海岸上的基督教会供职。他回到黄金海岸后，在海岸角堡建立了学校，后来又在其他一些沿海城

市建立学校。此时，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正值高峰时期，做一名传教士特别困难。奎克一生只成功地让 5 个人皈依基督教，但他在为未来基督教徒成功皈依播撒种子方面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拉特雷，罗伯特・萨瑟兰（Rattray，Robert Sutherland，1881 - 1938），生于印度，父母为苏格兰人。1906 年，他在黄金海岸海关供职，1911 年成为阿散蒂地区助理专员。他学习了许多民族语言，1921 年被委任为人类学部主任。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 9 年，在此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研究阿桑特和加纳北部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他撰写的有关书籍已成为加纳的人类学经典。

罗林斯，杰里 - 约翰（1947 - ），出生于阿克拉，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埃维人。他在阿奇莫塔学校接受教育，然后于 1968 年入读泰伊军事学院。他于 1969 年被委任为中尉，接受飞行训练，并于 1978 年成为一名空军中尉。他于 1978 年参与了一次针对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未遂政变，逮捕入狱，但因 1979 年的另一次政变而被释放，并成为新政府——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在其在位的 4 个月时间里，3 位前国家元首和 5 位高层军官被处决。该委员会将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但在 1981 年罗林斯领导了另一场政变，并再一次成为临时国家防御委员会的领袖。加纳在 1992 年迎来一部新宪法，临时国防委员会变成全国民主大会，罗林斯成为这个新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在是年末举行的大选中获胜，成为加纳第 4 位总统。1992 宪法允许该总统只有 2 个 4 年的任期，2000 年罗林斯不得不下台。从这时起，他一直是全国民主大会的首脑和加纳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势力。

萨尔巴赫，约翰・门萨（1864 - 1910），出生在海岸角堡，一位海岸角堡成功商人可敬的约翰・萨尔巴赫和和阿诺马布的儿子。他曾经在海岸角堡和英国接受早期教育，在伦敦的林肯学院学习法律并于 1887 年获得律师资格，是黄金海岸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人。他是 1897 年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利保护协会创始人之一。他于 1897 年出版了芳蒂习惯法，1904 年出版了芳蒂判例汇编，1906 年出版了芳蒂全民宪法，1904 年帮助创建了姆凡齐聘学校。今天，它成为加纳最重要的

中学之一。1901 年，他继承其父亲的衣钵，被任命为立法会委员。他身居这一职位直到逝世。在那个时代，他是黄金海岸殖民地非洲利益最重要的代言人。

塞齐，威廉・艾苏曼 - 圭拉（Sekyi，William Esuman - Gwira），(1892 - 1956) 以科比纳・塞齐的名字更为人所知，出生在海岸角堡，在那里就读于姆凡齐聘高級中学。他继续在伦敦接受教育，1918 年在伦敦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回到黄金海岸后，他卷入了凯斯利・海福德和英属西非国家委员会。最终，两人因 1925 年宪法问题失和。塞齐成了英国间接统治政策最重要的评论家和殖民地最重要的“不合作者”。他利用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利保护协会作为其主要手段反对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政策，1930 年凯斯利・海福德死后，他主要的非洲对手变成了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塞齐代表了保守的民族主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时，他被激进的新一代所取代。

萨瑟兰，埃福阿・西奥多拉，尼摩尔格（Sutherland，Efua Theodora，nee Morgue，1924 - 1998），出生在海岸角堡。在完成了加纳的教师培训之后，她进入了剑桥大学学习，是第一批到剑桥大学求学的非洲女性之一。她在阿克拉成立了戏剧工作室，即现在莱贡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中的作家研究会。1992 年，她成为在海岸角堡召开的第一届泛非历史戏剧节组织身后的主要动力。该研究会现在每两年举行一次活动。她为戏剧节创作了好几个剧本，其中最知名的是《埃杜夫（Edufu）、福丽娃（Foriwa）和阿南瑟瓦（Anansewa）的婚姻》。

华莱士 - 琼森，艾萨克・西奥菲勒斯・阿库纳（Wallace - Jonson，Isaac Theophilus Akunna，1895 - 1965），出生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1915 年，他加入了英国军队，服役于军需团，做文书。1926 年，他加入商船队，进入英国全国海员联盟。他最终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应邀于 1931 年进入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他在英国做短暂停留后，最终返回塞拉利昂，但很快又离开前往拉各斯（Lagos），最后到阿克拉，在那里开始为当时他的朋友纳姆迪・阿齐克韦任主编的《非洲清晨邮

报》撰稿，同时组织工人。1934 年，他在西非青年团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于 1936 年被裁定出版煽动性的文字，并上诉到英国枢密院。这让他受到了英国左翼的注意。1938 年，他回到塞拉利昂，继续他的激进政治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当局认为他是一个对安全构成威胁的人，于是监禁了他。战争结束后，他仍然是塞拉利昂政治中一个激进的声音。

雅·阿散蒂娃（1863？ – 约 1921）库马西市以东 10 英里一个小镇埃吉苏（Ejisu）的太后。她在 1900 年总督弗雷德里克·霍奇森来到库马西要求金凳的时候联合阿散蒂人反对英国。她与普列姆佩一世及其随从一起于 1901 年被遣送到塞舌尔群岛流亡并于 1921 年死在那里。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萨尼·阿巴查将军，247
I. K. 阿岷法官（后来的大法官），177，227
加速增长计划，220
阿克拉，27；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峰会，226；市政府，78；非统组织大会，131；地方税纳税人，60；风浪港，42；战争努力，76
阿克拉商会，83
阿克拉俱乐部，54
阿克拉橡树之心，257，263
阿克拉－特玛高速公路，148
阿克拉城市议会，116
国防革命公社协会，222
伊格内修斯·阿昌庞上校（后任将军），13；反殖民立场，167；武装力量，166；被执行，180；对加纳人的感情，177；对进步党政府的不满，165；部长职位，166；恩克鲁玛主义者的同情，170；提升为将军，174；被取代，178；政变，161；联合政府，175
阿奇莫塔，58，59
萨姆·阿夸赫，191
阿尔哈吉·易卜拉欣·亚当，260，261
塔维亚·阿达马菲奥，132，136
伊凡·阿达·门萨教授，270
亚的斯亚贝巴，130
阿库福·阿多法官，136，152
塞西莉亚·柯蓝腾·阿都，191
阿科·阿德杰，136
彼得·阿拉·阿杰蒂，244
阿杜，A. L.，78
阿发日·吉安，K.，231
变革联盟，222，223

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13；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的成就，181；人民革命法庭，190，191；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夺得权力，179；过渡准备，181
非洲裔美国人，11，141
非洲特征，55
A. A. 阿弗利法少校（后升至上校及将军），138；被捕，166；被处决，180；反对联合政府，176；密谋推翻恩克鲁玛，148；支持布西亚，166
阿散蒂金矿公司，167，221；几近倒闭，239－240
阿格雷，詹姆斯．E，58
阿吉耶库姆，约翰，203
阿吉埃庞，K. A，191
阿霍伊德，夸米纳，247
阿杰纳，119
阿肯，8；聚集性，9；出现，11；力量扩张，21；拓展，22；治国之道，62；权力凳，14，注释8，20
阿肯化，10
阿卡塔－珀尔，阿洛尔加，191，193
阿科松博大坝，5，6，119，239
阿库福，弗雷德中将，178，180
阿库福－阿多，纳纳，244－245，246，248，264
阿库塞，84
阿夸，23，25，27
阿夸平，64
阿夸平－多哥山脉，6
阿肯人的阿布阿夸，23，56，61，97
全非人民大会，124
阿玛特非奥，G. W，176
非洲卫理公会派教会主教基督教会，48
海军少将阿梅杜姆，乔伊，180
阿蒙加－艾特格，鲁道夫，269
美洲人，138
阿米杜，马丁，243
国际特赦组织，172，204
安蓬萨，R. R.，107
安达尼，予库布，271
安吉洛，玛雅，141
盎格鲁－芳蒂社会，48
安克拉赫，J. A. 中将，148，153
安南，D. F 法官，196
安南，科菲，254
阿诺马布，30，42
反通胀运动，83
阿帕洛，F. K. 法官，154
阿皮亚，J. E.，107，134，154，169
阿以冲突，171
阿根廷，206
阿尔欣，夸梅，203
阿卡阿副总统，K. N.，219，228，229
阿玛，A. K.，135
工人专业团体协会，175，176
萨福公司，8，28，70
阿萨芒克色，61
阿萨莫阿，奥贝德博士，206；与卡纳杜·罗林斯结盟，242－243；批评新爱国党，265；全国民主大会党成立，

209；新党主席，265；支持博奇韦，266；副总统选举，243
匹南柯，阿萨姆·弗兰克，48
阿散蒂博士，S. K. B.，208
阿散蒂联邦，12；官僚化，23；并入阿肯城邦，23；精选知识界，69；军事挑战，21
阿散蒂联邦委员会，69，79，80
阿散蒂亨：阿杰曼·普列姆佩一世，45，59；奥波库·韦尔23；奥塞·邦苏，30；奥塞·卡瓦多，23；奥塞·图图，22
阿散蒂·科托科，105，210，263
阿散蒂人会议，106，108，111
阿散蒂民族，37；傲慢，233；野蛮人，31；最初出现，22；金凳，44，45；对殖民政府的仇恨，40；侵入海岸区，30，34；建立起来的民族财富，69；格言，62；与英国人的关系，44，45；对抗大会人民党，105－112
阿散蒂人青年协会，86，106
阿散蒂地区，64；大会人民党，109；政治不安，211；立法席位，105；高地，6
亚洲人，11
亚洲四小虎，280
联盟，206－207
阿斯旺大坝，119
阿迪木，克里斯，193
大西洋宪章，80
艾德礼，克莱门特，80
阿托赫·阿胡玛，S. R. B.，43
非洲联盟，273
西非商人协会，82，96
阿克西姆，25，60
阿齐克韦，纳姆迪，67
阿祖，克拉布，塞缪尔大法官，159，177，192
巴阿克，科菲，132
巴登·鲍威尔，R. S.，45
巴杜，科菲，159
白芣，埃马纽埃尔·尧，106
巴莱瓦，阿布巴卡尔·塔法瓦爵士（尼日利亚总理），129，130
班巴，阿尔哈吉·莫克塔尔，275
加纳银行，132，197；借贷，223；严格货币政策，239
巴博特，吉恩，28
巴恩斯，查尔斯，42
巴塞斯特，57
战斗：多多瓦，31；菲亚色，22；恩萨曼考，31
铝土矿，8
包库中心选区，250
英国广播公司，206
贝尔菲尔德，H. C.，54
比利时，127，129
贝宁，26
伯纳斯科，弗兰克上校，167
布莱科尔，H. W. B.，77
黑星轮船公司，121，157
黑星，260

布莱尔，托尼（英国首相），273
布莱登，爱德华·威尔莫特，48，55
国家调查局，204，264
波汉，阿杜教授，159，212，245；党的代表大会的让步，228；与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交锋，218；沉默文化，208；作总统候选人，210
空军少将伯克耶，G. Y.，180
伯格诺尔，约瑟夫，134
《1844年条约》，32，80
葆孢芳蒂人，24
边防军，180
博斯曼，威廉，27
奎西·博奇韦博士，竞争旗手位置，266；重实效政策，193－194，196，220；辞职，223
鲍乔，科乔，86，93，131，172
布恩，弗雷德里克爵士，108
鲍迪奇，T. E.，30
布兰德福德·格里菲思，威廉爵士（首席法官），40
勃兰登堡人，26
巴西，206
布拉扎维，129
布鲁，詹姆斯·赫顿，42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131
英属圭亚那，101
英国工党，80
布朗－阿哈福地区，212
布朗－齐亚姆朗，107，112
布朗，E. J. P.，60
佛教，11
建设者旅，124，134，见工人旅
布纳，20
布基纳法索，6
缅甸，76，80
布西亚，阿玛，246
布西亚，科菲博士，13；接受宪法，112；受任政治职务，78；1969年竞选，154－155；大会人民党的批评，118；上诉法院，159；流放，124，156；加纳议会党领袖，103；率领代表团去英国，107，110；遗产，180；恩克鲁玛，160；被政变废黜，161；报纸，159
迦南，17
联合呼吁程序，268
海岸角堡，27，32；行政角色，80；市政管理，78；反对市议会，52；纳税人委员会，60；暴乱，64，70；自治，51；风浪港，42，58；青年运动，69
三点角，2
凯匹腾，约卡布斯·埃利萨·约翰尼斯，29
加勒比海，10
卡特中心，211
卡萨布兰卡，129
凯斯利·海福德，约瑟夫·艾弗里恩，54；布莱登的影响，55；与塞克伊的冲突，61；市政立法，59；天然领导，56，60；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副主席，

57；泛西非主义，67；阿肯人的相似性，62
城堡与要塞：海岸角堡，26；克里斯蒂安堡，26，32，83；克雷弗克，26；埃尔米纳，25，45；大腓特烈堡，26；詹姆斯要塞，26；圣安东尼，25；圣塞巴斯蒂安，25
革命防御委员会，209－10
塞地：阿昌庞塞地，178；继续贬值，220，238，239，273；贬值，178；浮动，197
政治分析中心，238
中央国家委员会，65，66
中央省份铁路，58
中部地区，283
锡兰，80
毛主席，170
钱巴斯，伊本·穆罕默德博士，225
张伯伦，约瑟夫爵士，44，54
商会，98
矿业协会，98
酋长：殖民政策，283；大会人民党，123；解职，61，149；高等教育，283；联合省议会，77，79，80，106；司法机关，38，40；国家机关，78，99；政治角色，106，124，282－283；保护，111；酋长凳，14，n. 8. 见阿散蒂亨；国王；曼策；酋长省议会；乌洛梅；亚娜
中国，127，131
中国人，281
基督教，11，28－30；卫理公会教，41，42，48；摩门教徒，201
美国中央情报局，139；反革命集团，205；反恩克鲁玛政变，166；间谍，201
行政部门，41；非洲化，101；裁员，63
克林顿，威廉·杰斐逊（美国总统），253－254
海岸居住区，26，27；行政区，33；税收，32
可可，3－4；减产，151，185；工业扩展，46－47，57－58，121；高价，104，118，120，273；停顿，13，63，64，67，70；低价，133，135，149，246；进步党，160；研究所，81；肿枝病毒，81－82，99
可可税收和发展基金条例（修正）草案，104
可可销售局，118，121，176，180
可可生产者联盟，121
可可收购公司，102，110
可可局，197
科克尔，W. Z.，61
科伦坡计划，127
殖民发展基金，79
殖民地福利与发展法案，79
有色工人协会，85
共产国际，65
委员会：阿帕洛，149；库西，91，92，93，94；埃利奥特，78；诺埃尔，

68，69；泰勒资产委员会，171；凡.拉尔，102，105；沃森，87，91，92，101
习惯法，38
英联邦观察员小组，211
英联邦秘书处，231
天主教会议，201
大会，126，133
刚果，131
宪法：阿散蒂联邦，22；伯恩斯，84，87；库西，99，102；第二共和国，153
腐败，223，257
乡村律师，38
法庭，49 n.1；律师，42；国家法院，77
库西，J. H. 法官，87
贝壳，18
大会人民党，13；被指控为部落制，107；取消 1965 年大选，137；舞弊，101－102，132；大选活动，96－98，109－110；2000 年大选，249；外国投资，120；建立，93；增税，133；内部摩擦，103；市政选举，95；工作官员，95；反对，105，122，133，136；迫害成员，94；名之争，241
克拉布，科菲，136
刑事诽谤和煽动叛乱法，263
古巴，193，205
坎利夫－利斯特，菲利普爵士，76，269
公民数据审核委员会，190
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87，92
塞浦路斯，111
达志，纳纳·阿托，260
达干邦，19，20，44
达贡巴，224；伊斯兰，224；青年组，225
达贡巴传统议会，224
达贡传统地区，271
达荷美，17
达格利什，安德鲁，84
丹麦人，25，26
当梅人，25
丹夸博士，J. B.，被捕，84，133－134，136；中央国家委员会，65，66；奥福里·阿塔的侄子，64；反对共和，125；加纳起源，17；与恩克鲁玛的关系，86，94，139；青年运动，69，79
丹夸/布西亚传统，210，246
德·格拉夫特·约翰逊博士，137
德库，A. K.，154
民主人民党，229
登基拉，22，23
萧条，13，63
去英国的代表团：1894 年的阿散蒂，45；1898 年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44；1912 年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54；1934 年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66；1934 年黄金海岸与阿散蒂代表团，65－66；1920 年英属西非国民大会，57；1955 年民族解放运动，107；1956 年民族解放

运动，110
发展规划：大会人民党的第1个5年计划（1952），116－122；大会人民党的第2个5年计划（1959），119；第2个5年计划被放弃，134；大会人民党7年发展计划（1963），134，140，148；格吉斯伯格计划，58，62；财富功能，282
钻石，8
直接统治，38－40
动物的驯化，18
食用植物的栽培，18
杜波依斯，W. E. B.，141
杜福尔，夸贝纳博士，239
杜马，文森特神甫，191
顿维尔，约瑟夫，29
多杜，卡梅伦，159
迪普伊，约瑟夫，30
12月31日妇女运动，207，242，253
迪尤拉商人，21
伊斯曼，詹姆斯·法雷尔，41，47
东非联盟，130
东欧国家，135，274
东欧，193。又见东欧国家
东部省，81
选举委员会，154，190，249，272
经济咨询委员会，150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26，253，272
土著知识分子，43，56
加纳全民党，209，229，243
埃瓜福，27
埃及，127
埃尔德·邓普斯特，47
大选：1951，95－98；1954，102－104；1956，109－112；1969，155－156；1979，180；1988，207；1992，211；1996，231－234；2000，245－251
精英，受西方教育者，12；内政职位，41－42；乡村律师角色，38；解体，33，见土著知识分子；天然领袖
伊丽莎白二世，英国女王，137，254
埃尔米纳，27，28，39；要塞交换，33；内部事务，70
英语，25，26
流行病，52－53
经济复苏计划，194，210
埃塞俄比亚国防委员会，67
欧洲人，11，12；公务员职位，78；到来，25－27；经济统治，83；影响，28；反欧洲人暴乱，64，83；贸易，24
欧洲人联盟，231
埃维人，9，10，54，103；罗林斯，193；进步党的迷信，158
执行委员会，66，77
退伍军人，124
亚德马，纳辛贝总统，226，258
芳蒂人，12；有限集中，24；麦克莱恩统治，32；立法会议代表，54
芳蒂联邦，33，41，42
“法瑞干”爆炸案，218

速审法庭，260，282
费利，罗杰上校，180
弗格森，乔治·艾克木，44
斐图，27
枪械，21
粮食作物，4－5，27
外汇局，197
加纳第四共和国，1，14，217。见加纳
法国，26，44；原子实验，127；非洲公社，127
罢工，160
自由法国，75
弗里曼，托马斯·伯奇，29，41
弗里敦，57
阿散蒂自由之友，66
预防独裁阵线，176
加人，10，11，17；与进步党的敌意，158；入侵，27；移民，24；史菲莫·柯丕，122，123；国，23；贸易，25
冈比亚，10，55
加维，马库斯，65
加人立场协会，122
格贝德纳，克姆拉，87，93，95；被禁止出任公职，154；谴责预防性拘留法案，133；种族性，153；归还恩克鲁玛遗体谈判，169；恩克鲁玛，132，139；反对联合政府，176－177；破坏罢工活动，155
黄金海岸原住民权力保护协会：凯斯利·海福德之俘，57；建立，12；领导，56；反对海岸角堡市议会，52；反对中部省铁路，58；反对新本土管理条例，61；拒绝合作，60；酋长与精英的结合，44；青年运动，69
国民生产总值，195，273，280－281
地质学，6
德国，44
加纳：作为颠覆基地，130，149；森林大火，195；海岸线，5；负债，148；人权，172；不结盟，149；一党制国家，136；与英国的关系，137；与邻国的关系，127；宗教，11；汇寄，282；共和国，125；社会主义，139；统计数字，1，115－116；第三世界地位，281；工人阶级，122。见加纳第四共和国
加纳艺术与科学学会，159
加纳航空公司，157，271
加纳律师协会，175，203，207，209，227
加纳广播公司，196，227，249
加纳商业银行，132，271
加纳－刚果联合协议，129
加纳议会党，103，104，105，109
加纳农民大会，96
加纳－几内亚联盟，126
加纳－几内亚－马里联盟，129
加纳工业控股公司，191
加纳国家学院，92
加纳国家石油公司，260
加纳国家贸易公司，158

加纳人民代表大会，93
加纳石油公司，223
加纳铁路，271
加纳第二共和国，13，156
加纳第三共和国，13，185
加纳渔业公司，157
格洛弗，J. H. 上尉，34
格洛弗-阿多，J.，60
加纳全国贸易委员会，134
黄金，6-7，22，273；不断增加出口，46；采矿，42，52
黄金海岸，1；管理，38，46；可可农，13；可可市场，68；殖民地，12，34，84；发展计划，99-100；经济，99；退伍军人，83；新名，17；铁路，46；税收，46；大学，79；战时局势，75-77
黄金海岸与阿散蒂可可联盟，64
黄金海岸会议，98
贡贾，10；创立者，20；种族对立，224；国王，20；新苏丹国，19；奴隶搜捕，62；社会财富，21；条约，44
戈尔巴乔夫，206
新约或五旬节教会，201
总督：诺贝尔·雅顿-克拉克爵士，98，99，106，111；布兰德福德·格里菲思，威廉爵士，43，44；伯恩斯，阿伦爵士，77，79，87；克利福德，休爵士，53，59；康兰，E. 上校，33；克里西，杰拉尔德爵士，84，88；格吉斯伯格，戈登爵士，57，58，59，60，63，78；霍奇森爵士，弗雷德里克，44；霍德森爵士，阿诺德，67，69；马克斯韦尔爵士，威廉，40，43，47；内森爵士，马修，40；派因爵士，本杰明，51；罗杰爵士，约翰，40，52，54；罗爵士，塞缪尔，38；斯莱特爵士，兰斯福德，63；斯特拉姆上尉，G. C.，37；托马斯爵士，申顿，64；索伯恩，詹姆斯，54；厄舍，赫伯特，38，39
戈翁将军，雅库布，169
格兰特，弗朗西斯，42
格兰特，乔治 A.，60，84
大阿克拉，23，24，27，32，51
大联盟，230；对 1966 年大选结果不悦的接受，233；难处理的性质，249
英国，12；发展基金，79；重债穷国，261；增加控制，33；受邀介入，119；重建与加纳的关系，149；奴隶买卖，31；帝国税收，78；增值税，222
大联合人民党，249
关人，10，24
几内亚，6，149
古尔，9
加纳水务有限公司，268
加纳污水处理公司，268
黑根，J. E.，177
黑根，乔治教授，249，258
海尔，塞拉西，131
黑利，洛德·威廉·马尔科姆，71
哈夫阿西尼，2

哈马舍尔德，德格，129
汉森，翰尼，160
哈雷，J. W. K.，148，154
热风，2
豪萨兰，18，20
海福德，马克，55
希尔上尉，H. W.，32
印度教，11
重债穷国，221；完成点，274；启动，261；反对，262，274
艾滋病流行，254，264
霍顿博士，詹姆斯·阿弗里卡纳斯，33
乌弗埃－博瓦尼博士，费里茨，127
人权观察/非洲，204
赫顿，米尔斯，T.，56
易卜拉欣中校，阿卜杜雷，2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援助进步党政府，161；高级顾问，199；查问财政责任，220，221；燃料价格，267；重债穷国计划，26，261，174；其政策的有限效果，150，281；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193－194，206；进步党的依靠，160；提供贷款，148；不受欢迎的建议，160
全国临时调节委员会，190
所得税，78
独立非洲国家，126
印度，80
印度人，259
间接统治，12；介入，61；内部事务，70；正式使用术语，64；国家财政，78
工业发展公司，102，121
国家临时选举委员会，211
通货膨胀，239，273
遗产，202
尹坤萨赫，A. E.，177
国税局，197
国际反帝同盟，65
党内顾问委员会，231
伊努萨，阿尔哈吉·伊萨卡，245
灌溉工程，167，168
伊萨，马拉姆·尤西夫，260
伊斯兰教，9
综合社会发展中心，268
以色列，127
象牙海岸，6；混乱，258，272；可可，273，282；密谋策划人，149，205，206；与加纳关系，127，131；走私，168，274
日本，262
日本人，76
耶和华见证人教会，201
6月4日运动，188
乔那，萨姆，240
琼斯博士，奥福里，245
司法委员会，203
初中，197
凯撒，埃德加，118
Kalabule，174，180，186，247
卡尔多教授，尼古拉斯

卡里巴大坝，118
约瑟夫·卡萨武布（刚果总统），129
肯普，丹尼斯，47
肯尼迪，约翰·菲茨杰拉德（美国总统），111，130
凯塔，42
国王：阿格雷，33；阿波罗尼亚国王，32；哈提，42；科比纳·吉安，34；塔奇·塔维亚，39。又见阿散蒂亨；酋长；曼策
金坦波文化，17－18
齐索托人，18
科福里杜亚，84
科乔·马布拉，39，52，61
科拉，22
肯门达糖厂，167
肯克姆巴，酋长地位要求，224；基督教，224；与纳农巴人争斗，224－226
肯克姆巴青年协会，224，225
科诺 梅特·科勒，54
科尔莱布医院，58，176
科尔莱布，科比纳·阿布，61，79，136
科泰将军，R. E. A.，180
克托卡上校，E. G.（后任将军），148，152
科托科协会，69
潘杜，122
库福尔，约翰·阿吉耶库姆，14；非洲联盟，273；当选北方人民党领袖，228－229；国际声誉，272－273；库福尔经济学，274－275；国会，218；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210；记者招待会，263；私营成分，281；许诺商业黄金时代，257，271；和解委员会，254；提高工资，245；与米尔斯失和，251；2004年大选，266；北方人民党中的地位，272；争取2000年大选提名，244－245；访问多哥，258
库伦古古，135，139，166
库马西，22；公共卫生局，78；鲍迪奇，30；大会，69－70；入侵，34；市政委员会，122；穆斯林，23；暴乱，84；协会，63；沃卢姆，45
科威特，206
夸胡高原，6
奎，乔基姆·阿玛蒂，191－192
工党，66
拉各斯，57
兰普蒂，C. O.，188
兰普蒂，奥贝泽比，137
丹尼尔·拉蒂，249
加纳爱国者联盟，124
黎巴嫩人，11，56，82，83，122，又见叙利亚人
法律体系：习惯法，38；本地法，38，44
立法：外国人遵守秩序法令，156，157；避免歧视法案，123；酋长地位法案，123；刑事诉讼程序，136；取消资格法令，177；加纳企业（促进）法，157；加纳企业法，148；加纳国籍

与公民条例，122；家庭法，201；工业关系法案，124；国家发展税收，160，168；出版物救国委员会约束法令，172；预防性拘留，123，150；禁止谣言法令，152；宗教团体法，201
立法委员会，55；非洲人反对，59，60；构成，80，95；非洲人多数要求，66；受教育的普通人，85；非酋长选举，77；奥福里·阿塔被弹劾，57
伦诺克斯·博伊德，阿兰，107，111
利奥波德维尔，129
刘易斯博士，阿瑟，119－20；幻灭，140；加纳的工厂，121；进步党与经济战略，150；各派的视野，132
解放运动，130
利比里亚，55，129，225，258
利比亚，193，205
利曼博士，希拉，13；患病，229；建立人民全国大会党，210；典礼，185；拒绝加入恩克鲁玛主义者，241；部长选举，220
林肯大学，85，102
沿袭体系，8，15n. 10
利斯托韦尔伯爵，125
利文斯通学院，48
洛克，约翰，153
隆明，240
劳，埃瑞克，127
卢蒙巴，帕特里斯，126，129，131
麦卡锡爵士，查尔斯，31
麦克莱恩上校，乔治，31－32
麦克米伦勋爵，哈罗德（英国首相），273
马登博士，R. R.，32
麦基提，伊拉斯马斯，156
马哈马，阿尔哈吉·阿留，246
马哈马博士，爱德华，229，249
马科拉市场，180
默兰，丹尼尔（南非总统），102
马来亚，111
马来西亚，280－281
马里，21，126
曼普鲁谷，18，20，44，62
曼丁哥语，18
锰，8
玛希宫，111
曼策，25，39
马尔盖爵士，艾伯特，131
茅茅党人，107
门萨，阿塔，86
门萨，J. H.，157；竞争新爱国党旗手职位，244－245；批评全国民主大会党政府，238；寻求借贷，161；在美国受审，206
商人，42，45
气象雇员工会，93
梅耶罗维塔，伊夫，17
芳蒂全国政治协会，48
自由正义运动，208，209
中央航路，28
军事政变：反布西亚，161；反恩克鲁玛，138；反人民国家党，189；反最

高军事委员会，179；冷酷手术，147；非洲趋势，142
军事精英，188，189
米尔，约翰·斯图尔特，153
米尔斯教授，J. E. 阿塔，254；全国民主大会党副主席，230；击败博奇韦，266；总统论坛，247；斯韦德鲁声明，242
矿，8；矿难，66；加拉姆西掘金，7；暗礁，7-8；西部省份，52
莫勒-达格巴尼，9
蒙罗维亚，129
摩尔，E. N.，166
莫西，44
蒙巴顿勋爵，路易斯，137
市政府，51；政府武装，53；伯恩斯宪法，80；冲突，52；市议会的扩张，78
纳纳·阿伊雷比·阿夸赫，64
纳纳·巴福尔·奥塞·阿科托，105
纳纳·奥福里·阿塔爵士，56；阿萨芒克色之争，61；凯斯利·海福德异议，57；批评，69；执行委员会，77；新本土管理条例，65；西部省议会，60
南卡-布鲁斯，F. V.，67
纳农巴人，19，20；种族冲突，224
国民大会，111
社会主义学生全国协会，124
全国合作会议，124
国债，199
国防委员会，190
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231
全国民主党，97
全国酋长会议，283
民族主义，33
全国和解委员会，259，275
天然领导人，60
纳粹，76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12，56，60，69
国家独立党，210
国家民主委员会，190，206，208
全国民主大会党，14，209；试图宣布违法，263-264；预算问题，220；补选损失，227；构成，217，220；2004年旗手之争，266；与新爱国党合作，275；新爱国党中的腐败，275；党内腐败，241；2000年大选结果的打击，253；双重公民身份，228；2000年大选，249-250；种族不安，224；外债，219-220；独立报纸，219；内部纷争，220；通货膨胀，221；肯克姆巴的请求，224；缺乏内部民主，244；国会议员不满，226；反对新爱国党的政策，262；进步联盟成立，229-230；罗林斯被解除党主席职务，265；声誉，275；归还财产，259；第二次统治238-240；中学考试结果，226-227；争取接替罗林斯，242-243
新民主运动，188
恩多姆博士，帕阿·奎西，258
非洲发展新经济伙伴关系计划，273

纽曼，约翰·亨利主教，96
报纸/周刊：《阿克拉晚间新闻》，87，92，96，128－129，132；《阿克拉使者》，41；《非洲清晨邮报》，67；《阿散蒂先锋》，108；《天主教旗帜》，201，208；《基督教信使与考察者》，41；《远征指南报》，249；《每日写真报》，96，122，159，180，187－188，200，249；《回声》，172；《晚新闻》，152；《言论》，219，227；《加纳纪事》，208，219，224，249；《加纳时代》，132，136，159，170，179，205，247；《黄金海岸原住民》，43；《黄金海岸纪事》，43；《黄金海岸独立报》，43；《黄金海岸领导者》，55；《黄金海岸卫理时代》，43；《黄金海岸国家》，43；《黄金海岸时代》，42；《黄金海岸周刊》，94；《独立日报》，192；《莱贡观察家》，152，160，172；《曼彻斯特卫报》，102；《黑人工人》，66；《新非洲人》，85；《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102；《人民每日写真报》，200，202，205；《先驱者》，159，172；《公共议程》，242，249，268；《观察者》，159；《代言人》，159；《西非时代》，65；《西非》，162；《西非导报》，129；《西方回声》，42
全国调查委员会，190
尼加拉瓜，205
尼日利亚，55，66；挑战加纳，128，129，131；可可市场，68；严厉改革，204；驱逐加纳人，195，203；高等教育，79；库福尔访问，258；和平新方案，272；策划者，205，206；为加纳供油，181；来自尼日利亚的军队，84
尼日利亚人，10；赶出加纳，156－157；零售贸易，281
尼日利亚工会，66
旖旎·夸贝纳·博讷二世，82，83，96；反通货膨胀运动，96
国家独立党，210
恩科伊博士，安蒙，177
恩克罗富尔，169，170
恩克鲁玛，杰马勒·果尔凯，241
恩克鲁玛，夸梅，13；非洲必须联合，130；大赦，160；军队，148；被捕，94；暗杀企图，135－136；葬于加纳，170；性格，140－141；酋长，94；共产主义联系，91；刚果，129；宪法，95；腐败，191，141，149；批评，100，122，129；政变，138；黎明广播，132；大选，97；判断，142；科乔·鲍乔，87；政府事务领袖，98，99；意识形态研究所，132；工业化，157；国际赞誉，192，127，141；马克思主义，137；母亲，169；向左转，131－137；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280；恩克鲁玛主义，133；恩克鲁玛主义者，180；反对新殖民主义，128，150，280；泛非主义，125－126；政治王国，283；许诺天堂，

116；暴乱的反应；84；再查，241；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110，111；与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关系，92，93；党的角色，124；社会主义，120；英国学生，85；塔，148；越南战争，138；沃尔特工程，118
恩克鲁玛女士，法蒂雅，170
全国解放委员会，13；大会人民党政策，150；不断降低的声望，152；经济，148－149，157；成立，138；军事，151；全国和解委员会成立，150；恩克鲁玛攻击，151－152；组织制宪大会，154；新闻，152
民族解放运动，105，125；成为政党，106；大选竞争，109－112
北部选团，97
北部省，109
北方地区，12，46，80，98，111
新爱国党，14；取消6月4日节，164；同意挖出被处决的领导人遗体，259；补选，272；对新爱国党的法庭挑战，218－219；北部种族骚乱，271－272；大联盟形成，229；准许双重身份，282；高层腐败，259－261；燃料价格提升，266；1992年选举损失，211；反对1993年预算，219；选举副总统，246；稳定经济，262；被盗的裁决发表，211，219；大专教育，279；青年支持，248；1997年退席，238；水的私有化，268－269
北方人民党，103，104，109，110
救国委员会，13；布西亚，171；可可价格，168；构成，166；恩克鲁玛之死，169；政变策划者，172；处罚，169；经济政策，167－169，173－174；埃维人，166；自给自足的工业，168；自给自足，167；市场输送食品的经营，168；反对，171；报纸，172；与非洲邻国的关系，171；拒绝履行债务，167；逆转塞地贬值，167；最高军事委员会取代，174；走私，168，174；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167；学生，172；工人，173
全国改革党，242，248，249
恩萨瓦姆，84
加纳学生民族联盟，160，270，175
努努·门萨，约瑟夫准将，188，190，193，192
尼雷尔，朱利叶斯（坦桑尼亚总统），241
非统组织，130；阿克拉会议，140；亚的斯亚贝巴，138；观察1996年大选，231；给加纳施压与英国断绝关系，137；难民，149
奥巴桑乔，奥卢塞贡（尼日利亚总统），258
奥蚌，P. V.，223
奥布阿西，46
奥福里·阿塔，威廉，176，177
奥夫苏－阿玛阿赫，乔治，159
奥海内，伊莉莎白，180
油椰子，2

奥阔姆佛·阿诺基，22
奥林匹欧，斯尔法纳斯（多哥总统），127－128
奥旁诉阿奇尼案，39－40
法令（殖民地）：特许权法案，44；刑事诉讼程序，38；官地，43；市政，51，59，60；国内司法，38，40；国内行政，61；国内管理税，64；国家权力，69，77；国家法庭，77；国家监狱，40；厌恶，65，66；州议会（阿散蒂），108；最高法院，38，40
奥萨福·马福，尧，14n.2，273
加纳之父，138
空军副元帅，奥图，迈克尔，153
奥图姆福尔·奥波库·韦尔二世，272
奥乌苏，维克托，107；被捕，177；部长位置，156；人民阵线党候选人，180
奥乌苏·阿昌庞，J.H.，249
进步联盟，243
政治咨询委员会，150
帕德莫尔，乔治，85，125，141
减轻调整社会代价行动规划，199
泛非历史戏剧节，230
泛非主义，130
泛非主义会议，55，85，107
泛西非主义，128
人民防卫委员会，190、202，210
和平团结委员会，176
五旬节协会，209
人民法庭，190。又见公共法庭
莫斯科东方大学，67
佩普拉，夸梅，238；受审，260；拒绝工会代表大会的要求，246；被阿散蒂金矿公司理事会开除，240；判刑，261
石油债务，258
人民阵线党，179，180，210
人民传统党，210
皮阿宁，夸梅博士，228－229，245
普兰格，奎西，95
自由正义人民运动，176
人民全国大会党，210
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13；反西方，205；一揽子赔偿，209；可可工业重建，194；政变企图，192－193，206；法庭，202；批评，198－199；民主化，206，208；示威，195；贬值，194；地区议会，206－207；第一个经济复苏计划，193－196；第二个经济复苏计划，196－200；经济好转，195；成立，190；超越，191；节日攻击，219；国际借贷，194－195；谋杀法官，191；律师，202；遗产，280－281；媒体，200－201；中产阶级，191；军队，192；普遍呼吁，190－191；预防性拘留，204；私有化，271；改革主义政策，204－205；宗教团体，201；返回多党民主，208；同恩克鲁玛时代的相似性，205；社会主义政策被抛弃，196；最高军事委员会，248；学生，191；双轨政策，206

人民全国大会党，176；政变，189；大选获胜，180；政府建构，181；恩克鲁玛主义党，179；自我毁灭，189
总统个人警卫团，138，147
波兰，127，131
葡萄牙人，12，23，25，31
积极行动，93；呼吁，94；向战术行动过渡，98；反对，100
积极行动委员会，127
邮政公司，269
鲍威尔，埃里卡，139
进步党，155，156；外国人，168；布西亚，171；可可，158；危机，161；国内政策，158－59；经济政策，157，160；电力输出，171；就业，157－158；履行债务，158；军队，165；非统组织，171；报纸，159－160；与西方的关系，171；罢工，160；苏联培训的非洲人，171
公私伙伴关系，160
总统论坛，247
新闻委员会，187
普林西比岛，26
监狱毕业生，96
枢密院，38，61，67，282
财产所有权，282
普劳腾，基督教，29
省酋长会议，59－60，61
伪科学种族主义，47－48
公共法庭，192；取消，264；审判权作用，203，腐败，203；政变策划者，202－203；批评，203－204；建立，292；上诉体系的建立，204；可怕的机构，204；法瑞干爆炸案审判，218
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268
奎努准将，阿诺德，188，190
奎森－塞凯，亚历山大，138
优质粮食事件，260
奎克尤，菲里奥，29
奎斯特，埃马纽埃尔，98
无线之眼，227，248
雨林，2－4，22
拉特雷，R. S. 中尉，62
罗林斯，杰里，13，14；1992年战役，209，211；6月4日运动主席，189；宪法，228；腐败，247；新爱国党政府的批评，265；2000年大选，250；杰出人物，254；“圣战”，189；国家调查局总部邀请，265；1979年政变领导人，179；谋杀法官，275；恩克鲁玛，212，229，241；反对执行，180；声望，212；经济争论的许诺，200；宗教调停，226；再定居，264；第二总统，237；社会主义，193；第三共和国，188，189；多哥，226；肥胖的政客，248；妻子的总统野心，242
罗林斯，纳纳·卡纳杜，207；女儿的国外教育，248；全国民主大会党总统提名，242；人身攻击，219
改革运动，241
地区法庭，264。又见公共法庭

尊敬的赖因多夫，卡尔·克里斯蒂安，17
罗得西亚，137－138
里贝里奥，A. F.，55
河，6，8，20，24
罗伯托，霍尔登，126
罗斯维尔，R. R. 牧师，133
俄罗斯人，119，136
卢旺达，226
萨福－阿杜，夸梅，176
萨拉加，20
萨拉赫，E. K.，158，159
萨洛韦，H. R.，93
索尔特庞德，42，58，79
桑科法，284
圣托姆，26
结构调整规划，13
萨尔巴赫，约翰，42
萨尔巴赫，约翰·门萨，42，48，62
萨科棣，F. P. 法官，191
沙特阿拉伯，206
萨维奇，R. A. 博士，55
施罗德，杰哈德（德国总理），273
斯科特，弗朗西斯爵士，45
斯科茨伯勒男孩，66
第二届世界水问题论坛，267
原住民事务秘书处，40
隔离居住，53
塞康第，46；市政府，51－52，60，78；暴乱，64；罢工，70
塞康第铁路协会，66
塞齐，科比纳，48，60，61
色罗米，维克托，260
塞内加尔，126
严重欺诈办公室，275
塞舌尔，45
沙加里，谢胡，205
沙马，26，64
特别调查委员会，191，192
塞拉利昂，45；内战，225，258；I. T. A. 华莱士·约翰逊，67；部分英属西非国民大会，55；大学，79
塞拉利昂人，10，41
新加坡，280
奴隶买卖，21；停止跨大西洋买卖奴隶，30；国内，37；早期葡萄牙的作用，26；17 世纪，27
斯莫尔，B. J. 主教，48
史密斯，弗朗西斯法官，41
社会主义，160
社会主义阵营，280。见东方阵营国家
公谊会，176
南非，130；反种族隔离斗争，205；对话，159，160，171
韩国，279，280
苏联，129，131，193
西班牙人，26，31
喷火基金，77
学生代表会议，270
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信托，247，279
体育场灾难，263
国家建设公司，134

国家渔业公司，134，196
斯特里克勒欺诈案，68
罢工，133，151
苏丹语地区，1，19
父系形象，8，45
第一任最高军事委员会，174；反对，175；取代，178
第二任最高军事委员会，178；政变，179；塞地贬值，178；经济政策，178；反对，178－179
Swish（一种饱经日晒的泥），116
叙利亚人，11，56，83，122。又见黎巴嫩人
战术行动，98，101
塔科拉迪，42；深水港，58；港口设施，185，197；战时飞机场，76
塔马克洛，B. E. A.，83
塔马利，272
塔诺，古西，242
坦桑尼亚，130
塔夸，46
马来西亚电信公司，269
挪威电信，269－70
特玛，122，197
泰特，约翰，172
泰国，280
第三共和国，88；宪法问题，187；腐败，186－187；赤字，186；经济问题，185－186；种族紧张，187；世仇，187；通货膨胀困境，186；缺乏决断，186；报纸，187－188；过渡性条款，188；工人不满，186
第三世界欠发达，279－280
汤普森，科乔 A. W.，60，67
木材，2，52
蒂莫西，班克尔，122
廷达纳斯，20，62
多哥，10，17；与加纳的边界，149；加纳北部宗族动荡，225；与加纳的摩擦，131；独立，127；阴谋策划者，139，196，205－206；走私，168，206－274
多哥兰，97；边界测绘，45；大会，103；大会成立，103，大选，109；德国，115；特定领土会议，80；南方叛乱，122；托管领土，108，109
地貌，6
特玛炼油厂，261，266
杜尔，塞古，126，138，169
旅游，230
贸易，42；扩展，41；金子，22，24；可乐树，22；专营，47；保护，31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54
小巴，267
舌蝇，5
齐卡塔，科乔上尉，188；被起诉谋杀法官，192，275；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顾问，204；经济复苏，200；退休，223
齐卡塔，查楚，260
塔布曼，（利比里亚总统），102，125
工会代表大会，93；官员被捕，94；

大会人民党控制，124；最低工资，246；全国和解委员会认同，169；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196；进步党160；社会主义控制，132
塔利，安德鲁，139
塔斯基吉学院，55
契维语，54，56
非洲联合公司，64，82，120
乌干达，130
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84－87，91，106；大选，97，110
加纳农民联合会议，120－121，123
加纳联合运动，248，249
全国联合大会，187
世界黑人改良协会，65
统一政府，207；防御，176；反对，175－177
联合国，80，111，126，149
美国，261；驱逐外交人员，205；与加纳关系改善，206；军事，76；关系，149；支持反革命集团，205
大学，279－271
加纳大学，100，159；反对全国民主大会党，220；反对恩克鲁玛，137；反对国家临时军事委员会，195；使用费，270
科技大学，241
西印度大学，140
统一党，123
上沃尔特，127，149，205。又见布基纳法索
美国众议院代表团，200
厄舍镇，116
苏联，127
乌图卡，E. K. 少将，180
沃尔特铝，195
凡·拉尔，W. B. 法官，136
增值税，221－2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7；新政府，269；再引入，238，246；撤销，222；沃瑞克－布拉比，248
阳台男孩女孩俱乐部，241，242，243
阳台男孩，86
凡尔赛和平会议，55
越南，138，149
暴力犯罪，263
美国之音，206
沃尔特大坝，195
沃尔特湖，6，10，157
沃尔特地区，275
沃尔特河当局，258
沃尔特河工程，10，118－119，132，134
选民登记，249
沃卢姆，亨德里克，45，47
佤，20
华莱士·约翰逊，I. T. A.，66
水私有化，267－269
水部门结构调整秘书处，268
水税，268－269
供水系统议案，269
艾肯·沃森，84

西非青年团，67
工人防卫委员会，190；最高法院的人侵，203；司法角色，202；革命防御委员会取得的地位，210；工会代表大会的衰弱，196
维尔贝克，纳撒尼尔，129
韦林顿，奥达尔提少将，179
沃瑞克-布拉比，查尔斯博士，248，258
西非（报纸），162
西非航空公司，128
西非考试委员会，128
西非上诉法院，57，67，80，128
西非货币发行局，128
西非医务部门，53
西非管辖地，46
西非学生会，65，85
西印度，79
威廉，H.S.，55
威尔逊，伍德罗（美国总统），56
温尼巴，10，42，58，64；平原，24；风浪港，132
温尼巴思想研究所，230
威尔铎，E.K.大法官，263
沃尔曼航运，47
沃尔斯利，加尼特爵士，34
妇女组织，124
工人旅，134
第一次世界大战，54；非洲人，75；行政部门，59；可可，68；经济条件，56-57；权力的自决，55
第二次世界大战，13；非洲人，75；可可市场，68；之后的新挑战，71；泛西非主义，71；泛西非注意，128；储备积累，116-118；胀枝病，81
乌洛梅，25
雅·阿散蒂娃，45
亚娜，予库布·安达尼，171-172
亚米奥勾，莫里斯（上沃尔特总统，即现在的布基纳法索），135
延迪传统地区，271，272
南斯拉夫，127
约鲁巴兰，17
少年先锋队，133
青年运动，65，69，70
赞比西河，118
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121

作　者

罗杰·S. 戈京是莫瑟尔学院城市与文化研究系的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非洲殖民史，特别是加纳和西非的历史。他还著有《回顾与展望：殖民统治下的加纳海岸公社》。